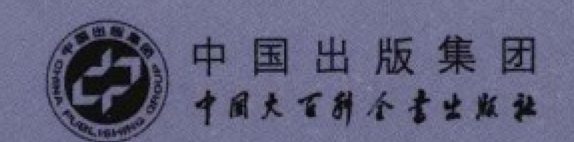


瑞典史

尼尔·肯特 著　吴英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Sweden



A Concise History of Swede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ww.cambridge.org

ISBN 978-7-5000-8239-2
9 787500 082392 >
定价：40.00元

世界历史文库
World History Library

瑞典史

A Concise History of Sweden



图字:01 -2009 -5506

A Concise History of Sweden[1](978 -0 -521 -01227 -0) by Neil Kent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瑞典史/肯特著;吴英译.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9

ISBN 978 -7 -5000 -8239 -2

(世界历史文库)

Ⅰ.瑞… Ⅱ.①肯…②吴 Ⅲ.瑞典-历史 Ⅳ.K5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166950号

责任编辑 李玉莲 王亦妮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 -88390635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20.75

字 数 280千字

印 次 2010年6月第1版 2010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0.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世界历史文库》出版前言

在全球化时代，关注世界各国各地区文明发展的源流、现实和未来，不仅仅是新世纪人文学科的一个重点课题，也是许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兴趣所在。甚至，关注别国热点，不亚于关注自身状况，也已经成为心态开放、视野开阔的许许多多当代中国人的一种精神生活方式。然而，至今我国尚未出版过一套相对完备的世界国别史及地区史丛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版业虽然陆续推出过一些国别史、地区史，但既无规划，也很分散，而且主要集中在英、法、美、俄、日、德等大国，覆盖面过于狭小，更遑论完备与权威了。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通过深入调研，邀约史学界专家进行多方论证，精心策划组织出版这套《世界历史文库》。

《世界历史文库》主要选收国别史、地区史的通史性著作，以国别史为主体，适当辅以地区史。计划共出版80种，2年内出齐。文库编辑委员会特邀我国世界史学界著名学者专家担任学术顾问，精心遴选著作。编选者和学术顾问一致认为，每个国家、地区的历史只选一种著作，因而要求此一种应是在学界已获得广泛定评的上乘之作，且最好是最新成果，作者应为著名史学专家，原出版者也应是知名的出版机构。原著使用的语种主要是英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中文译者应基本上是史学专业人士或具有较高史学修养的翻译家。总之，学术性、权威性、完备性、可资借鉴性以及可读性，是《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所追求的目标。

显而易见，入选《世界历史文库》的著作，只是给读者们提供了关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历史一种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在史学领域里，治史者所拥有的材料、眼光、立场以及才学识见的不同，必然导致历史研究结论与叙述状态的迥异，相信读者们会在阅读研究时注意加以辨别。上下数千年，人类一直在探寻自己的历史，寻找“信史”，追求“良史”，以期获得历史的真相和启悟。正如清代著名思

想家龚自珍所说:“出乎史,如乎道,欲知大道,必先为史。”治史、读史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并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这是人类认识自身与寻求发展的需要。因而,寻找“信史”——要求史家叙述历史时具有很高的可信度,是其正当的要求。而追求“良史”——希望史家叙述历史时,在可信的基础上能正确揭示历史的内在真相与内在规律,达到“知兴替”而经世致用的目的,则是其最高的要求。宋代曾巩在《南齐书目录序》中曾提出“良史”的标准:“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世界历史文库》编选出版工作就是要坚持提供“信史”的原则,努力追求“良史”的境界,竭诚为我国史学研究者提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并可资借鉴的优秀文本,并满足各界读者了解世界各国各地区历史的需要,增进国际文化交流,为我国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贡献。这是编辑委员会和各位学术顾问的共同心愿和追求。

编辑出版工作不周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批评指正!

《世界历史文库》编辑委员会



《瑞典史》简介

一部全面的瑞典史是非常需要的。尼尔·肯特的书纵览了瑞典从石器时代直到今天的历史。前面的章节涉及维京霸权、北欧联盟、宗教改革和瑞典作为欧洲最强大的超级大国在17世纪达到其政治影响的巅峰;稍后的章节考察了瑞典的启蒙运动、绝对君主制、军事中立政策和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作者将他的历史记叙一直延伸到今天,关注了瑞典最近的发展:社会民主制度的兴起、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瑞典加入欧盟和瑞典的生态保护政纲。本书成功地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内容综合在一起,说明了世界上最成功运行的人道的社会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对学生和普通读者而言,阅读本书是享受一次知识盛宴。

尼尔·肯特(Neil Kent)是剑桥大学斯科特极地研究所(Scott Polar Research Institute)的客座研究人员和圣彼得堡国立艺术、建筑和文化学院(St Peterburg State Academy of Art, Architecture and Culture)教授。他最近的出版物包括:《赫尔辛基:一部文化和文学史》(*Helsinki:A Culture and Literary History*,2004年)和《的里亚斯特:一部城市变迁史》(*Trieste :Biograpgy of a City*,2008)。

序　言

长期以来，瑞典一直是一个具有独特地位的欧洲国家，从军事的和社会的角度看都是如此。它在几乎两百年间避免了战火纷扰，建构了一种社会福利制度，而后者在几十年前就已经使极端贫困被消灭了。因此，对许多人而言，它似乎是一块乐土、一个繁荣的国度，那里的人们生活在宽容与和谐之中。尽管现实并非完全如此。

主导瑞典社会和文化发展的民族精神并非神祇的产物，而是瑞典人民在长期的斗争、牺牲、妥协中付出坚忍不拔努力的结晶。结果就是这样一种社会的形成：其中每个社会成员都被期望去承担他或她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当然这是在一个高度有序的社会中实现的。在这里，个性发挥受到严格限制，没有政治强人发挥强力作用的土壤。据考，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王朝统治是在大约两个世纪前由卡尔·约翰（Karl Johan）国王确立的，他曾是势力强大的法国陆军元帅，在改换身份前是拿破仑的得力干将。

当然，瑞典社会有它自身的问题，并因此而产生不良后果。所谓的詹特法则（Janteloven 或 Law of Jante）可以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说明。这一在瑞典众所周知的法则，首先是在阿克塞尔·桑德摩斯（Axel Sandemose）出版于1933年的小说《一个流亡者的足迹》（*A Refugee Crosses his Tracks*）中被系统阐发的。桑德摩斯是一位定居挪威的丹麦作家，他

在小说中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尤其是在其乡镇范围，个体如果有表现自己、坚持自己权利的冲动，不管是在什么领域，那他就会遭遇众人的不理解、敌意和鄙视。在这个世界中，保持一致和维护集体安全与稳定总是会压倒个体进行的冒险行为和显示天才的创造性冲动。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真实的，正如许多来自艺术、商业和学术领域的杰出瑞典人所抱怨的那样。然而，它并没有剥夺瑞典人民以多样方式同不利条件作斗争的意愿，从而使该国能够在数个世纪中克服地理、气候和其他方面的诸多困难。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乍看起来，瑞典的地理条件似乎不利于它发展成为一个富裕的、爱好和平和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民族国家。瑞典最初由 4 个大区组成，即哥得兰区（Götaland）、斯维亚区（Svealand）、诺尔兰区（Norrland）和奥斯特兰区（Österland），这最后一个地区在瑞典的东部，现在是独立的芬兰。瑞典位于欧洲的极北方，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半部，其西半部分是挪威。但瑞典在国土面积上具有优势。全国领土面积大约为 173 732 平方英里；南北最大长度接近 1 000 英里，这个距离等于从瑞典南端到意大利南端的那不勒斯（Naples）；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典东西最大宽度仅有约 310 英里。因此，尽管瑞典的南北长度可观，但它绝算不上一个大国，在面积上只是比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大些。

瑞典的气候很难说得上宜人。它比同纬度的其他大部分地区，如阿拉斯加（Alaska）、格陵兰（Greenland）和西伯利亚（Siberia）北部，要温暖些，这是因为大西洋湾流在冬季对瑞典的大部分地区产生了明显的升温效应。该国有 15% 的地区位于不适宜居住的北极圈内，那里冬季的温度经常会降到零下 40℃。尽管夏季温度能够上升到 30℃（86℃）以上，但除了夏季最热的短暂时期外那里都可能发生霜冻。在斯堪尼亚省（Scania）的南部地区，土壤大多是非常肥沃的；但南部斯莫兰（Småland）平原地带的土壤却是石质的，它们形成于冰河时期，不宜耕作，而且像这样的土壤覆盖了瑞典其余国土的大部分。不管在瑞典的哪个地区，农作物的生长期通常都是非常短的，而冬季却是漫长和严酷的。在瑞典遥远北方的哈帕兰德市（Haparanda），6 月份的平均温度仅有 15℃（59℃），甚

至在极南端的马尔默市(Malmö),平均温度也只有17℃(63℃)。谷物歉收在瑞典历史上经常发生,饥荒一直到19世纪中期都很普遍。甚至在今天,可耕地也仅占全部国土面积的7%。但另一方面,森林覆盖了目前瑞典地表的70%。在极南部地区、斯堪尼亚省和沿瑞典西海岸的大部分地区,林木种类是落叶林;而在南部和中部的其余大部分地区,则是典型的北欧类型的混交林;只是在达勒卡里亚(Dalecarlia)和诺尔兰,才几乎全都是针叶林。在瑞典中部和北部的森林中仍然有大量麋鹿在活动,但狼却已经很少见,熊更是消失已久。

瑞典境内河流纵横交错,其中最著名的是北部的哥塔河(Göta)和南部的托尔尼奥河(Torneå),但从对河运的意义方面看,瑞典却没有能与德国的莱茵河(Rhine)和美国的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相媲美的河流,因为瑞典的河流几乎半年都处于封冻状态。不过,瑞典有3个面积相当大的湖,即维纳恩湖(Vänern,2 156平方英里)、韦特恩湖(Vättern,738平方英里)和梅拉伦湖(Mälaren,440平方英里),它们对湖周边的居民具有极大的重要性。而且,在波罗的海(Baltic Sea)上,还有哥得兰岛和厄兰岛(Öland,面积较小)这些大的瑞典岛屿,它们即使在早期也绝非是与大陆"隔绝"的,而是繁荣的贸易中心,只是当冬天波罗的海冰封时才被切断与大陆的往来。

长达2 000英里的海岸线,尽管有利于捕鱼业的发展,但也使它易于遭受强大邻国的海上攻击,尤其是丹麦和俄国。它们与瑞典在几个世纪中时断时续地发生战争,目的经常是企图干预它的内政。而且,瑞典是一个地势非常平坦的国家,只在与挪威相邻的西北边界有一座山脉;另外,在极北部地区,有瑞典的最高山峰凯布讷山(Mount Kebne),它的海拔高达6 926英尺。因此,除西北边界外,瑞典并没有自然的陆上屏障可用以抵御外部入侵。

尽管有这诸多的缺陷,但瑞典还是努力将自身建设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民族国家之一。瑞典的市场经济是繁荣的,其社会福利水平是无与伦比的,尽管最近财政支出在削减。瑞典在性别问题上,即在女权、尤其是男女同性恋者权利问题上,取得的进步也是重大的。目前的瑞典

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 XVI Gustaf)和他的配偶、王后西尔维娅(Silvia)——她是一位德国商人的女儿,出生在巴西——于1980年决定让他们年龄最大的孩子维多利亚(Victoria)公主(生于1977年)继承王位,这被证明是在推进女权方面的一种重要姿态,以增加公众对君主制的支持。最重要的是瑞典一直在避免主动卷入到残暴的战火中,而战争是自拿破仑时期以来长时间困扰世界的现象。这种避战状态在欧洲大陆只有瑞典和瑞士能够做到。这使得瑞典长期以来成为大批避难者的天堂,他们为躲避自己国家的战乱而出逃,尤其是现时代的伊拉克人。这些都是瑞典取得的非凡成就,但同时也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瑞典为什么会取得这些成就,或它们是在什么条件下取得这些成就的。



大事年表

829—830 年和 851—852 年	传教士安斯佳到达贝加进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
约 860 年	留里克在诺夫哥罗德确立了自身的地位，为俄罗斯作为一个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约 900 年	奥洛夫征服石勒益苏格附近的海泽比
约 1000 年	在丹麦国王斯文·特维斯卡格（Sven Tveskägg）的帮助下，瑞典国王奥洛夫·舍特科农国王在松德海峡的斯伏尔德（Svolder）海战中击败挪威国王奥拉夫·特里格瓦松（Olav Tryggvason）
约 1022 年	奥洛夫·舍特科农在西哥得兰的哈萨比（Husaby）接受洗礼
约 1027 年	阿努德·雅各布国王在斯堪尼亚的赫尔基（Helge）被挪威人打败
1101 年	三位北欧国家君主在康哈拉（Kunghälla）召开会议，划定了瑞

	典、挪威和丹麦的边界
1143 年	法国西多会修士在东约特兰修建了阿尔瓦斯特拉修道院
1160 年	埃里克·耶德瓦尔德森（Erik Jedvardsson）国王或圣埃里克殉道
1248 年	比格尔·马格努松（Birger Magnusson）任命雅尔为伯爵；为教会在瑞典建立了更为有效的基础设施；规定牧师要过独身生活
1249 年	比格尔·雅尔领导了对芬兰的远征
1280 年	阿尔斯诺法令有助于沿袭欧洲大陆的成例，在瑞典巩固封建制度，同时引入了等级制度
1281 年	教会的财产被授予免于税收的权利
1306 年	哈图纳庄园事件，比格尔·马格努松与他的两个兄弟埃里克和瓦尔德马尔为争夺政治统治权而进行的权力斗争
1317 年	尼雪平盛宴，这是一次圣诞庆祝宴会，比格尔·马格努松利用这次机会囚禁了埃里克和瓦尔德马尔，据传说，他们都被饿死
1318 年	比格尔·马格努松被叛军罢黜，被迫逃到丹麦
1319 年	在莫拉推举马格努斯·埃里克松（Magnus Eriksson）为国王，这就为瑞典政府的存在和国王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合法基础，一直持续到1719 年

1323 年	诺特堡和约，是瑞典和俄国之间签署的第一份领土协议，划定了两国间的边界
约 1325 年	著名的史诗《埃里克编年史》开始编撰，集中记叙了从比格尔·雅尔时代开始，一直到尼雪平盛宴这一较长时期的历史
1349 年	毕哲（约 1303—1373），是权贵比格尔·佩尔松（Birger Persson）的女儿和乌尔夫·古德马松（Ulf Gudmarsson）的遗孀，她离开瑞典到罗马以确保她所创立的宗教教派能够存在
1349—1350 年	黑死病肆虐瑞典
1391 年	毕哲被封为圣徒
1396 年	尼雪平法令颁布，根据该法令，收税权力只有皇家授权才为合法，而且禁止没收私人财产来充税；以前被如此没收的物品将会归还
1397 年	卡尔马联盟宣布成立，根据协议，瑞典、丹麦和挪威统一在一个国王统治之下
1434 年	恩格尔布莱克特·恩格尔布莱克特松在贝里斯拉根（Bergslagen）和达勒卡里亚领导了反对国王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的叛乱，埃里克·普克领导了在诺尔兰的叛乱
1436 年	恩格尔布莱克特·恩格尔布莱克特松被谋杀
1437 年	埃里克·普克被处死

1436—1438 年	《恩格尔布莱克特编年史》写作完成，集中记叙了对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统治的不满
15 世纪 50 年代	编撰《卡尔编年史》，它记叙了开始于 1389 年，一直持续到 1452 年的这段时期
1451—1455 年	瑞典和丹麦之间的战争（1453—1455 年休战）
1477 年	雅各布·乌尔夫松（Jakob Ulfsson）大主教创建乌普萨拉大学
约 1480—1496 年	撰写《斯图尔编年史》，其中强调了瑞典从丹麦统治下独立的重要性
1483 年	卡尔马条令颁布，其中正式宣布了政务会的至上地位
1495 年	俄国进攻芬兰
1496 年	斯万特·斯图尔（Svante Sture）为瑞典夺取了伊万格勒（Ivangorod）
1506—1509 年	瑞典和丹麦之间的战争
1518 年	克里斯蒂安二世率领的丹麦海军在布兰基尔卡被小斯滕·斯图尔指挥的瑞典军队打败
1520 年	血洗斯德哥尔摩，发生于 11 月 8 日和 9 日，许多克里斯蒂安二世的敌人被处死；古斯塔夫·瓦萨试图在达勒卡利亚发起一次叛乱
1523 年	古斯塔夫·瓦萨进入斯德哥尔摩
1526 年	瑞典语的《新约圣经》出版
1527 年	达勒卡利亚第二次叛乱爆发；古斯塔夫·瓦萨控制了瑞典教会

1531 年	路德教改革家劳伦丘斯·佩特里成为乌普萨拉大主教
1541 年	《圣经》的翻译工作完成
1542—1543 年	达克叛乱
1544 年	韦斯特罗斯会议，批准君权世袭
1555 年	与俄国的战争
1561 年	在阿尔博加召开的政务会决定削弱公爵的权利；爱沙尼亚接受瑞典的统治
1563—1570 年	瑞典与丹麦之间的七年战争
1567 年	埃里克谋杀了势力强大的贵族斯图尔家族的一些成员，包括尼尔斯、斯万特和埃里克·斯图尔，以及阿伯拉罕·斯腾柏克，但把罪名推到在乔兰·佩尔松身上
1570 年	《斯德丁条约》批准了由古斯塔夫·瓦萨所建立的秩序；在缴纳赎金后，艾尔夫斯堡被归还给瑞典；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放弃了他对瑞典的领土要求，瑞典国王约翰也放弃了对挪威的领土要求；与俄国的战争爆发
1576 年	约翰国王试图将一种新的、受天主教影响的礼拜形式，即所谓的红皮圣经引入瑞典
1590 年	与俄国的战争在爱沙尼亚爆发
1593 年	乌普萨拉集会确认路德教为瑞典国教，拒绝接受红皮圣经这种仪式
1595 年	《特于辛那条约》划定了瑞典和俄

	国之间在拉普兰的北部边界；重建乌普萨拉大学
1596 年	农民在芬兰东波斯尼亚发动了反对克拉斯·弗莱明的起义
1598 年	西吉斯蒙德在卡尔马附近的斯坦格布罗被卡尔和他的军队打败
1599 年	西吉斯蒙德的王位被瑞典国会废除
1600 年	血洗林雪平，在瑞典国会的命令下，卡尔的贵族反对者图瑞·比尔科、埃里克·斯派瑞、古斯塔夫·巴纳尔和斯滕·巴纳尔都被处死
1604 年	卡尔取帝名为卡尔九世，前一年，他在北雪平被批准为世袭国王
1605 年	瑞典军队在利沃尼亚的基尔克霍尔姆战败
1607 年	哥德堡建城
1611 年	卡尔马战争爆发：丹麦人占领了卡尔马，瑞典占领了耶姆特兰和海里耶达伦；阿克塞尔·奥克森斯特纳（1583—1654）被任命为首辅大臣
1612 年	丹麦人占领艾尔夫斯堡和加尔堡，切断了瑞典同北海的联系
1613 年	瑞典和丹麦之间通过《克奈勒德条约》实现和平，双方的谈判是由英国促成的，根据条约，艾尔夫斯堡被归还给瑞典，后者支付 100 万瑞典圆给丹麦，这相当于瑞典每年收成价值的 2/3
1614 年	瑞典和荷兰在海牙签署军事同盟

	条约
1617 年	根据斯托尔博瓦和约，瑞典获得了凯克斯霍尔姆和印格利亚；皈依天主教被宣布为非法
1618 年	三十年战争在中欧爆发
1621 年	哥德堡被允许进行国际贸易；与波兰的战争在利沃尼亚爆发，结果瑞典占领了里加；乌普萨拉大学第三次重建
1626—1629 年	与波兰的战争蔓延到普鲁士
1627 年	荷兰人路易斯·德·吉尔到达瑞典，建立自己的兵工厂和黄铜生产厂；瑞典和丹麦在斯特拉尔松组成联合防御，以抵抗哈布斯堡王朝将军华伦斯坦的进攻
1629 年	瑞典和波兰之间的 6 年停战协定在阿尔特马克签署
1630 年	瑞典加入三十年战争
1632 年	5 月 5 日，提利将军在莱希受了致命伤；11 月 6 日，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在吕岑战役中阵亡；政务会接管了瑞典的统治权；塔尔图大学创建
1634 年	华伦斯坦在波希米亚遇刺
1635 年	萨克森和勃兰登堡独立与哈布斯堡王朝媾和；瑞典和波兰之间达成了 26 年的休战期
1636 年	法国对哈布斯堡王朝宣战
1638 年	新瑞典殖民地在特拉华建立

1640 年	埃博学院建立
1642 年	在克里斯蒂娜女王支持下，芬兰语的《圣经》出版
1643—1645 年	瑞典和丹麦之间的战争
1645 年	瑞典人在布拉格东南部打败哈布斯堡王朝军队
1646 年	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执掌了瑞典军队的领导权
1648 年	弗兰格尔领导的瑞典军队占领了布拉格，并进行了劫掠；《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根据该条约，瑞典获得了波美拉尼亚的部分地区、鲁根、乌泽多姆、不来梅和费尔登
1654 年	克里斯蒂娜女王退位；在德国爆发了争夺不来梅的战争
1655 年	削减贵族占有的土地数量；与波兰的冲突再次爆发；新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堡被荷兰人占领
1656 年	俄国进攻瑞典波罗的海东部的领土
1657 年	丹麦对瑞典宣战；卡尔十世从波兰和德国北部开始他的对丹麦军事行动
1658 年	罗斯基勒和约（Peace of Roskilde）确认丹麦将斯堪尼亚、哈兰、布莱金厄和布胡斯兰，以及波罗的海岛屿波恩荷尔姆岛和挪威的特伦德拉格省割给瑞典；围困哥本哈根
1660 年	与丹麦签署和约：波恩荷尔姆岛和

	特伦德拉格省被归还给丹麦；与波兰和俄国分别签署了和约，后者批准了史托波瓦和约
1666 年	第二次不来梅战争
1675 年	瑞典和勃兰登堡之间的费尔贝林战役，瑞典军队被击退
1680 年	绝对君主制在事实上确立；实施“减少免税土地数量”的政策
1681 年	瑞典法律被强加给斯堪尼亚；在礼拜仪式和教育中强制使用瑞典语
1682 年	国家政务会被剥夺了它的大部分权力，并更名为王室政务会；卡尔十一世被承认有制定法律的权力和监督“减少免税土地数量”政策的执行
1686 年	教会法颁布，对教会组织和行为的许多方面做出规制
1689 年	国王被承认有权在战争时期征税
1695 年	瑞典由于作物歉收引发严重饥荒；《瑞典圣歌集》出版，被认为出自大主教耶斯佩·斯韦德贝格（Jesper Svedberg）之手
1697 年	大火烧毁了斯德哥尔摩三皇冠皇宫的大部分
1700 年	以瑞典为一方和以丹麦、波兰—萨克森与俄国为另一方之间的北方大战爆发；瑞典于 11 月 20 日在纳尔瓦取得大捷
1701 年	瑞典在库尔兰（Courland）的德维

	纳河（the Duena River）附近打败了波兰人
1702年	瑞典占领波兰的华沙、克里索夫和克拉科夫
1703年	波兰的但泽和托伦被瑞典占领；彼得大帝在前瑞典的英约尔曼兰（Ingermanland）建立圣彼得堡城
1704年	俄国重新占领纳尔瓦；瑞典占领利沃夫
1705年	在莱文豪普特的领导下，瑞典军队在库尔兰的盖莫特尔霍夫战役中打败俄军
1710年	丹麦人在赫尔辛堡战役中战败；瘟疫肆虐斯德哥尔摩；里加和塔林被俄国军队占领
1712年	在麦克伦堡打败丹麦军队，瑞典军队成功地守住了它在德国北部的领土鲁根
1713年	奥斯曼人发动卡拉巴里肯叛乱以反对在宾杰尔的卡尔十二世；马格努斯·斯滕柏克在托宁根战役中被丹麦军队俘虏
1715年	卡尔十二世最终回到瑞典
1716年	德国外交官员乔治·海因里希·冯·戈尔茨重组瑞典的财政
1718年	在1718年11月30日弗雷德克里克斯滕要塞（Fredkriksten's Fortress）的战役期间，卡尔十二世在弗雷德里克沙德（Fredrikshald）战死

1719 年	新摄政王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被迫接受王权专制统治的终结；瑞典东部海岸受到俄国军队的进攻；不来梅和费尔登被出售给汉诺威
1720 年	瑞典在波美拉尼亚的部分领土被割给普鲁士
1721 年	《尼斯塔德条约》在不利于瑞典的条件下结束了北方大战，瑞典的大片领土，包括印格利亚、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南卡累利阿被割给俄国
1731 年	瑞典东印度公司成立
1738 年	引入一部新的、精简的法规
1738—1739 年	“戴有沿帽者”和“戴无沿帽者”之间的冲突在国会爆发，前者在卡尔·吉伦伯格领导下，后者以阿维德·霍恩为中心
1739 年	瑞典科学院建立
1741—1743 年	与俄国的战争再次爆发，结果南卡累利阿被割给俄国
1747 年	在奥古斯丁·艾伦怀特的指挥下，斯韦堡的修建工作开始，它在赫尔辛基的外围
1753 年	引入公历
1756 年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和洛维萨·乌尔里卡发动了一场未遂政变
1757—1762 年	波美拉尼亚战争，瑞典未能从普鲁士手中夺回德国北部的失地
1766 年	政治审查制度被废除
1772 年	8 月 19 日，古斯塔夫三世发动政

	变，在瑞典重新确立王权专制统治
1782年	犹太人被允许在瑞典的四座城市定居
1788—1790年	对俄战争
1788年	反对对俄战争的安亚拉密谋被镇压
1790年	斯文斯克松德战役
1792年	3月16日，在其他不满人士的支持下，不忠的贵族雅各布·约翰·安卡斯特罗姆上尉在皇家歌剧院的一次化装舞会上枪杀了古斯塔夫三世
1804年	瑞典与英国结成联盟
1805—1807年	瑞典和法国之间的波美拉尼亚战争
1807年	瑞典东印度公司关闭；瑞典人被授予对圣巴特勒米岛的自由贸易权
1808—1809年	争夺芬兰的战争
1809年	《哈米纳条约》：瑞典将芬兰割给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统治的俄国；王权专制统治被废除
1814年	与丹麦签署和约，结果挪威被割给瑞典
1815年	瑞典被迫将波美拉尼亚部分地区的主权让给普鲁士
1827年	颁布新法律，即所谓的圈地，试图将小块农业用地合并成较大单位
1832年	约塔运河开通，它开凿于1809年
1834年	霍乱肆虐许多沿岸城市
1846年	行会制度被废除
1853年	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之间的电报线路对公众开放；煤气灯照明被引

	入斯德哥尔摩
1855 年	英国及其盟国与瑞典达成《十一月协议》
1856 年	厄勒布鲁与埃尔瓦拉之间的第一条铁路线开通
1857 年	松德海峡的船只通行费被取消
1858 年	年龄在 25 岁以上的单身妇女被承认有权处理财产和类似事物
1862 年	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之间的铁路线投入运行
1863 年	瑞典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发明甘油炸药
1866 年	等级制度被废除
1867 年	引入两院制议会
1878 年	瑞典对圣巴特勒米和圣马丁的主权被移交给法国
1880 年	阿尔维德·波塞被选为首相
1883 年	塞姆坦德当选首相
1885 年	社会民主党成立
1891—1900 年	博斯特罗姆担任首相
1901 年	第一届诺贝尔奖颁授；实施普遍义务兵役制，旧的摊派制度被废除
1902—1905 年	博斯特罗姆再次担任首相
1909 年	大罢工
1911—1914 年	卡尔·斯塔夫担任首相
1913 年	议会通过对老年人提供国家抚恤金的政策
1914 年	农民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游行；瑞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宣布中立

1917 年	议会制开始发挥作用
1920 年	瑞典加入国联
1921 年	废除死刑
1922 年	第一位女性（科尔斯汀·海塞尔格伦）被选进瑞典国会；公共广播开播
1930 年	大主教纳特汉·瑟德尔布罗姆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1939 年	皮尔·阿宾·汉森当选首相；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瑞典宣布中立
1940—1943 年	德国军队被允许在密封的车厢中乘火车穿越瑞典
1946 年	瑞典加入联合国
1946—1949 年	社会民主党人塔格·埃兰德担任首相
1948 年	联合国驻耶路撒冷代表福克·贝纳多特伯爵被犹太恐怖分子刺杀
1954 年	哥德堡大学创建
1955 年	普遍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被引入
1970 年	瑞典国会改为一院制
1974 年	冈纳·缪尔达尔赢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埃温特·约翰逊和哈里·马丁逊共同分享了诺贝尔文学奖
1986 年	奥洛夫·帕尔梅首相遇刺；切尔诺贝利事件造成的放射性物质扩散影响到了瑞典的大部分地区
1995 年	瑞典加入欧盟
2000 年	瑞典教会与政府分离，由此实现政教分离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从史前时期到维京霸权时期

一、最早的居住点

与欧洲的其他部分相比，作为具有现代海岸轮廓的地理意义上的存在，今天的瑞典是在相对较近的时间形成的，它的现代轮廓是在最近一次冰川期结束时出现的，而这次冰川期覆盖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直至1万年前。首先是在南部的斯堪尼亚地区，地面开始从冰川期的冰雪覆盖中逐渐显露出来。在那里，冰川是在大约公元前11000年时消失的。之后逐渐地向北拓展，在后来的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及其周边地区，冰川仅是在大约公元前8000年时才消失。接着，又用了4 000年时间，瑞典其余的大部分地区的冰川才最终消失。但在极北方诺尔兰的部分地区，一些冰川一直存在到基督纪元开始之前。因此，只是从这个时期开始，我们才能提及瑞典的史前史，因为在冰川期结束前不可能有任何人类的存在。

在冰川期结束后，第一批到达瑞典的移民主要来自丹麦。他们是穿越今天将两国分割开来的松德海峡（Sound）移民到瑞典的。在17世纪之前的数个世纪，海峡两岸一直是由丹麦人统治。到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居住点是在瑞典的极南端，即在马尔默附近的塞格布罗（Segebro），遗址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10000年到公元前9000年之间。

另一个早期的居住点是在布胡斯兰（Bohuslän）的汉斯贝卡（Hensbacka），它能够追溯到前7300年到前6600年之间。该遗址的存在可以由对驯鹿的捕猎予以证明。驯鹿是北欧地区许多居民的重要食物来源，甚至远至极北端的佩琴加（Pechenga，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是芬兰的领土，被称作皮查摩［Petsamo］）也是如此。佩琴加在如今俄联邦的极西北端。这种对作为食物的驯鹿的依赖表明，一条通过今天芬兰北部进入瑞典的陆上通道或许是一条重要的迁徙路线，它不仅是对驯鹿、也是对移民而言的。其他稍晚一些的居住点在桑达纳（Sandarna）和斯堪尼亚的阿格罗德（Ageröd）被发现，现在的哥德堡市就坐落在桑达纳。前一个遗址能够追溯到公元前6600年到公元前5000年之间，后一个遗址可以更精确地追溯到公元6000年左右。两个地区的人民主要都以渔猎为生，使用石制、陶制、木制和骨制工具。

瑞典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延续到公元前3000年初，而自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定居农业和畜牧业带来了居民生活的剧烈变化。移民的大量涌入进一步改变了该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结构，移民潮是由各种族从东向西的迁徙推动的。这一时期最引人注目的考古遗迹是大规模石砌墓葬的发现，其中有一些能够在西哥得兰地区（Västergötaland）的鲁特拉（Luttra）看到，它在福雪平（Falköping）附近。学者们普遍认同这些墓葬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修建的，尽管就墓葬建造者的种族身份问题仍存在争议。

二、铜器时代的居民点

尽管瑞典位于欧洲的北部边缘，但它所处的地理区域在那时已完全融入到泛欧洲的贸易网络之中。跨越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海上贸易的繁荣，使铜器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被引入瑞典，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人们输入铜器以换取毛皮、奴隶和珠宝。而铜本身不仅被用于制造武器、农具和其他器具，也被用于装饰和宗教仪式。铜制首饰成为有权势家庭追逐的目标，它们被用来装饰羊毛制成的衣服，那时羊毛已替代兽皮成为主要的服装制作原料。

3

大规模的石砌墓葬是这个时期开端时的特征，以后逐渐被土葬取代。后一类墓穴中放置有各种人工制品，人们设想它们将同死者一道进入另一个世界。尸体在当时一般是被火化，骨灰被放置在瓮棺中，然后被放进墓穴。一种所谓的“岩画”（Hällristning），即在岩石上的雕刻，能够在布胡斯兰的维特莱克（Vitlycke）看到。上面雕刻的形象不仅有帆船和人物，而且有各种家畜和实用器具，千姿百态，被认为表现了这一时期的特征。

三、铁器时代

铁器首先由讲凯尔特语的种族引入，他们是从南方穿越波罗的海进入瑞典的。由于铁器的实际效用更大，所以很快就取代了铜器。到公元前500年，铁器的应用已经非常广泛，它引起了瑞典社会和农业的深刻变革。因为铁比铜更坚硬，所以它不仅被制成更耐用和更有效的武器，而且也被制成更合用的家庭用具和农具。

然而，当农业生产在铁器时代的瑞典得到改良时，此地的气候却变得更加严酷。气候日趋变冷不仅导致人口数量下降，并且导致贸易减少，而后者对人们的生存几乎像农业一样重要。尽管贸易数量有限，但对外的商业联系却绝没有切断。考古发现证明，一些珍贵物品，像玻璃器皿和有精美装饰的陶器等，开始在瑞典出现，而它们是从罗马帝国输入的。与罗马保持着联系的又一个证明是，发现了一种瑞典人使用的古北欧语言和文字，它与拉丁字母有许多共同的特征。50多个用北欧古文字刻写的铭文，从大约公元2世纪保存至今，证明了这两种文字存在的相似性，它们至今仍吸引着考古学家的关注。最初，这种古北欧文字由24个字母组成。不过，到7世纪，经过简化改革，字母减少到16个。它一直是瑞典人的书面表达方式，直到这个国家被基督教化并与罗马确立了直接联系。这之后，拉丁语迅速取代了古北欧语，而此时书面语言的应用也变得更为广泛，不再局限于刻在木头、骨头和石头上的纪念性铭文。

4

至于家庭建筑的风格，有3个狭长通道的长房子是这个时期的典

型特征。它一般包括几间用于居住的屋子，边上则是畜棚饲养牲畜。在瑞典各地都发现了这种建筑的遗址，甚至在极北端的安格曼斯兰（Ångermansland）也有发现。

四、与罗马帝国联系的加强

大约在公元400年时，瑞典进一步确立了与罗马帝国更加密切和广泛的联系，尽管这个时期的罗马帝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已经走向衰落。当时许多商品经商人之手从日尔曼各部族那里输入。此时日尔曼人已经开始袭扰瑞典，他们建立庞大的网络，主要是经济的，向南延伸到地中海沿岸。但同时也存在来自其他方向的贸易，尤其是来自东方的。瑞典领土上新兴国家的发展和巩固，主要应归功于这种不断增加的商业活动。到6世纪早期，来自亚洲的宗教和其他珍贵物品也传入瑞典，它们是沿着俄罗斯水路然后穿越波罗的海输入的。这些人工制品中最有趣的是一个来自印度的小佛徒雕像，它目前陈列于斯德哥尔摩的北欧博物馆（Nordic Museum），是瑞典早期与亚洲次大陆存在贸易联系的证明，珍贵而又吸引人的眼球。

在罗马帝国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人们就知晓北欧世界的存在。在基督纪元开始的几个世纪，一些罗马作家的作品提及了它。例如，根据罗马伟大的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的记叙，公元1世纪时，居住在那里的斯韦人（Sveas）就是一个统一的民族，甚至在那个时代就有一个国王。但我们现在的历史学家却得出结论认为，斯韦人组成的联合王国的存在实际只能是从9世纪开始才被证实。也许塔西佗在撰写北方民族历史时，更多关心的是用精心编排的历史著述来影响国内进程，而不是就其他地区的历史是否真实发表评论。

即使如此，根据一位东罗马帝国历史学家普洛科庇乌斯（Procopius）写于6世纪早期的著作，瑞典居民由13个部族组成，每个部族都有自己的王。不过，稍后的历史学家认为该国主要由两个部族组成，即斯韦人（Sveas）和哥特人（Goths），前者分布在科尔马登（Kolmården）和蒂威登（Tiveden）大森林带以北地区，后者分布在以

南地区和哥得兰岛上。然则，问题却由于另一个事实而变得更为复杂，即现代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斯韦特约德（Svitjod）或斯韦人分布的地方是一个很有限的地区，即今天的乌普兰（Uppland）及西曼兰（Västmanland）的部分地区，而不是一个广阔的地区。

那时的瑞典社会是个高度等级制的社会，其首领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他们在政治大会上行使这种权力，而大会的召开有助于围绕一个中心议题形成他们共同的政治认同。召开大会的主要目的最初是宗教性质的，以对神的共同祭祀为基础，而与管理、法律和贸易相关的问题也在这里讨论并做出决定。大会还被用来发挥一种统一的作用，即将组成它的 3 个地区提安达兰（Tiundaland）、阿坦达兰（Attundaland）和福贾德汉达兰（Fjärdhundraland）统一在一起，并通过塑造一种更一致的政治和经济认同来实现。在哈格豪根（Hågahögen）发现的国王墓地似乎也证实，一个斯韦人组成的联合王国至少在斯堪的纳维亚铁器时代晚期已经是一个政治实体。那时，它的势力范围至少向南远至梅拉伦湖，向北扩展到诺尔兰南部，向东则延伸到芬兰沿海地区。

伴随着贸易，尤其是同东部贸易的不断扩张，斯韦人建立的国家逐渐走向繁荣。这可以由黄金的输入部分地予以说明，黄金可能是从他们的南部邻居哥特人那里掠夺来的，后者的经济富裕程度在这个时期有明显下降。在西哥得兰的斯帕罗萨（Sparlösa）发现的 9 世纪的卢恩文石碑（rune stone）能否被视为决定性地证明斯韦人在那个省具有霸权，仍存在争议。不过，北欧旅行家沃尔夫斯坦（Wulfstand）于 865 年向英国国王阿尔弗雷德（Alfred）提供的报告表明，到那一年，布莱金厄（Blekinge）、哥得兰和厄兰岛，即临波罗的海的大部分地区，都在斯韦人的统治之下。据传说，在第一个千禧年即将来临之时，在国王奥洛夫·埃里克森·舍特科农（Olof Eriksson Skötkonung）的统治下，生活在今天的乌普兰、西曼兰、东约特兰（Östergötland）、斯莫兰和西哥得兰诸省的斯韦人和哥特人都正式统一在一个公认的统治者之下，从而为一个统一的瑞典国家奠定了基础。此外，在极北方，萨米人（Saami，也被称为拉普人［Lapp］）的居住点被发现，不仅在

内陆有发现，而且在波的尼亚湾（the Gulf of Bothnia）西海岸的许多地点都有发现，其中格兰德斯卡坦（Grundskatan）和霍恩斯兰德特（Hornslandet）两处最为著名。最近发现的鹅卵石砌成的小屋遗址为4米长、5米宽，屋中央有壁炉，这为他们在至少公元5世纪初、直至13世纪结束期间的存在，提供了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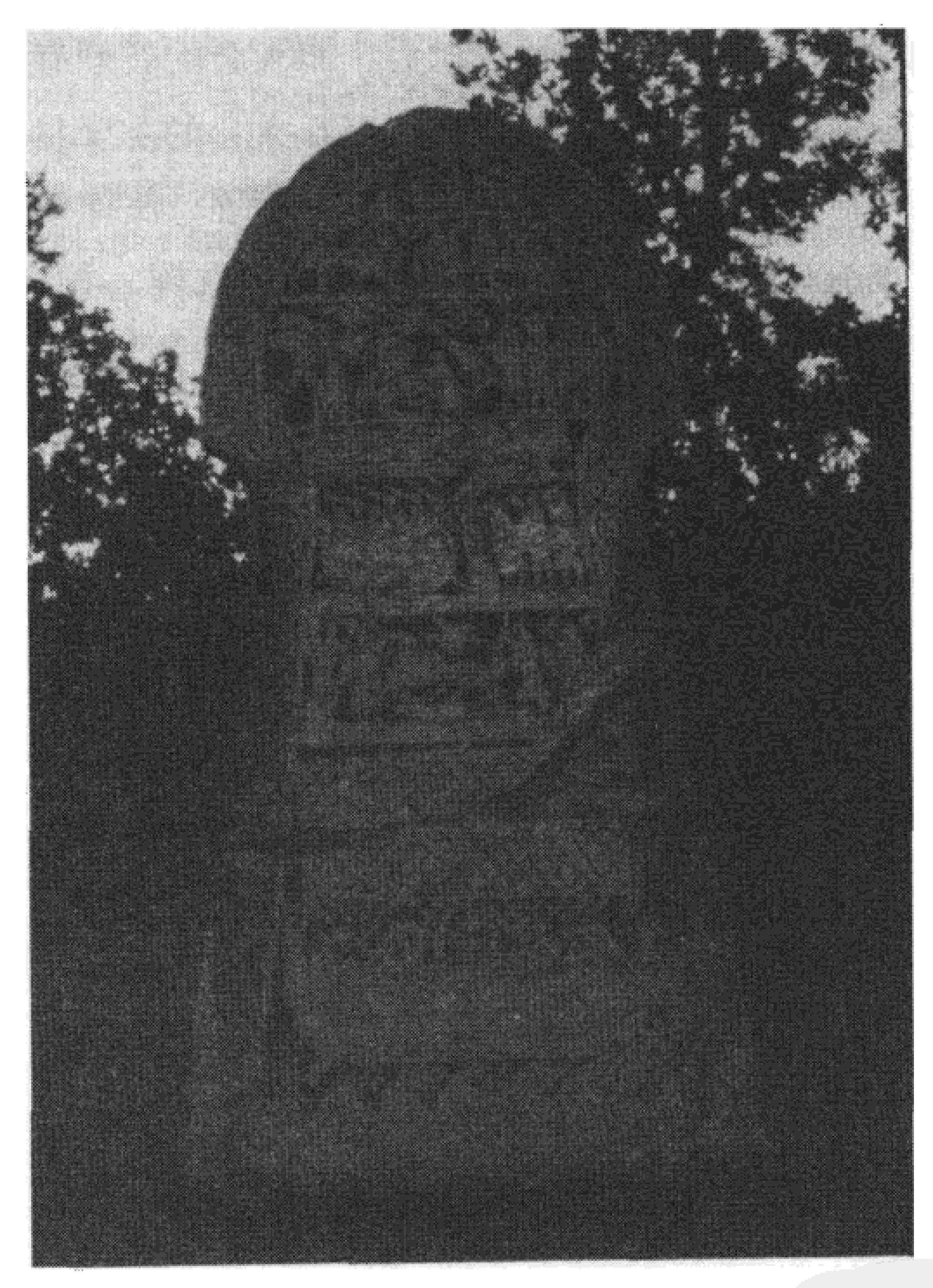


插图1　在第一个千禧年临近结束时，在波罗的海中部的哥得兰岛上雕刻成型并竖立。哥得兰岛是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这个刻有古北欧文字的石碑是在莱尔博（Lärebo）的海马斯（Hammars）发现的，石碑装饰以丰富的图画，刻画有马、武士和维京帆船，但其确切含义至今尚不清楚。照片提供：埃尔斯·罗斯达尔（Else Roesdahl）。

五、维京时期

从9世纪初开始，由斯韦人、哥特人、丹族人（Danes）、挪威人和其他族人组成的维京人（Vikings，也被称为北欧海盗），通过劫掠和贸易，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对欧洲大部分地区产生剧烈影响。出于这一原因，人们提到了北方存在海盗霸权。“维京”一词泛指居住在峡湾（fjords）的人，而峡湾则是北欧海岸线的特征。尽管许多西部的维京人同西方进行贸易并进行劫掠，但在东部，许多瑞典的维京人却不这样做。瑞典的维京人在那里即今天的俄罗斯和乌克兰所在地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在9世纪中期帮助当地人建立起诺夫哥罗德城（Novgorod，在古瑞典语中被称为“霍尔姆加德”[（Holmgåld]），在10世纪早期又帮助建立了基辅城（Kiev）。

在瑞典国内，维京人的活动也深刻地改变着当地的生活和文化：村落开始形成，新的土地被开垦。政治和司法管理被加强，由握有权力的军人和政治人物组成的统治网络越来越集权化并具有渗透性，由此巩固了他们对一个地区的权势，而这个地区就会变成一个愈来愈统一和中央集权化的国家。在这个国家，由最有势力的家族权贵们选出的国王拥有支配性权力。在这种进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财富的不断增加，它使集权国家的出现成为可能。而这些财富则是在与俄罗斯和东方急剧发展的贸易中产生的。这种贸易的范围绝非地方性的或仅仅是跨波罗的海的，而是真正洲际性的。借助于俄罗斯境内的诸条河流，瑞典的维京人能够发展同拜占廷帝国和中东阿拉伯世界的重要商业联系，前者是东罗马帝国的后继者。

城镇对商贸而言是必需的，它吸引着整个地区的商人。乌普兰省的贝加（Birka）是瑞典的第一个城镇，离今天的斯德哥尔摩不远，它的出现正是由于贸易的缘故，由那些成功的商人建立起来。面积扩展到大约12公顷的贝加镇，在800年和975年间走向繁盛，它受到在西南部小山顶上的要塞的保护，而要塞的城墙在今天仍能看到。这里交易的商品都来自远方，诸如英国和中东等地方，这显示了它作为波罗

8

的海主要交易市场的地位。很有可能是从这里启程，向东经过罗斯拉根（Roslagen）的贸易中心，瑞典商人到达今天的俄罗斯。他们跨越波罗的海在那里定居，或许正是罗斯拉根的名字使他们被误称为“罗斯人”。

尽管这一时期法兰克人的编年史仍然称这些维京人为斯韦人，但他们实际已经向东和向南扩散开来，深入到俄罗斯内陆，甚至到达更远的地方。他们沿河而下，主要是沿伏尔加河（Volga）和第聂伯河（Dnepr）而下，至少远航至黑海（Black Sea）和里海（Caspian Sea）；当遇到地理障碍诸如急流时，他们就将船拉上岸，而最终到达拜占廷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的人不在少数。在那里，一些人赚取了巨额的财富，不仅是通过劫掠，还有的是通过在帝国政府供职。但另一方面，向西与罗马之间的交通路线却非常不畅，直接联系仍然极少。

拜占廷帝国首都与瑞典间的关系有时是互惠性的，有时是相互敌对的。860 年君士坦丁堡就遭突然袭击，进攻的动议是在基辅做出的，这些北方人对这座城市进行劫掠，直到累得无力再抢。不过，一般地讲，他们是使当地人获取到利益的，因为后者在拜占廷帝国的市场上贪婪地购买他们带来的商品。

另一个主要的贸易中心是瑞典在波罗的海上的哥得兰岛（Gotland）。据考古遗址发现，既有城镇的遗址也有乡村的遗址散布于整个地区，发掘出的物品包括有银制品，其中许多是来自阿拉伯和拜占廷的银币，前者上面刻有古阿拉伯文字图样。这些表明，它通过这种跨波罗的海的贸易积聚了财富。贸易主要是由当地富裕的土地所有者进行的，他们经常到一些海外的港口进行商业活动。由于他们的许多商船在航行时是由武装船队护航的，而当对那些缺少防御的城镇和乡村进行劫掠能够获得诱人的利润时，这种护航防御时常会变为公开的海盗抢劫。据说，这些瑞典商人经常会与他们遇到的外国人进行合作，尤其是当那些人能够帮助他们在整个欧洲甚至欧洲之外进行商品的输入和输出的时候。例如，向西与北海海岸的弗里斯人和向南与邻居丹

9

麦人的合作就是如此，特别是那些居住在海泽比（Hedeby）的人，那里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在10世纪早期瑞典皇族的一支还曾短暂地取得过对它的政治控制。

瑞典人在各个方向交易广泛的产品，主要是奴隶、毛皮和琥珀，而那些奴隶主要是斯拉夫人。至于输入的产品也是各种各样，但以银制品为最，用它作个人装饰是非常时髦的。

此时，俄罗斯这片土地成了瑞典维京人实施政治统治的潜在地域，而至关重要的是，那里成了维京人获得物质利益的场所。正如《聂斯托编年史》（*Nestor Chronicle*）所记叙的那样，无可质疑，在经历诸多事件以后，瑞典人留里克（Rörik 或 Rurik）率领他的人向南和向西扩张，在斯拉夫人居住的地区确立起瑞典的霸权，而他在俄罗斯乃是众所周知的人物。考古遗址仍能证明，北欧殖民者途经拉多加湖（Lake Ladoga）、伊尔曼河（Ilmen）、伏尔加河、顿河（Don）和第聂伯河，在一个广阔的区域定居下来，比较集中于重要的贸易场所。这些殖民点向东扩展到诺夫哥罗德（Novgorod），向西到斯摩棱斯克（Smolensk），向南到基辅。考古遗物中诸如妇女戴的首饰表明，这些移民主要是来自瑞典中心地区的斯韦人，他们原来生活在贝加附近和马拉伦湖周围，而不是在哥得兰。在诺夫哥罗德确立的法典是斯韦人的法典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着这个结论。

在975年，贝加作为一个著名的贸易中心突然从编年史中消失。也许它是毁于一次敌人的进攻，尽管敌人是谁或为什么发动进攻至今尚不清楚。虽然如此，但这并非意味它所在的乌普兰省不再是重要的贸易中心，因为新建立的希格图纳（Sigtuna）居民区似乎已经接替贝加完成了以前的大部分贸易。而且，哥得兰的商业在这一时期也得到迅速发展。在第一个千禧年到来时，位于瑞典西海岸的劳多斯（Lödöse）也成为一个重要的贸易中心，以它为中心形成一个不断扩张的网络，向西跨越北海到达英国和荷兰。

10

伴随着与欧洲其他地方经济整合的加强，瑞典越来越受另一种泛欧洲运动的影响，即基督教化运动的影响。结果，瑞典很快加入到信

奉基督教国家的行列，而它已经信奉了数世纪之久的宗教很快就销声匿迹，但后者所产生的文化影响仍持续存在，并且确实延续到了今天。

六、宗教信仰

瑞典的维京人留给世界许多遗产，既有惠及后世的，也有贻害四方的。从文化领域看，影响最持久的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体系。长期以来，古瑞典人的宗教不仅吸引了专业历史学家的关注，而且也令全世界的诗人和作家着迷；他们虽然隶属不同的文化，却都对古瑞典复杂的神话体系感兴趣，认为它可以与古典世界的神话体系相媲美，当然那也是受着后者的影响。古瑞典神话影响最大的地域莫过于地处中欧的德国腹地，即使是在其全盛期几乎 1 000 年后的 19 世纪。正如瓦格纳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诸神的描述所证明的那样，那些作品在今天仍然受到欢迎。但瓦格纳在他那气势磅礴而又才华横溢的歌剧中表现的北欧男女诸神，却不应被视为基督教化之前北欧宗教信仰的真正代表。诚然，瑞典人一直到第一个千禧年临近结束时仍然坚持对太阳的崇拜虽说明显与古日尔曼人的宗教信仰和风俗有所关联，但这些宗教信仰的独特性不应被过分强调，因为它并不像 19 世纪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

古瑞典的宗教绝非是单一体系的和排斥异己的，它是一种多神教，包括众多的男女诸神，各自发挥着与生活各个方面相关联的作用。它没有基督教意义上的那种正式身份的教士，原因之一是它与除基督教以外的世界大多数宗教一样，在宗教和世俗之间并不存在神圣不可逾越的界限。其结果是，政治、军队和经济领域的重要人物在宗教和世俗事务中均发挥作用。他们在广泛的情况下祈求男女诸神的帮助和保护，不管是在社会、文化、农业，抑或是在军事等方面都是如此。广泛的事务——诸如好的收成或成功的军事行动——都要求他们作适当的宗教祈福，许多祈福包括着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献祭。在这些宗教活动中，古斯堪的纳维亚诸神起到各种关键的作用。

托尔神（Thor，雷神）、奥丁神（Odin，司智慧、艺术、诗词和战

争之神）和弗雷尔神（Freyr，司丰饶、和平及耕耘之神）在最著名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诸神之列。应该记住的是，对他们的崇拜并不仅限于瑞典人，在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和其他一些地区都是如此。

农民祈求托尔神保佑好收成，尤其是祈求他的保护来对抗那些巨人。人们认为，这些巨人们居住在神界的“巨人之家”。尽管巨人们既与诸神也与人斗争，但他们也为人类提供了许多智慧和技能。而他们中的一位伊米尔（Ymir，巨人始祖），被认为是最早的生灵。

托尔神是诸神中权势最强的一位，他司管的领域是秩序和稳定，阻止动乱的发生。而当战事发生时，人们则祈求奥丁神的保佑。他被认为是保护神，不仅保护佩剑贵族，而且也保护吟游诗人——他们为前者的英雄业绩吟唱。不过，像古希腊的诸神那样，奥丁神是一位反复无常的神，当他犯错时令人恐惧，尤其是当他主管杀戮和生死时就更是如此。

奥丁神的诸婢女瓦尔基里们（Valkyries，她们将阵亡将士导入瓦尔哈拉殿堂，并侍候于此）是裁决者，她们对那些在战场上战死的武士们做出裁定，他们由此而能够成功进入瓦尔哈拉殿堂（Valhalla，奥丁神接待阵亡将士灵魂的殿堂）。这是北欧版的希腊奥林匹斯山，在瑞典语中即众所周知的天堂（Asgård）。考古发掘证实，在10世纪时，许多武士与他们的武器被一起埋葬，似乎预示着英雄将被欢迎进入瓦尔哈拉殿堂。而一旦进入天堂，战死的武士将最终进入一支新的军队，与诸神一道去作战，制止威胁人间和神间秩序的混乱。据信，这种善恶大决战将会在世界末日爆发，这是北欧版的日耳曼人的“众神的黄昏”（Götterdämmerung，瓦格纳的戏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的一幕“众神的黄昏”），即神的启示，它不仅暗示诸神自身的末日，而且对整个人类历史也具有无法抗拒的影响。在这一场景中，托尔神和奥丁神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这一毁灭性事变不是被视为历史的终结，而是被视为重生的机会。

12

诸神本身被划分为两大神族。托尔神和奥丁神属于众所周知的阿萨神族（œsir）。与之相对的弗雷尔神，则来自著名的华纳神族（va-

nir)，他是尼约德（Njord，海洋之神）的儿子，尼约德是司掌风、海洋和火的神，弗雷尔本身是司掌丰饶及生殖的神。瑞典皇室的绝大部分影响力即来自于这种传说，据信英弗·弗雷是弗雷尔的后裔。弗雷尔的姐姐是弗蕾亚（Freyja），她与生殖崇拜相联系，但同时又与灵界相联系，负责招引在战场上战死的武士的亡魂。

其他女神还有诺恩（Norns，命运女神），她是北欧版的命运之神，决定每个人生命的长短。还有狄丝女神（Disir），她是司掌节日献祭，即所谓圣灵节（Blót）祭祀的女神，祭祀通常是在冬至和夏至日举行，这反映在至今保存的那时北欧诗人的诗作中。

男女诸神和英雄都居住在天堂，而人类则被限制在尘世（Midgård）这一中间层面，即人间。尽管所有造物本身都被一条巨大的海蛇统揽，但它的中心却绝非是固定的，正如同一时期的基督教所言说的那样。据说，宇宙的中心是伊格德拉希尔（Yggdrasill）或宇宙之树，它是对巨大复杂性的神秘抽象。在农民自家农庄上生长的古树经常被认为与它有联系而受到敬重，人们认为由此可以将家庭生活和幸福与宇宙秩序本身相联系。所以说，在基督教化以前的瑞典的宗教世界，自然界就与一种神正论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在接下来的数个世纪中，甚至直到今天，它还激励着许多人，有政治人物，也有文化人物。

七、瑞典的基督教化

瑞典皈依基督教大体完成于12世纪。这不仅对瑞典社会和它的精神生活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有助于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瑞典国家本身的发展。然而，皈依过程是漫长而艰辛的，花了几个世纪才完成。829年，法国传教士安斯加（Ansgar），即后来德国汉堡的大主教，途经丹麦的海泽比到达瑞典的商贸中心贝加。斯韦国王对他的欢迎是虚情假意的，他在贝加并一直呆到来年。不过，在他离开后，反基督教的情绪不断增加，最终导致对仍然呆在那里的传教士的屠杀，它的直接后果是使安斯加不再在那里做进一步的传道工作。但最终他还是在

13

850 年返回贝加呆到来年，尝试恢复基督教传教活动。尽管这次恢复传教是短命的，但安斯加作为坚忍不拔的布道者的作用被承认，在他于 865 年死后不久，被尊奉为天主教的圣徒。

此后，改变瑞典宗教信仰的动议被提出多次，只是在 11 世纪，基督教才开始真正生根，这可以由那个时代带有古北欧文字的石刻予以证明，因为那上面装饰有基督教的符号。最初，似乎是瑞典的尚武国王埃里克·塞格萨尔（Erik Segersäll，死于约 994 年）在旅居丹麦期间皈依了基督教，从而加速了瑞典的皈依过程。不过，在他返回都城乌普萨拉（Uppsala）后又恢复了对异教的信仰，乌普萨拉是瑞典异教活动的古老中心。据说，他的儿子奥洛夫·埃里克森·舍特科农（大约 980—1022）对新宗教的信仰更坚定。他甚至将基督教的符号刻在瑞典的硬币上，而且还拿英国人的榜样力量来激励国人皈依基督教。他还尽力招揽大量英国工匠和牧师到瑞典来传播基督教，他们同时还可以为建造教堂和制作宗教物品提供新的技能。不幸的是，招揽英国移民的努力被他与挪威的不睦关系所破坏，几次战争接踵而至。尽管短期内有一些领土的收获，但对招揽移民却没有什么助益。所幸在宗教领域还是有了成功的保障：基督教被牢固地确立为这个国家的宗教，并且是以天主教的形式。

15

奥洛夫·埃里克森的 3 个儿子阿努德·雅各布（Anund Jakob）、埃蒙德（Emund）和斯滕克尔（Stenkil）继续坚持他们对新宗教的信仰。而且，斯滕克尔在继位后，倡议在离乌普萨拉以南不远的希格图纳设一个主教席位，以安抚那些仍然坚信异教的人群的巨大民愤。该席位后来在 12 世纪中期被转到乌普萨拉，后者是前异教的中心地区。另一个主教席位是 1015 年在斯卡拉（Skara）设立的，这是瑞典的第一个主教席位。由于教会和政治方面的复杂原因，两个席位都空缺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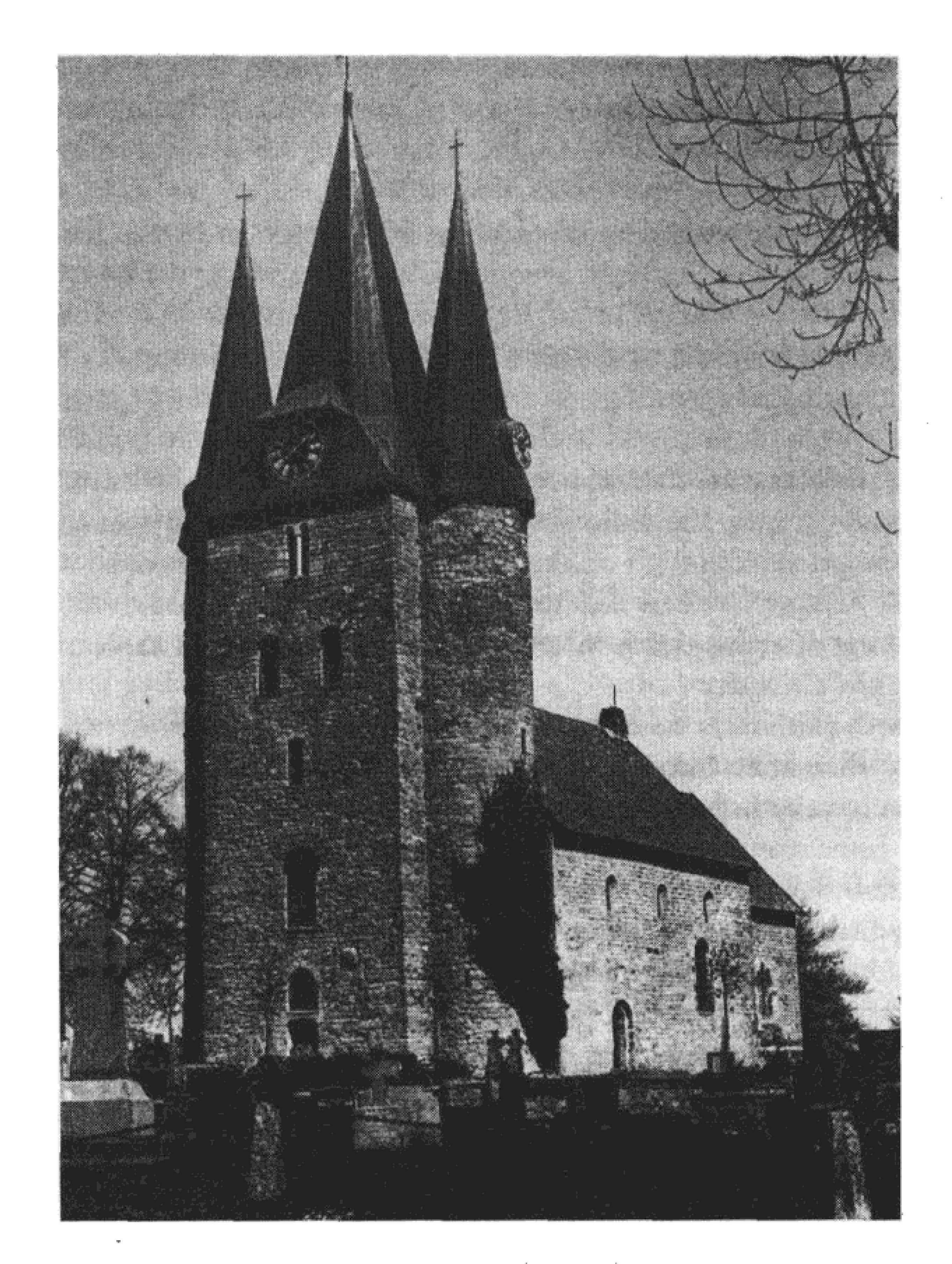


插图2　位于西哥得兰地区的哈萨比教堂（Husaby Church）。它是瑞典最古老的一个教堂，可以追溯到11世纪。它那带有圆拱形窗户的宏伟塔楼最初是附着在一个木制中殿上的，12世纪时木制中殿被替换为石制的。它的建筑风格是罗马式的，大体衍生于这一时期在瑞典建造的具有典型的德国莱茵地区风格的石制教堂。照片提供：安娜·尼尔森（Anna Nilsén）。

正是不来梅的亚当（Adam）于10世纪70年代的到来，对稳固天主教会在瑞典的地位起了关键作用。在他的主持下，基督教不仅逐渐

被有权势的名门望族所接受，而且也被普通百姓所接受。据说，仍然需要对正在走向衰落的异教给予最后的致命一击。各种新法律被适时颁布以实现这最后一击，尤其是乌普兰法（Uppland），通过该法律，偶像、圣树、圣石崇拜都被禁止。尽管如此，旧的习俗在瑞典仍然顽固存在，正如英国修道士埃尔诺斯（Aelnoth）在11世纪的证词所表明的那样。而且，战争的威胁、坏收成、严重的政治和经济衰退，再加上这一时期的其他灾难，导致过去的异教重又流行。为了与这种逆流作斗争，国家修建了许多教堂，从那里传播基督教教义。在接下来的数年，许多古老的异教活动被逐渐纳入基督教的活动之中。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异教活动以乡间迷信为幌子延续到现代。

第二章　瑞典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一、基督教在瑞典地位的巩固

16

到 12 世纪第一个 1/4 时期结束时，天主教会在瑞典的地位已牢固确立。1120 年，一个主教常驻瑞典主持宗教事务的制度最终确立，其他主教席位也正式在全国各地设立，例如在林雪平（Linköping）、斯特兰奈斯（Strängnäs）、韦斯特罗斯（Västerås）和艾斯通纳（Eskilstuna），即使是现任主教也并不必然在教区居住。还有，在这一时期，这些教职很少由瑞典人担任，因为早期到瑞典布道的主教绝大多数都是外国人，主要是英国人，也有一些德国人。一些传教士不幸殉道，如最早在南曼兰（Södermanland）传教的埃斯基尔（Eskil）。为了纪念他，艾斯通纳主教教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因此，在早期，英国和德国的天主教对瑞典教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个过程中加强了它们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外国传教士还在引入成体系的法律和行政管理原则上发挥了特别的作用，当然主要是仿制他们母国的成例。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是对书面文件的强调，由此确证土地转赠或其他形式的自愿捐赠。这就为司法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后者进一步促进了瑞典国家本身的发展。

这一时期，瑞典的建筑几乎完全使用当地的建筑材料，特别是木

材，不过许多建筑风格是受域外影响的。因此，瑞典早期的大多数教堂都是由木板搭建的就并不令人感到奇怪了。但到12世纪初，已经开始改由石材建筑，像在希格图纳建造的教堂，它们在建筑模式上是仿照盎格鲁—诺曼式。这种状况与瑞典南部的斯堪尼亚地区形成鲜明对照，那里仍在丹麦人的控制之下，其教堂建筑风格往往仿效德国式尤其是莱茵兰地区的设计风格。

虽然说瑞典教堂的建筑风格高度依赖于外国的原型，但在行政管理上，瑞典则是在努力实现更大程度的自主性。为了摆脱邻国丹麦的控制，瑞典的首要目标就是设立一个独立的大主教席位。12世纪后期，国王卡尔·斯渥克森（Karl Sverkersson）派遣特使觐见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III），请求教皇允许在乌普萨拉设立一个大主教席位，独立于设在隆德（Lund）的丹麦大主教，后者是在12世纪初设立的。这一请求在1164年最终被批准，但附加了一个限制性条款，即责成乌普萨拉大主教的授权仪式在隆德举行。也就是说，设在隆德的大主教仍然是整个北欧地区的大主教，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宗教改革时期。尽管如此，瑞典大主教席位的设立还是有助于强化瑞典的国家建设的。

瑞典教会当时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如何得到财政上的支持，这也是瑞典国王和他的臣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意义。因此，瑞典采取了一揽子措施以使教会统治集团能够获得财政支持，其收入不仅来自国王和贵族的自愿捐赠和财政援助——其制度化完成于1300年左右，而且来自对各种形式财产课收的什一税（tithes）。其中财产不仅包括土地，而且也包括牲畜。所课收的什一税的三分之一交给牧师，这是各教区应尽的一种义务，这种做法在宗教改革时期被保留下来，一直延续到19世纪。提供给教会一定数量的土地以充分满足教职人员的日常生活需求，这些土地也被免于政府税收，但超过规定数量的土地是要征税的，除非有皇室的减免政策。1281年，国王马格努斯（Magnus）发布特权许可令，完全免除了教会缴纳任何非宗教税收的义务。不过，在他死后，由于贵族对这项措施的敌

18 视，使这项特权被剥夺。这以后，教会中只有过去获得的土地即1302年之前获得的土地，还保持永久免税。

各种不同的教派纷纷在瑞典设立自己的圣职，正像它们在信奉天主教的欧洲的其他地方所做的那样。与教会管理机构在瑞典确立一同发生的是，这些不同的教派不仅修建了它们自己的修道院和基础设施，而且经常宣称对大片林地拥有所有权，目的是将它们变为耕地。在12世纪中期，第一批来到瑞典的是西多会的修士（Cistercians）。在皇室的帮助下，他们很快就修建了柏亚拉姆（Byarum）、阿尔瓦斯特拉（Alvastra）、古德海姆（Gudhem）和瓦恩海姆（Varnhem）4个修道院。本笃会（Benedictine）的僧侣也在这一时期来到瑞典，修建了伯瑞格（Börringe）和伯斯雅克洛斯特（Bosjökloster）两个女修道院。克吕尼修会（Cluniacs）在隆德修建了一个修道院，奥古斯丁会（Augustinian）的修士也在隆德和达尔比（Dalby）修建了他们自己的修道院。据说，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正是那些后来者，尤其是方济会修士（Franciscans）和道明会修士（Dominicans）逐渐主导了瑞典宗教事务的格局。

教会管理的一套复杂体系由此在这一时期的瑞典发展起来，它是模仿整个西欧基督教会的管理制度建立的，保持了相对于世俗政权而言的巨大独立性。到13世纪初，负责教堂管理的牧师会礼堂以及教会法庭纷纷设立，集中管理教会事务；与此同时，将瑞典教会整合进更广泛的国际教会组织中。培养神职学生的教育的愈来愈国际化促进了这一过程，它形成了与欧洲大陆诸大学的更紧密的联系。的确，1309年仅在巴黎就有大约30名瑞典学生。在两个多世纪中，在欧洲主要大学中学习的瑞典学生的数量是可观的，至少有800人在各大学学习。例如，在13世纪，学习神学和法律的瑞典学生是预备做高级教士的，他们先是被送到博洛尼亚（Bologna）大学，后来被送到巴黎大学学习。与此同时，较低级教士也能受益于教育的这种国际化，他们当时能够在为此目的而设立的教会学校中接受两年神学教育，教师通常是从国外引进的。这些新建立的学校也开始逐渐满足世俗人口受教育的

19

需要，但在范围和数量上是有限制的。它们局限于诸如斯德哥尔摩、瓦德泰纳（Vedstena）和延雪平（Jönköping）等主要城镇。芬兰当时已完全整合进瑞典王国，土尔库（Turku，瑞典语为 Åbo）成为教会和学术活动的中心，就前者而言，这种地位一直持续到今天。

瑞典的基督教化并非仅限于它的中心地带，甚至扩展到了它的北极地区，例如它最北方的省份诺尔兰也在这一时期接受了基督教。沿海省份西博滕（Västerbotten）的律勒欧（Luleå）被迅速确立为该省最重要的宗教中心。它古老的教堂修建于 1339 年，后来在 1492 年扩建，由此成为瑞典乌普萨拉以北最大的教堂，乌普萨拉的大主教为它主持了落成仪式。它是按照哥特式风格建造的，它的圆拱形内部装饰着由著名艺术家阿尔伯特斯·皮科特（Albertus Pictor，约 1440—约 1507）创作的油画和其他饰品，例如 1525 年的记录显示，后者包括一个从安特卫普（Antwerp）进口的精美祭坛。只有繁荣的地方经济才有可能在财政上支持购买这些昂贵的装饰品，律勒欧的经济繁荣是基于鱼干、毛皮和焦油贸易，利润颇为丰厚。这个教堂所服务的教区是广阔的，覆盖了今天瑞典四分之一的地区。不过，它的大部分资助主要来自乌普萨拉，来自瑞典大主教本人捐赠的资金。然而，尽管该教区服务的地区在扩大，但它服务的人口却很少，定期到教堂做礼拜的人数也非常有限。1559 年在该教区登记的 2 500 名居民中，有 700 多人甚至在复活节那一天也不参加礼拜，复活节是教会年历中最重要的宗教节日。据说，律勒欧的宗教地位是非常高的，因为它是向该省北部其他地区进行传教活动的基地。确实，正是来自律勒欧的传教士，努力改变了萨米人的宗教信仰，萨米人当时居住在拉普兰（Lapland）的腹地，而在数世纪前他们生活在海岸边。萨米人转变信仰的过程花了许多年才完成，因为许多萨米人顽固坚持他们的萨满教，其中敲鼓和哼唱（joik）在宗教仪式中发挥主要作用，这种宗教仪式将在未来的几个世纪中持续存在，但会愈来愈多地掺杂基督教宗教习俗的因素。该地区的基督教化也有助于将极北部地区更紧密地整合进瑞典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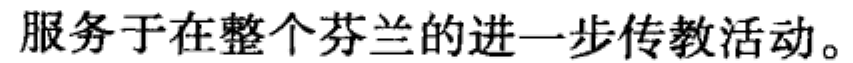
20

二、王朝更替

如果说 12 和 13 世纪对瑞典而言是一个宗教信仰改变的时期，那么它同时也是一个世俗世界发生重大动荡和变革的时期。王朝的更替是一个不断发生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竞争各方都宣称拥有对皇室的控制权。例如，伴随着小英格（Inge the Younger）的去世，斯滕克尔王朝由于无子嗣继承而终结。于是他的女系外孙、一位名叫马格努斯·尼尔森（Magnus Nielsen）的丹麦王子宣称有权继承瑞典王位。尽管他对哥得兰的统治权被毫无争议地承认，但他在 1134 年斯堪尼亚的福提维克战役（the Battle of Fotevik）中突然死亡，这为大斯渥克尔（Sverker the Elder）成功地继承王位铺平了道路。大斯渥克尔是来自西哥得兰（Västergötland）的权贵，当时已与小英格的遗孀结婚。不过，1156 年圣诞那天，他在去做礼拜的路上被议院的一位贵族谋杀，而后者这样做是出于义愤。长达一个世纪的残酷的王位竞争由此拉开了序幕，竞争是在两个主要的王位竞争群体间展开的：即斯渥克尔的后人和圣埃里克（Erik the Holy）的后人。

三、埃里克国王：圣徒和殉道者

人们在乌普萨拉投票表决后，伴随着圣埃里克约（1120—1160，即埃里克九世雅瓦尔德松［Erik IX Jevardsson］）的就职，瑞典王位就由一位新的、虔诚的国王所占据。他要用世俗的和宗教的方法，来确保天主教会在他领土内的兴旺发展。在瑞典的南部和中部各省，普遍是用石材而不是木材建造教堂，但诺尔兰地区除外，它仍沿袭着用木材建造教堂的习惯。正是在圣埃里克统治时期，乌普萨拉的主教席位被晋升为大主教。同时，具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是圣埃里克发起的传教活动，因为正是这些传教活动导致芬兰转信基督教。那里的领导人是在圣埃里克的帮助下实现该地区的信仰转变的，他是一位出生在英国的主教亨利（Henry），在大约 1156 年殉道。作为他们努力的结果，在接下来的世纪中，一个主教席位在土尔库设立，它作为一个辐射中心



服务于在整个芬兰的进一步传教活动。



插图3　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官印。印上刻有瑞典早期的一位君主、同时也是瑞典的守护神埃里克国王（约1120—1160），也即人们熟知的圣埃里克。他对巩固罗马天主教在瑞典的地位做出了贡献，不管是在宗教领域、还是在政治领域都是如此。他殉道于乌普萨拉，即天主教会不久前在瑞典设立的主教席位所在地。他不是被异教徒、而是被心怀不满的丹麦王子马格努斯·亨里克森刺死。

在瑞典，埃里克国王本人也不幸殉道，他在乌普萨拉做弥撒期间被刺死，不是被异教徒而是被心存不满的丹麦王子马格努斯·亨里克森（Magnus Henriksen）刺死。殉道的埃里克很快就被宣布为教会的圣徒，不久就被奉为瑞典的守护神。接着，一个势力强大的权贵卡尔·斯渥克森（Karl Sverkersson）掌握了瑞典王位，但他也未逃过凶残的结局，而于1167年被埃里克的儿子克努特·埃里克松（Knut Eriksson）杀死。这也算是位归原主，因为正是斯渥克森篡夺了克努

特·埃里克松的王位。由此开始的一个较长的相对稳定时期，它一直延续到1196年克努特·埃里克松（Knut Eriksson）自然死亡。克努特之后，敌对王朝的小斯渥克尔（Sverker the Younger）再次执掌王位。由于小斯渥克尔没有子嗣，人们预计王位将会回复到埃里克的世系上。1208—1210年在西哥得兰进行了一系列的决定性战役，其中丹麦和挪威支持反对的一方，而埃里克的支持者最终赢得了胜利，埃里克·克努特松（Erik Knutsson，即埃里克十世）登上王位。不过，直到他1216年去世时也未能留下男性继承人（他唯一的儿子，在他死后才降生），这使得约翰·斯渥克森（Johan Sverkersson）要求将王位归还给他所在的世系。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得不偿失的胜利，因为约翰·斯渥克森在死时也没有子嗣，他所建立的王朝也突然终止。由此，年轻的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son，即埃里克十一世）于1222年成功继位。尽管他一直统治到1249年，但他的王权也曾遭遇挑战，在13世纪20年代晚期，由克努特·朗格（Knut Långe）领导的叛乱曾短暂地迫使他逃到丹麦。不过，此后不久，朗格就死掉了，埃里克·埃里克松返回瑞典并重登王位。他也没有子嗣，政治权力很快就集中在一小撮势力强大的瑞典伯爵手中，尤其是乌尔夫·雅尔（Ulv Jarl，讲英语的伯爵）。因此，在埃里克·埃里克松死后，正是乌尔夫·雅尔的侄子和比格尔·雅尔（Birger Jarl，约1210—1266）的儿子积聚了强大的势力，比格尔·雅尔也是一位伯爵。尽管比格尔·雅尔的儿子仍是一个孩子，但被选为国王，在他背后实际上是比格尔·雅尔的势力在支撑着。他一直执掌国家政权到1266年病故。在这期间，他强化了国家权力，并完成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和经济改革，包括废除火刑等司法酷刑和减少农奴数量。

四、汉萨同盟对瑞典的影响

这一时期，瑞典开始强烈感受到来自波罗的海对岸的南方国家的影响，例如在经济和建筑领域中。这些影响源出于德国北部结成汉萨同盟（Hansa）的诸城市，那时它们开始渗透到瑞典的经济和政治生

活中。位于波罗的海中部的岛屿哥得兰此时已成为一个繁荣的商业活动中心，它的主要城市维斯比（Visby）是汉萨同盟跨波罗的海贸易的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到1250年，它已经完全由德国商人控制，大约有56名德国商人从莱茵兰和维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移民到这里。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快就被当地瑞典人同化，但也有一些人继续保持他们对德国文化和语言的认同达几个世纪之久。这尤其适用于卡尔马（Kalmar）的情况，那里对德国的种族认同一直持续到17世纪。当然，德国移民并非仅限于哥得兰和瑞典大陆的沿海地区。德国移民也到了维堡（Viborg，芬兰语称之为Vipuuri，但今天被称为维堡，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被并入苏联），在那里，一位德国移民在14世纪被任命为土尔库的主教，而且那里的德国社区一直保持兴旺，直到20世纪早期。汉萨同盟的商船此时经常往来于波罗的海和北海两岸，满载着货物，将瑞典与欧洲的主要贸易中心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们也使瑞典愈来愈多地受到汉萨商人的影响，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均是如此。这些商人中既有定居在瑞典的，也有居住在律贝克（Lübeck）、汉堡（Hamburg）和其他地方的。

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些德国移民为他们定居的瑞典城市、城镇甚至乡村打上了烙印，这表现在建筑和商业方面。哥得兰拥有大量宏伟壮丽的哥特式教堂，其每平方英里的教堂数量比国内的甚至于比意大利的托斯卡纳（Tuscany）都多。这些教堂展现了那些被引进来的撒克逊工匠出众的建筑工艺。同样，希格图纳的玛丽大教堂（Maria Church）和斯特兰奈斯大教堂（Strängnäs Cathedral）则证明德国工匠在14世纪就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他们传播着大陆建筑风格的最新技术，这些技术当时是他们家乡的标志性成就。

德国人作为神学家和思想家也是非常出众的。当德国法学家和教士在15世纪的瑞典获得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时，就为将它变成一块善于接受外来影响的土壤打下了基础，后来德国领导的宗教改革倡导的价值观也由此能够在这里传播。这一过程受文字革命的推动而加速，文字革命是继第一台印刷机从律贝克引入后发生的，它可能是在1480年

发生的。那时许多瑞典学生在德国学术中心做较长时间逗留学习，使瑞典受德国影响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导致路德教在瑞典最终获得教派斗争的胜利。在未来许多年后，当路德教臣服于瑞典国王时，强化了瑞典国家的发展。

五、比格尔王朝

伴随着比格尔王朝（也称福尔孔王朝）的确立，许多势力强大的贵族感到他们由于皇权的加强而愈益被边缘化，而皇权的加强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国王对司法制度加强控制而导致的。势力强大的贵族与国王不和的问题是瑞典历史上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结局则往往是谋杀，这一状况一直延续到18世纪晚期古斯塔夫三世（Gustaf III）国王被刺。在早期背景下，贵族怨恨的不仅是君主权力的加强，而且对德国移民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以及比格尔·雅尔的儿子被授予半自治公爵领地的事实也颇为不满。结果，在比格尔·雅尔死后不久，公开的叛乱就爆发了，他的儿子瓦尔德马尔·比格尔松（Valdemar Birgersson，约1239—1302）被迫退位。这次王位更替是在丹麦人的干预下完成的，瓦尔德马尔的兄弟马格努斯·拉杜劳斯（Magnus Ladulås，大约1240—1290）被推举继承瑞典王位，而这更便于他们控制瑞典内政。马格努斯死后，他的儿子比格尔被推举继承王位。不过，此时对政府的控制实际掌握在权贵托尔吉尔斯·克努特松（Torgils Knutsson，他死于1306年）手中，因为比格尔还是一个孩子，而为进行统治而设立的执政议会的权力在摄政时期是有限的。

当年轻的比格尔终于成年时，对他统治的主要威胁已不是来自于敌对王朝，而是来自于他自己的家族内部。他的弟弟埃里克·马格努松（Erik Magnusson）发动了叛乱。最终，双方在1305年达成妥协。尽管摄政王克努特松被以叛国罪处死，但家族内的对立仍然存在，进一步的冲突接踵而至。这种情势又由于瑞典邻国的干预而更趋恶化，在接下来的一年中发生了多次叛乱，这期间埃里克成功地掌控了权力。比格尔在乌普兰的哈图纳（Håtuna）庄园被抓获并被囚禁在那里，以

消除他的影响。不过，到了1310年，更广泛的和平才最终实现。它不仅包括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和平，而且也包括德国北部沿海诸公国的和平，后者已经深刻地影响到瑞典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但瑞典也由此分裂为一些独立的政治领地，每块领地都由不同的兄弟控制，继承权问题也被简化为看他们是否有男性子嗣。这次分裂付出的代价是高昂的，但从形式上看，瑞典的统一并未被触动：比格尔仍然是名义上的国王，他的兄弟们也都向他宣誓效忠。这是一个根深蒂固问题的暂时解决办法。

由于表象之下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所以各方达成的妥协的短命并不令人奇怪。1317年，比格尔在加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之后反败为胜，反过来囚禁了他的兄弟们，据传说，他们在第二年都被饿死。尽管比格尔用这些残忍而暴虐的方法来支撑他的权力，但他的统治还是很快就瓦解了。他逃到丹麦，不久便死去。

六、等级制度的确立和瑞典的扩张主义

作为对上世纪最后几十年发生的变革的反应，目前一群新的政治杰出人物正蓄势待发，他们将在这个世纪的早期造成瑞典政治生活的剧烈变化，并最终在该世纪结束时缔造出北欧联盟。

1280年颁布的阿尔斯诺法令（the Decree of Alsnö）有助于沿袭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在瑞典的巩固，同时也引入了等级制度，其中每个等级：贵族、教士、市民和农民，都发挥着他们各自的作用。不过，从更广泛的欧洲背景看，它具有特殊性，因为农民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的和拥有许多权利的，这些权利使他们能够发挥重要的政治作用。因此，他们能够影响到教士的任命以及参与当地的决策——最初是参与地方法律的制定，后来甚至能参与国家法律的制定。

1319年7月8日，在乌普兰的莫拉（Mora），埃里克的幼子马格努斯（Magnus，1316—1374）被推举接替他继承瑞典王位。不久前，马格努斯才在挪威加冕国王，这是按母系继承他祖父哈肯·马格努松（Håkon Magnusson）的王位。因此，小埃里克的继位，意味着瑞典和

挪威以国王为同一个人的形式联合在一起，也即两国历史上第一次统

一在一个国王之下。瑞典在北欧地区的扩张主义即以此为开端，并一直持续到16世纪早期。这次推举还具有另一种意义，因为它规定了许多彼此间的义务，即国王和国家期望对方能履行的义务。所以，它被称为瑞典的大宪章不是没有理由的，它实际上提供给这个国家的是一部基本宪法，并一直沿用到1719年。

为了巩固地位，新国王很快就沿着所谓的埃里克之路（Eriksgatan）出巡，大体说来，这是一条在东约特兰地区从东北到西南的传统路线。它的意义在于，这种传统——新当选的瑞典国王沿着这条路线走，沿途停留于恩雪平（Enköping）、尼雪平（Nyköping）、延雪平（Jönköping）和该国第一个主教席位所在地斯卡拉时，会见当地的要人，参加一系列盛装活动——有助于使他的权力合法化。

然而，国王的权力绝非是无限的。相反，它依赖于有权势的贵族的支持。从1319年以来，这些瑞典贵族处于一种特别强势的地位，他们是国家政务会（Council of State）的成员，能够在政治和经济等广泛的问题上向君主提出建议。当来年王位的一位竞争者马格努斯·比格尔松（Magnus Birgersson）被抓获，并根据政务会的决定被处死时，很明显，贵族们赢得了新的权力。此外，当既是女公爵又是皇太后的英格柏（Ingeborg）——当时已与丹麦人克努特·珀斯（Knut Porse）结婚——绕开政务会，试图以削弱她儿子的权力为代价来加强自己的地位时，政务会迅速做出反应。1322年，政务会在斯卡拉召开会议，采取一揽子措施来限制这位女公爵的权力，即在年幼的国王未成年期间，任命克努特·乔森（Knút Jonsson，死于1347年）为首辅摄政王；同时将女公爵设有防御工事的诸城堡——瓦尔堡（Varberg）、哈尼豪斯（Hunehals）和阿科斯瓦尔（Axvall）——都置于政务会的监督之下。此后，政务会的注意力转向瑞典以外，越来越关注南方的丹麦。丹麦从14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就陷入了内部争斗和经济衰退之中，这是由于荷尔施泰因（Holstein）王子们的阴谋诡计造成的，他们想从其虚弱中谋取个人利益。在这种背景下，瑞典进行领土扩张的前景非

常诱人，难以抵御。刚好在国王宣布成年之前，斯堪尼亚和布莱金厄被并入瑞典王国。这是在主教席位设在隆德、当时在卡尔马（Kalmar）办公的丹麦大主教，以及当地的大多数百姓的支持下，由德国行政干预割让给瑞典的。作为交换，丹麦获得 34 000 银马克，但其国王决心收复失地。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阿特达（Valdemar Atterdag）恢复丹麦领土完整的尝试导致了与瑞典的敌对状态，双方对峙多年。

1356 年，新并入瑞典的斯堪尼亚和哈兰（Halland）两省爆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它们是在与丹麦的斗争过程中，最近才被马格努斯·埃里克松（Magnus Eriksson）占领的。叛乱一直持续到 1363 年，那一年贵族通过国家政务会最终罢免了马格努斯国王。然而，政务会却未对丹麦和它的国王做出任何谴责。部分而言，叛乱是对马格努斯国王未能满足他几个儿子的政治野心的反应，他试图确保自己终生担任国王。但这种处理方式与瑞典的传统和以前的政治处理办法相悖。在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小阿尔布莱克特（Albrekt Younger，1338—1412）的支持下，国王的长子要确保自己叛乱的成功，而为了获得更广泛的支持，他假称在以他的父亲的名义行动。结果，马格努斯·埃里克松被迫将他的领土在他和大儿子之间进行分割。不过，马格努斯·埃里克松、他的儿子和追随者都被证明不是这种新政治安排的主要赢家，真正的赢家是政务会的成员和它的盟友梅克伦堡的阿尔布莱克特，后者获得了斯堪尼亚省及其相邻的法尔斯特堡（Falsterbo）作为封地，而这些地方拥有繁荣的市场，由他统治的 12 年间，源自于市场交易的大部分财富都流入他的金库。与此同时，瑞典贵族也获得了显赫的政治地位，这是其他欧洲国家的贵族不可能获得的。

不过，马格努斯·埃里克松留下的另一份遗产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他的土地法，而它最早的草案可以追溯至 1343 年。随着时间的变化，它成为瑞典领土内神圣不可侵犯的基本法，对国王和臣民都有约束力。它能够被补充或修改，但前提是必须得到全体国民的同意。不管这部土地法有多么不完善，但它毕竟提供了一部成文宪法，其中国王的权利被明确给予规定，而这些权利则与他听从政务会建议的义务

联系着，政务会的成员必须是瑞典出生的贵族。与此同时，臣民们也就他们必须履行的职责获得了基本的保障，即有关服兵役和缴纳附加税方面的限制，还有其他方面的保证。因此，尽管该法助长了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存在，但也有助于培植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管理权被移交给地方法院，后者定期开庭处理诉讼。臣民们被赋予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官员，最终，权力被授予由当地自耕农组成的陪审团。因此，该法律对瑞典国家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在国家和基层两个层面都是如此。在1608年后，这部法律的实施力度进一步增强，那一年它变为书面形式的法典。尽管在1734年做过重大修正，但直到今天它仍然是瑞典基本法律体系的组成部分。由于持续几个世纪的对这部法律的尊重，该国免于了革命的创伤。

28

不过，在14世纪中期，这部法律对瑞典未来的长期的意义却并未被充分认识，国王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关注。1359年，马格努斯·埃里克松和他年纪较轻的儿子哈肯与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阿特达结成联盟，哈肯是在成年后于1355年成为挪威国王的。根据盟约，丹麦将获得赫尔辛堡城（Helsingborg），它位于斯堪尼亚临松德海峡的海岸地区；作为交换，丹麦帮助马格努斯和哈肯收复由马格努斯长子占据的领土。这种努力最初是不成功的，但他的长子埃里克在第二年夏天的突然死亡使马格努斯能够重新控制他王国的全部领土。不过，他的实用主义策略损害了他的地位，例如在梅克伦堡的阿尔布莱克特对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阿特达进行的战争中，他改变了立场支持阿尔布莱克特；他还对政务会在宪法上的要求做出让步。由于马格努斯的背信弃义，瓦尔德马尔成为了一个可怕的军事对手。瓦尔德马尔不仅迅速地重新占领了斯堪尼亚的全部、布莱金厄和哈兰省的南半部，而且也占领了哥得兰岛。在对哥得兰的占领中，瓦尔德马尔老练地利用了当地的政治矛盾：那时与从事农业生产的内陆地区处于对峙状态的维斯比城接受了丹麦国王提供的保护，作为交换而对他效忠，从而也就推动该岛的主权被转移给了丹麦，同时还进献了大笔钱财。尽管这座城市被允许继续保持它作为汉萨同盟城市的地位，但它的经济影响力已

在持续下降。

七、汉萨同盟影响的增强

29

尽管这些土地被丹麦占领是一种屈辱，但越来越充满敌意的政务会比丹麦国王更为可怕。马格努斯·埃里克松要确保通过哈肯与他以前敌人的女儿的婚姻来与后者结盟，1363 年，他的儿子与丹麦国王瓦尔德马尔·阿特达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e，1353—1412）结婚。单是这一举措就成功地为长期的王朝冲突提供了解决办法，并有利于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未来都联合在一个王朝的统治下。同时，也为将不友好的国家政务会逐渐边缘化提供了希望。不过从短期看，它只是加重了形势的严峻性。因为，玛格丽特此时尚无子女，政务会派遣特使觐见梅克伦堡的阿尔布莱克特，提出由他的儿子小阿尔布莱克特继承瑞典王位。阿尔布莱克特接受了这一提议，并在 1367 年马格努斯·埃里克松被强行罢黜后，小阿尔布莱克特适时地在莫拉被推举为瑞典国王。当汉萨同盟在瑞典政务会的支持下于 1367 年组织科隆同盟（the Confederation of Cologne）时，其目的就是要形成一个反对丹麦和挪威的联合阵线。阿尔布莱克特要依赖其军事和经济力量来进一步加强自己的地位，他入侵了瓦尔德马尔·阿特达所控制的领土。这次成功的入侵导致了 1370 年《斯特拉尔松和平协议》（the Peace of Stralsund）的签署。根据该协议，汉萨同盟获得对斯卡诺尔（Skanör）、法尔斯特堡（Falsterbo）、马尔默和赫尔辛堡又一个 15 年的控制权。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谈判，瑞典内部反对德国的呼声已越来越强烈，最终被罢黜的国王埃里克松于 1371 年被迫勉强承认拥有对西哥得兰、韦姆兰（Värmland）和达勒卡里亚（Dalecarlia）确定的权利。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对前瑞典国王微不足道的收买，但事实上这是一份大礼。因为，这些领土是由哈肯领导的挪威在进行管理，所以在哈肯的父亲于 1374 年在一次船只失事中被淹死后，这些新获得的领土实际上就被并入挪威王国。当瓦尔德马尔·阿特达接着于第二年去世，其皇位由哈肯和玛格丽特的儿子奥洛夫（Olof）继位时，阿尔布莱克特确保由

他自己的子女继承丹麦王位的企图明显失败，汉萨同盟进一步扩张的企图也被有效扼制。

此外，伴随着德国人，其中包括管理者、商人和其他人，对所居住城市的控制的不断加强，汉萨同盟在瑞典的影响继续增强。不仅有作为瑞典国王的小阿尔布莱克特，而且还有他的父亲都获得了大量土地的所有权，这些土地不仅包括卡尔马和尼雪平等皇室领地，而且还包括整个诺尔兰。据说，皇室的特权绝非是无限的，因为政务会的愿望也必须予以考虑。的确，1371 年，阿尔布莱克特就被迫将一些皇家城堡和它们所管辖的领地直接转交给了政务会，还被迫承诺在重大国务问题上听从政务会的建议。权贵博·乔森·格瑞普（Bo Jonsson Grip，死于 1386 年）此时已成为政务会中势力最强大的人物，正是他要求梅克伦堡的阿尔布莱克特归还所占领的土地，并且尽量减少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1387 年，仍未成年的奥洛夫国王去世，玛格丽特本人接掌丹麦王位。此时，挪威和瑞典对她的支持也在增强。1389 年，在福雪平（Falköping）战役中，她的军队取得了对阿尔布莱克特的胜利，并且成功地将后者俘获。因此，玛格丽特被拥戴为 3 个北欧王国的女王，即瑞典、丹麦和挪威联盟的女王。然而，斗争仍在继续，而且斯德哥尔摩和卡尔马仍然控制在梅克伦堡德国人的手中。在瑞典首都发生的暴力事件最终演变为一场所谓的卡普林格大屠杀（Käpplinge Massacre），即一群被称为海特兄弟会（Hätte Brothers）的全副武装的德国人杀害了许多瑞典人；汉萨同盟也在外海对瑞典船只发起海盗式攻击，攻击是由那些组成名为瓦泰利兄弟会（Vitalie Brothers）的水手们干的。这些事件证明，反对玛格丽特执掌瑞典皇位的压力绝未减轻。复杂的谈判随之而来，在 14 世纪 90 年代的早期持续了几年时间。结果，两个统治集团在斯堪尼亚的林德霍姆城堡（Lindholm Castle）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阿尔布莱克特被用赎金赎回，赎金用于资助律贝克和其他汉萨城市的发展；与此同时，斯德哥尔摩被转交给了玛格丽特的支持者。协议签署于 1395 年，并于第二年开始执行。玛格丽特本人没有

其他子嗣，她的一个亲戚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Erik of Pomerania，1384—1459，即埃里克十二世）被她收养后，先被宣布为丹麦国王，后来被宣布为瑞典国王。

伴随着这些王朝冲突的解决，现在已有可能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因此，在1395年颁布了尼雪平法令（Nyköping Recess）。根据该法令，税收只有得到皇家授权才可以征收；没收私人财产充税被禁止，并保证以前被如此没收的物品将会被归还；自1363年以来被不合理地充为教会和贵族地产的土地，也将被归还给它们合法的所有者。

八、卡尔马联盟

1397年6月17日，卡尔马联盟（Kalmar Union）正式宣布成立，君主统治在所有这3个王国确立。尽管其中每一个国家的法律都截然不同，但在一个国家被判有罪的人，在其他两个国家也被视为有罪。在汉萨同盟的帮助下，1398年梅克伦堡人归还了斯德哥尔摩，但这是在赋予他们一系列特权后归还的。不久后，诺尔兰和芬兰的反抗也停止了。只有哥得兰仍在继续抵抗，但最终于1408年屈服，在支付给维斯比巨额钱财后，其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它的经济影响力，汉萨同盟的成员资格也成为昨日黄花。

玛格丽特在她的余生中继续统治着联盟，甚至在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于1401年成年并正式就职后仍是如此。只是在玛格丽特去世后，埃里克才于1412年按照传统巡游全国，以此来加强他的君主地位。他还通过联姻结成两个重要的联盟，以扩大他的政治影响力，一个是他本人娶了英国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的女儿菲利帕公主（Princess Philippa），另一个是将他的妹妹卡特里娜（Katerina）嫁给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王子——巴伐利亚的约翰（Johann of Bavaria）。这些行动有助于更牢固地强化他的地位，使他跻身欧洲势力最强的统治者之列。

九、中世纪的社会

正如12世纪欧洲的其他国家一样，瑞典社会也是高度等级化的。

权力集中在君主和势力强大的权贵家族手中，人口中的大多数处于被奴役状态——他们的身份是农奴，服从于农奴主的意愿，在后者的庄园中劳作。尽管经常有农奴被解放——这是教会所鼓励的，但这种解放并不承认农奴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根据古老的传统，由于土地是家族的，而不是个人所有，因此为了完成解放程序就要求接纳农奴为家族成员。伴随着中世纪的进步，农奴迅速转变为自由农民。1355 年一纸皇家敕令最终完全废除了农奴制。在农奴制存在的最后时期，教会更强烈地谴责对基督徒的奴役，因此未皈依基督教的萨米人成为瑞典人中最后一批处于被奴役状态的人。到中世纪盛期，像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国家一样，瑞典的全部农业人口都已变成自由人。他们对土地的使用权是基于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租赁占有和自由持有的土地都是如此。这意味着租佃制度是稳定的，给予了农场劳动者和地主双方以相对的经济保障，并赋予人们从事其他有益经济活动的自由。

尽管给农奴自由有许多明显的好处，但也有不利的方面，最不利的就是国王所课征的税收。不过，在教会和贵族的土地上劳作的农民，即所谓贵族佑庇的农奴（frälsebönder），免缴这种皇家税收，从道理上讲为的是要换取贵族服兵役，不管事实上他们是否实际履行这种义务。从 14 世纪末到 16 世纪 20 年代早期，此类免于税收的土地所占比例一直保持稳定，因为在这一时期贵族被禁止购买应纳税的地产。这不仅有助于强化君主相对于贵族的力量，而且有助于国家自身的发展，因为有税收持续流入到政府的国库中。

这一时期瑞典是一个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乡下，居住在由 3 到 5 个农庄组成的小村庄中。农业是国家的支柱产业，种植的作物则多种多样。在大多数地方大麦和燕麦都是最重要的产品，只是在南部地区种植小麦；黑麦仍然非常稀有，谷物一般是从塔林（Tallinn，德语是 Reval）进口。亚麻和大麻主要是为家用而种植。

两年一次，有部分土地（通常是一半）要保持休耕状态，主要是在重新轮作前满足家畜的需要。在南部地区，在轮到休耕之前通常种植两种作物。农具仍然是原始的。这一时期只是在西哥得兰地区引入

了曲犁（turning plough），它在瑞典更北部地区的推广用了两三个世纪的时间。

当然，由于拥有广阔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湖泊，渔业在瑞典非常重要。到12世纪，捕钓大马哈鱼已经在生产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几个世纪中为海岸地区大量的人口提供了让他们大量享用的食品。其他生产活动包括狩猎和采集，在那些不太适于农业生产的地区，采矿和采石也是一种重要的工作。

正如我们所观察到的，瑞典的商贸也非常繁荣，这是依赖北欧汉萨同盟的商人和商船创建的商贸网络。尤其是卡尔马，到12世纪已经成为瑞典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而在接下来的世纪中，其他商业中心也相继发展起来，特别是北部的南雪平（Söderköping）、北雪平（Norrköping）和尼雪平。此外，延雪平和奥雷布洛（Örebro）也相当重要，尤其是维斯比，它从临波罗的海各国乃至以外地区的商贸中获益。在所有这些贸易中心，德国商人在13和14世纪发挥了主要作用，他们都得益于汉萨同盟的支持。能够获得相对充足的资本和使用大的商船，使他们比瑞典商人更具有优势，不仅是在哥得兰地区而且在瑞典本土的其他地区也是如此。而据说德国商人在瑞典本土沿海地区的成功发展损害了哥得兰的利益，这个波罗的海中的岛屿越来越被边缘化，因为瑞典与波罗的海的主要贸易伙伴，诸如律贝克之间的贸易不再需要中转补给，但在过去是由哥得兰岛的维斯比提供该服务的。

伴随着商贸的繁荣和人口的增长，瑞典的城市不仅在数量和规模上都在增加，吸纳了全国5%的人口，而且城市的发展还导致它们获得更大的政治自治权。这种趋势类似于那时在丹麦出现的发展，但同 34 挪威的情势形成鲜明对比，那里人口稀疏。城市社会生活的特征在相当程度上不仅是商贸，而且是手工业、是行会，许多城市居民根据他们的职业被划分到各个行会，而各行会不仅要求获得大量财富，并且要求拥有地方政治权利。行会也发挥着重要的宗教和社会职能，这都有助于它们在政治领域索求权利。行会主要是由德国人引入瑞典的。第一份有关的记录是海员行会，它记录于1356年的斯德哥尔摩。行会

要求高标准的工艺水平，但与此同时却限制竞争并维持高价格，因为竞争不受行会成员的欢迎，而高价格则能确保现实的兴旺。

十、黑死病

如果说城市和城镇是繁荣的商贸中心，但相比乡村生活却也有非常不利的方面。在整个中世纪的瑞典，卫生和健康状况都是很差的，城区尤其如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地方性疾病和瘟疫不时地袭扰瑞典，特别是它的城镇地区。麻疯病是一种常见的疾病，其他诸如天花等疾病也定期爆发。不过，没有哪种疾病像人们所称的黑死病（the Black Death）或称淋巴腺鼠疫那样在 14 世纪 40 年代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作为席卷几乎整个欧洲的这种瘟疫，它吞噬掉至少 1/3 的瑞典人，而同样生活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其他各民族也损失惨重，只有芬兰相对而言未遭受大的损失。由于丧失了劳动人口中的主要劳力，这场灾难对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影响。劳动力的大批死亡意味着大片土地抛荒，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中世纪末期，它减少了王室的税收来源，也减少了土地贵族的收入。据说，残存下来的劳动力从中获得了利益，因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使那些仍有能力耕种土地的人的收入得到增加，这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当然，这种趋势不仅在瑞典出现，在同样遭受这场瘟疫的西北欧其他大部分地区也是如此。而与之相反，残存下来的地主却发现他们的财富减少了，因为他们的土地的被耕种数量大大减少，但支出却比过去大大增加。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向东去寻求新的机会，或是购买土地或是进行贸易。

十一、沿波罗的海方向的扩张

瑞典国家在 14 世纪继续得到发展，它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与俄国处于对峙状态，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是如此。1323 年的《诺特堡和约》（the Peace of Nöteborg）是瑞典和俄国签署的第一份领土协定，确定了两国之间的边界，但这很快就被证明是存在争议的，就像瑞典

与丹麦和挪威的边界存在争议一样。与俄国贸易的增加也是造成摩擦的一个原因。芬兰湾（the Gulf of Finland）末端的涅瓦河（the River Neva）是一个充满诱惑力的水路通道，通过它向北可以经拉多加湖拓展贸易，向南可以深入俄罗斯腹地。不过，当时瑞典还没有占据涅瓦河这个出入口的想法。不过，瑞典有能力投资与俄罗斯大的商业城市诺夫哥罗德进行贸易，该城在涅瓦河口南方约 100 英里处。不幸的是，瑞俄贸易的增长导致了同汉萨同盟的摩擦的增加，这种摩擦日益演化为整个波罗的海的经济对抗，从丹麦一直延伸到俄罗斯。就瑞典国王对财富的持续地不断追求而言，这种对抗并不可取，因为在所有主要方面它都加剧着财政的困难，这种困难是在瑞典过分扩张的数年中一直困扰王室的问题。例如，在马格努斯·埃里克统治期间，他被迫从他岳父，即梅克伦堡的阿尔布莱克特那里贷款，而作为回报，他答应将斯堪尼亚海关征收的一揽子关税给予后者作为补偿。

不过，到 14 世纪较晚期，波罗的海东海岸地区为帝国提供了补偿。波罗的海东部的贸易已经增加到了使国王将注意力转向东部的程度。诸如塔林和里加（Riga）及南方的但泽（Danzig，波兰语称为格但斯克）等港口作为主要贸易伙伴，相比律贝克是越来越有竞争力。这种状况有利于斯德哥尔摩成为与这些港口进行贸易的中心，而且虽然它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却又不会影响瑞典以前一些沿海港口（如卡尔马等）的贸易活动。由于这种原因，国王看到了瑞典向东扩展的好处，那里能够吸纳瑞典出口商品的港口越多就越能期望有更多的收入来填充皇室的国库。

36

瑞典的出口商品绝不限于少数大宗产品。相反，这一时期出口产品是非常多样的，而有几种产品最为重要：铁矿石至少从 13 世纪就开采和出口，虽然在数量上从未超过每年 1 000 吨。开采达勒卡里亚的铜也非常重要，它是欧洲的为数不多的几个矿源之一。过去来自北方的毛皮贸易和来自南方的乳品贸易仍在继续。反过来，腌制肉和鱼所必需的盐及服装都是大量进口。高级教士和贵族也在贪婪地购进诸如葡萄酒和香料等奢侈品。

德国境内的条顿骑士团（the Teutonic Order）1410 年在坦能堡（Tannenberg，长期以来一直在东普鲁士境内，但今天位于波兰境内）的失败造成了一种真空状态，促使瑞典对从政治和经济上扩大在该地区的影响变得非常热衷。既然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继承了德国北部临波罗的海的领地，他由此希望向东进一步扩张领土以获得整个波罗的海沿岸的土地。为了实现这种意图，他在丹麦修建了新的埃尔西诺（Elsinore）要塞，同时在松德海峡的另一方、赫尔辛堡附近的卡尔南（Kärnan）加固要塞。这些举措使他拥有了对波罗的海入口的完全霸权。它们也提供了丰厚的收入来源，因为他能够在那里对过往船只征收通行税。毋庸多言，与汉萨同盟的更多冲突也由此产生。汉萨同盟不断增加的敌意使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面临的对抗增加，而这对瑞典而言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只是当来自国内的困难逐渐开始削弱他的力量时，他的扩张意图才开始收敛。到 1430 年，埃里克非法将他的几乎所有城堡（那些在芬兰的除外）、连同它们管辖的领地都赐予了外国人（通常是丹麦人和德国人，但有一次是赐给一个意大利人），这引发了极大的愤怒，旧的瑞典贵族认为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权利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37

国王采取的另一项举措也引起很大的怨愤，即实施货币贬值政策以补偿皇室对货币不断增加的需求。此时，铜币经常被以银币的价值强迫商人接受。结果，瑞典较高质量的铸币相比汉萨同盟和其他外国商人使用的货币已经大大贬值，并且被越来越少地使用。这大大损害了瑞典的对外贸易。

十二、不满、恩格尔布莱克特叛乱和对波罗的海霸权的追逐

像在世俗政治中一样，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在教会政治中也热衷于巩固他的权力。他也像其继母玛格丽特一样，利用与教皇的密切关系来保障自己民族在教会中的重要地位，由此经常与瑞典主教的牧师会处于直接对立状态。然而，皇家对教会的权威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在玛格丽特掌政期间曾成功地使她倾向的候选人乔斯·格里克松

（Jöns Gerekesson）晋升为乌普萨拉的大主教，但那是短命的，因为那位大主教由于明显的行为不端而被免职。不过，在另一位教士短暂履职后，埃里克选择斯特兰奈斯的主教托马斯·西蒙森（Thomas Simonsson）来填补空缺。对此，牧师会予以拒绝，他们选择自己的当地主教奥洛夫·劳伦森（Olof Laurensson）来递补。接着是进一步的推举工作，随之发生了对抗和公开的冲突。最终，争议被送至巴塞尔（Basle）的一个牧师会裁决。但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且影响到政治领域，最终导致公开的叛乱爆发，其中达勒卡里亚地区对埃里克最为不满。

达勒卡里亚从经济方面看是一个非常富裕和重要的省份，而且根据传统，它还是国王被推举后进行盟誓的地方和巡游全国的出发地。因此，这里对国王的敌意达到极点是非常令人惊讶的。恩格尔布莱克特·恩格尔布莱克特松（Engelbrekt Engelbrektsson，约 14 世纪 90 年代到 1436 年）是一个低级贵族，从事采矿业，而采矿业在埃里克的统治下是遭受严重打击的。因此，在他的领导下，人们同国王的对立情绪不断加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对立由于达勒卡里亚人希望免除韦斯特罗斯地方长官乔瑟·埃里克松（Jösse Eriksson）的职务而加剧。这座教会城市的两个最重要的世俗官员尼尔斯·古斯塔夫松·罗斯维克（Nils Gustavsson Rossvik）和他的儿子埃里克·普克（Erik Puke）都支持恩格尔布莱克特。甚至通过他们父子的努力，诺尔兰地区也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到 1434 年 7 月份，恩格尔布莱克特的叛军直抵斯德哥尔摩城下，在那里达成了停战协议，他因而又能够自由地向南部进军：在前往瓦德泰纳路途中的诸要塞都保持了中立；许多政务会的成员，既有世俗的，也有教会的，都汇聚到瓦德泰纳——在何种程度上他们是出于受到威胁而屈从于恩格尔布莱克特的优势力量并不很清楚，但最终他们都被迫在他给国王的信函中支持他。由此就使这场叛乱合法化了，它削弱了埃里克的地位。叛军很快占领了瑞典南部的大部分地方，接着他们试图在这些地方将埃里克任命的地方长官驱逐出境，其中大多数是外国人。

38

作为回应，埃里克动员他在丹麦的军队，并在 1434 年晚秋率领他的舰队到达斯德哥尔摩。在绝望中，埃里克试图从他唯一可能得到帮助的地方寻求支持，即从他以前的敌人汉萨同盟那里寻求支持。此时，恩格尔布莱克特已经在瑞典中部的朗豪（Långholm）安营扎寨。他同样也在努力寻求更广泛的支持。尽管双方达成停战协定，但来自瑞典的各方面代表——不仅有贵族和教会的，而且还有商人阶层的，于 1435 年 1 月齐聚阿尔博加（Arboga）商讨如何应对。他们选择恩格尔布莱克特做他们的领袖，来处理保卫斯德哥尔摩和乌普兰这一特别事项。由于拥有这种实力地位，叛军最终于 1435 年 5 月 3 日在哈尔姆斯塔德（Halmstad）与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达成和解，根据和约，埃里克答应满足叛军对他提出的要求。这一年 7 月，埃里克国王同汉萨同盟达成和解，他感到有能力再次将他的舰队派往斯德哥尔摩。

然而国王埃里克与叛军双方对这次和解都不满意。尽管埃里克允诺要尊重瑞典法律，并将他的大多数城堡和它们管辖的领地都留给瑞典人管理。但是，斯德哥尔摩、尼雪平和卡尔马的城堡和领地却不在此列，这是该国 3 个最重要的地区。因此，不满仍在累积，而且由于税收成为更沉重的负担，所以双方的对抗加剧。结果，在阿尔博加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而且集结了军队。叛军的军队领导权被授予恩格尔布莱克特和卡尔·克努特松·邦德（Karl Knutsson Bonde）共同掌控，但诸叛军的联合实际是不可能的。两位领导人之间的摩擦已经变得如此严重，以致前者于 1436 年在前往斯德哥尔摩参加一个会议的途中遭谋杀时，杀手马格努斯·本特森（Magnus Bengtsson）还得到卡尔·克努特松的庇护。

39

与埃里克国王的和解再次达成，卡尔·克努特松的地位得到巩固。在又一次的公开叛乱后，埃里克·普克于 1437 年被抓获并斩首，而杀死恩格尔布莱克特的本特森的家族获得了瑞典波罗的海沿岸的诸城堡。但自从第二年卡尔·克努特松成为政务会无可争议的领袖起，他就采取行动反对本特森家族，强迫他们交出新占有的土地，尽管国王也对这些土地感兴趣。

不满仍然存在，1439 年冲突再次升级。多次的纵火袭击造成了大的破坏，叛军在韦斯特罗斯和乌普萨拉占据了优势，他们再次得到了尼尔斯·古斯塔夫松·罗斯维克的帮助。

与此同时，埃里克国王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丹麦政务会的损害。1439 年夏，政务会放弃了对他的支持，转而支持他的侄子——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夫（Christopher，1416—1448）作为折衷的选择。当后者由此执掌政府大权时，瑞典政务会也宣布忠诚于他，认为支配他比支配他的前辈可能更容易些。因此，1440 年克里斯托夫被正式宣布成为丹麦国王，接着于 1441 年被推举为瑞典国王。此时，瑞典和挪威都处于衰落的过程中，而丹麦的统治力量却在加强。据说，国家政务会变得越来越强大，甚至克里斯托夫也被迫同意修订法律，即在他外出时设摄政职位，对在他有可能死亡、新的国王尚未就职时就应尽的义务做出规定，而这些都是由政务会倡议的。

40

政务会对克里斯托夫施加的限制要比过去尝试对埃里克施加的更为严格。不再允许国王将归他所有的国家财富汇出国外，这些财富将被存放于新设立的国库中用于满足瑞典境内的需要。至于卡尔·克努特松，他被补偿以芬兰境内的土地，并被迫居住在那里的土尔库城堡。尽管博里霍尔姆（Borgholm）和厄兰岛的其他地方被授予他作为某种形式的补偿，但其实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强制流放。

尽管政务会希图对克里斯托夫施加限制，但他在瑞典的统治为这个国家的权贵和更多的人提供的益处并不比埃里克提供的多。作物歉收导致普遍的贫穷，而克里斯托夫被谴责为了一己私利去掠夺瑞典人的土地。甚至更为严重的是，他被指责试图绕开政务会而依赖于他的巴伐利亚顾问们进行政府决策。并且，他还暴露出在军事方面的虚弱，即未能从埃里克手中收复哥得兰。据说，正如政务会所期望的那样，克里斯托夫确实于 1442 年颁布了一部新法典，规定了这样的原则：瑞典城堡的辖地应该被授予政务会和政务会所青睐的人选，而不是授予他自己的德国随从。结果，过去支持克里斯托夫的一些势力继续支持他，这削弱了对立方的力量。到 1448 年，叛乱似乎已经平息下去。不

过，克里斯托夫在同年的去世不仅结束了贵族在北欧联盟中的霸权，而且为卡尔·克努特松重新谋求三国王位开辟了道路。当丹麦政务会支持奥登堡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 of Oldenburg，1426—1481）做丹麦和挪威的国王时，克努特松只好被迫予以接受，因为那是1450年在哈尔姆斯塔德（Halmstad）召开的代表大会上的决定，代表们是从所有这3个国家产生的。尽管联盟后来重新恢复，但现实的安排是各就其位。卡尔·克努特松被迫满足于仅仅担任瑞典国王，承认奥登堡的克里斯蒂安是丹麦和挪威的国王。

当然，这是一种不稳定的情势，在卡尔·克努特松的统治下，瑞典很快就遭到内部叛军和外部敌人的攻击。克里斯蒂安开始进攻瑞典的南部边界，意在收复被瑞典占领的丹麦领土。与此同时，敌对的各派别团结在乔斯·本特森（Jöns Bengttson）周围，他是乌普萨拉大主教，是势力强大的奥克森斯特纳家族（Oxenstierna family）的成员，该家族感到自身被卡尔·克努特松边缘化了，于是在国内起而反抗。在反对瑞典国王的公开叛乱中，他们与其他不满的权贵联合在一起，并获得瑞典人民的广泛支持。这其中，不仅包括斯德哥尔摩的许多有影响力的商人，该市目前拥有大约5 000人；而且包括达勒卡里亚和乌普兰的小农，他们由于军队的征兵、教会和贵族免税土地的减少以及经济的普遍衰退而起来反抗。结果，卡尔·克努特松被废黜，1457年奥登堡的克里斯蒂安被推举为瑞典国王。这就巩固了教会的地位，特别是加强了奥克森斯特纳家族和它的表亲瓦萨（Vasa）家族的势力，这些家族彼此处于共生状态。不过，克里斯蒂安也不得不对贵族强加税负，以为在荷尔施泰因进行的战争筹款。当大主教本特森改变立场，努力恢复卡尔·克努特松的地位时，克里斯蒂安抓捕了这位高级教士，而这是在对凯蒂尔·卡尔松（Kettil Karlsson）在西曼兰领导的叛军的攻击赢得决定性胜利后实行的。但这并未能阻止那时的政务会重新推举卡尔·克努特松为国王。于是，一系列复杂而持久的谈判随之进行，结果，1464年本特森大主教被释放，卡尔·克努特松被驱逐，克里斯蒂安被再次确认为瑞典国王。这样，瑞典的实际权力落在

了大主教本特森手中，他是政务会的首脑和奥克森斯特纳与瓦萨家族的利益代表，所以权力不是在国王那里。

然而，他们的地位很快又受到另一个强势家族、新崛起的托特家族（Thotts）的威胁，该家族有公认的丹麦血缘，但却渴望在瑞典获得更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他们当时居住在它的边界地区。该家族的一位成员伊瓦尔·阿克塞尔松（Ivar Axelsson）与卡尔·克努特松的女儿玛格达莱娜（Magdalena）结婚，由此结成一个对托特家族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联盟。不久之后，本特森大主教失去了他作为政务会领导的地位，伊瓦尔的兄弟埃里克·阿尔克塞松（Erik Axelsson）当选并接替了他的位置。

42

尽管与克里斯蒂安的关系得到改善，但那些在达勒卡里亚从事采矿业的人和斯德哥尔摩的商人的境遇却在恶化。他们的领袖尼尔斯·波森·斯图尔（Nils Bosson Sture）此时与埃里克·阿尔克塞松合作，鼓励卡尔·克努特松返回瑞典。克努特松做到了，并于1467年第三次被推举为瑞典国王。这次是托特家族充当了幕后推手。当卡尔·克努特松于1470年去世时，与托特家族联姻的尼尔斯·波森·斯图尔掌控了政务会，同时也控制了王国的主要城堡。乌普兰的权贵极其愤慨，他们和奥克森斯特纳与瓦萨家族结盟。战争又由此爆发。

克里斯蒂安国王和他的舰队抵达斯德哥尔摩对斯图尔和达勒卡里亚人而言似乎是不祥之兆。但1481年10月10日的布伦克堡（Brunkeberg）战役中，他们是胜利者。奥克森斯特纳家族战败，克里斯蒂安逃回了丹麦。

克里斯蒂安于1481年的去世促使政务会尝试重新恢复权威。1483年卡尔马条令（the Kalmar Recess）颁布，该条令维护了政务会的至上地位。1487年，大斯滕·斯图尔（Sten Sture the Elder）集中全力清除作为对手的托特家族的势力，他派兵包围了该家族的几个城堡，像斯特格堡（Stegeborg）、伯格霍姆（Borgholm）和瑞斯堡（Raseborg）等。结果，托特家族被打败并逃往丹麦。由此，斯滕·斯图尔在政务会获得了无可争议的权威。

出于加强实力地位的需要，斯滕·斯图尔此时将注意力转向东部。1493 年，他与利沃尼亚骑士团（the Livonian Order）签署协议，后者在今天拉脱维亚（Latvia）的北部，这既是为了阻止俄罗斯人向西扩张，也是为了削弱国王汉斯（King Hans）的力量。汉斯当时继承他父亲克里斯蒂安的王位，并与俄国结成联盟。这就使瑞典同时与丹麦和俄国处于对立状态，这明显是一个错误的路线，并持续了几个世纪之久。1495 年，俄国进攻维堡和尼斯洛特（Nyslott）等瑞典东部居民点，它们是 15 世纪 70 年代才建成的。2 年后，两个强国之间缔结和约。

伴随着东部侧翼压力的减轻，斯滕·斯图尔拒绝国王汉斯的要挟。因此，当支持汉斯的乌普萨拉主教试图打破斯滕·斯图尔的权威时，斯图尔对主教的财产进行了洗劫。作为反应，教会革除了他的教籍，汉斯则带领军队进行干预，斯滕·斯图尔被迫进行谈判。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斯滕·斯图尔从这些谈判中获取了巨大利益：他被赋予许多领地，包括土尔库和尼雪平的许多最好的城堡。

43

斯滕·斯图尔死于 1503 年。第二年，斯万特·尼尔松（Svante Nilsson）占据了政务会的领导地位。与丹麦的对抗并未能解决，有两个城堡仍然在丹麦人手中，即卡尔马和伯格霍姆城堡。1510 年秋，瑞典军队尝试收复它们，但内部矛盾损耗了他们的力量。当尼尔松于 1512 年冬意外死亡时，严重的派系斗争仍然存在，反对派领导人埃里克·特罗尔（Erik Trolle）被选为政务会领袖。斯滕·斯图尔的儿子小斯滕·斯图尔（Sten Sture the Younger）坚决反对特罗尔当选，他分散在王国各地的势力开始行动，那些都是他设防的领地，包括斯德哥尔摩、土尔库和伯格霍姆等。他要重新组织一次选举，以确保他本人当选。很快，新任大主教古斯塔夫·特罗尔（Gustaf Trolle）于 1514 年在罗马被授予教职，他是政务会中反对派领导人的儿子，开始成为对抗小斯滕·斯图尔图谋的一股强大力量。结果，双方间的对抗升级，使得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二世（1481—1559）能够利用这种情势来为他的干预寻找借口，并于 1517 年将海军派往斯德哥尔摩附近的瓦

尔达（Välda），公开支持瑞典大主教。不过，丹麦人被打败，被迫撤回。政务会感到自身足够强大，有能力于1517年11月召开会议，在会上对大主教的叛国罪进行起诉。结果，大主教所在的主教城堡受到攻击，他被迫退职。作为对此的反应，1518年夏，丹麦舰队再次出现在斯德哥尔摩，这次是在布兰基尔卡（Brännkyrka），由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亲自率队。尽管再次战败，对卡尔马的进攻也被阻止，但他们对西哥得兰和厄兰岛的突袭是成功的。丹麦设在隆德和罗斯基勒（Roskilde）的两个大主教发布命令，宣布开除瑞典的教籍和停止它的教权，以此来支持他们国王的行动。进一步的军事行动随之而来，1520年丹麦人在东约特兰进行了一次重大战役。在这场位于今天乌尔瑞克海曼（Ulrikehamn）附近的冰上战斗中，小斯滕·斯图尔受了致命伤，并在回斯德哥尔摩的路上去世。严重的军事对抗就这样戛然而止，前大主教特罗尔亲自率谈判团恢复了与克里斯蒂安的和平共处。

44

获胜的克里斯蒂安二世认为重新入主斯德哥尔摩的时机已到。他于11月初加冕瑞典国王，随之进行庆祝活动，并以一种“另类盛宴”作为结束。正如改革家奥劳斯·佩特里（Olaus Petri）后来所描述的那样，它给瑞典历史打上了难以磨灭的烙印。它被传为对该国所施加过的最大暴行：即对斯德哥尔摩的血洗。1520年11月8日和9日，大约100名克里斯蒂安二世的反对者被屠杀，其中包括两位主教、许多贵族和商人。大主教特罗尔在这场杀戮中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可以肯定，他的许多反对者在利用他所起的不良作用来诋毁瑞典的天主教会。因此，尽管政务会随后欢迎克里斯蒂安二世做瑞典国王，但对丹麦人而言这只是一个虚幻的胜利。镇压并没有扼制权贵古斯塔夫·瓦萨（Gustaf Vasa）不断增强的势力，他通过联姻成为斯图尔家族的亲戚，同时消除了其主要竞争对手。一个新的阶段被开启，新的瓦萨家族长期世袭统治的王朝得到确立，同时改革得以实施，这种改革将瑞典从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分割开来，而此前的几个世纪，瑞典一直是完全融入它的。这一事件也为瑞典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巩固铺平了道路，成为更广泛的欧洲框架下的一个国家。

十三、中世纪的文学

从文化特别是文学领域看，瑞典长期以来一直是融入欧洲的。正如在整个基督教世界那样，瑞典早期的作品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而且一般也都是基督教性质的作品。瑞典第一部重要的世俗文学作品是《埃里克编年史》(*The Erik Chronicle*)，它是由匿名的作者或作者群于大约1330年写成的。植根于前一个世纪德国的文学传统，它是一部押韵的史诗，描述了埃里克·马格努松公爵的生活，集中记叙了他与两个兄弟埃里克公爵和瓦尔德马尔公爵（Duke Valdemar）的斗争，例如，它将12世纪后半期和13世纪头20年的一些真实事件写进作品。在写作风格上，它受欧洲大陆宫廷史诗的巨大影响。它是写在羊皮上的，因为纸在瑞典首次使用是在14世纪，所以羊皮在此后很长时间继续被用于手稿的撰写。

继《埃里克编年史》之后的是写于15世纪中期的《卡尔编年史》(*The Karl Chronicle*)，那是由12位作者合作完成的一部押韵的史诗故事，主题是玛格丽特女王登上整个斯堪的纳维亚联盟的王位，并一直记叙到1454年。许多有势力的权贵，特别是国王卡尔·克努特松都对这部作品感到愤慨，后者是于1464年首次登上王位的。撰写这部作品的意图明显是政治性的，它也许吸纳了较早期的《恩格尔布莱克特编年史》(*Engelbrekt Chronicle*)的许多内容，后者涉及许多相同的问题。继《卡尔编年史》之后的是《斯图尔编年史》(*The Sture Chronicle*)，它也是由许多作者（可能是教士）撰写的，问世于1500年，集中记叙了1496年及以前几十年发生的少有争议的政治和军事事件。

在风格上更具现代性的是《哥特王国编年史》(*The Chronicle of the Gothic Kingdom*)，是由埃里克斯·奥莱（Ericus Olai）从1477年开始撰写的，他是当时新成立的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他先是在德国北部的罗斯托克（Rostock）学习，后转到意大利的锡耶纳学习，深受这一时期大陆历史著述的影响。

大量宗教文学作品此时也相继面世，主要是从瓦德泰纳的圣毕哲

女修道院（St Birgitta's Convent）和斯德哥尔摩的格雷兄弟修道院（the monastery of the Grey Brothers）流传出来的。其中来自圣毕哲女修道院的作品经常带有神秘主义的风格。该女修道院是毕哲（约1303—1373）的主教席位所在地。毕折是权贵比格尔·佩尔松（Birger Persson）的女儿和乌尔夫·古德马松（Ulf Gudmarsson）的遗孀。她后半生大部分时间对国王马格努斯·埃里克松及其朝廷都持强烈批评态度，她认为这一立场可由她的宗教观念来证明其合理性。多年间，她的宗教声望已经增强到一定程度，以致她成了瑞典女性圣洁的权威表率。确实，她作为圣洁女性的声誉已传播到瑞典以外很远的地方。她创立了一种新的宗教教派，教皇乌尔班五世（Pope Urban V）于1370年确认了该教派教规的合法性。这一时期，她与她的女儿卡特里娜长期居住在罗马，但在去世之前不久曾到耶路撒冷朝圣。教皇朴尼法斯九世（Pope Boniface IX）于1391年封她为圣徒。

46

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许多人将叛乱者恩格尔布莱克特视为一位殉道的圣徒，斯特兰奈斯的主教托马斯创作了抒情诗《自由是最美好的事物》(*Freedom is the best of things*）来纪念他，并称颂据说发生在他坟墓旁边的奇迹。然而，人们的偏好在不断发生变化，到15世纪晚期，那些较早时期受欢迎的宫廷传奇不再流行，而代之以民间的、更现实题材的故事。这些变化对应了那些出身卑微的文学创作者的偏好，他们在更广泛的领域中维护着自身的权利，包括政治、经济和宗教诸领域。

1477年乌普萨拉大学的建立有助于形成另一个文学创作的中心，尽管这种情况在宗教改革初期曾一度停顿，因为那时该大学被关闭了。在16世纪早期，德国教会创作的神学作品大量地传入瑞典，它们为随之开始的宗教改革铺平了道路。

十四、艺术和建筑

这一时期的瑞典艺术也充分融入到广泛的欧洲传统之中。在15世纪后半期和进入16世纪以后，阿尔伯特斯·皮科特是瑞典最杰出的艺术

家，尽管有争议，但是他以他的多幅壁画而闻名，尤其是那些保存在乌普兰的哈克贝加教堂（Härkeberga Church）的壁画，上面有诱人心魄的魔鬼和命运之轮等画面。斯德哥尔摩大教堂祭坛背后的一幅画将圣母玛利亚（the Virgin Mary）描画成圣伊丽莎白，那是1468年在律贝克绘制完成的，它进一步表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座伟大的汉萨同盟城市对瑞典产生了巨大的文化影响，同它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是一致的。这种特征也可以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大量重要的木雕中得到证明，诸如1489年制作的“圣乔治和龙”（St George and the Dragon），它也是存放在斯德哥尔摩大教堂，同样是一位来自律贝克的艺术家所创作。这些雕刻都有一种理想化的特质，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理想主义。不过，1470年雕刻的“行善者卡尔·克努特松·邦德”则是瑞典的第一幅现实主义肖像作，存放于格里普斯霍尔姆城堡（Gripsholm Castle）。那种理想主义风格被回避，而倾向于对被画的人作一种现实主义的描绘，这种风格是受德国影响的产物。画中所描绘的邦德对位于斯德哥尔摩中心骑士岛（Riddarholmen）上的圣方济各会修道院的礼拜堂进行过极其慷慨的捐赠，他本人也于1470年被葬于那里。

48

中世纪时期瑞典的建筑风格也表现出德国的影响。乌普萨拉大教堂（Uppsala Cathedral）的建造开始于13世纪晚期，但是在一个半世纪后才完成，最终于1435年被奉为圣地。它是按照哥特式风格建造的，是瑞典这种风格中最大的教堂。在整个这个时期都是在丹麦人的控制下，隆德大教堂（Lund Cathedral）建造于12世纪，它是按照早期罗马式风格建造的，这种风格起源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rmbardy），但经过了德国莱茵地区的重新诠释。它的高大祭坛早在1145年就被供奉，在其前方于14世纪70年代建造的唱诗班席座上有丰富的雕刻，这些雕刻的风格是哥特式的。如果说高大的教会建筑受到德国建筑风格的深刻影响，那么这也同样适用于一些较大型的世俗建筑，包括建筑于13世纪80年代的土尔库城堡和建筑于大约相同时期的乌普兰的阿尔斯诺胡斯宫（the Palace of Alsnöhus）。确实，直到宗教改革开始及其后几十年间，德国的建筑风格的影响对于其他方面德国影响的渗透起着极大的促动作用，

包括神学、经济和行政管理等方面。所有这些都在塑造新兴的和不断扩张的瑞典国家方面起着积极作用，有时甚至以意想不到的方式在发挥影响。瑞典跟随着德国的脚步走向了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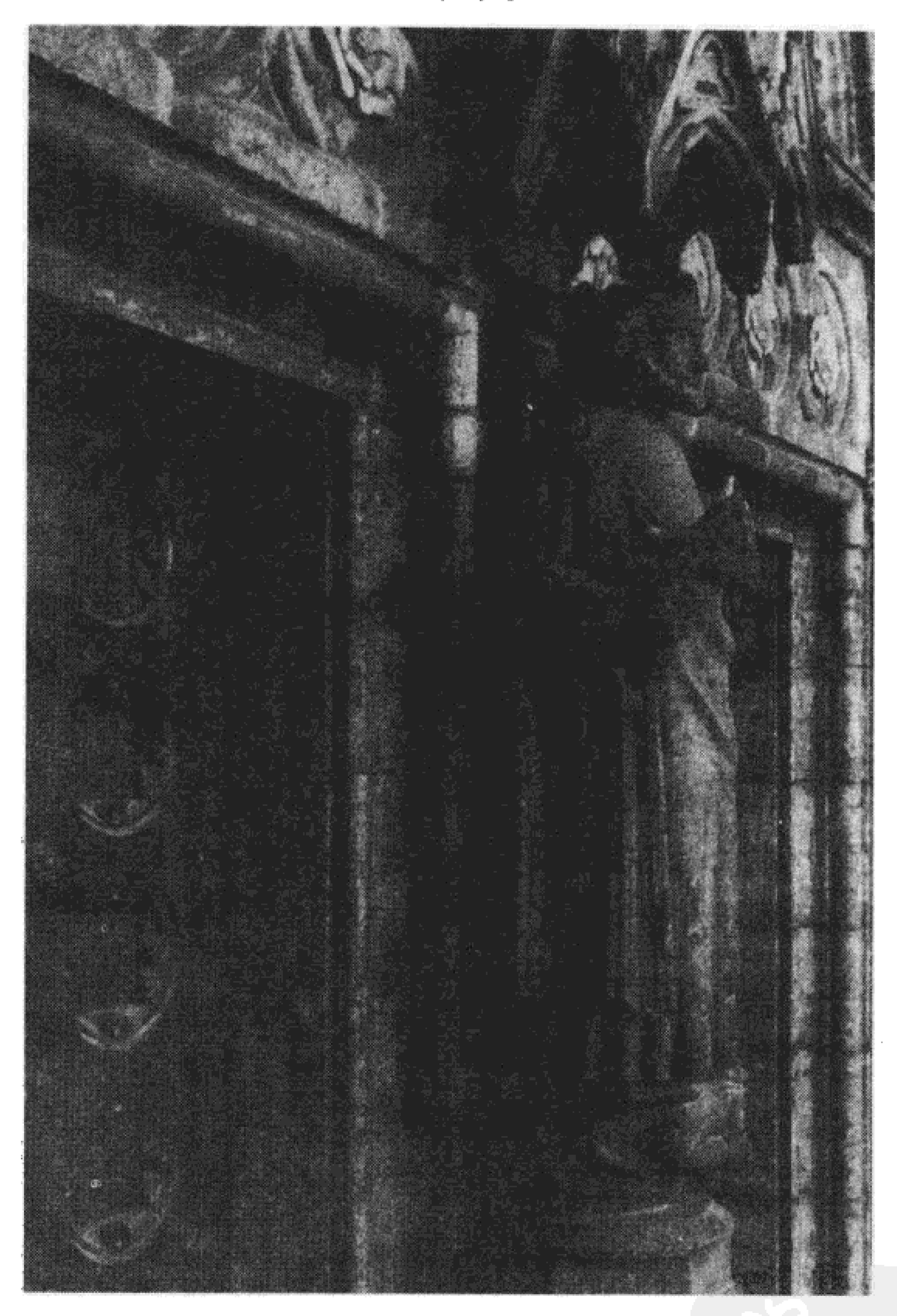


插图4　早期挪威的国王圣奥洛夫和他的守护神雕像。装饰在13世纪建造的哥特式乌普萨拉大教堂的正面。乌普萨拉大教堂是瑞典最重要的朝圣地和历史上大主教教席所在地。这个建筑直到1435年才被奉为圣地。乌普萨拉曾有一个古代的宗教组织，古乌普萨拉村一度曾是瑞典最重要的异教寺庙所在地（乌普萨拉大教堂）。

第三章　瑞典领土的统一

一、北欧联盟的失败和古斯塔夫·瓦萨的崛起

49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北欧联盟的最终崩溃导致瑞典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在古斯塔夫·瓦萨（1496—1560）的领导下，瑞典加入了其他欧洲新兴国家的行列，这是在新教改革的背景下发生的，瓦萨成功地利用新教改革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瓦萨这位强势的权贵是克里斯蒂娜·吉伦斯蒂娜（Kristina Gyllenstierna，1494—1559）的近亲，后者是已故的摄政王小斯滕·斯图尔的遗孀，1519 年前她从丹麦人的囚禁中逃走。1521 年 1 月，瓦萨被推举为愤愤不平的达勒卡里亚人的领袖，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支持斯图尔家族。瓦萨在布伦巴克（Brunnbäck）附近的渡口遭到斯德哥尔摩新统治者迪德里克·斯拉格海克（Didrik Slagheck）的攻击，后者是亲丹麦的。瓦萨在对抗中取得胜利，并继续进攻，在古斯塔夫·特罗尔（1488—1535）的领地乌普兰击败了特罗尔，后者是乌普萨拉的大主教。瓦萨由此赢得国家政务会大多数人的支持，并于 1521 年 8 月被推举为领袖。到来年，瑞典的大部分地区已被瓦萨占领，虽然不包括斯德哥尔摩和卡尔马等重要城市，也未包括芬兰人建立的一些城堡。在瓦萨的扩张过程中，汉萨同盟给了他援助，条件是同盟的船只在瑞典免征通行税，并承诺瑞典船只限于在波罗的海水域航行，而不与汉

萨同盟进行贸易竞争。有汉萨同盟的支持和反对丹麦克里斯蒂安二世的瑞典人的急剧增加，到1523年暮春，古斯塔夫已经能够将几乎全部的瑞典领土都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结果，他于是年6月6日在斯特兰奈斯被推选为国王。如果说他与汉萨同盟的联盟已经为他赢得好处，那么由汉萨同盟在丹麦煽动的叛乱也对他有帮助。叛乱进一步削弱了克里斯蒂安二世在那个国家的地位，而此前其王位已不稳固并有竞争者出现，结果是他的叔叔——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Schleswig-Holstein）的弗雷德里克公爵（Duke Frederik）登上王位，即弗雷德里克一世，而克里斯蒂安被迫逃离了丹麦。 51

在5年后的1528年，古斯塔夫·瓦萨在乌普萨拉大教堂加冕为国王，成为瑞典第一位世袭君主。此时的政治情势已经完全不同于7年前，他能够感到自身已经相对安全。因为，确立世袭原则不仅有助于巩固君主的地位，并能够巩固主权国家本身。不像波兰在接下来两个半世纪中明显表现出的那样，一个由推举产生君主的国家会定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易于遭到贪婪的邻国的暗算。确实，到16世纪30年代，古斯塔夫·瓦萨甚至有可能不再需要汉萨同盟的帮助。他放弃了他们在律贝克对他的支持，加强了自己舰队的力量，并获得了来自律贝克的敌对城市但泽的巨大支持。

王朝间的联盟也有助于强固新王朝的根基和瑞典领土的完整、统一。尤其是国王与玛加丽塔·莱荣霍夫德（Margareta Leijonhufvud）的第二次婚姻，使他获得了来自另一个本土权贵家族的支持，而不是在瑞典没有实际权力基础的外国王侯家族的支持。

对瑞典国家的巩固同样重要的是，从欧洲大陆特别是从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等国引入有专业技能的官员来管理政府，这是在16世纪30年代实现的。1538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Charles V）宫廷的前廷臣康拉德·冯·皮黑（Conrad Von Pyhy，死于1553年）成为宫廷大臣总监，古斯塔夫·瓦萨由此获得了一位高素质的行政官员，他不仅成功地将国王的行政管理中央集权化并使之更有效率，而且在同几个国家、尤其是前敌国丹麦的谈判中也获取了不少利益。 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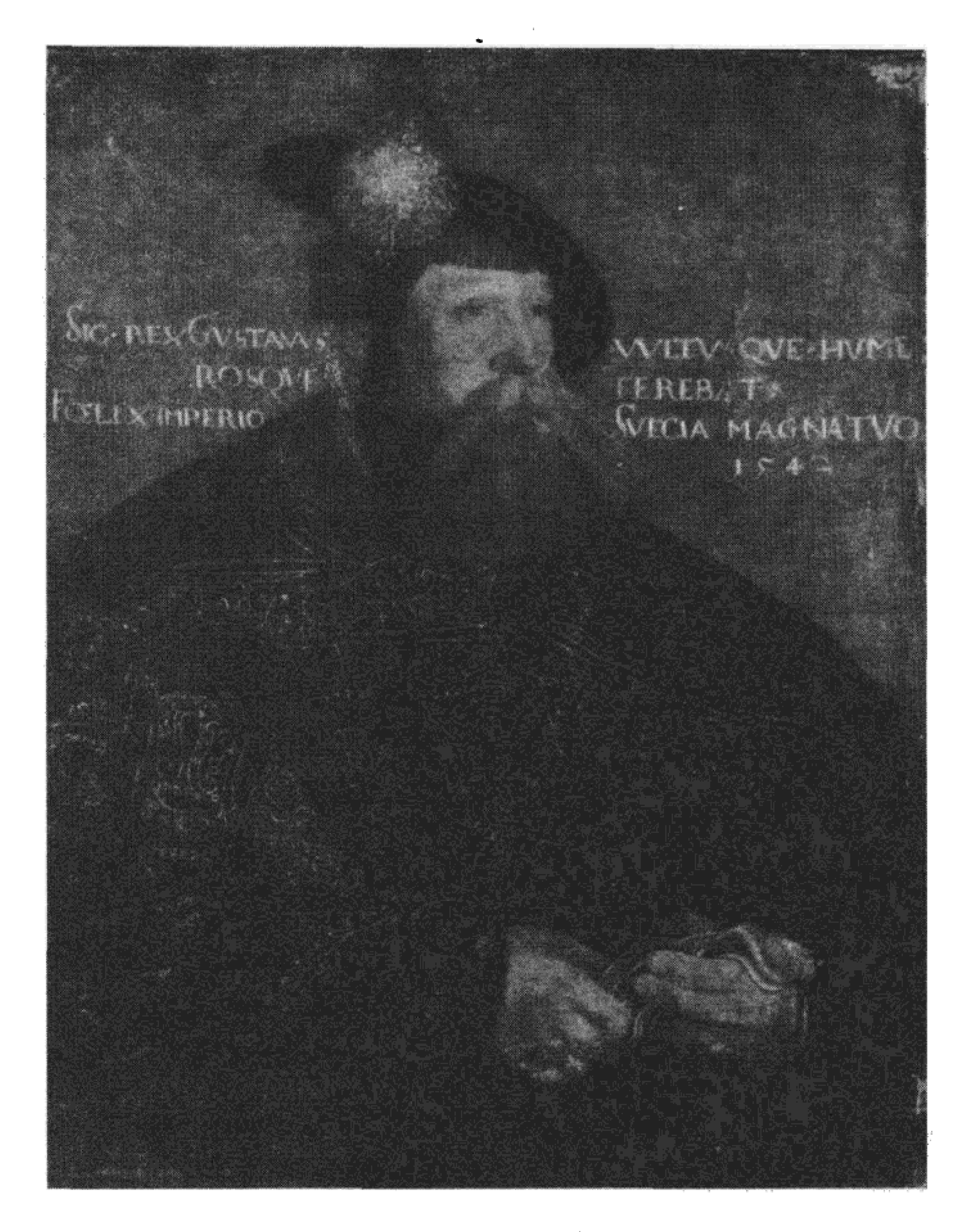


插图5　国王古斯塔夫·瓦萨（1496—1560）是瑞典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君主。他不仅引入了世袭君主制，这种制度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进行了新教改革。他剥夺了罗马天主教会的财产，由此而使王室和贵族变得富有。并且进一步巩固了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瑞典，同时创制了一套行政官僚体制。他的这幅肖像是雅各布·宾克（Jacob Binck）1542年创作的油画，是乌普萨兰大学的艺术收藏品。

1536年，瑞典最终同丹麦达成了一份有利的协议，丹麦此时由新国王路瑟兰·克里斯蒂安三世统治。他是格雷文斯·费加德（Grevens Fejde）战争的胜利者，那是一场从1534年到1536年在丹麦进行的内战，在战争中他与古斯塔夫·瓦萨结成联盟。丹麦的支持加上普鲁士的援助，使瑞典能够成功地抵抗来自律贝克的攻击。从实力地位看，古斯塔夫·瓦萨那时已有力量废除早先为了获得支持而赋予律贝克的种种特权，因为此时这座德国城市已无力进行反抗。

从神圣罗马帝国引进其他德意志行政官员的行动在加速进行，目的是促进古斯塔夫·瓦萨政府管理体制的中央集权化。这意味着瓦萨能够比以前更有效地维护他的权威，同时取得更大的财政支持。以德国的法典为样板，他也引入一系列新的民法，其中包括将对刑事犯罪的审判由宗教法庭转交到世俗法庭进行。到这个时期，瑞典的天主教会已经被剥夺了财产，这一举措大大有利于古斯塔夫·瓦萨巩固他的政治权力。

二、剥夺教会的财产与王室权力的加强

16世纪30年代，对天主教会的不满在瑞典已经形成强大的力量，人们同情诸如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菲利普·墨兰顿（Philipp Melanchthon）等德国的新教改革家。一些瑞典人已经激进到如此程度——16世纪20年代在斯德哥尔摩和马尔默爆发了破坏圣像的骚乱，后者当时尚处于丹麦人的统治之下。伴随着群众对宗教改革的日益支持，国王自己虽然对宗教事务不感兴趣，但他要利用这种公众情绪来达到他的实际目的。他认识到，通过没收和再分配瑞典天主教会拥有的巨大物质资源能够有利于王权的加强，尤其是对他自身和贵族有利。因为，通过满足贵族的物质利益，可以获得他们的忠诚。他还认识到，随着教会权力的削弱，瑞典国家的独立和他的统治权威都将得到加强。并且，他也能够得到来自下层新教徒的支持，尤其是那些能够从获得公职的机会中获益的人，其中既有教职，也有国家公职，现时都将对他们开放。

53

1527 年在韦斯特罗斯召开的政务会应该对照这种背景来考察，因为它对政治以及对教会在瑞典的地位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则，聚集在那里的各阶层代表正式宣布成立瑞典国会（the Swedish Riksdag）。二则，政务会断绝了瑞典教会同罗马天主教会的联系，并将前者纳入国家的体系，从而使国王能够没收它的大部分财产。这期间起关键作用的是一次带有传奇色彩的争辩，争辩的一方是宗教改革者、曾在威登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ittenberg）学习的奥劳斯·佩特里（1493—1552），另一方是天主教徒彼得·加利（Peder Galle，卒于1537 或 1538 年）。这场争论据说就发生在古斯塔夫·瓦萨面前。佩特里被认为获胜，因此他能够实施他的路德教改革，其中就有清除他鄙视的托钵僧，而并未遭遇实质性的反抗。

在奥劳斯·佩特里的倡议下，1529 年在奥雷布洛召开了一次宗教会议，又引入一些进一步的改革措施。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那些出身卑微的瑞典教士的利益，而不利于那些出身贵族的教士的利益，因为最强烈的宗教改革热情是存在于出身卑微的那部分教士之中。不过，由于这些措施的提出，再加上一部分旧贵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日益增加的不满，引发了一些有势力的权贵在西哥得兰的叛乱。这次叛乱还利用了斯莫兰北部和西哥得兰存在的不满，叛乱领袖们的领地都在那里，像斯卡拉的主教（the Bishop of Skara）马格努斯·哈罗德松（Magnus Haraldsson）和国王的内务大臣（Lord Steward）图里·乔森（Ture Jönsson）。但是，叛乱并未能在普通百姓中获得普遍的支持。不久，哈罗德松和乔森逃离瑞典，去投靠处于流亡中的前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对新政权更为严重的威胁是第二年达勒卡里亚地区对改革做出的不友好反应，这是当古斯塔夫·瓦萨国王试图普遍没收教会的大钟以作为一种形式的地方税收时发生的。这次叛乱也被镇压下去，尽管国王曾允诺实行特赦，但它的主要领导人很快都被处死。

与此同时，在 1531 年，奥劳斯·佩特里的弟弟、路德教的劳伦丘斯·佩特里（Laurentius Petri，1499—1573）被认命为乌普萨拉大主教，这是在国王第一次大婚前不久发生的。国王与萨克森—劳恩堡

54

（Sachsen-Lauenburg）的德国人卡塔琳娜（Katarina）结婚，她是来自一个转信马丁·路德学说的家族，由此与罗马关系的破裂变得无法挽回。但是，这对兄弟改革者同国王的关系并非完全融洽。确实，1539—1540年，奥劳斯和劳伦丘斯兄弟受到审判，被皮黑指控犯有叛国罪并被判处死刑。虽然对他们的处罚后来减刑为处以巨额罚金，最终两人被恢复名誉，但自此以后，国王设置了一个非教会的政府总监管理宗教事务，这明确表明，国王不能容忍任何竞争，即使它来自忠诚的路德教改革者也是如此。另一位领地在鲁根（Rügen）的德国路德教徒乔治·诺尔曼（George Norman，卒于1553年）被任命为管理瑞典教会的第一任总监，对教会各级教士有着广泛的司法权。1541年他接受国家政务会的任命，越来越多地从事于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的外交使命，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促成瑞典与法国结盟，而这是未来几个世纪中支撑瑞典外交政策的数个联盟中的第一个。

在基层，地方教会的管理工作由专门任命的教士和世俗官员联合进行，而不是由主教本人来进行。王室继续没收教会财产的工作，在诺尔曼的法眼之下，没收了更多的剩余财物，诸如银制圣骨盒和圣体匣。

宗教改革对瑞典政治统一的重要性是非常明显的。1540年，在一次于奥雷布洛召开的由世俗和教会领导人物参加的会议上，古斯塔夫·瓦萨宣布自己是具有神授权力的国王，所有臣民都要对他和他的子孙宣誓效忠。到此时，国王已经充分巩固了他对教会的权力。确实，亲天主教的小集团并未被完全消灭，但他们于1542年挑起的内乱则为国王提供了更有力的理由来镇压旧宗教的拥护者，并全力阻止他们恢复它的企图。

此时经济压力也在瑞典变得非常明显，就像宗教改革的压力一样。它们被证明对旧制度具有破坏力，就像宗教改革具有的破坏力一样。因此，1542年在斯莫兰的冲突演化成了一场真正的叛乱，叛众聚集在尼尔斯·达克（Nils Dacke）周围，他不仅谴责税负的不断增加和必需品价格的上涨，而且不满对出口国外的产品施加的各种限制。而所

以会有这些限制，是因为国王害怕进一步疏远他以前的盟友律贝克，后者一直都是欧洲北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人口大约为25 000人，依那时的标准看它的人口数量是庞大的，使仅有6 000人的斯德哥尔摩相形见绌。当然，对天主教会的掠夺和新教各种礼拜仪式的引入也起了促反作用。据说问题很快就解决了。不久，双方宣布暂时休战，古斯塔夫·瓦萨成功运用各政治、宗教和经济派别的矛盾来削弱达克的力量。达克在1543年被杀，叛乱也就被平息。

接着，古斯塔夫能够抛弃那位管理技能高超、但非常不受民众欢迎的德国管理者皮黑了。尽管他成功领导了瑞典和法国的结盟谈判，但在1453年，他突然由于行政和经济的不当行为被逮捕，马上就被宣布有罪，被判处终生监禁在韦斯特罗斯城堡，不久就死在那里。随着他的去职，瓦萨政府的"德意志化"戛然终止。政务会重新组建，尽管诺尔曼仍然担任总监，但主教被重新赋予了巨大的宗教事务管理权。不过，由于教会被剥夺了曾拥有的巨额资产，所以从财政方面看，它们仍然高度依赖王室的善意。正是出于这种原因，没收教会土地在古斯塔夫·瓦萨一生中一直是被优先考虑的重要选择。据记载，在1521年，全国至少有21%的地产和多达1/3的可耕地是属于教会的，而到1560年，这些土地几乎全部被重新分配，很大一部分被分给了支持国王的贵族，王室拥有的地产份额从5.5%增加到28.2%。据说，主要的财物收益也归了王室。这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君主制本身，而且巩固了作为一个国家的瑞典。

56

1544年，瑞典贵族和教士的代表被召集到韦斯特罗斯开会，每个人都代表着各自集团的利益。会上批准了新的、瓦萨家族对王位的世袭占有制度，授予国王年轻的儿子们以公爵爵位和世袭土地，同时将这些领地完全纳入统一的瑞典王国之内。约翰（Johan）被授予了芬兰西南部的土尔库地区，卡尔（Karl）被授予南曼兰、纳克（Närke）和韦姆兰，马格努斯被授予达尔斯兰（Dalsland）以及东约特兰和西曼兰的大片土地。由是，瓦萨家族的命运越来越等同于瑞典国家的命运。

三、瑞典教会内部的认同

在波的尼亚湾（the Gulf of Bothnia）对面的芬兰，是被完全整合进瑞典王国的一部分，宗教改革也自上而下被引入，随之而来的是其与瑞典其他地区更紧密的整合。那里，宗教改革运动由米卡尔·阿格雷考拉（Mikael Agricola，约1510—1557）领导，他也是路德和墨兰顿的追随者，并在他们的指导下在威登堡大学学习。作为他宗教改革政策的结果，本国语在1537年被引入宗教仪式，同一年，路德教被正式确立为丹麦的国教。1548年，阿格雷考拉做出了奠基性的成就，将《新约圣经》翻译成芬兰语，这促进了新教在普通百姓中的传播。6年后，他晋升为土尔库的主教。当新的主教席位在维堡东部创设时，他确保主张宗教改革的教士帕阿瓦利·尤乌斯滕（Paavali Juusten，1516—1576）担任该职务，后者曾于1543年到1546年在威登堡学习。两人都在严密监督防止天主教的复兴。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密切关注着来自东部东正教的威胁，它来自俄罗斯统治下的国土——西方教会是在1054年失去对它们的控制的。1555年爆发的反对俄国的残酷战争增加了他们的恐惧，也加剧了各国政治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没有哪个国家从中获益：尽管俄国严重破坏了瑞典的波罗的海沿岸，但也导致它自身无法从那里获得持久的收益，和约最终于1557年达成。至于阿格雷考拉，他死于从莫斯科回国的路上。他作为外交特使出使俄国，在国内外加强路德教的传播是他出使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俄国沙皇伊凡雷帝（Tsar Ivan the Terrible）憎恶新教，将之等同于犹太教，认为它们都是不虔诚的，所以阻碍了两国达成任何和解。确实，改善新教徒在俄国命运的外交尝试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严重。1564年，沙皇在波洛茨克（Polotsk，即今天的白俄罗斯，但那时在俄罗斯的统治下）屠杀了这两种宗教的信众，并加紧努力在芬兰传播东正教。只是当埃里克斯·埃里奇·索罗莱宁（Ericus Erici Sorolainen，1546—1625）于1583年晋升为土尔库主教时，这种情势才有所好转。此后，在基督教世界两大分支之间进行新的对话的建议被谨慎提出，

57

它是在瑞典国王约翰三世（Johan III）的支持下实现的，他既希望拓展在俄国的政治触角，又希望扩大新教的影响。

在波的尼亚湾的西侧，瑞典教会也巩固了它的权力，并宣扬一种比宗教改革开始以来所宣扬的教规更严格的宗教教规。颂安魂弥撒曲、圣徒崇拜和使用薰香都被禁止。参照瑞典礼拜仪式制定的新宗教规程得到批准。据说，在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之间的冲突不断增加，直到该世纪结束也未能解决。加尔文教派的影响是从16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加强的，只是到17世纪初才能够说路德教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从而瑞典也就加入了北欧地区其他路德教国家的行列，确保它们信奉一个共同的宗教，从而培植出一个不同寻常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统一体。虽然它们之间也经常会有政治和军事冲突，但这种统一体一直持续到今天。

四、经济

58

瑞典的成功统一不仅依赖于对教会财产的没收，而且取决于高生产力的经济。在瑞典经济中，贸易不断得到增长和繁荣。瑞典经济有两大支柱：农业和畜牧业，正像它们自远古时代就如此那样，在整个16世纪它们一直是瑞典经济的中心所在。确实，畜牧业发展尤其强劲，这一时期的产量甚至3倍于以后它在18世纪的产量。采矿业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在达勒卡里亚地区：全欧洲都在追逐由斯道拉·卡帕堡（Stora Kopparberg）和加尔彭堡（Garpenberg）出产的铜。银也是在达勒卡里亚地区开采的，即在瓦斯特西尔沃堡（Västersilverberg）和奥斯特西尔沃堡（Östersilverberg）古代就有的矿井中开采。不过，一个位于萨拉（Sala）的新矿井于1510年开始开采，并且产出比重越来越大。同样重要的是铁矿的开采，而且对未来尤其重要。它当时不仅在达勒卡里亚，而且在西曼兰、乌普兰、南曼兰和东约特兰等地开采。到中世纪末，在大型炼铁炉被引入替代那些较小型的和效率较低的炼炉后，铁的产量急剧增加。这为技术先进的火炮生产提供了方便，瑞典在16世纪生产的火炮以高质量闻名。

到16世纪中期，与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瑞典的大部分土地即约51.7%的土地，掌握在普通农民、商人和其他人手中，而不是在教会、王室和贵族手中。据说，继宗教改革之后对教会财产的大规模重新分配几乎并未影响普通农民的地位。确实，在未来40年间，他们占有的土地份额明显没有大的变化，到1560年占49.9%，只略有下降。那个时期，有新移民大量流入。为满足瑞典常备军不断扩充人员的需求，必须提供更多的粮食供应；对更多粮食的需求则导致了将所谓的阿维尔斯加德（avelsgård）或说大片王室领地交每个行政区的1/3居民耕种，因为当时非常需要这些军队来保卫国家领土。虽然继续禁止食品出口，但却鼓励用于维持常备军所需物品的进口，这对工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它增加了对条形铁的生产和出口需求，因而促使古斯塔夫·瓦萨鼓励铁匠移民到瑞典。这些条形铁越来越多地通过更靠东的但泽的汉西蒂克港（Hanseatic port）外销，而不是像以前那样通过律贝克。

税负对农民和商业精英而言是沉重的，但就瑞典的那些小规模的城镇而言，征税范围是有限的。在1523年，斯德哥尔摩仅有300名居民被迫交税。另外，与教会有着密切联系的行会成员也处于不利地位。行会中的同业公会受到最不利的影响，那些拥有教会背景的同业公会被全部取缔，其财产也被没收。据说，斯科拉（skrå）或说世俗行会，仍继续发挥着作用，尽管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地方城镇的作用并不突出，但当时在斯德哥尔摩是起到相当突出作用的。

五、文学

正如瑞典的新教改革被证明是促进瑞典主权国家发展的催化剂一样，它也激励了文学更广泛地使用瑞典语言并发展瑞典自己的文学，并培植了民众对后者的需求。埃里克斯·斯基纳卢斯（Ericus Skinnerus）的六部格的诗作《婚颂》（*Epithalamion*）是那个时代所能达到的一个文学制高点，该诗是为祝贺约翰三世与古尼拉·比尔克（Gunilla Bielke）的大婚创作的。不过，新教改革也产生了一些不良影响。

例如，作为培植天主教势力的温床的乌普萨拉大学在古斯塔夫·瓦萨统治期间被停办，正像瑞典众多的天主教主教被处死一样，它成为宗教改革的悲剧性牺牲品。据说，一些瑞典最著名的改革家也是它的最著名的校友。这肯定符合奥劳斯·佩特里的情况，他的《瑞典编年史》（*Swedish Chronicle*，大约写于1540年）集中记叙了1450年到1520年这段时期，他一方面从一位瑞典宗教改革家的视角，另一方面从古斯塔夫·瓦萨的副手的视角来看待这一时期，尽管是瓦萨将宗教改革引入瑞典的。甚至更为重要的是完全版本的《圣经》于1541年在瑞典第一次出版，这是在乌普萨拉大主教的指导下完成的。从这时起，对瑞典的识字家庭而言，作为宗教和文学财富的《圣经》就变得愈加重要，所有人都能够从中汲取灵感，尽管后来又花了一个半世纪才使它在瑞典国民中真正得到普及。

约翰尼斯·马格努斯（Johannes Magnus，1488—1544）主教的兄弟奥劳斯·马格努斯（Olaus Magnus，1490—1557）也许是这个时期有着最高学养的文学人物。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和外交官，他献身于对地理学和历史学的研究，并与他的哥哥一道于1523年游历了罗马。他绘制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图在威尼斯出版，这些地图非常重要，它们第一次提供了对该地区地理轮廓相当准确的描绘。然而，最著名的还是他的历史著作、尤其是《北欧人民史》（*History of the Nordic People*），该书出版于1555年。这部历史著作有超过500幅版画插图，将瑞典理想化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君主国家，与欧洲其他的主要强国处于同等地位。它还强调瑞典在一个神圣计划中的独特作用，同时还关注了那些不为人所知的民族、像拉普兰的萨米族。这部著作对欧洲文化和哲学价值观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在瑞典、而且也在基督教世界的其他地方。那时的北欧国家才刚刚转信各种形式新教，正在努力巩固它们自身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第四章　中央集权的军事国家的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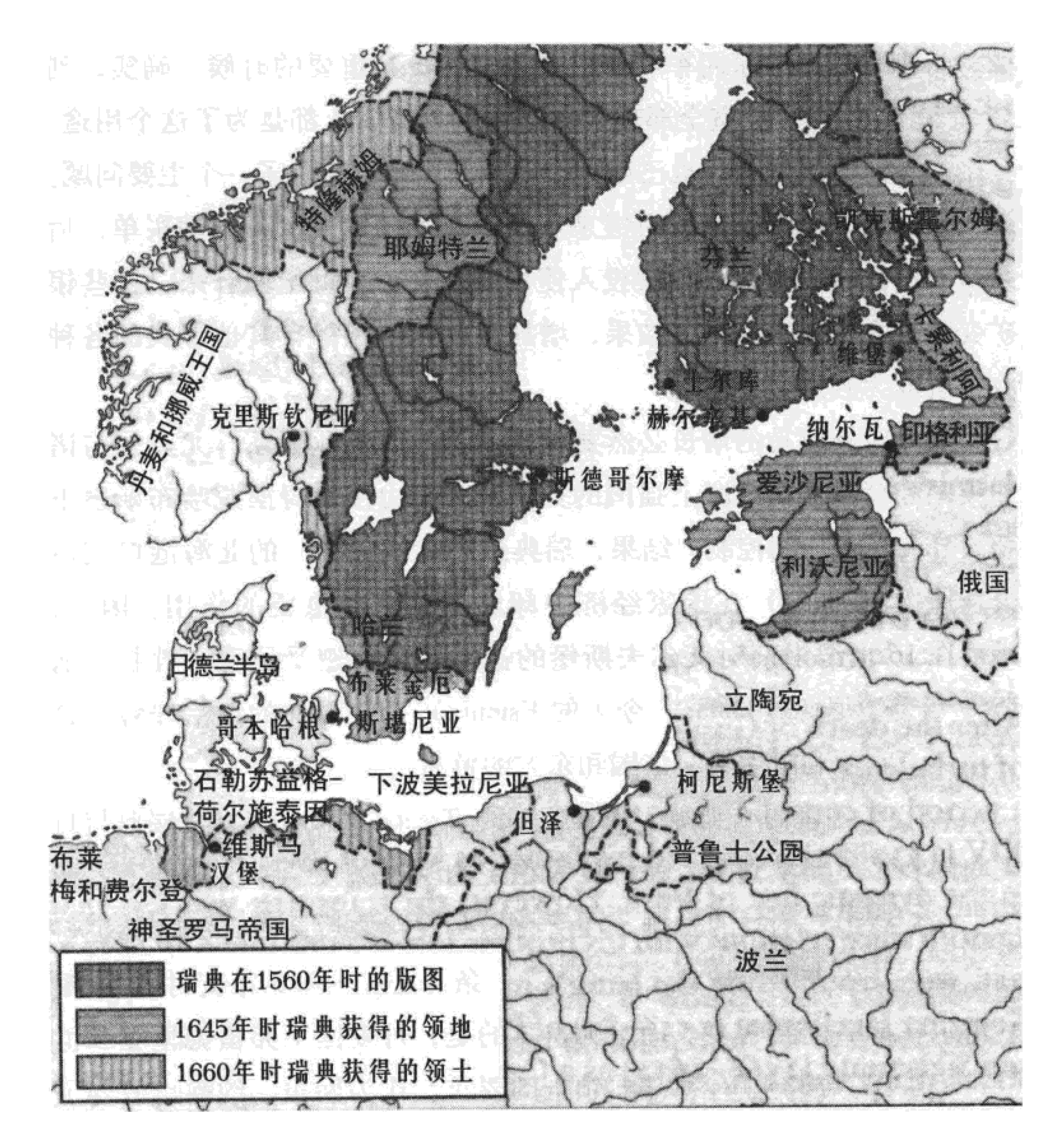
一、古斯塔夫·瓦萨继承人领导下的政治巩固

61

古斯塔夫·瓦萨死后，瑞典经历了很长时期的动荡，结果在17世纪进入了全面的巩固时期。1560年，埃里克十四世（Erik XIV，1533—1577）继承他父亲的王位，担任瑞典国王，这是瓦萨王朝的第二任国王。不过，王位交接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他与弟弟约翰，即后来的约翰三世（Johan III，1537—1592）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这是由后者与波兰的天主教公主凯瑟琳·雅盖隆卡（Katarina Jagellonica，1526—1583）的婚姻引发的。他们将儿子西吉斯蒙德（Sigismund，1566—1632）培养成了一位天主教徒。这种状况使瑞典越来越多地卷入了欧洲大陆的政治和军事事务，尤其是涉及波兰的事务。因不愿屈从于埃里克的意旨，约翰被囚禁4年，而他的暂时消失留给埃里克一系列问题无法解决。埃里克与他的情妇卡琳·曼斯多特尔（Karin Månsdotter，1550—1612）于1568年的婚姻尤其不受欢迎。法官乔兰·佩尔松（Jöran Persson，约1530—1568）在埃里克政治决策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也为埃里克带来许多政敌，对这些政敌实施的酷刑和谋杀并未能缓和这种局势。因为由埃里克和他的党羽对强势、高贵的斯图尔家族的成员和同伙进行的谋杀被谴责是佩尔松的阴谋，这个显贵

家族包括尼尔斯、斯万特和埃里克·斯图尔，以及阿伯拉罕·斯腾柏
62 克（Abraham Stenbok）等显赫人物。结果，埃里克于1568年被剥夺王位，并被囚禁，约翰被扶上王位接替了他。第二年，作为安抚贵族的一种手段，约翰三世国王颁布了一个法令，免除贵族们的军事义务。不过，他与贵族的关系也存在麻烦，特别是因为约翰在暗中试图重新确立天主教在瑞典的地位。他在1576年引入了所谓的红皮圣经（the Red Book）——一种新的但更具天主教风格的礼拜形式，但遭到强烈
63 的反对。尽管1571年颁布的一系列新的倾向宗教改革的宗教法令从日历中清除了许多旧的天主教节日，但新教改革者自身却由于神学上的分歧而分裂，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竞争主导瑞典教会的支配地位。前者被证明是最终的胜利者，但后者也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比如埃里克十四世本人就深受后者的影响，他孩童时的两个导师迪尼修斯·布尔卢斯（Dinysius Beurreus）和让·冯·赫沃维勒（Jan van Hervoville）都是虔诚的加尔文教徒。

尽管新教徒的力量强大，但约翰在他天主教妻子的怂恿下，努力沿旧的宗教方向进行宗教改组。他提出的倡议从范围上看是有限的。他在宫廷中开设了一个天主教小教堂以满足王后的精神需求，邀请耶稣会教士到斯德哥尔摩建立一个新的研究院，由他们的神父尼科莱·劳伦提休斯·尼科莱（Nicolai Laurentius Nicolai）管理。尽管局限于小范围，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教士却都以恐惧的心理看待形势的这种变化。尤其是当王储西吉斯蒙德作为一位天主教徒将继承王位的时候。1587年，西吉斯蒙德继承信奉天主教的波兰的王位更加剧了瑞典教士的恐惧，他们中目前绝大部分是新教徒，害怕瑞典会被暗中重新纳入天主教的控制之下。更广泛的瑞典民众也带有同他们一样的焦虑，他们那时也已经接受路德教的忏悔，他们的宗教观念也受到改革派教士每年一次造访的灌输，在这种造访中新教教理以问答方式被详细地予以了说明。



地图1 1560—1660年波罗的海两岸的瑞典。伴随着这一时期的统一和领土扩张，尤其是军事征服，瑞典从经济和军事方面迅速成长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使波罗的海成为它名副其实的内湖。

二、经济困难

如果说宗教问题仍然是教会与王室之间冲突不断加剧的一个缘由，那么在埃里克十四世的统治下，瑞典的经济也处于窘迫状态。获得充足资金来供养军队已成为一个愈来愈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当雇佣国外

的、特别是德国的雇佣军对保卫领土安全日益重要的时候。确实，到16世纪50年代，王室全部现金支出的1/2到2/3都是为了这个用途。一个常设海军舰队这时也已建立。对国王而言，这成了一个主要问题。最初是用从教会没收来的白银来为埃里克十四世的军事行动买单，后来得自萨拉银矿的收入也被投入使用。随着一个世纪的开采，这些银矿变得越来越无银可采。结果，增加税收和使用得自其他形式的各种收入就成为必然。

64

瑞典对外贸易的增长必然要求其改善对外商业关系，尤其是与诸如英国和荷兰等西方海上强国的关系，并努力使自身摆脱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的控制。结果，瑞典虽小，但它唯一的北海港口艾尔夫斯堡（Älvsborg）在国家经济中却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丹麦在16世纪中期对艾尔夫斯堡的占领使瑞典遭受了重大挫折。而1561年爱沙尼亚（Estlan，今天的Estonia）接受瑞典的统治缓解了这种情势，它便利了瑞典与俄国和东方的贸易。

1570年签署的《斯德丁条约》（the Treaty of Stettin）使瑞典与丹麦间的和平重新恢复了，一种更为稳定的秩序被接纳，这得益于古斯塔夫·瓦萨最初确立的安排。在所有这些变化之后，西部的情势也得到改善。艾尔夫斯堡被归还给了瑞典，条件是在未来3年支付15万银达雷尔（daler）给丹麦。而更为重要的是，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k II）放弃了他对瑞典领土的要求。作为回报，约翰也放弃了他对挪威的领土要求。

三、乌普萨拉宗教会议和它对王朝的影响

约翰在瑞典培植天主教势力的企图使他与那时的大多数路德教徒相对立，而且也逐渐失去了公众的支持。他于1592年去世后，虔诚的天主教徒西吉斯蒙德的继位不仅导致在宗教上，而且也导致在政治上的两派对立。作为反应，路德教会的教士于1593年在乌普萨拉集会，发布了一系列宣言来界定瑞典教会的信条，同时继续禁止天主教会的活动。另一个结果是于1595年恢复乌普萨拉大学，这不仅恢复了使人

接受传统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而且提供了一种途径，可以对未来的外交官和其他政府人员进行培训，培养他们承担未来角色的能力。它培养的许多人能够到欧洲的王室和亲王宫廷中供职，那里是欧洲政治权力的所在地和知识精英汇聚的地方。 65

然而，这次宗教会议的直接后果是与西吉斯蒙德的对立。国王于1593 年 12 月抵达瑞典，他明确表明，宗教会议有关宗教问题的决定并未获得王室的同意。确实，据说他将天主教会众布置在斯德哥尔摩，同时尝试以其他方式维护他的意愿，即既反对路德教派、又反对执行他们的改革措施。不过，他的叔叔卡尔公爵（Duke Karl，1550—1611）以及各等级的反对意见是如此强烈，他们汇聚在一起参加约翰三世的葬礼，致使西吉斯蒙德被迫承认宗教会议的决定。之后，他返回波兰，留下卡尔担任摄政王，与政务会合作，但各自治地区的总督则由他自己任命。其中的一些总督被证明是非常不受欢迎的，不仅卡尔不欢迎，当地的百姓也不欢迎。尤其是芬兰东波斯尼亚（Ostrobothnia）的总督克拉斯·弗莱明（Klas Fleming），他获得国王的完全支持，但在当地却如此遭恨，以致 1596 年农民发动起义来反对他。

在这一阶段，卡尔不仅与西吉斯蒙德，而且与贵族处于对立状态——他们中许多人反对他巩固自身的权利却损害他们的利益。不过，问题在 1598 年 9 月得到了解决，那时西吉斯蒙德和他的军队在斯坦格布罗（Stångebro）被卡尔的军队打败，前者是 7 月抵达卡尔马的。西吉斯蒙德和他的残余逃回了波兰。因此，从实力及地位出发，第二年7 月，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会正式宣布废黜西吉斯蒙德的瑞典王位。国会的人员组成是在不断变化的，此时，它由 4 个等级组成，即贵族、教徒、市民和农民，但头两个等级居主导地位。当时，在国内还有反对者需要应对，卡尔利用平民的广泛支持对那些权贵发起攻击，权贵们热衷于使政务会再次成为政府权威的中心，这导致 1600 年发生了所谓的血洗林雪平，其中卡尔的贵族反对者图瑞·比尔科（Ture Bielke）、埃里克·斯派瑞（Erik Sparre）、古斯塔夫·巴纳尔（Gustaf Banér）和斯滕·巴纳尔（Sten Banér）都被处死，而且是根据瑞典国 66

会的命令执行的。

直到1603年，在各等级代表于北雪平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卡尔才被批准成为瑞典国王，王位世袭权授予了他的子孙。第二年他取名卡尔九世，但却不得不再等3年才能由乌普萨拉大主教为他行加冕礼。一旦加冕完成，他就能够将注意力转向外交事务以及巩固他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他并非仅仅通过增加平民对他专制统治的支持来实现上述目标，而且还通过抓住对俄国扩张的机会，后者当时正处于政治混乱状态。

1595年签署的《特于辛那条约》（The Treaty of Teusina）划定了瑞典和俄国之间在拉普兰的北部边界，于是过去有关边界的争端不再成为问题。卡尔九世干预俄国事务的关键在于减少波兰对俄的政治影响而有益于瑞典，尤其是有关在那里建立新王朝以取代刚刚才被残忍灭除的旧王朝的事务。他加强瑞典和俄国之间的贸易的做法导致他与丹麦处于公开的冲突之中，冲突不仅是在波罗的海，而且在北方的北冰洋以及拉普兰发生，并且在拉普兰与丹麦人控制的挪威的边界也存在争议。结果，在17世纪早期，当瑞典试图在更大程度上控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时卷入了与邻国的3场战争。瑞典在利沃尼亚的基尔克霍尔姆（Kirkholm）战败使士气受到严重打击，后者在瑞典控制的爱沙尼亚南部边界附近。但1611年爆发的对丹麦的卡尔马战争（Kalmar War）对瑞典的威胁则更大一些，尤其是因为这座港口城市很快就被丹麦人占领。虽然，瑞典占领了挪威人控制的耶姆特兰（Jämtland）和海里耶达伦（Härjedalen），但并不能弥补失去波罗的海上一个如此有价值的门户的损失。不过，随着在那一年任命阿克塞尔·奥克森斯特纳（Axel Oxenstierna，1583—1654）为首辅大臣，国王获得了一位瑞典国内最有能力的行政官员。当然，许多挑战依然存在，有许多困难需要去应对：1612年，丹麦人再次占领了艾尔夫斯堡，切断了瑞典的北海贸易通道，加尔堡（Gullberg）要塞也被占领。

四、经济扩张及其对军事的影响

67

与丹麦的冲突又持续了2年，到1613年最终签署了《克奈勒德条

约》（The Treaty of Knäred），这个条约的达成得到了爱沙尼亚的推动，而后者有自己的海上发展计划。不过，条约的要求是苛刻的：艾尔夫斯堡归还给瑞典，但必须支付 100 万瑞典圆（riksdaler），这是一个巨大的数额，它相当于瑞典每年农业产出价值的 2/3，在这个要求被满足前，丹麦仍然控制着西哥得兰的部分地区。卸掉这个繁重的负担花了 6 年多时间，主要是通过出口达勒卡里亚的铜获得收入来缴纳。此外，还有来自荷兰的贷款，因为拥有商船的荷兰商人希望丹麦的海上力量被削弱。通过 1614 年于海牙签署的军事同盟条约，瑞典和荷兰的关系得到进一步加强。据说，丹麦的军事力量并没有被削弱，因为根据刚刚签署的《克奈勒德条约》，瑞典还必须归还从挪威那里占领的极北部地区芬马克（Finnmark）。

但是，荷兰的支持对于瑞典还是非常有益的，而且不仅仅是在军事支持方面，还有它的贸易商和制造商能够提供的必要的技能，这是瑞典新兴的工业所需要的，它对瑞典扩展军事力量也至关重要。在这个时期，瑞典要弱于竞争对手丹麦。对丹麦的巨额支付大部分得依赖采矿业的收入。虽然铜的出口在 16 世纪 80 年代有显著增长，但从较长时期看，炼铁工业和铁矿开采则更为重要。而在这些产业中，荷兰人起了关键作用。例如，在那 10 年间，荷兰企业家威廉·范·魏吉克（Willem van Wijck）给予了约翰三世极大的帮助，使铁的总产量的出口价值从 1549 年 27 501 英镑增加到 1604 年的 48 335 英镑。荷兰是铁的主要进口国，但从购买量上看，在市场上英国的需求迅速超过了它。这一新兴产业是如此重要，致使引入了新的管理措施以方便它的运行。它导致矿业学会（Bergskollegium）在 1637 年建立，而且是由国王倡议的。就其对矿业的监督和管理而言，这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它一直持续发挥作用到 1828 年。

68

伴随铁矿开采的迅速发展，对其他金属进行开采的风险投资也在进行。1636 年，在克里斯蒂娜皇后统治的早期，一个银矿在瑞典拉普兰地区的纳莎（Nasa）投入生产，它离挪威边界不远。在那里，政府征用了萨米族牧民的驯鹿运送矿石，不过后来被证明在经济上是不合

算的，最终关闭了那里的银矿。铜矿的开采继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的确，斯道拉·卡帕堡的铜矿在整个17世纪供应了几乎全欧洲，稍后是美洲所需要的铜，这些铜矿是在达勒卡里亚地区的法伦（Falun）附近。它也促使政府开始用铜作为铸币的原料。那时铸造的一些瑞典铜币是如此之大，直径1英尺、超过40磅重，运送它们非常困难，于是有新的支付方法被设计出来。据说瑞典在1601年就发行了纸币，成为欧洲第一个发行纸币的国家。但税收却仍主要是用产品支付，这证明瑞典当时还不是一个完全“货币化”的社会。又据说，1644年瑞典开始正式印制纸币，比英国银行发行第一批纸币早了50年。

到16世纪末，约翰三世倡议进行一揽子其他商业活动，其中特别是要在瑞典建立几座新的城市：卡尔斯塔德（Karlstad）、马里士塔（Mariestad）和马里夫雷德（Mariefred）。国库中不断增加的资源对军事而言非常重要，因为它能够使瑞典增加常备军的规模，在和平时期也能达到24 500人，同以前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量。军队在战争时期会由于雇佣军的加入进一步膨胀，这些雇佣军通常由英格兰、苏格兰或德意志人组成。在服完兵役后（通常是在波罗的海东部的战役中服役），他们中的许多人会继续留在瑞典。在这个时期对免于税负的土地进行了分配，晋升为世袭贵族的人的数量也同时增加了。因此，在约翰三世统治下，全部可耕地中有不少于19%的土地拥有这种特权，而在埃里克十四世统治下，这一数量又增加了4%。这在短期内用于满足军事需求是有用的，但从长期看，对国家的财政稳定、以及加强中央集权却是不利的。

69

五、新城市的建立

在16世纪晚期，瑞典仍然是一个农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国家，而且人口稀疏。根据1571年的一份税收记录，不包括芬兰的瑞典人口约是75万人。其中，仅有5%左右生活在城市，但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斯德哥尔摩是最大的城市，也是最重要的商业中心，但它的人口仍然未超过6千人。位于波罗的海列岛上的斯德哥尔摩，

像整个瑞典一样，在几个世纪中倾向于向东和向南方向寻求其主要市场；不过，到 17 世纪，随着它同西欧海上联系的增加，瑞典对临北海东部港口的需求就变得愈益迫切。于是，一个新的城市哥德堡（Gothenburg）于 1607 年建立起来，填补了这一空白。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荷兰商人在这座新城市中居主导地位，该市新的管理委员会有 10 名荷兰人，其他成员包括 7 名瑞典人和 1 名苏格兰人。同荷兰人的这种联系不会令人感到奇怪，因为正是从荷兰那里借的钱才使附近的艾尔夫斯堡被归还给了瑞典。据说，在早期，哥德堡一直是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直接管辖之下，所有国际贸易都需通过它的批准。不过，到 1621 年，哥德堡被授予直接进行国际贸易的许可，使它具有了进行海外联系的特权，不仅是同欧洲的其他地方，而且还有欧洲之外更广泛的世界联系，由此也就为瑞典的海运史翻开新的一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座由荷兰和苏格兰商人主导的城市发挥着筛选作用——有选择地准许外国投资者和商人进入这个国家，而他们带来的人力和物质资源是欠发达的瑞典经济所渴望得到的。

在芬兰的北部和东部边界，新的居民区也建立起来，但规模都不大，贸易范围也都很有限。因为，那时芬兰人口仍然非常稀疏，1690 年仅有大约 50 万居民。当然，1/3 的居民是无地农民，其中大多数人作为农场劳动力在其他人的土地上劳作，勉强维持生计。尽管许多人在寻求改变自身命运的方式——越来越多的人尝试在同俄国接壤的边缘地区得到一些未开垦的土地进行开垦，但代价高昂：因为俄罗斯人将他们日趋增多的存在视为一种威胁，在与瑞典的多次战争中，俄国军队的入侵使这些移民处于不安全的状态。由于俄罗斯人不断进行劫掠性袭击，逃离该地的移民越来越多，许多芬兰人穿越波的尼亚湾到瑞典北部和中部地区去寻求避难。许多人在韦姆兰定居，他们在那里受到欢迎去开辟林地用于耕作。移民的数量极大，甚至直到今天，那里许多村庄的名字仍然能够证明他们以前的存在。据说，尽管有俄罗斯人入侵的危险，但新城镇还是在芬兰与俄罗斯交界的“殖民区”迅速增加，例如在卡累利阿（Karelia）、萨沃（Savo）、卡雅尼（Kajani）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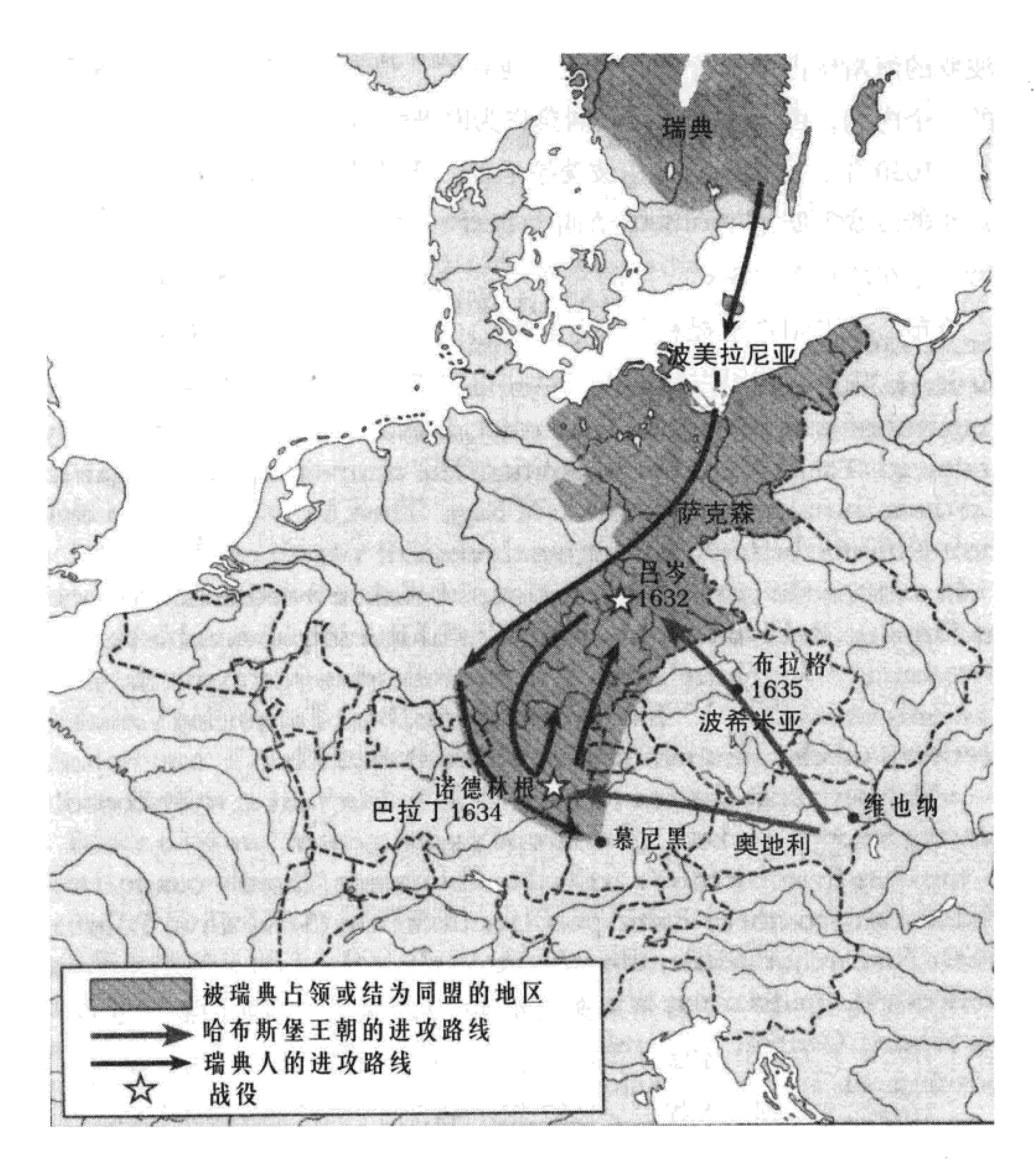
和芬兰的拉普兰。

六、三十年战争

瑞典成功地将自身统一为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军事化的主权国家，但它很快就开始经受考验。1618 年在欧洲中部爆发的一场涉及广泛的大战，最初并未太多地影响到瑞典。但在瑞典 1630 年参与到战事中时，它拥有了一种重要的军事和政治的地位，这是它以前从未取得过、也是今后不会再取得的地位。用现代话语表述，它变成了可称之为超级大国或至少具有超级大国表象的国家，而事实上它根本没有人力和财力长久地维持那种地位。

就部分原因看，瑞典取得它新的地位归功于新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1594—1632）的聪明才智，他是在 1611 年继承王位的。在东部战线迅速取得的军事进展有助于巩固他的军事和经济力量。1617 年，在他行加冕礼的那一年，根据《斯托尔博瓦和约》（The Peace Treaty of Stolbova），瑞典获得了凯克斯霍尔姆（Kexholm）和印格利亚（Ingria），前者在卡累利阿北部，后者在今天俄罗斯的列宁格勒州（Leningradskaya Oblast），圣彼得堡就坐落在那里。作为一个虔诚的路德教徒，以及对创建一个更加统一的国家的企盼，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推进国家官僚制度愈益集权化和更有效地管理它的资源，这些得到了瑞典教会的帮助。服从和追求的一致性，成为瑞典社会的典型特征，宗教界和世俗社会都是如此。天主教和东正教都被宣布有罪，信奉它们的教徒将被驱逐出境和没收财产。因为国王认为，那些继续坚持旧的宗教信仰的人，不管他们真正持有的宗教异议是什么都会危及国家的统一。

1618 年，当三十年战争爆发时，神圣罗马帝国的中心地区打得一团糟。瑞典最初保持中立，它是在等待时机。不过，伴随 1621 年与波兰的重新开战，瑞典深深地卷入了中欧的政治冲突。战争首先在利沃尼亚展开，很快导致对里加的占领。接着，1626 年，普鲁士也卷入冲突，但战火直到 1629 年才烧到那里。



地图 2　三十年战争（1618—1648）时期的瑞典。这一时期，由尚武的国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统治的瑞典，拥有欧洲最大的军事机器。在善战的将军的领导下，瑞典能够统治欧洲中部德国的大片中心地区，并使它成为欧洲政治中一个非常可怕的竞争对手。

1629 年，瑞典和波兰在阿尔特马克（Altmark）签署协定，休战 6 年。这条战线上压力的解除，使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能够于第二年将瑞典带入三十年战争，其目标不仅是帮助他的新教同道，而且是要在

波罗的海南岸占领有价值的领土。他希望，很快使波罗的海成为瑞典的一个内湖，由此来真正巩固瑞典作为欧洲强国的地位。

1630 年，瑞典军队抵达波美拉尼亚，迅速占领了波罗的海南岸富裕的港口城市斯德丁（波兰语叫什切青）。他们所打的第一次大仗是第二年在萨克森（Saxony）的布莱登菲尔德（Breitenfeld），那是瑞典对哈布斯堡王朝将军提利（Tilly）获得的一场重大胜利；从实力和地位看，这场胜利使得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能够建立起与德国北部主要新教强国的联盟，包括马格德堡（Magdeburg）、勃兰登堡（Brandenburg）和萨克森。尽管他是一位虔诚的路德教徒，但对新教不同教派的容忍给他带来了实际的政治利益，他的许多新教盟国信奉的是加尔文教。他的军事行动范围很快就扩大了，在未来 20 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瑞典在中欧参加了几次大的战役，从北方的斯特拉尔松（Stralsund）向南一直延伸到南方的莱比锡（Leipzig）、法兰克福（Frankfurtam-Main）和慕尼黑。甚至维也纳也受到过它的威胁。

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心中窃喜，它的首席大臣红衣主教黎塞留（Cardinal Richelieu）对这样一个事实感到高兴，即他的新教盟友正威胁到法国的主要敌人哈布斯堡帝国，当时法国正与后者处于战争状态。

73

1631 年 1 月，法国承诺，如果瑞典用一支 36 000 人的部队对哈布斯堡帝国发起战争的话，它将给瑞典每年 40 万瑞典圆。瑞典做到了这点，到 4 月份，它从帝国军队手里夺取了爱尔福特（Erfurt）和法兰克福。

双方都遭受到巨大损失。1632 年 4 月 5 日，哈布斯堡的将军提利在莱希（Lech）受了致命伤。接着，1632 年 11 月 6 日，古斯塔夫·阿道夫本人也在吕岑（Lützen）战役中阵亡。他的王位由他的女儿克里斯蒂娜（1626—1689）继承，但那时她还仅是一个孩子，必须安排一个摄政职位。国家政务会因此接管了瑞典的统治权，确立由阿克塞尔·奥克森斯特纳领导摄政统治，直到克里斯蒂娜成年的时候。

与此同时，在德国的战争也在同步进行。1634 年，哈布斯堡将军阿尔布莱克特·冯·华伦斯坦（Albrekt von Wallenstein）在波希米亚（Bohemia）遇刺。接着，1635 年，萨克森和勃兰登堡与哈布斯堡帝国

签署没有年数限制的和约，而瑞典和波兰之间则达成了26年的休战期。只是到这时，法国才最终抛弃它的代理人战争策略，于1636年对哈布斯堡帝国宣战。这给了瑞典以支持，在约翰·巴纳尔（Johan Banér）将军的领导下，瑞典军队于9月在勃兰登堡北部的威茨托克（the Battle of Wittstock）战役中取得胜利。

巴纳尔于1641年突然死亡，而新的军事天才又涌现出来。到1642年中期，瑞典军队是由陆军元帅伦纳特·托尔斯滕森（Lennart Torstensson，1603—1651）率领，他那时是在同哈布斯堡帝国作战的瑞典军队的最高统帅。在同年进行的第二次布莱登菲尔德战役中，他几乎全歼了对战的哈布斯堡帝国军队。接着，他继续战斗而且不断取得胜利。1643年，战争再次在瑞典和丹麦之间爆发，他紧急赶到日德兰半岛（Jutland），在那里阻击丹麦人的前进。在返回与哈布斯堡帝国作战的前线之前，与丹麦人进行的一系列战斗为他向多瑙河和更远的地方进军开辟着道路。但他本人却被帝国军队挡住了去路——由于痛风致残，他回到了瑞典。

1644年，克里斯蒂娜女王（Queen Kristina）到了成人年龄，她迅速将统治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她在阿克塞尔·奥克森斯特纳的辅佐之下实施统治，后者仍是瑞典最有权势的人。这尤其适用于处理外交事务和在德国进行的战争，从整体而言，瑞典和它的盟国在这场战争中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1645年又一次于布罗姆塞布罗（Brömsebro）签署和约，和约规定，丹麦失去对耶姆特兰、海里耶达伦和哈兰（Halland）、以及哥得兰和奥塞尔（Ösel）的控制权，它们都交瑞典管理，期限为30年。瑞典船只经过松德海峡和贝尔特海峡（the Belt）免收通行税，这一特权事实上一直持续到1720年。最重要的是，1645年瑞典军队在布拉格（Prague）东南部打败了帝国军队。1年后，这场战争最伟大的一位将军卡尔·古斯塔夫·弗兰格尔（Carl Gustaf Wrangel，1613—1676）接过了瑞典军队的领导权。他积极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击，于1648年占领了布拉格，那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一座重要堡垒和波希米亚的首都，战争30年前就是在这里爆发的。伴随着《威斯

74

特伐利亚条约》（The Treaty of Westphalia）在明斯特（Munster）的签订，中欧核心地带饱受战火蹂躏的30年血腥敌对状态终于结束。结果，通过这最后时刻的既成事实，瑞典不仅获得波美拉尼亚的部分地区以及鲁根、乌泽多姆（Usedom）、不来梅和费尔登（Verden）等领土，而且从鲁道夫王朝设在布拉格的王宫中抢得数量巨大的战利品，该王宫是欧洲最重要的艺术珍品收藏地。

七、瑞典统治下的波美拉尼亚

伴随着波美拉尼亚并入瑞典领土，有着波美拉尼亚公爵身份的瑞典国王就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君主的臣属。据说，这种从属地位纯粹是名义上的，因为瑞典国王有权征税、授予土地和任命行政官员，包括总督和其他大臣。德语仍然是波美拉尼亚普通百姓和政府使用的语言，以前的度量衡和货币继续使用，但财政事务此后由瑞典人管理。旧的法律体系被保存，但瑞典的最高法院现在已替代过去德国的最高法院，新法院建在首都斯特拉尔松，似乎是要从象征意义上强调这一事实。瑞典在波罗的海的霸权似乎已经变成现实。

为了保卫新获得的在德国领土，瑞典建筑师埃里克·达尔伯格（Erik Dahlberg）被任命沿新大陆南部和东部边界建造一连串用铁链连成的要塞。这些要塞中最重要的是在维斯马（Wismar），其他要塞还包括西部的施塔德（Stade），在不来梅附近；东部的诺特堡（Nöteborg），在拉多加湖附近。

75

瑞典预计它在德国新获得的殖民地将遭受激烈的军事争夺，这种预测被证明是对的。1675年，在盟国勃兰登堡的支持下，丹麦占领了维斯马，但瑞典的盟国法国要求丹麦归还维斯马。至于瑞典被迫将下波美拉尼亚（Nether Pomerania）的大部分领土割让给勃兰登堡，已是不可逆转。而且，斯特拉尔松于1715年被占领，首都被迫迁到斯德丁。5年后，只有上波美拉尼亚（Hinter Pomerania）的一个狭窄地带，即位于佩内河（the River Peene）以北的地带，仍在瑞典控制下。尽管斯特拉尔松再次被归还给瑞典，政府行政部门所在地又迁回到那里，

但这个省的辖区已大大缩小。接着瑞典政府计划对这座城市进行修缮，以与它恢复的地位相称。结果，一座新的总督府梅吉法特伯爵宫（Count Meijerfedt）按巴洛克（Baroque）风格建成，它是由荷兰建筑师科尼利厄斯·卢斯（Cornelius Loos）设计。卢斯曾在卡尔十二世（Karl XII）流亡宾杰尔（Bender）期间陪伴其左右，而卡尔十二世是在他的军队被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领导的俄罗斯军队打败之后被迫流亡的，宾杰尔就在今天的摩尔多瓦（Mordova）境内。斯特拉尔松军事长官的宅第也被重新建造。此外还建造了一个新的邮政局，用各种建筑风格予以装饰，似乎是将瑞典和德国的设计元素结合在了一起，就像政治殖民地一样。

八、作为一种政治表现的艺术

在三十战争结束后，不是瑞典国王而是弗兰格尔将军享用了最奢华的建筑，那不仅是在波罗的海以南地区，即使在瑞典本土也是如此。在担任瑞典统治下的波美拉尼亚总督之后，弗兰格尔于1654年开始建造斯库克洛斯特宫（the palace of Skokloster），它就在梅拉伦湖岸边，离斯德哥尔摩不远。一些北欧最著名的建筑师对此做出了贡献，包括大尼克德谟斯·泰辛（Nicodemus Tessin the Elder，1615—1684）、让·德·拉·瓦利（Jean de la Vallée，1620—1696）和卡斯帕·沃格尔（Caspar Vogel，1615—1684），其中泰辛是在斯特拉尔松出生的。这座宏伟建筑物在完工后表现出受到哥达（Gotha）的弗里登施泰因城堡（Friedenstein Castle）和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的约翰尼斯堡宫（Johannisburg Palace）等德国建筑原型的影响，而不是受瑞典建筑原型的影响。尽管到17世纪60年代，弗兰格尔在三十年战争中抢夺的大部分战利品已经被运到斯库克洛斯特宫，那里已是他家族领地的中心所在，但这座宏伟的建筑却从未竣工。虽然如此，弗兰格尔绝非仅有一个住处：他在斯德哥尔摩建造的弗兰格尔宫（the Wrangel Palace）是该市最辉煌的一座宅第。他还在瑞典占领的波美拉尼亚建有多处住宅。在斯特拉尔松的弗兰格尔宫，是由瑞典建筑师尼尔斯·伊奥

76

桑德（Nils Eosander，1635—1705）按照瑞典风格建造，这种风格的标志性特征是在建筑的主正面建有斜面屋顶，与旧的德国式三角形屋顶建筑的传统相区别。伊奥桑德还在1670年左右领导了对鲁根的斯比克城堡（Spycker Castle）的重大修复工作。当该城堡于16世纪初次建造时，有一个城壕包围着，侧面建有角楼，角楼被涂成法伦红颜色，这种颜料是达勒卡里亚法伦铜矿的副产品。城堡具有典型的瑞典风格，它成为弗兰格尔最喜欢的一个住处。1676年他就是在那里去世的。

如果说艺术和建筑风格在17世纪的瑞典发挥了一种重要的政治作用的话，那么音乐也是如此，它被视为对提高该国地位起了关键作用。在这种新涌现的繁荣中，一个关键人物是古斯塔夫·杜本（Gustaf Düben，1628—1690），他继承了其父、德国人安德雷斯·杜本（Andreas Düben）的职位，既担任瑞典皇家管弦乐队（the Royal Swedish Court Orchestra）的指挥，又担任在斯德哥尔摩的德国人的圣盖特鲁德教堂（St Gertrud Church）的风琴手。以新建成的多特宁霍姆宫（the Palace of Drottninghom）为剧场，他的《三首舞曲》（Three Dances）和《萨拉班德舞曲》等曲目受到广泛称赞。这证明在音乐方面，瑞典已经能够与其他主要欧洲国家的王室比肩。

九、对俄战争重新爆发

如果说瑞典在波罗的海西部地区的超级大国地位是不稳固的，那它在东部地区的地位就更不稳固。1656年，俄国再次对瑞典在波罗的海东部的领土发动进攻。而令问题更糟的是，丹麦也在第二年对瑞典宣战，它希冀能够取消因《布罗姆塞布罗条约》赋予敌国瑞典的各种利益。此时，卡尔十世古斯塔夫（Karl X Gustaf，1622—1660）已经继承了他表姐克里斯蒂娜的王位。作为回应，他率领驻扎在波兰的军队通过德国北部进入丹麦。在进入日德兰半岛后，瑞典军队穿越冰封的小贝尔特海峡进入菲英岛（Funen），从那里穿越大贝尔特海峡进入西兰岛（Zealand），在哥本哈根（Copenhagen）城外安营扎寨。瑞典军队的威胁迫使丹麦投降。结果，瑞典不仅获得了斯堪尼亚、哈兰、

77

布莱金厄和布胡斯兰，而且获得了波恩荷尔姆岛（Bornholm）和挪威的特伦德拉格省（Trøndelag）。但卡尔十世却渴望获得更多的领土，此后不久便再次威胁哥本哈根。但这次他却不太成功。在长期的围困和不成功的进攻后，第二年，瑞典人被击退，并最终于1660年签署了和约。结果，波恩荷尔姆岛和特伦德拉格省被归还给丹麦—挪威。同时，瑞典也与波兰、最重要的是与俄国分别签署了和约。

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即使瑞典军队中有很大比例是外国雇佣军，但在德国的军队复员还是造成了后勤和财政问题。一则是将王室土地赏赐给那些从三十年战争返回的军官，使得国家的金库处于严重枯竭状态。而这种情势又由于另一个事实而加剧，即到克里斯蒂那女王统治末期，大约有63%的农业用地已经属于贵族，并因此免于税收。这样，当卡尔十世于1654年继承王位时，一项新的法律被颁布，即强制减少贵族拥有的土地数量。其结果是，自1632年以来由贵族占有的土地总量的1/4、以及那些被认为是维持王室所必需的土地均被收回，即总量大约有3 000户的农庄被收回。这一举措既有助于巩固不断中央集权化的政府，又有助于加强君主专制制度。

虽然农村生活由此在管理方面经历了重大变革，但采矿业继续平稳运作并保持着高利润。国外对铜和铁的需求一直很旺盛，这一时期瑞典生产的铜和铁大约80%出口国外。直到17世纪20年代，铜的生产和出口一直都在瑞典的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传统上一直是以粗铜的形式出口，但后来以加工成的精铜出口，这是一种经过特别精炼、去除了小的杂质的铜。从1625年起，不断增加的铜产量推动了铜币的铸造，这一方面减少了所需的银用量，另一方面也使货币进一步贬值。不过，伴随着这个世纪的渐去，铁作为出口产品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确实，到17世纪末，它的国际市场急剧扩大，仅英国就购买了瑞典出口的铁产品的约65%。

78

黄铜也是瑞典的一种重要出口产品。德国移民毛莫兄弟（Momma

brothers）推进了它的生产，这种生产是如此成功，以致他们能够聚敛巨额财富，并以新名字林斯蒂尔纳（Reenstierna）晋升为贵族。

来自瓦隆尼亚（Wallonia）的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1587—1652）在1627年来到瑞典后，也沿着相似途径致富并获得较高地位，瓦隆尼亚在今天的比利时境内。他在北雪平附近的霍尔蒙斯·布鲁克（Holmens Bruk）逐步建立了自己的兵工厂和黄铜生产厂，成为那个时期最主要的工业家之一。在瑞典卷入三十年战争期间，他还为瑞典军队提供了大量装备，并继续发展、创建了一个商业王朝，在瑞典经济中长期发挥了主导作用。

瑞典以斯德哥尔摩为中心的海运经济总量也在急剧增加。运量从1615年的17 100船运磅（shipping pound，这样的1磅等于大约170公斤）增加至1640年的58 500船运磅、以及1650年的102 800船运磅。斯德哥尔摩仍然是主要的出口港，通过它进行的国际贸易迅速增加。与之相比，通过哥德堡进行的贸易则要逊色得多：从1640至1650年仅由15 200船运磅增至17 000船运磅。

然而，如果说此时的波罗的海已成为瑞典名副其实的内湖的话，主要的受益者却非瑞典人，而是荷兰人，他们收获了最大的酬报。他们的船只运送着瑞典王国绝大部分的出口商品。的确如此，在17世纪50年代早期，通过松德海峡的运输船舶有大约65%悬挂着荷兰国旗，却仅有10%的悬挂瑞典国旗。

波罗的海东部目前也处于瑞典的霸权控制之下，这里的贸易，即通过利沃尼亚的里加进行的贸易，也有明显增加。海军所必需的植物纤维大麻从今天的白俄罗斯（Belarus），通过里加、跨越波罗的海运到瑞典，其数量从1660—1669年的12 000船运磅增至1690—1699年的约58 700船运磅。大麻籽的进口数量甚至增长得更快些：从前一时期的2 300船运磅增至后一时期的123 300船运磅。因此，当饥荒发生时（这在17世纪后半期绝非罕见），里加就成为瑞典从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内陆地区进口谷物的生命线。

尽管瑞典有广阔的海岸线，但此时被允许进行国际贸易的城市仅

包括斯德哥尔摩、卡尔马、哥德堡、耶夫勒（Gävle）和土尔库，耶夫勒还被禁止在斯德哥尔摩以南地区进行贸易。卡尔斯克鲁纳（Karlskrona）也很重要，它是瑞典海军的主要基地所在，也是重要的船舶制造基地，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瑞典海军的许多舰船都是在那里的船坞中建造的。舰船生产得到英国造船专家查尔斯·谢尔登（Charles Sheldon）的大力帮助，他在那里参与指导了7艘海军大舰船的建造。

林木一直也是瑞典重要的出口产品，在16世纪，极南端诸省的原始森林已经大部分消失。与它不同的是，在芬兰，大部分土地尚未被开垦，原始森林、沼泽和灌木丛林地仍然大量存在。并且不像瑞典大多数地区那样，除哥得兰、达勒卡里亚和诺尔兰外，在芬兰开垦的土地约有90%掌握在自耕农手中，而不是在王室或贵族手里。部分原因是，芬兰的贵族还很少，在16世纪早期仅有215户。但他们的地位在接下来的世纪中得到加强，因为波的尼亚湾两岸的贵族得到中央集权程度不断加强的政府的支持，比如去除了他们为国王的利益服兵役的繁重义务。据说，在人口稀少的芬兰，甚至在它的行政首府和主要城市土尔库周边也很少有居民，贵族的力量自然也相对有限。

十一、新瑞典在特拉华的建立

瑞典地理边界的扩张说明它对扩展经济实力的追求，而最激动人心的创意是在北美建立一块殖民地，尽管那是很难持久的。1637年，在两位荷兰人萨缪尔·布罗马尔特（Samuel Blommaert）和彼得·米努伊特（Peter Minuit）的倡议下，为了这个目标设立了新瑞典公司（the New Sweden Company）。它使第一块瑞典殖民地于第二年在美洲的克里斯蒂娜堡（Fort Kristina，即今天的威尔明顿［Wilmington］）建立，它在今天美国的特拉华州。不过，没有人愿意移民到那里，以致瑞典政府于1641年决定将囚犯运到那里。军队逃兵、被军事法庭判罪的士兵以及偷猎者、流浪者和一个被指控在瓦恩海姆修道院的皇家果园中砍倒6棵苹果树的人，很快被运到这块新殖民地居住，而他们的

80

家人也一道前往。

它的第一任总督是约翰·普林茨（Johan Printz，1592—1663），他后来在返回瑞典后被任命为延雪平省的总督。在他任职殖民地期间，烟草的种植和出口到瑞典成为主要收入来源；毛皮贸易也得到发展，海狸皮成为一种重要的出口产品。

安全一直是一个大问题。由于克里斯蒂娜堡易于遭受军事攻击，所以需要选择一个新的首府。因此，1643年，政府所在地迁至有更好防护的地点新哥德堡（New Gothenburg），它位于特拉华河更深处。即使这样，该殖民地也是很难防御的：1655年，在彼得·史岱文森（Peter Stuyvesant）领导下，荷兰人占领了克里斯蒂娜堡，并将这块殖民地划归自己所有。不过，瑞典人的存在留下长久的影响，特别是他们建造的瑞典式小木屋。而且，700名瑞典人和芬兰人中的大多数仍然居住在那里。更不幸的是，奴隶制遗产也将在那里保留：1639年第一批非洲人为此目的被运到那里，那种怪异的制度将在这块殖民地上维持225年还多。

在这个时期，路德教也在新瑞典确立了地位。第一座教堂在特拉华河上的丁尼肯岛建立起来，拉尔斯·洛克（Lars Lock）被任命为第一任牧师，任职期从1648年直到1654年。他的存在大大扰乱了以前就定居在那里的居民，不仅包括土著的美国人，而且包括改革教派的荷兰追随者——他们遵从加尔文教的信条。殖民地总督普林茨厌恶加尔文教派，试图对它进行镇压。不过，他最敌视的是美国土著的宗教。他鼓吹对拒绝接受基督教的人实施灭绝政策，但在缺乏军事力量的条件下是很难执行这种政策的。在他离任后，殖民地管理者变得宽容，不仅不信新教的人、甚至犹太教徒都被允许在那里定居，而那个时代宗教宽容的例子还是少见的。至于瑞典的路德教会，它有许多常驻牧师，在一个多世纪中它继续发挥作用，即在瑞典放弃那里的主权后很久仍在发挥作用。

虽然新瑞典最终是失去了，但建立其他殖民地的倡议却在实施。着眼于控制一些奴隶贸易，以及在西非海岸建立一个有用的停靠港，

81

瑞典从荷兰人手里夺取了卡罗鲁斯堡（Carolusburg），那是荷兰人于1637年建造的，在今天的加纳（Ghana）海岸。不过，它很快被丹麦人于1659年，即第一次北方战争期间夺走。接着在由土著人占领几年后，又于1666年回到瑞典手中；两年后又转到英国主权之下。后来，直到18世纪早期时，瑞典建立殖民地的新倡议才再次被实施。

十二、各等级

17世纪的瑞典是一个高度等级化的社会，从政治和社会方面看都是如此。在1626年，瑞典建立起一个由官方认可的、僵化的等级制度，同时瑞典社会的各主要阶层也被组织进各种政治团体。就在那一年，第一等级被正式组织为1个团体，包括着3个不同的群体：那些拥有郡县或男爵头衔的人、那些家庭成员有供职于国家政务会的人和那些出身贵族但没有高头衔的人。第二等级代表教会，它在乌普萨拉大主教领导下，由辅佐他的各主教管理。第三等级代表商人阶级、尤其是斯德哥尔摩商人的利益，它选择一位成员作为主要代表。最后是第四等级，它代表农民利益，它的领袖从其成员中选出。国王设立宫廷总管，监督等级制的运作。这样，各等级的代表人物与国家政务会一道，构成瑞典的国民政府。因此，在瑞典，社会人口的各主要部分都有他们自己的政治代表，这与欧洲其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

82

十三、大学的重建和知识思想的发展

拥有这样一种中央集权形式的政府，未来政府成员的教育问题就变得愈加紧迫。因此，恢复乌普萨拉大学的倡议遂于1621年被采纳：它首建于1477年，再建于1595年，当时它是北欧国家最古老的大学。国王本人提供了重建大学所需的巨额资金。正如当时有人所描绘的，它包含一种“对所有外国东西的过分迷恋，而伴随的是对本地资源的不重视……”该大学许多最珍贵的图书都来自德国，它们是在三十年战争期间作为战利品从哈布斯堡王朝波希米亚地区各图书馆劫掠来的。

其他大学也相继建立。多尔帕特大学（Dorpat University，也叫塔

尔图大学［Tartu］）在今天的爱沙尼亚（Estonia），建立于1632年；图尔库大学建于1640年；隆德大学在新占领的斯堪尼亚，建于1668年。在新吞并的德国北部诸地区中，格赖夫斯瓦尔德（Greifswald）已经有一座建于1456年的古老大学。因此，在瑞典占领的这些地区能够自夸有5所高等学府。所有这些大学全部用于满足瑞典的政治需要，它们有助于形成一种文化和文学氛围与价值体系，能够使其毕业生团结在共同的瑞典文化遗产下，并将他们整合到更广泛的泛欧洲思想世界；它也能促进一种更统一的司法裁判制度的建立，同时使整个王国的教会组织更加统一。这可以由1634年颁定的政治体制给予清楚说明，其中路德教会的管理机构被纳入政府体制，对以前自治的地方社会的控制在加强。同不断增强的自由主义与个体性相对立，新的社会制度奠基于在法律下的服从和一致，这有助于破坏封建制度的旧形式，当然也保留了许多以前的地方特色，而这些则不利于中央集权化军事国家制度的加强。新的制度被着意培植，来替代旧的制度。这种新的制度被追溯到虚构的哥特人祖先那里，将瑞典人歌颂成一个尚武的民族，它注定会统治欧洲。由教会和国家加以宣传，使它作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持续存在了一个多世纪，直到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各种理想将它一扫而光。

83

那时，瑞典深深地卷入到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和经济事务中，这种状态对国家的物质资源强加着繁重负担。不过，知识界的成果却是异常丰富。在整个17世纪，伴随大学的兴旺发展以及与欧洲大陆的密切联系，瑞典人的精神世界得到极大的丰富。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一位知识分子是约翰尼斯·鲁德贝丘斯（Johannes Rudbeckius，1581—1646），他既是数学也是希伯来语的教授，1619年被授予韦斯特罗斯主教席位，并多年担任古斯塔夫·阿道夫国王的私人牧师。他的儿子奥洛夫·鲁德贝克（Olof Rudbeck）也很著名，尤其以文学作品《王者世界》（*Atlantica*）闻名，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幻想曲，歌颂了瑞典在世界历史中的霸权角色，而这种想象迎合了国王对战争和中央集权政策的偏好；他还是一位任教于乌普萨拉大学的重要的科学家，在

那里，他集中研究淋巴腺和它们在人体中的功能，他还帮助修订了全部学术课程，大部分瑞典贵族都接受这些课程的教育；特别著名的是他在乌普萨拉建立的一个植物园，这个植物园在18世纪被瑞典伟大的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Carl von Linné，1707—1778）接管，直到今天它仍然存在。

另一位重要人物是乔治·谢恩赫尔姆（Georg Stiernhielm，1598—1672），他是出版于1658年的六韵步诗《赫尔克里斯》（*Hercules*）的作者。尽管他的职业是法官，但他对北欧各种语言的历史起源进行了深入研究，同时也对数学和科学问题有着浓厚兴趣。 84

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化也走向了繁荣，瑞典第一份报纸《定期邮报》（Ordinari Post Tijdender）于1645年发行，甚至到今天仍在发行。当时它的许多文章关注来自三十年战争的消息，而当时新建成的高效邮政系统便利了它的发行，该系统已经能够服务全国。

在芬兰，通过路德教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工作，人们普遍已经能够识字。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一般来自该地区的西部和南部，而那里的社会有着高度等级化的分层。据说，在1640年到1700年间，有10%的大学生来自卑微的农业家庭。虽是如此，但多数人口仍未掌握书写技能，这种情况持续到19世纪。不过，克里斯蒂娜女王于1642年出版的《芬兰语圣经》（*Finnish Bible*）对提高识字率做出很大贡献，芬兰语的赞美诗也在大约50年后出版。

在拉普兰，教育也于17世纪取得发展。例如，对萨米族儿童进行教育的学校在1632年就在吕克瑟勒（Lycksele）建立起来了。古斯塔夫·阿道夫的枢密顾问官和导师约翰·斯基特（Johan Skytte，1577—1645）对此起了重要作用。他在拉普兰大力推进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例如，他帮助募集了资金，在18世纪中每年资助4名萨米族学生到乌普萨拉大学学习。在政治方面，斯基特曾作为年轻的古斯塔夫·阿道夫的导师对后者产生重要影响。他被授予杜德霍夫（Duderhoff）男爵称号。在被征服的利沃尼亚，他于1629年被任命为总督，印格利亚和卡累利阿两地也归他管辖。接着，在1632年，他成为新建立的多尔帕

特大学的校长。稍后，1634 年，在克里斯蒂娜女王统治早期，他被任命为约塔（Göta）上诉法院的院长。他对瑞典自然哲学的贡献也值得关注，尤其在培养年轻女王克里斯蒂娜的高才智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十四、克里斯蒂娜女王

85

克里斯蒂娜女王对科学和艺术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着流利表达多种语言的天赋，包括德语、荷兰语、法语和拉丁语。她异常固执己见，在 17 世纪 40 年代极力地维护她的独立性，以摆脱那些很久以前就确定的顾问们，尤其是阿克塞尔·奥克森斯特纳的控制，后者那时是瑞典的枢密院顾问。据说，女王越来越多地依赖其他人的帮助，尤其是外交官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Johan Adler Salvius，1590—1652），他是多年居住在汉堡的瑞典人，由于这种缘故，他被接纳进国家政务会。女王甚至吸引法国哲学家雷内·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到斯德哥尔摩做她的导师，尽管此后不久他就因为肺炎死在那里。后来女王坚持认为，正是笛卡尔促使她接受了天主教。而天主教是被瑞典法律所禁止的，她的这种行为令路德教和国家如此的不快，以致她被迫退位，由她的表兄弟卡尔十世继承王位。

克里斯蒂娜的统治虽然是短暂的，但却实现了许多政府方面的改革，尤其是在贵族等级的构成方面，贵族数量也大大增加。在她统治的初期，较高级的贵族仅由 13 个伯爵和男爵家族构成，而到她统治结束时，较高级的贵族已经包括 18 个伯爵家族和 50 个新男爵家族。他们的特权也被扩大，包括任命省总督和建立新城镇的权力。她的改革也涉及较低级贵族，其数量增加的程度甚至更大，它的成员数量翻倍，从 300 个增至 600 个。不过，这些举措抑制了第三等级力量的加强，使其在成员数量上相比其他等级处于不利地位。贵族院官邸于 1642 年到 16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建造，它是由法国父子建筑师西蒙·德·拉·瓦利（Simon de la Vallée，1590—1642）和让·德·拉·瓦利在德国人威廉（H. Wilhelm）、荷兰人芬伯翁（J. Vingboons）和瑞典人埃德尔斯瓦尔德（A. V. Edelsvärd）的帮助下建造的。它在首都的中心位

置上，一直是作为贵族权力机构的所在地，维护着贵族等级的巨大权益。直到 1866 年——那一年等级制度被废除，它随之变成国家议会所在地。它一直是该国巴洛克建筑风格极盛时期最辉煌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尽管瑞典通过三十年战争在国际上获得巨大成功，但克里斯蒂娜却受到国内一些严重问题的困扰。1650 年，当她的表兄弟卡尔十世被选中作为她的继承人时，饥荒席卷了这个国家，这既是农业歉收、也是家畜流行病暴发的结果。外部压力也给瑞典造成损失。1654 年，为了争夺对不来梅的控制权，第一次不来梅战争爆发。不来梅以前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后来作为三十年战争的结果被强制划归瑞典统治。丹麦在得到荷兰不断增强的支持下重新成为瑞典的威胁，因为荷兰希望阻止瑞典海军力量的迅速增加。瑞典国王卡尔十世与荷尔斯泰因—戈托普（Holstein-Gottorp）公爵弗雷德里克的女儿海德薇格·埃莱奥诺拉（Hedvig Eleonora）的婚姻使丹麦感到南方更不安全，因而进一步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86

前女王克里斯蒂娜由于转信天主教被正式驱逐。她首先去了布鲁塞尔（Brussels），在那里她被天主教会正式接纳，接着第二年她去了罗马。出国时她携带了许多王室财宝，其中很大数量被出售来填补她的开销。当她抵达教皇席位所在地时，教皇亚历山大七世（Alexander VII）用盛大的仪式欢迎她。她居住在隆加拉（Lungara）的里亚里奥宫（Palazzo Riario），那是于 15 世纪建造的。她一直生活在这座城市，直到 1689 年去世，其间只是偶尔作非正式的私人旅行回过瑞典。尽管她的宗教声誉在瑞典很快被败坏，那是由一系列的政治阴谋和私通丑闻造成的；但她为反对奥斯曼土耳其人（Ottoman Turks）进行的巴尔干（Balkan）战争做出的金钱资助，以及她对罗马犹太人的慷慨布施，都对她的声誉提供了补偿。她在死于丹毒症后，被埋葬于梵蒂冈（Vantican）的圣彼得大教堂（St Peter's Basilica）。在那里，教皇英诺森十二世（Innocent XII）委任艺术家休顿（G. Theudon）和奥塔尼（L. Ottani）建造了一个由铜和大理石制成的纪念碑来纪念她。纪念

碑于1702年建造完成，它以一个寓言来表现克里斯蒂娜女王的美德，即她为了真正的宗教信仰而放弃王位。

十五、瑞典作为强国的迅速衰落

尽管瑞典在17世纪第二个25年取得了军事上的成功，但很明显，
87
这个国家在经济上仍然不发达。它作为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在迅速衰落。在17世纪50年代，瑞典在西非海岸角（Cape Corso）建立的殖民地，很快就被荷兰人夺取。接着，在年轻的卡尔十一世（Karl XI，1655—1697）摄政时期，瑞典又卷入第二次不来梅战争，促使其开始衰落。1674年另一场战争接踵而至，交战一方是瑞典，另一方是丹麦和勃兰登堡—普鲁士，这场战争给瑞典造成更为不幸的后果。1675年，费尔贝林战役（the Battle of Fehrbellin）在瑞典和勃兰登堡之间展开，瑞典被它的前法国盟友抛弃，处于孤立状态，战役以瑞典的失败告终。使事态更糟的是，丹麦人在克里斯蒂安五世的领导下，于1676年经赫尔辛堡入侵斯堪尼亚，而这次入侵得到了挪威总督乌尔里克—弗雷德里克·格尔登拉弗（Ulrik-Frederik Gyldenløve）的支持，他们从北方威胁到哥德堡。在哈尔姆斯塔德战役（the Battle of Halmstad）中，入侵者虽被击退，但同年在厄兰岛进行的几次战役和第二年在克厄湾（Køge Bay）进行的战役使瑞典对波罗的海的实际控制权霎时间终结。丹麦人和荷兰人成为这片海域毫无争议的联合主人。在这些战役之间的冬季短暂休战期，卡尔十一世聚集了来自瑞典全国的充足军队将入侵者击退，同时镇压了支持丹麦的当地人。然而，当战争最终于1679年结束时，瑞典虽能够享有比一代人更长时间的和平，但它以前的大国地位却不幸受到削弱。此后，在卡尔十一世的统治下，瑞典主要采取了军事防御而不是积极进攻态势。

但不管怎样，瑞典本土边界目前是有保障的，所以卡尔国王能够着手去巩固他的专制地位；而且国家政务会被降格为一种从属的角色，使他能够全权处理国内的问题。例如，1681年在斯堪尼亚，他确保瑞典的法律在这里实施，并使瑞典语成为学校和教会的法定用语。他下

令批准王太后海德薇格·埃莱奥诺拉（1636—1715）建造德洛特宁宫（Drottningholm，也被称为皇后岛宫），这表现出瑞典试图仿效凡尔赛宫（Versailles）在斯德哥尔摩郊外建行宫的抱负，他对一个以前就存在、但是较为简陋的建筑物进行了重建，那里最初是由约翰三世国王为他的王后凯瑟琳·雅盖隆卡建造的。那时大尼克德谟斯·泰辛是卡尔十一世的宫廷建筑师，被任命负责这项工程，从1662年动工，一直到1686年才完工，在这项工程上他取得的成功直到今天仍令人啧啧称奇：它是北欧国家曾建造过的最大的行宫，是瑞典巴洛克风格的集大成者，它的建筑成就一直受到称颂。

88

一种新的政治和军事解决方案要求建立新的联盟关系——与荷兰和英国这些强势国家建立联盟，这些联盟关系有助于强化瑞典作为海上强国的地位。不过，它与法国的旧联盟则逐渐走向终结。特别是卡尔十一世努力消除瑞典在财政和政治上对法国的依赖，使旧的联盟的作用大大减小后就更是如此。维系这种独立性要求对瑞典的财政做出一次重大的改组，导致对所谓“减少免税土地数量”的政策的争议，该政策主张将大片土地归还王室，置于国王的直接控制之下，政策根据的是瑞典国会在1682年正式授予国王的权力。

十六、减少免税土地数量

减少免税土地数量成为迫切需要实施的政策，因为在多次代价高昂的战争以后，瑞典王室发现自身处于极端的经济困窘之中。于是，王室采取孤注一掷的举措，以确保流入王室金库的资金能够尽可能快地增多。因此，就在经济上快速、而且大幅度地引入了减少免税土地数量的政策。这种政策的执行结果是，到17世纪末，大约有80%转授给贵族的土地被归还给王室，既有以土地也有以税收的形式归还的；其中特别包括了男爵和伯爵所占有的全部土地。在这个过程中，卡尔十一世国王得到了他非常信任的朝臣——伯爵约翰·吉伦斯蒂纳（Count Johan Gyllenstierna）的大力支持。总之，这些政策被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以致王室每年至少获得了200万银达雷尔的收入，其中的

绝大部分，即130万来自波罗的海以外诸省。它剥夺了贵族一半的土地财产，由此而削弱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基础。

89 当存在了几世纪之久的国家政务会于1682年被废除时，贵族权力被进一步大大削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软弱无力的王室政务会。王权专制主义由此确立。这是与欧洲其他国家相似的政治潮流的反映，但它也有自己的特色，即它的实行更多地是依赖于社会各部分所达成的全国广泛一致的支持。7年后，卡尔十一世被授予进一步的特权，即在战争时期直接征税的权力。这就将王室的特权强化到这种程度：1693年国王最终宣布，根据瑞典国会的授权实施绝对君主制。无数的农庄被分配给士兵，作为他们参加战争的回报。而与此同时，富裕的自耕农被免于税收，作为他们“自愿”为军队提供马匹的回报。也有许多人选择避免使他们的儿子去当兵，而参加新的组织和上缴土地的部分收入就使这成为可能。

十七、旧皇宫楚克罗纳城堡被毁

卡尔十一世死于4年后的1697年，就好像是他的时代结束的谢幕一样，楚克罗纳皇宫（Tre Kronor，又被称为三皇冠）化为一片灰烬，而他的尸体正停放在那里供人瞻仰。这一象征性事件在政治上和建筑上为他的子嗣——14岁的卡尔十二世（Karl XII，1681—1718）建立具有他自己特点的统治铺平了道路，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障碍。首先，他将这一事变视为一个机会去修建一个更大规模的皇宫，新皇宫要配得上并真正代表他作为欧洲最伟大国王的显赫地位，这种地位是他梦寐以求，却又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在他的抱负中，建筑师小尼克德谟斯·泰辛（Nicodemus Tessin the Younger，1654—1728）的天赋为他所用，后者曾于1678—1680年在巴黎学习建筑，并于1681年子承父业担任卡尔十一世的宫廷建筑师。受一个典故的启迪，据说这个典故最初是由红衣主教黎塞留提出的，即如果法国国王是太阳王的话，那么瑞典国王就是北极星，泰辛将这一主题作为中心纳入他的王室建筑风格，他主持的许多建筑在装饰上都表现了这种象征意义。他还能够

借鉴他在巴黎积累的经验和形成的印象。他于1687年回到巴黎继续深造，那一年，他就凡尔赛宫几项新工程的设计竞标提交了自己的方案。90 尽管这些方案没有被选中，但它们却同其他设计师的方案一起在法国展出，其中有诸如贝尼尼（Bernini）、勒沃（Le Vaus）和佩罗（Perrault）等建筑设计大师，为这位年轻的瑞典设计师赢得了国际声誉。小泰辛因此成为瑞典最适合实现卡尔愿望的建筑设计师，他的愿望就是将斯德哥尔摩变为北方的巴黎。卡尔还设想建一所新的夏宫和一个巨型教堂，前者将使洛德特宁宫相形见绌，后者的规模与巴黎的荣军院（Les Invalides）相当，能够被用于搞大型的军事仪式。不过，这些设想就像他为瑞典制定的许多宏伟计划一样，由于缺乏资金支持而受阻。甚至连建造皇宫都因为资金缺乏而拖延。据说是有更紧迫的问题需要应对，国王将他对建筑项目的关注撇在一边而转向了军事问题。

十八、卡尔十二世

在卡尔十一世去世后，摄政统治很快于1697年4月建立，由皇太后海德薇格·埃莱奥诺拉和5位枢密顾问摄政。不过，它仅持续了6个月多一点，同年11月，卡尔十二世被宣布为国王，并于12月加冕。相比17世纪的其他君主，这次加冕快得惊人。之所以如此快地进行加冕，原因在于俄国对瑞典的政治和军事威胁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致使必须用所有可能的手段支撑瑞典领导人的权威。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卡尔十二世将面对丹麦、波兰—萨克森和俄国组成的恐怖联盟，它们联合在一个反对瑞典的条约之下。因此，卡尔十二世要像他父亲所做的那样寻求建立自己的联盟关系，1700年1月瑞典与英国和荷兰建立起联盟关系。

目前国王的主要努力方向是加强军队的力量。作为他努力的结果，一支有效的常备军很快建立了起来，以每年一次的演习形式作为训练。到1700年战争前夕，瑞典军队总数达到大约9万人，其中大多数是雇佣军，仅有36 000人是本土士兵。瑞典还能够得到它的盟国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支持，后者过去是丹麦的盟友，但在竞争对手建立的奥 91

登堡王朝（Oldenburg dynasty）统治下，它成为丹麦的死敌。瑞典还能够得到英国和荷兰的海上支持。虽然如此，瑞典的敌人丹麦、波兰—萨克森和俄国联合在一起时还是可怕的，尤其是当每个敌人都在不同的战线上向瑞典军队发动进攻时更是如此。

波兰—萨克森是第一个入侵瑞典领土的国家，它于1700年2月进攻里加。丹麦接着于3月进攻荷尔斯泰因—戈托普。作为报复，瑞典在英国和荷兰联合舰队的支援下入侵丹麦，不久就导致《特拉温莎和约》（the Traventhal Peace）的签订，结束了战争状态。

不过，那一年的8月，在有着西方宏大视野的君主彼得大帝的领导下，俄军首先在爱沙尼亚，接着于次月在印格利亚向瑞典军队发动进攻。卡尔十二世迅速从丹麦返回，并立即对俄国采取行动作为反击。在1700年11月20日进行的纳尔瓦战役（the Battle of Narva）中，瑞典给了俄军以沉重打击，迫使彼得大帝和他的军队撤退。尽管如此，他却未能巩固这一胜利，很快又于第二年转入对波兰人的战争，这是一场拖延很久的战争，一直延续到1707年。最初，他取得了成功，于1701年在库尔兰（Courland）的德维纳河（the Duena River）附近进行的一场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波兰人。接着，在1702年，他不仅占领了华沙（Warsaw），而且占领了克里索夫（Klissow）和克拉科夫（Krakow）。第二年，但泽和托伦（Thorn，波兰语为Torun）也被他占领。由于卡尔成功地将他的支持者斯坦尼斯拉夫（Stanislav）推举为国王，替代敌视瑞典的奥古斯都二世（Augustus II），瑞典在波兰的影响得到扩展。这些举措确保了波兰与俄国和丹麦的军事联盟被瓦解。

但瑞典在波兰的军事战斗以及未对俄国乘胜追击，却是失策的被证明是具有灾难性的，因为它使彼得大帝能够重组和加强其军队。很快沙皇就占领了涅瓦河（the Neva River）河口和瑞典设在那里的要塞尼恩（Nyen）；沙皇没有浪费时间，他于1703年建立了新城圣彼得堡（St Petersburg），并使该城成为俄国的新首都。他还于第二年11月重新夺回了位于爱沙尼亚边境地区的纳尔瓦。虽然此后瑞典占领了利沃夫（Lvov），它的军队又在莱文豪普特（Lewenhaupt）的领导下于

1705 年夺取了库尔兰的盖莫特尔霍夫（Gemäuterhof），但这一切都很难说是对俄国对瑞典造成损失的重大补偿。 92

同年，瑞典与波兰签署了一个短期和约；哥萨克人（Cossacks）的酋长马泽帕（Mazepa）与卡尔十二世进行了一系列谈判，希望能够实现他自身反对彼得大帝的政治抱负（后来由于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的同名歌剧而永垂不朽）。1706 年，瑞典和波兰—萨克森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奥古斯都在那里重新登上王位。这次，瑞典人在弗劳施塔特战役（the Battle of Fraustadt）中获得胜利，使卡尔十二世国王能够在那一年稍晚时候再次入侵萨克森，并通过《阿尔特兰施泰特条约》（*the Treaty of Altranstädt*）又一次使奥古斯都二世退位。不过，俄国仍然是主要的威胁，因此，瑞典国王决定正面与它对抗来解决问题。

卡尔十二世率领超过 56 000 人的军队于 1708 年夏侵入俄国，他们的目的地是莫斯科。俄国人不断后撤，但在撤退前实行一种焦土政策，破坏所有可能有益于侵略者的庄稼和其他资源，而接下来的冬季则是一个罕见的冷冬：当其他侵略者入侵俄国时，这种野蛮的策略在历史进程中被一再使用，这迫使瑞典人选择了一个更靠南方的行进路线。此时，彼得大帝已经成功地镇压了马泽帕的叛乱，消灭了卡尔十二世的主要盟友。波尔塔瓦是一座俯瞰第聂伯河（the River of Dnepr）的重要城市，在乌克兰的中心地带。1709 年暮春，当瑞典军队抵达波尔塔瓦（Poltava）郊外时，情势变得很凶险，因为到 4 月对这座城市实施包围后，卡尔很快发现同自己对峙的是彼得大帝率领的 4 万俄军。最后的决战于 1709 年 6 月 28 日打响：国王本人受伤，卡尔·古斯塔夫·瑞恩斯基尔德（Carl Gustaf Rehnskiöld，1651—1722）和亚当·路德维希·莱文豪普特（Adam Ludvig Lewenhaupt，1659—1719）指挥下的瑞典军队被彻底击败。卡尔本人仓皇逃到奥斯曼帝国，仅有 4 000名瑞典士兵伴其左右，他在那里的宾杰尔安下营寨，后者紧邻着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在今天的摩尔多瓦境内。而瑞恩斯基尔德和莱文豪普特都被俄国人俘虏并监禁。

与此同时，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南部沿岸地区，卡尔的出逃留下一
93 个权力真空，他的敌人很快就加以填补。奥古斯都重新获得了他的波兰王位。丹麦于1710年进攻斯堪尼亚，试图收复它以前的这个省，并夺取瑞典在波美拉尼亚的海外领土。前一企图受到卡尔能力出众的司令官马格努斯·斯滕柏克（Magnus Stenbock，1664—1717）的有效抵制，他于那年2月进行的赫尔辛堡战役中击败了丹麦人；但俄国人占领了里加和塔林。尽管2年后，斯滕柏克在德国北部与丹麦人的作战中再次取得胜利，保住了瑞典在该地区的领土；但1713年5月，在托宁根（the Battle of Tönningen）战役中他被丹麦人俘虏，并被监禁直到1717年他去世。瑞典由此失去了一位最有能力的军事指挥官。

俄国也利用瑞典国王不在位的时机进攻芬兰，很快就在斯托尔基罗战役（the Battle of Storkyro）后占领了这个地区，迫使芬兰将军阿姆菲尔特（Armfelt）逃到瑞典。作为应对不利形势的一种谋略，在宾杰尔营帐中的卡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苏丹政府的高层政治中，利用他掌握的各种手段促使奥斯曼人进攻俄国。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但总体效果却对瑞典人的战争努力没有多大帮助。卡尔在瑞典继续招募军队以重新夺回芬兰的努力，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并且，他在奥斯曼政治中实施的阴谋为他树立了许多政敌，他们有着不同的政治和军事谋划。结果，一场针对他的所谓卡拉巴里肯（Kalabaliken）骚乱爆发了，在骚乱中他逃到附近的德谟提卡（Demotika），才勉强逃生。

卡尔一直在等待合适和安全的时机重返瑞典，他最终离开奥斯曼帝国，而于1714年11月经由陆路抵达瑞典的殖民地波美拉尼亚的城市斯特拉尔松，然后又花了一年时间，才最终于1715年12月踏上瑞典领土斯堪尼亚的土地。他又立即着手进行各种军事冒险活动。第二年，在极端需要资金来恢复他的军事行动时，他获得德国外交和行政官员乔治·海因里希·冯·戈尔茨（Georg Heinrich von Görtz）的支持。为达目的，戈尔茨被允许重组瑞典的财政，这是通过执行强制借款和货币贬值政策实施的，但这两种政策导致国内的巨大不满。至于
94 国王，他根本未回斯德哥尔摩。1717年，他率领22 000人对丹麦统治

下的挪威发动进攻。这是他遭受的最后一次不幸。在夺取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现在的奥斯陆）附近的阿克什胡斯（Akershus）要塞时遭到失败；在接下来争夺弗雷德克里克斯滕要塞（Fredkriksten's Fortress）的战役中，于1718年11月30日在弗雷德里克沙德（Fredrikshald）被自己部队的一位士兵射伤。这是偶然的还是故意所为，至今仍不清楚。他随即死去。随着他的去世，瑞典在欧洲重新获得它超级大国地位的希望也永远破灭了。尽管瑞典是如此艰辛地打赢了三十年战争，却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来长期支持它的争霸行动，即使这种重新确立霸权的愿望持续残存了几乎一个世纪。

十九、卫生与健康

如果说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对瑞典的军事方面而言是灾难性的时期，那么，卫生与健康方面也是如此。17世纪的最后10年是人口数量急剧下降的灾难时期，因为这一时期恶劣的气候条件导致大范围的饥荒和破坏性疫病的发生。其中尤其具有破坏性的是1695年爆发的严重饥荒，它是由瑞典中心地区的作物歉收引发的。17世纪90年代末，芬兰的情况也大致如此，饥荒和疫病夺去了该地区大约1/3人口的生命。气候变化起了主要作用。现代研究揭示，那一年北极浮冰增加，伴随着夏季海水较低的温度，驱使北大西洋上空的低气压进一步南下，这些状况导致夏季温度大大降低和主要农作物的歉收。然而，它还不是最为致命的，最严重的威胁是诸如斑疹伤寒等疫病，那些营养不良的人最易罹患，导致大批人口死亡。死亡在老少身上同等发生，在乡下觅食的人群将疫病从一个村庄带到另一个村庄。

随后的情况更糟，从1710年到1712年间，瘟疫肆虐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和赫尔辛基受灾最重，1/3的人口死亡。还好的是，此后疫病的威胁有了明显的减轻，虽然更好地执行严格的隔离防疫制度可能起了作用，但其原因尚未能充分了解。不管怎样，瑞典领土此后再未受到那种疫病的袭扰。

不过，天花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祸害。克里斯蒂娜女王本人就受到

过这种疾病的痛苦折磨，富人和穷人得这种病的机率是一样的。另一种在17世纪袭扰瑞典但严重性有所降低的古老疫病是麻疯病。它在瑞典南部和中部的破坏性明显下降，但在海尔辛兰（Hälsingland）和芬兰地区破坏性仍旧很强。对其患者的治疗在不断改善，能够为患者提供适宜的食宿条件，当然这是根据那时的标准而言的。在中部恩雪平的麻疯病医院是瑞典治疗此类疫病的最大医院，一般能接纳大约20名病人接受治疗。随着罹患此类疾病的人数的进一步下降，这里和许多其他麻疯病医院被用于禁闭精神病患者。

同样是这一时期，第一所与各种工业疾病相联系的医院开张营业：1695年，一所医院在达勒卡利亚的法伦矿区建立，专门救治那些在铜矿开采中受伤的人，可以同时收治16名矿工。

二十、孤儿院

在17世纪早期，政府加强了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对那些以前由天主教会支持的慈善机构做出补偿，那些慈善机构曾受到宗教改革的破坏。像这一时期瑞典的许多其他方面一样，社会福利被越来越多地纳入政府负责的范围。1638年，一个收留儿童的孤儿院在斯德哥尔摩的北城（Normalm）建立，美中不足的是紧挨着收容成年人的感化院（the House of Correction）。它能够为大约150名儿童提供食宿，但在合法与非法被收容者之间做出了明显的区分：合法的被收容者将接受各种技能培训，而后者则接受做家务或类似卑下工作的培训。每月洗两次澡，接受两次宗教教育——由当地的教区牧师提供。

就穷人而言，提供给他们的福利质量与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声望密切相关，他们都失去了供养自己的经济能力。例如，潦倒的贵妇人和她们的亲戚将根据特定标准得到饮食和服务，由富裕的私人捐赠者提供资金。一个这样的机构是女王院（the Queen's House），它俯瞰着斯德哥尔摩圣约翰尼斯大教堂，是由马提亚斯·斯皮勒（Mathias Spihler）于1689年建立，专门为官员、牧师和贵族的遗孀和女儿提供食宿。类似的，在斯德哥尔摩，穷困的老年贵族由他们专门的机构

“老年贵族之家”（the Home for Old Gentlemen）提供住宿。

二十一、犯罪

在17世纪，地方法官的权力不仅由贵族土地所有者行使，而且在1671年新法律颁布后，也由自耕农行使，即在他们的大家族中行使。这有助于使瑞典法律贯彻到基层，使它更为有效。对仆佣和雇工的惩罚包括罚款、鞭笞和监禁，监禁期间只供应粗劣的饮食，监禁时间可以长达一个月之久。不过在实行4年之后，除了贵族等级外所有其他等级都对此不满，所以该项法律被废除。但这种做法却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流放到殖民地也是一种惩罚，尤其是特拉华，当然那是在瑞典对它拥有统治权的短暂时期内。相反的情况也曾发生过，例如，一个瑞典炮兵斯文·瓦斯被指控在那里的新哥德堡居民区纵火，他在当地接受短暂审讯后被遣返回瑞典接受审判。

那时的瑞典像现在一样，大多数犯罪行为都是由男性干的，尤其是打架斗殴，经常是在酗酒的情况下犯罪。由酒精驱使的暴力犯罪在樵夫和锯木行业尤为频发。年轻人间的帮派斗殴也很常见，尤其是在哈兰省沿岸的渔村更是如此。据说，在那里，年轻的帮派成员受到年龄大的成员的唆使。街头斗殴并不罕见，尤其是在最大的城市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更是如此。在拉普兰，一般是与集市和市场的争夺有关。相反，像入室盗窃和偷盗等针对财物的犯罪却不多见（直到20世纪中期仍是如此），对被判此罪的人的惩罚是长年劳役拘禁。走私烈酒和高税收产品是常见的，尽管处罚很重——绞死，但还是有许多人冒这个风险，因为它的回报很高。最严重的犯罪会被判死刑，断头台直到19世纪在各地都是常见的。罪行较轻的罪犯会被判监禁。

97

在瑞典有许多小型监狱，而西海岸马斯特兰德（Marstrand）附近的卡尔斯滕堡（Karlsten Fortress）一直是瑞典最臭名昭著的监狱之一。在那里，多达20人被关押在同一间石砌的拱状房屋中，墙有大约4公尺厚，犯人在白天要干数小时各种卑贱的工作。

流浪者和小偷会被判较轻的罪。在斯德哥尔摩，他们会被送感化

院进行短期改造，在那里的锻冶场劳动。附近是所谓的国家罗斯室（Rose Chamber），专门关押严重的政治犯，有时甚至会动用酷刑，它被一直使用到1850年。一个这种罪犯是芬兰牧师拉尔斯·乌尔斯塔吉斯（Lars Ulstadius），他被关押在那里40多年，因为他的激进的虔信派宗教信仰影响到政治领域。

至于鸡奸罪即同性恋和兽奸，在1608年颁布的国家法典增加的附加条款中被严厉谴责，并且处罚也是严厉的，但因此罪被捕的人很少，被起诉的就更少。

二十二、巫术

像欧洲其他地方一样，长期以来巫术的存在被瑞典人视为对公众福祉的真正威胁，而且更被认为削弱了国家。在奥劳斯·马格努斯（Olaus Magnus）写于1555年的《北欧人民史》(*History of the Nordic People* ）中附有一幅插图，描绘一名被恶魔夺取性命的妇女，以此作为一种直观告诫。不过，在1668年到1675年之间，一系列针对巫师的重大法律诉讼在瑞典发生，这些审判后来变得声名狼藉。诉讼主要是基于对他们与魔鬼所订的契约的指控。拉普兰被许多瑞典人视为巫术的滋生地，那里许多巫师敌视基督教，一位巫师由于攻击一个路德教牧师而被烧死在火刑柱上，后者还没收了他作法用的鼓。绝大多数审判是在瑞典的中心地区，即在达勒卡利亚和斯德哥尔摩进行的。这些审判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所谓的布拉库拉（Blåkulla）审判，它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瑞典东南沿海的一个离岸小岛，在1668—1675年，有大约856人受到审判，其中包括许多儿童。最终，有300多人（大多数是妇女）被处死，但也有一些男人被处死。他们大多数人是由于儿童的告发而被判罪的，儿童指控这些人要将他们献给魔鬼做仆佣。芬兰也进行了这种审判。在东波的尼亚地区（Ostrobothnia），152人被指控，其中28人被处死。不过，在17世纪临近结束时出现了一个间歇期，一方面是人们由于越来越意识到私人恩怨和私利在指控中所起的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瑞典科学家的努力，像内科医生和矿物学家厄

98

尔本·海尔尼（Urban Hiärne，1641—1724）等。另外，它也是由有关善与恶的宗教观念的深刻变化促成的，这是由路德教派中一种新的宗教关注造成的。该教派在17世纪对《旧约全书》进行了严厉批评，批评它所描绘的高度苛求的上帝形象；同时在政治领域树立适合像瑞典这样的国家的榜样形象，瑞典在这个时期是处于极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的统治下，并处于军事扩张的状态。

二十三、拉普兰

瑞典一直在尝试用军事手段向南和向东扩张；同时，以和平方式的扩张也发生在向北对拉普兰的吞并上，在很大程度上这是通过传教士而不是军队实现的。早在17世纪初，继瑞典宗教改革之后，卡尔九世就提倡将路德教传播到拉普兰。那里是瑞典、丹麦统治下的挪威以及俄国三国边境地区，它的归属的反复变化持续到18世纪。为实现对它的吞并，卡尔九世于1605年委任丹尼尔·约尔特（Daniel Hjort）去寻找合适的地方建立新的教堂。结果，新教堂在阿尔维斯克尔（Arvidsjaur）、约克摩克（Jokkomokk）、朱卡斯佳维（Jukkasjärvi）和恩农特基约（Enontekiö）被建立起来。建立这些教堂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宗教方面的，它被视为将拉普兰和萨米族人进一步整合进瑞典社会和国家的有用工具；同时，扩展了瑞典的北部边界。但是，《克奈勒德条约》迫使国王放弃所有对挪威属拉普兰的要求，仅满足于那些已经获得的属地。

如果说拉普兰在18世纪之交不再是军事争夺的对象，但它确实已成为文学和科学关注的对象。在那时，它由于巫教而臭名远扬，成为一个吸引人们关注的地方，它的异国情调开始发挥其野性和传奇的诱惑力，伟大的瑞典文学之父奥洛夫·鲁德贝克（Olof Rudbeck）在1701年出版的《图说北欧》（*Lapponia illustrata*）中收录了一首歌颂该地区的抒情诗。当一位古怪的瑞典骗子尼克劳斯·奥恩（Nicolaus Örn）于1706年出现在凡尔赛宫，声称他是拉普兰王时，对这个地区的广泛关注引发了一场国际狂热。但狂热很快就转化为严肃的理性探

索：在该世纪较晚时期，对这一地区的科学考察吸引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改变了生物学和植物学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植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到这里考察之后。

至于萨米族人，他们中的一些人通过一种被称为幼子继承制的继承形式聚敛了巨额财富，这种继承制度规定最年轻的儿子继承全部财产。这种制度与那时在瑞典其他地方占统治地位的长子继承制不一致。一位萨米族人是如此成功，以致他在 17 世纪晚期被任命为西波的尼亚（Västerbothnia）的总督。但更多的是那些遭受经济困苦的人，这特别是由对土地和其他资源不断加剧的争夺造成的，而后者又是由来自瑞典其他地方的移民不断增加引致的。在这些新移民中，许多人寻求从政府提供给新移民的税收减免政策中获益，用作促进农业发展的手段。结果，大农场开始从极北部的河流盆地向外扩展。这些农场彼此隔绝，一般都是由长方形的小木屋组成，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它们环绕一个中心庭院分布，几乎都没有窗户。这样，它们就特别适合该地区严寒的气候条件。这种气候条件一直限制着向这里的大规模移民，直到进入 19 世纪后才有所改变。然而，这些北方的移民区不管多么简陋，它们构成了一个广泛的、多方向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运动是要在漫长的 17 世纪在各个方向上巩固和扩大瑞典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霸权，它随着卡尔十二世的去世而结束。在他去世时，将瑞典视为一个重大的、能够持续存在的欧洲强国的想法已是一种幻想。



第五章　专制制度的衰落和自由时代的来临

一、北方大战的结束

卡尔十二世在对挪威的战役中突然死亡，对瑞典而言是灾难性的。101 它的直接后果就是瑞典发动的军事作战突遭失败，令它在军事、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脆弱性暴露无遗。西部的布胡斯地区遭到彼得·陶登斯乔尔德（Peder Tordenskjold）领导的挪威人的猛烈攻击，而专用于此战役的资金却在混乱中不翼而飞。俄国军队于1719年对瑞典基本未设防的东海岸的突然攻击使形势进一步恶化。塞德特里耶（Södertälje）被夷为平地；其他城市，远至极北地区的于默奥（Umeå）也破坏严重。在芬兰，许多男子作为战俘被押送到俄国，被强制招入俄国军队服役或做农奴干苦工。其中许多人逃跑到瑞典，在新的家园定居下来，永远不再回他们的故土。斯德哥尔摩在鲁特格尔·福斯（Rutger Fuchs，1682—1753）的领导下虽成功击退了俄军的进攻，但国家却无力长久对抗。结果，瑞典被迫接受非常苛刻的要求，特别是失去了它在三十年战争中获得的大部分德国领土，尤其是不来梅和费尔登（Verden）被割让给汉诺威（Hanover），尽管这换得了一些金钱上的补偿。沃林（Wollin）和乌泽多姆（Usedom）以及波美拉尼亚腹地的其

他几个地区被割让给普鲁士。仅有波美拉尼亚在佩内河西部的部分仍然归瑞典人所有。

102

还有其他金钱上的损失，像过去赢得的某些特权被取消，即过往松德海峡的船只免向丹麦海关缴税的特权。但更严重的是俄国根据1721年《尼斯塔德条约》（the Treaty of Nystad）对瑞典强加的要求，即不仅将印格利亚永久割让给俄国——它已经由俄国控制达一代人之久，而且将爱沙尼亚、利沃尼亚（Livonia）、卡累利阿和凯克斯霍尔姆（Kexholm）也割让给俄国。

二、新政治秩序

在新的秩序中，君主制的地位受到削弱。因此，当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Ulrika Eleonora，1688—1741）在她的兄长卡尔十二世死后于1719年接受摄政统治时，她被迫接受王权专制统治的终结以保住王位。由于这个原因，接下来的时期在瑞典传统上被称为“自由时代”，直到1772年。只是在这50多年过后，王权专制统治才再次被她的孙子古斯塔夫三世（Gustaf III，1749—1792）恢复。

在她继位1年后，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为了丈夫的利益而退位，她的丈夫、黑森的弗雷德里克伯爵（Count Fredrik of Hesse，1676—1751）作为弗雷德里克一世（Frederik I）统治了瑞典30多年。在这种新的解决方案中，瑞典国会，尤其是4个等级中较高的等级：贵族、教会和市民，获益最多。而农民等级经常被排除在最重要的决策之外，因为最重要的决策是由所谓的秘密委员会做出，它由50名贵族和各25名的牧师和市民组成。但国会在功能上越来越具有议会的性质。根据国会于1723年颁布的法令，法律制定权和征税权被授予国会，而不是由君主行使；国会每3年召开一次会议。瑞典于1734年颁布的新法典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相对于旧法典而言，它简化了诉讼程序。

三、“戴有沿帽者”与“戴无沿帽者”的对立

在这个新的时代，国务顾问阿维德·霍恩（Arvid Horn，1664—

1742）发挥了主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他担任首席大臣的职务时更是如此，首席大臣是国家官僚制度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作为一位温和的重商主义者，他热衷于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尤其是纺织品的生产。他同时努力使瑞典避免卷入国际军事冲突。不过，一些人认为，他的举措不够坚决。这是一些更激进的重商主义者，通常是年轻的军官、官员和商人，绰号“戴有沿帽者”（the Hats），他们在反对霍恩的过程中越来越好地组织在一起。而霍恩的那些年龄更大一些的贵族支持者，那时被称为“戴无沿帽者”（the Caps）。当前者成功地于1738—1739年间主导瑞典国会时，霍恩被迫从他的职位上退下来。卡尔·吉伦伯格（Carl Gyllenborg，1679—1746），一位“戴无沿帽者”的领袖走向前台，继任首席大臣。自此以后，一直到古斯塔夫三世于1772年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瑞典实际上实行的是一种议会制政府的政治体制。霍恩在军事方面是主张和平的鸽派，而吉伦伯格却明显是鹰派，他决心在条件有利的时候不惜任何代价重新夺回被俄国占领的那些领土。与俄国重新开战后，瑞典军队遭遇溃败，于1743年丢掉南卡累利阿。吉伦伯格退出政坛，接受一个完全没有压力的职位，职能包括大学的管理。

103

四、等级院

在演化至今的政府政治体制中，全部瑞典公民在政治上都可以由4个等级中的1个所代表。贵族等级在以前的多次战争中损伤大半，到目前为止，仅占总人口的5%。教会等级占9%，市民和农民等级占绝大多数。相对于欧洲许多其他国家而言，第一等级的流动性较大。贵族绝非是一个封闭的等级，一些最杰出的市民能够通过军队和国家官僚制的晋升最终加入其行列。

最大的政治权力被赋予王室和贵族，但教会等级也同样重要，它的影响力既渗透到城市也渗透到农村，既主导宗教事务也影响到世俗事务。它在等级院中的领袖一直是乌普萨拉的大主教，他也是瑞典的大主教，但他的权威仍然是有限的，从属于国家权威。

104

五、“戴有沿帽者”的统治

1741 年，得到民众支持的对俄战争再次爆发。预计会得到法国的援助，但这些援助被证明并非马上就能得到。资金不足，计划也不充分，由查尔斯·埃米尔·莱文豪普特（Charles Emil Lewenhaupt，1691—1743）将军领导、亨里克·马格努斯·冯·巴登布鲁克（Henrik Magnus von Buddenbrock，1685—1743 年）辅佐的瑞典军队被迅速击败。尽管有新的瑞典军队抵达那里，但维曼斯特兰德（Villmanstrand）仍于 8 月份落入俄国人之手。伊丽莎白女皇（the Empress Elisabeth）继承俄国王位提供了一个短暂的休战喘息机会，但当俄国试图再次夺取芬兰时，战争于来年春季重新爆发。瑞典军队的战斗力已迅速下降，于 1742 年 8 月投降，结果代价高昂：芬兰被完全割让给俄国。莱文豪普特和巴登布鲁克成为替罪羊，在经短暂审判后被处死。不过，长期的后果没有预期的那么严重，在接下来进行的谈判后，芬兰的大部分领土被归还给了瑞典。作为回报，没有子女的瑞典国王弗雷德里克一世同意认领阿道夫·弗雷德里克（Adolph Fredrik，1710—1771）作为他的子嗣继承王位，阿道夫是伊丽莎白女皇的亲戚，来自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王室。阿道夫的妻子洛维萨·乌尔里卡（Lovisa Ulrika，1720—1782）是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的妹妹。因为对这种王位继承的选择不满，大约 4 500 名来自达勒卡利亚地区的农民和士兵组织了一次尖锐的抗议，他们更倾向于一位丹麦竞争者及其配偶，当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不满。他们于 1743 年 6 月到达斯德哥尔摩抗议。这次抗议被称为伟大的“达勒卡利亚之舞”（Stora daldansen 或 Great Dalecarlian Dance），结果遭到军队的残酷镇压，领导人被处死或监禁。这引起丹麦人的愤怒。由于害怕受到来自西部丹麦的攻击，瑞典被迫要求它以前的敌人俄国派军队保护瑞典的海岸。战争被避免，但俄国在该地区的影响有了巨大增强，此时俄国表现出了“宽宏大量”。当 1743 年正式签署和平条约时，瑞典仅将南卡累利阿割让给了俄国。俄国在瑞典的军队也于第二年夏季撤出。

105

之后瑞典立即将注意力转向在它重新获得的芬兰领土上加强防御工事。为了保护那时仍是一个小渔村的赫尔辛基在未来免于俄国入侵，斯韦堡（Sverborg，以前在芬兰语中被称为瑞典堡［Viapori］，但今天叫芬兰堡［Suomenlinna］）要塞的修建工作在奥古斯丁·艾伦怀特（Augustin Ehrensvärd）指挥下于1747年开始，他也成为该要塞的第一任司令官。它最突出的一个特色是建于18世纪60年代的戈拉码头（Galär Dock），花费了大约67吨黄金。那时的要塞建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有不少于6 750人参与了修建。因为重新恢复的法国援助为它买单，瑞典政府省下了它的建设费用。这似乎预示着芬兰南部军事安全新时代的到来，一幅创作于1765年的名画就是为了纪念它，那是由瑞典著名艺术家埃利亚斯·马丁（Elias Martin，1739—1818）创作的。当然，芬兰西海岸地区也需要安全保障，那里的贸易受到鼓励，因此临波的尼亚湾的许多港口在这个时期也发展起来。

此时，卡尔·古斯塔夫·泰辛（Carl Gustaf Tessin，1695—1770）走向前台，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王室建筑设计师，而他是作为“戴有沿帽者”的重要领导人在政界而不是在建筑领域发展。不过，以他为中心的这个政治集团的力量由于俄国对瑞典国内政治事务不断增加的干预而受到削弱，这种干预破坏了他所领导的集团的声望和群众的支持度。它的政治竞争对手安德斯·约翰·冯·霍普金（Anders Johan von Höpkin，1712—1789）明确表达了这种不满，在1746—1747年度的瑞典国会上，他发布了一份“民族声明”（National Explanation），对泰辛提出批评，同时谴责俄国对瑞典政治事务的干涉。然而，“戴有沿帽者”继续主导着这场政治争论，与俄国和普鲁士的联系在继续加强。

不过，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和洛维萨·乌尔里卡对当前的政治状况也越来越不满，他们感到自己对国家的控制力在下降，于是开始组建他们自己的政治小团体。在这个过程中，“戴有沿帽者”于1749年强加给国王的要求遭到抵制，他们要求国王放弃对荷尔斯泰因—戈托普的任何要求。这导致1756年发生的一次为恢复王权的未遂政变，尽

管有王室支持但还是失败了，而且后果严重：非王室领袖被处死，国106王夫妇被完全隔离。“戴有沿帽者”继续大权在握，他们以这次未遂政变为借口打击他们的政敌，使他们屈服。

六、波美拉尼亚战争及其后果

此时法国也开始更明显地介入波罗的海地区的事务。1757 年，反对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战争爆发。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与法国结盟的结果，瑞典此时参与了于前一年开始的七年战争（the Seven Years War）。瑞典一直希望收复它在德国的领土，而这与法国的扩张计划相吻合。不过，这次法国的援助仍然没有及时到位，瑞典军队无法与弗雷德里克大帝的军队相匹敌。因此，当 1762 年战争以在汉堡签署的一个条约结束时，德国的领土现状仍然保持不变。虽然如此，瑞典国内的政治情势此时却发生了明显变化，伴随着经济不景气和通货膨胀的不断加剧，“戴有沿帽者”明显处于守势。结果，在 1765—1766 年的瑞典国会中，“戴无沿帽者”再次占据上峰。

他们此时开始逐渐疏远法国，同时不仅与俄国，而且也与英国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国家的财政沿着反重商主义的原则进行重组，这是由像安德斯·巴奇曼松·诺登克兰茨（Anders Bachmanson Nordencrantz，1697—1772）和安德斯·屈德纽斯（Anders Chydenius，1729—1803）等有经济头脑的贵族提出的。通过裁撤许多职位削减政府支出，对奢侈品的进口、生产和消费进行严格限制，尤其是咖啡、巧克力、葡萄酒和高档纺织品等奢侈品。海军力量得到加强，1763 年瑞典第一座干船坞在卡尔斯克鲁纳港建成。大部分新银行贷款被禁止，债务被收回。结果导致经济紧缩。在政治上鼓励更加开放，由全部 4 个等级代表都参加的大会越来越多地替代秘密委员会的政治活动，正如上面曾提到的，农民等级以前是被排除在外的。1766 年，当政治审查制度被废除时，瑞典已能够自夸与英国一道成为欧洲最自由、非专制的国家之一。但它的代价高昂，随之发生了政治上的混乱。

七、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威胁退位——“戴有沿帽者”重新回归权力中心

瑞典经济此时处于一种贫穷和停滞状态，人口的大部分都不满现状。当国王以退位相威胁，坚持要废除瑞典国会时，他得到“戴有沿帽者”的支持。他们害怕“戴无沿帽者”会对他们提起诉讼，想借助国王的力量加强他们的特权，由此他们重新回归权力中心。不过，他们无力让国王重新获得过去的那些王室特权，而这是他们承诺要给予他的；他们同样也不能满足那些处于上升势头的专业官僚阶层的要求，后者不满贵族所享有的特权，要求获得更大权力。结果，反革命随之发生。 107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于1771年2月的去世创造了一种有利条件，使他的儿子古斯塔夫三世有可能发起一场政变，这是他在游历各地的归途中酝酿的。他中途曾在普鲁士停留拜访他的叔叔弗雷德里克大帝，并就瑞典的政治未来进行讨论后，于第二年5月到达斯德哥尔摩。他认识到，由于得到俄国的援助，“戴无沿帽者”在他父亲死后召开的瑞典国会中重新取得支配地位。但普遍的不满阻止了他们继续巩固其地位，并由于作物的歉收使这种不满加剧。古斯塔夫利用了这种混乱状态，并得到法国的支持。1772年8月19日，国王和他的支持者发动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在王权专制主义统治消失了半个多世纪后又重新确立了它的地位。

八、经济生活

18世纪初的北欧大战被证明在经济方面对瑞典是灾难性的。因此，战争结束后，许多在卡尔十二世期间由冯·戈尔茨引入的改革被迅速抛弃。冯·戈尔茨本人也受到审判并被处死。货币大幅贬值。

移民引起的人口构成的变化也影响到经济，而且这种影响是持久性的。许多逃到瑞典的芬兰人最终在这里获得他们自己的家园，而且再未返回他们的故土。因而他们抛弃的土地经常被其他人接管：或是 108

仍然留在那里的人，或是那些从俄国俘虏营中返回的人。这特别有利于那些留在该地区的芬兰贵族或自耕农的利益，也有助于王室的利益他们也获得了实质份额的被抛荒的土地。

采矿业仍然是该国主要的工业部门，因为此时铁制品是最为重要的出口产品，在18世纪早期的大部分时间，它占总出口额的约75%。1747年设立的铁制品生产办公室（Jernkontor）也非常重要，因为它可以有效地管理瑞典铁制品的价格。由此，铁取代了铜成为瑞典赢利最大的产品。到18世纪中期它已占全部出口总额的85%还多，而且其中的一半被出口到英国。但此后不久，英国本土铁制品工业的发展使瑞典的铁制品在那里变得多余。不过，俄国和地中海国家迅速补上了这一缺口，他们购买了瑞典的全部铁制品。在法国的波尔多，葡萄种植者尤其渴望进口他们盟国的金属产品，以便用铁箍将他们的葡萄酒桶箍牢。瑞典政府还鼓励开办一些以国际市场为目标的新经济部门。追随北欧其他国家的步伐，瑞典开辟了多条新的国际贸易路线，其中最新的和最赢利的是对华贸易。

九、瑞典的东印度公司

1731年，瑞典东印度公司（the Swedish India Company）成立，并于第二年经由印度将哥德堡和中国的广州联系在一起。它的总部大楼是由卡尔·哈利曼（Carl Hårleman，1700—1753）设计的，给人印象深刻。该公司也在斯德哥尔摩的新皇宫办公。

公司的远程贸易是由公众入股的方式提供资金支持的，尽管风险很高，但利润也非常丰厚。贸易不仅是将中国的茶叶和陶瓷输入到欧洲，而且还有调味品的输入，包括生姜、肉桂和亚力酒。而亚力酒在瑞典尤其受欢迎，它被用于生产宾治，这种饮料在今天乌普萨拉的学术圈中仍很流行。其他输入品有布、漆器和象牙。与此同时，瑞典也在努力寻找适合出口到中国的产品来抵消贸易逆差，这也有益于促进瑞典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努力大体是不成功的。因此，金钱流向东方是对瑞典经济的一种削弱，并且所得的酬报也只由少数个人和股东分

享。尽管名字是东印度公司，但实际对印贸易只是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这期间，该公司仅有 8 艘船以印度为最终目的地。并且，瑞典试图在印度东南沿海的波多诺伏（Porto Novo）地区建立一块殖民地的设想也告吹，因为该计划遭到英国和法国的一致反对，他们敌视任何可能出现的竞争者。

十、人口变化

1720 年时瑞典是一个人口稀疏的国家，不算 17 世纪从丹麦手中夺取的斯堪尼亚和其他城市，它的人口仅有 112 万人。而据说，瑞典人口在不断增长，其变化模式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口变化趋势吻合。尽管它不时遭受战争和疫病的突然袭扰，但到 1750 年，瑞典人口已增长到大约 180 万人。城市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斯德哥尔摩，它的人口那时已达到 85 000 人。而这种增长主要是通过来自农村地区的移民实现的，因为在卫生状况不佳的首都，死亡率是如此之高，以致它无法实现人口的自增长。瑞典的其他主要城市在规模上要小得多。哥德堡和卡尔斯克鲁纳各自的人口刚刚接近 1 万人，后者是瑞典主要的海军基地。芬兰最大的城市土尔库也相对较小，只有 9 000 名居民。但在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早期由饥荒和疫病造成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土尔库的人口数量增长迅速：从 1754 年到 1769 年，人口增加了 1/3 还多。在瑞典统治下，波美拉尼亚对人口增长的贡献也非常显著，相比瑞典的其他地方，它的人口要更稠密些。尽管它的面积相对要小，110 但它的城市化程度较高，所以它的人口在 18 世纪的第 2 个 25 年已超过 10 万人。

十一、卫生与健康

虽然人口在不断增长，但 18 世纪早期和中期的卫生和健康状况仍然不佳。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也很少，尤其是在农村地区；而在瑞典的北部地区，它们几乎不存在。正如林奈当时所描述的那样：在斯德哥尔摩北边不远的耶斯特里克兰（Gästrikland）的高尔伏（Gälve），

药店和常驻医生是北极以南地区最难找到的。

由于居住条件狭窄和不卫生，斯德哥尔摩和其他城市的人口预期寿命较低，但在农村地区，它却相当高。在首都，1 岁前的婴儿死亡率高达 25%。而在农村地区，7 个婴儿中有 6 个都能活过 1 岁。儿童年龄越大，死亡率就会相应地降低。在 18 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人口中有 60% 能活到 25 岁，而农村是 70%。在非婚生子女中，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死亡率都要更高些：几乎 1/3 的婴儿活不过 1 岁。这种高死亡率并非不受父母们欢迎，正如一位乌普萨拉的医师当时所指出的："绝大部分自耕农和农业雇工处于严重贫困状态，使得父母对孩子的死亡比对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更心存感激。"由于卫生状况不良非常普遍，而且人们缺乏对疾病传染的认识，所以许多婴幼儿成为流行疫病的牺牲品。其中百日咳尤为致命，1749 年到 1764 年间共夺去 4 万多名瑞典儿童的生命。这种情况又由于低劣的饮食而进一步加剧。据说，土豆作为一种主要食品于 18 世纪中期的引入是对农民的一种恩赐，它确实成为他们饮食的主要组成部分；并且，相比种植其他作物所付出的努力，种植土豆的辛苦程度要小些。此外，它能够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生长，而且相比谷物更可能抗过暑热。

十二、天花

111 18 世纪早期和中期在瑞典流行的急性疫病中，没有哪一种比天花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更大。作为一种严重毁人容貌的疫病，它定期袭扰瑞典。天花在拉普兰的破坏性尤其大，因为不像瑞典的其他地方，它以前很少袭扰这里，当地没有形成对这种疾病的抗拒能力。它从沿岸的城镇和居民点沿河而上，造成惨重损失，这种毁灭性的侵袭引起当地的极度恐慌。正如林奈于 18 世纪 30 年代造访那里时所注意到的，与瑞典其他地方人们所抱有的宿命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萨米族人在混乱中抛弃家人和财物逃到山上以避免被传染。1740 年在北方地区爆发的这种流行病非常严重，老年人患病比率要高于青年，而这与瑞典其他地方和整个欧洲的通常情况相反。

幸运的是，1756年开始采取对这种灾难性疫病的防御措施，实施针对这种疫病的疫苗接种，这至少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古斯塔夫三世和他的兄弟姐妹于1769年由普鲁士人戴维·舒尔茨·冯·舒尔岑海姆（David Schultz von Schultzenheim，1732—1823）为他们进行了疫苗接种，后者也由于为王室以及朝廷的许多官员和富裕的中产阶级提供这种服务而被授封为贵族。虽然如此，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天花导致的死亡一直占瑞典死亡总人口的1/4。在瑞典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它对儿童尤其致命，在疫病流行期间，儿童中由它所致的死亡占死亡人口1/4。至于在与世隔绝的北方地区，接种疫苗几乎还不为人所知。

即使在那些知道疫苗接种好处的地方，由于它存在的风险，经常使那些位居高位的人对是否接种感到犹豫。疫苗接种本身会导致在那些未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发生疫病，而且经常有一些人死于疫苗本身的感染或其他感染，诸如梅毒，它们通过不卫生的性行为传播。天花这种破坏严重的流行病在瑞典定期爆发，分别是1754年、1763年和1771年。对那些幸免的人而言，通常也会产生社会以及身体的不良后果。那些从疫病中恢复过来的患者通常会彼此成婚，因为患病过后一般会留下标志性的瘢痕，使他（她）们不可能对婚姻有过高的期望。 112

十三、医院治疗

到这一时期，麻疯病患者在瑞典急剧减少；但到18世纪早期，它仍然在芬兰作祟。为此，在土尔库岛的塞利（Seilli）建立了一个治疗麻疯病的医院，而且也像瑞典其他地方的情况一样，它最终被移交作精神病院。据说，那时还新建了几个特殊的医院来禁闭精神病患者。一个这样的例子是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丹维克精神病院（Danvik's Mental Asylum），它是由建筑设计师戈兰·约苏伊·阿德尔克兰茨（Göran Josua Adelcrantz，1668—1739）设计建造的，是当时瑞典最大的一座医疗机构建筑。根据这一时期最新的治疗原则，它的房屋都有大而宽的窗户以便于通风换气。在芬兰，坐落于皮耶萨尔塔里（Pietarsaari 或

Jakobstad）与科科拉（Kokkola 或 Gamla Kaleby）之间的克鲁努比医院（Kronoby Hospital）有麻疯病分院，它建于 17 世纪 70 年代，于 1743 年被移交作精神病院。几乎未受到“启蒙价值观”的影响，饱受痛苦折磨的病人被锁在单人小病室或囚室中，面积仅有 1.8 米乘 2.4 米大，有木栅栏隔开。患者还经常被用锁链锁着。在克鲁努比医院的其他分院，有病室治疗慢性病、失明和腿残疾。它还收容孤儿，他们就住在医院周围散布的小木屋中，耕作空置的土地为自己和其他病人提供食物。那些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此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给自足的小共同体，由此减少了社会和国家的财政负担。

荣军院也在这一时期建立起来，尤其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后，留下了如此多的伤兵需要治疗和照顾。建在瓦德泰纳的荣军院是这一时期收容伤残军人最重要的场所，它由一个旧的修道院改建，该修道院于 1595 年被废弃。这个荣军院一直发挥作用到 1783 年，由于病人数量不断增加和新的治疗制度的要求，曾进行过多次修整。它不仅为残疾军人提供住房，而且还为他们的家人和侍从提供住所。

113

这一时期建立的另一个重要医院是斯德哥尔摩的天使医院（the Seraphim Infirmary），它于 1752 年开业。它为 36 名城市贫民提供食宿，这些人无力照顾自己。对卫生与健康给予如此大的关注在当时确实是罕见的，它的地面铺着云杉或松柏枝以防止传染。维持它所需的资金最初来自博彩、烟草税和慈善捐助，但在 1783 年以后就由政府直接拨款。

十四、孤儿院与贫民院

解决孤儿和贫民问题所需的社会基础设施大部分是 17 世纪早期建的，到 18 世纪中期已处于过度使用状态。例如，在斯德哥尔摩北城的孤儿院，收容的人员到 1756 年已经翻番，达 300 多人。为了减轻这种拥挤现象和为儿童成长提供更宜于健康的城郊环境，就如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劝诫的那样，瑞典政府实施了改革，将孤儿们（不包括幼儿和患病儿童）寄养出去，并鼓励首都周围农村地区的父母收养，这同时减轻了看护他们的负担。

对首都出身低贱的穷人而言，一个新的设施于 1752 年建立，即萨巴特斯堡贫民院（the Sabbatsberg Poor House）。它收容了大约 300 名贫民，一直到 18 世纪 70 年代都是城市贫民的主要避难所。在瑞典的其他地方，到 1734 年这变成了一种通则，每个教区都为当地贫民或无家可归者提供一个避难场所。结果，到 18 世纪中期，有不少于 1 400 个贫民院散布于全国各地。它们发挥作用直到 20 世纪，有时由教区提供费用维持，有时由富裕的地主捐赠费用维持。它们收容的贫民绝大多数是妇女，因为人们设想贫穷的男子可以去农场当雇工维持生活。因此，富有的地主通常会有大约 20 多间适合的住房来收留这类男子，有时也包括他们的家人。

十五、建筑的发展

此时，许多在卡尔·古斯塔夫三世时期启动的宏伟建筑项目仍然未能完工，许多项目是进展缓慢的，这主要是受到瑞典财政困难、战争的突然袭扰和国家政治地位下降等因素的阻碍。而在这些项目中，最重要的是斯德哥尔摩的新皇宫的完工。该工程一度进展非常缓慢，尤其是在 1709 年以后；但在卡尔三世的继承人弗雷德里克一世的督促下，建设速度明显加快。为了使它早日完工，瑞典国会批准征收了一种特别税，使尽快完工成为可能。不幸的是，在第二年建筑设计师小尼克德谟斯·泰辛去世，因此工程被托付给他的儿子卡尔·古斯塔夫·泰辛，后者当时是一位朝臣，后来成为古斯塔夫三世国王的导师。实际建设的大部分监工和设计工作交由著名的瑞典建筑师哈利曼负责。作为一位狂热的法国文化爱好者，他用一种精致的洛可可（Rococo）式风格装饰它的内部，这种风格在当时的巴黎非常流行，为此目的还于 1732 年从法国引入了一些工人。9 年后，哈利曼负责整个工程，他很快成为瑞典最走红的建筑设计师，并于 1735 年设计了另一处在斯瓦斯特约（Svarstjö）的皇宫，还为一些富裕的贵族设计了他们的豪宅。结果，瑞典南部和中部的农村地区开始多了豪华住宅，它们能与同一时期英国和法国相应的房宅媲美。

114

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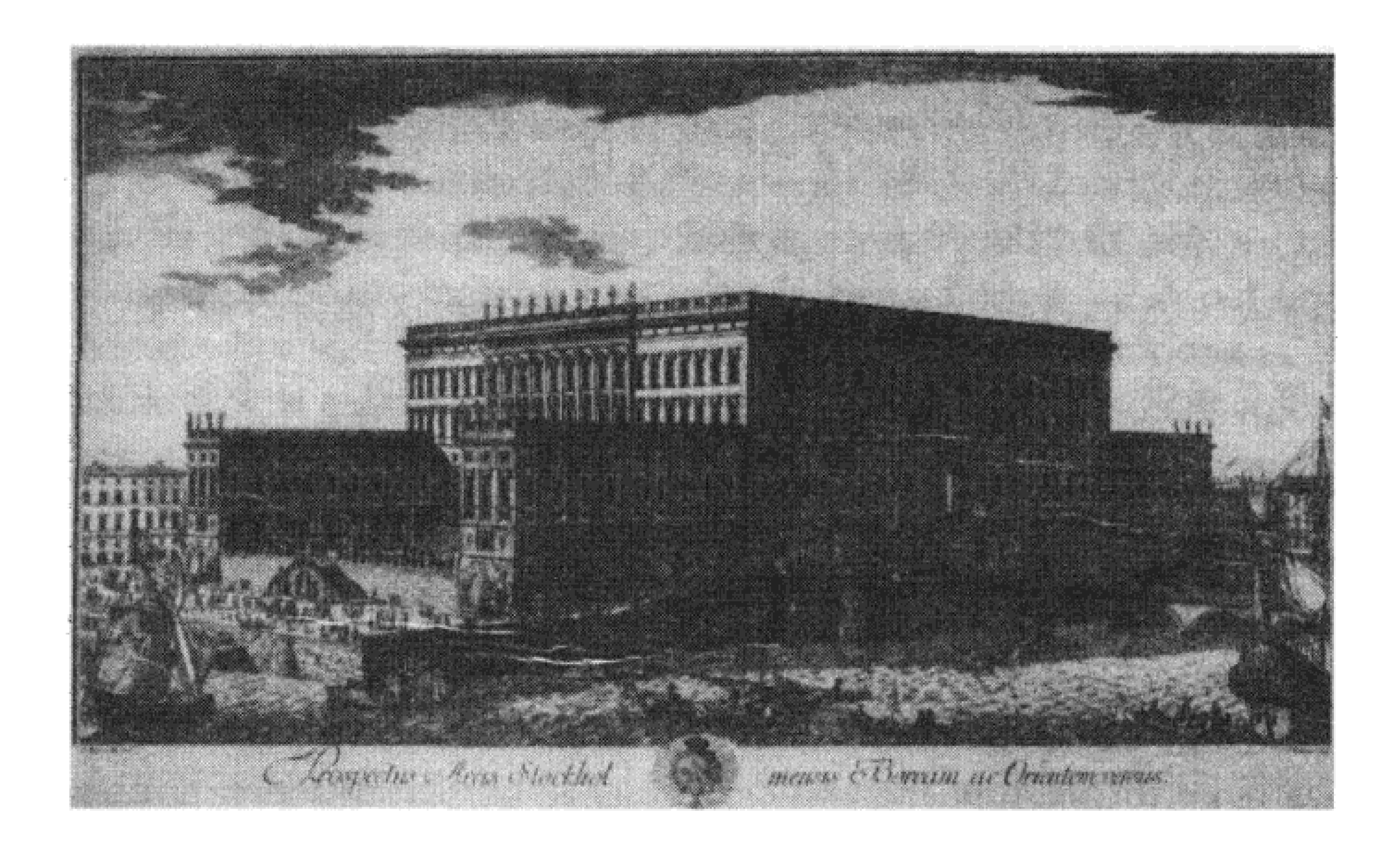


插图 6　18 世纪斯德哥尔摩王宫全景。让・埃里克・瑞恩（Jean Eric Rehn）绘制。斯德哥尔摩新王宫的建筑是由小尼克德谟斯・泰辛启动的。他在继承父亲宫廷建筑设计师的职位之前，曾在巴黎学习过几年。尽管只是到 18 世纪很晚的时候才完工，但这座位于斯德哥尔摩中心地带的王宫规模浩大、宏伟壮观，与那时瑞典王室的拮据和国民经济的整体状况极不相称。照片来源：斯德哥尔摩的国家博物馆（Nationalmuseum）。

在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和洛维萨・乌尔里卡统治期间，洛可可式风格在瑞典王室中兴盛起来，不仅在艺术方面，而且在建筑方面也成为政治权力的象征性标志。然而，对欧洲艺术产生最持久影响的还不是瑞典的宫廷，而是它的东印度公司，因为该公司使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1726—1796）能够到中国游历。威廉・钱伯斯是一位年轻的建筑设计师，父母是苏格兰人，但自己是土生土长的哥德堡人。在中国，他深受它的建筑艺术和园林设计的影响。他被瑞典国王封为爵士。在定居英国后，他在那里成为未来的国王乔治三世（George III）的建筑学导师。他通过那部伟大的著作《中国建筑的设计》（*Designs of Chinese Buildings* ）不断向整个西方世界传播他的思想，该著做出版于 1757 年，里面附有多幅插图。他为英王乔治三世的

第二个女儿、奥古斯塔（Augusta）公主设计的宝塔，成为他从中国输入的价值观的完美体现，宝塔坐落于伦敦附近的邱园（Kew Gardens）内。在瑞典，这些异域价值观主要是通过他对其他瑞典建筑设计师的影响来实现的，它们表现在德洛特宁宫的皇家公园（Royal Park of Drottningholm）、汉高（Haga）和一些乡间别墅上，尤其是斯德哥尔摩北部的福斯马克（Forsmark）。除了他引入的来自异域中国的一些元素外，还有一种新的和非正式的私密感也被纳入他的设计，并灌输给他的那些追随者。由此既保持了建筑的典雅，同时又带有一种洛可可式风格对时代的反讽。

不过，并非所有的人都欢迎这种对异域风格的吸纳。伟大的植物学家林奈虽然热衷于收集来自国外的标本和作物以扩大他的收藏，同时对瑞典农艺也很关心，但他却将对国外事物的兴趣以及现代时尚的浅薄视为对瑞典社会、工业和文化的破坏。瑞典教会的虔信派也反对 116 接受外部文化的影响，他们认为在审美和经济领域与中国的交流会引入一种浪费性的奢华生活方式，由此对瑞典的道德和精神价值观产生不良影响。此时这些道德问题也引起瑞典知识分子圈，尤其是政府的关注，因为虔信派价值观能够服务于一种有用的目标，即强化教会和国家的共同利益。在1766年之后，王室的公告也和宗教的劝诫一道在教堂的讲台上被定期宣讲，在全瑞典都是如此，由此教会就成为国家的传声筒。在诸如诺尔兰的海讷桑德（Härnosand）等北方新建的教区，教士尤其重要，他们是王室在这些政府管理很有限的地区进行统治的有力工具，当然是非官方的。据说作为结果，他们培植了一种相当大的地方自治性，尽管他们的开销穷奢极侈，消耗了大量地方资源。

虽然瑞典的内陆地区非常偏僻，而且人烟稀少，但瑞典教会派驻那里的牧师在心态上却绝非是偏执的，观察世界的视野也绝非是狭隘的。相反，许多教士都受过较高的教育，而且游历甚广。例如，来自哈兰的斯拉普斯（Släps）村的古斯塔夫·弗雷德里克·约特伯格（Gustaf Fredrik Hjortberg，1724—1776）就是斯德哥尔摩科学院（the Academy of Science）的成员，曾作为随舰牧师游历中国3次。然而，

有对世界的了解并受过良好的教育却并不必然有对其他宗教开放的胸襟。尽管他们受过启蒙价值观的熏陶，但宗教宽容在18世纪的瑞典仍然是一种陌生的观念。一位著名的朝臣尼尔斯·比尔科伯爵（Count Nils Bielke，1706—1765）在转信天主教后被迫流亡，他逃到了罗马。这也很难说是一种严重的惩罚，因为他在那里定居后被任命为罗马教廷的朝臣和罗马的议员，并发挥了促进教皇国和瑞典之间商贸往来的作用。他还成为一位不可或缺的导游，导引那些年轻的瑞典贵族游历意大利各地。他死后被埋葬在罗马的圣布丽吉塔大教堂（the Church of St Brigitta），在那里以及瑞典都受到尊重。

十六、18世纪60年代的德洛特宁宫

117 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由于受到1756年试图恢复王权专制统治的政变失败的影响，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国王和洛维萨·乌尔里卡王后在朝廷中受到限制，只能从事有限范围的政治活动。不过，这一对国王夫妻拒绝在生活的其他方面也受胁迫，他们以一种非常确定的方式从事高雅文化的传播和促进工作。

他们于18世纪60年代在德洛特宁宫着手进行了一些重大的建筑创新尝试。该宫殿是国王于1744年作为结婚礼物赐予王后的，但它最著名的建筑目前已经变成了中国宫（the Chinese Palace），由卡尔·弗雷德里克·阿德尔克兰茨（Carl Frederik Adelcrantz，1716—1796）设计，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洛可可式建筑艺术最耀眼的奇葩。同样著名的还有1766年在那里建造的宫廷剧院（the Court Theatre），在它的舞台上，古斯塔夫三世既作为王子又作为后来的国王演出了自己人生的乐章。事实上，这个剧院历史上的许多舞台装置直到今天仍然能够看到。德洛特宁宫在这个时期的瑞典有着极大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它在建筑和园林上的吸引力，而且由于聚集在这里的知识和文化精英所具有的活力，尤其是皇家历史与考古学院（the Royal Academy of History and Antiquities）的成员。该学院建于1753年，有诸如林奈等科学家。在像瑞典这样一个国度里，由于大多数的领土被分割出去，因

此只留下了两所传统的大学，政府也不可能一直有能力提供替代的选择。所以，正是这些学院越来越多地为瑞典最博学的名士交流思想提供学术场所，它们所起的作用在某些方面直到今天仍在继续。

十七、科学发展和拉普兰

毋庸置疑，林奈是瑞典最伟大的科学家，他对后世的影响是持久的，其思想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对生物科学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在18世纪上半期，当时流行的对拉普兰的兴趣将人们的关注集中在这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北端的地区，而林奈是最先到那里进行科学考察研究的人之一。在一次科学探险过程中，林奈于1732年游历了拉普兰，结果就导致了他那本著名的《拉普兰植物志》（*Flora Lapponica*）1732年的出版。该书附有丰富的插图，不仅详细说明了在拉普兰发现的各种植物的迷人外貌，而且对居住在那里的萨米人作了理想化的描述，将他们描绘为居住在荒野自然状态下的居民，尚未受文明的影响，过着一种游牧生活。

119

然而，萨米人现实的生活不同于林奈和其他访客所作的那种罗曼蒂克式的描述，尽管他们是依据经验观察来作描述的：一个家庭的一个或两个成员也许在专门从事驯鹿的放养工作，平均一群大约200只。这种营生被许多人想象为萨米人的主要工作，实际却不是这样。因为，那时在诸多平凡的定居活动中，许多萨米人首先从事的是捕鱼或农耕。据说，在瑞典所涉及的几个领土附属国于1757年给予萨米人自由跨越国界的权利后，放牧在范围上确实有显著扩展，特别是在暮春和初秋。驯鹿放养是一项季节性要求很强的工作，所以许多萨米族牧人在接近4月底时从瑞典和芬兰游牧远至挪威海岸，以进行捕鱼和狩猎。这为丹麦的海关官员提供了数量丰厚的税收，因此，后者欢迎他们的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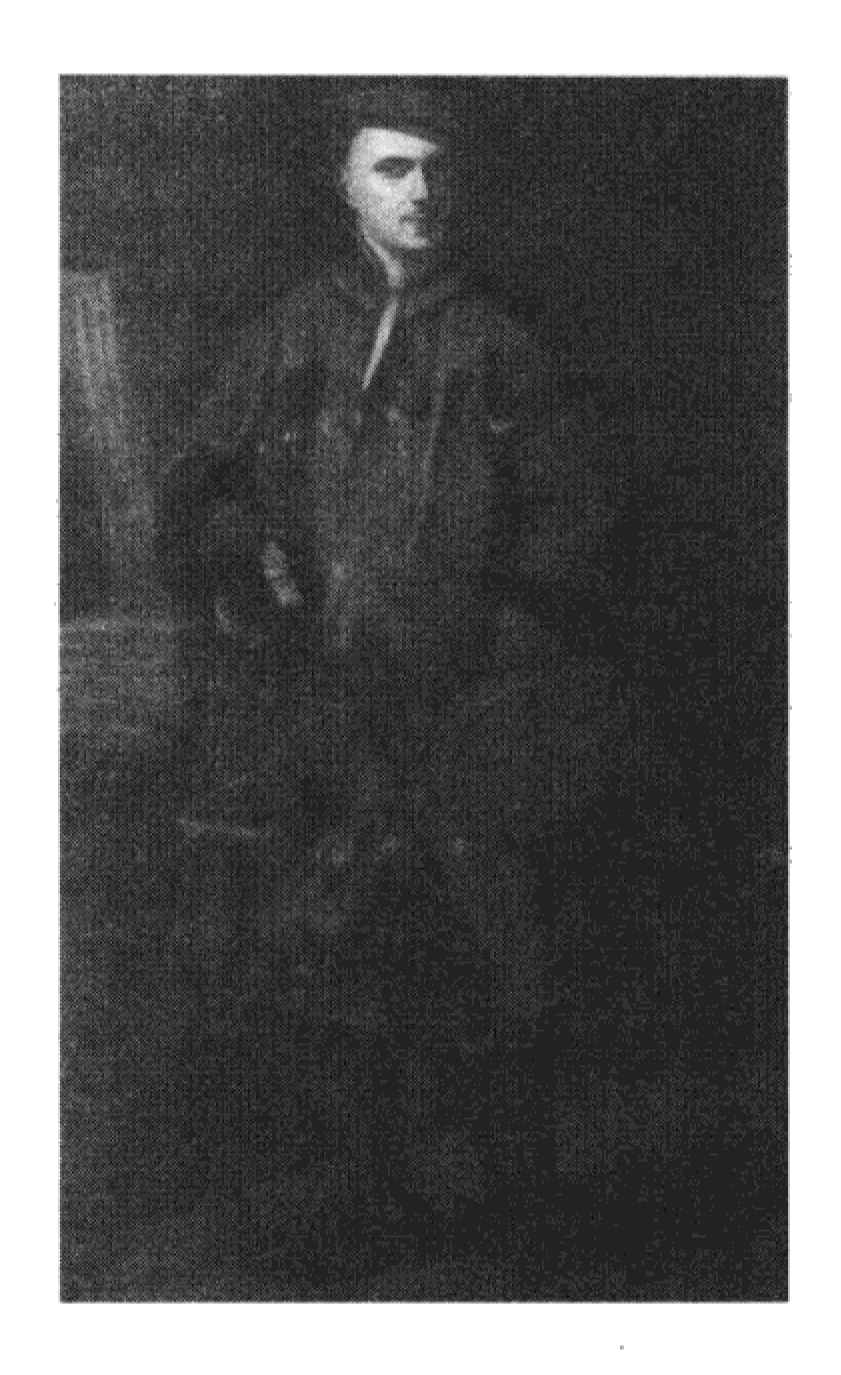


插图7　身着拉普兰人服装、手拿萨米（或拉普兰）鼓的卡尔·冯·林奈的肖像。马丁·霍夫曼（Martin Hoffman）创作的油画。卡尔·冯·林奈（1707—1778）是瑞典最著名的科学家，他对生物学术语命名——现在仍然是我们对各种生物物种进行区分的基础——的贡献，使他被称为生物学之父。他还是第一批对拉普兰进行科学探险的学者之一。拉普兰位于瑞典的极北部地区，是萨米人的家乡。林奈对他们具有极大的人类学研究兴趣。照片提供：索伦·霍尔格伦（Sören Hallgren）。油画收藏在乌普萨拉的林奈博物馆。

甚至在瑞典国内，萨米人也是在从事各种活动，而不仅仅是放牧驯鹿：制作和销售白兰地和其他烈酒，尽管非法但利润丰厚；设陷阱捕捉狐狸，以及制作各种用途的鹿皮和鹿角，也非常有利可图。这些物品在每年举行的萨米人大集上出售，其中最重要的集市在2月中旬在芬兰—瑞典—挪威三国交界的克拉山都（Karesuando）举行，持续

10 天。萨米族妇女编织的麻线、毛织品和麻织品也在这里销售，还有诸如滑雪板、雪橇、摇篮和其他家庭用具等。

1736—1737 年，皮埃尔—路易·莫罗·德·莫培督（Pierre-Louis Moreau de Maupertuis）追随林奈的足迹，在逗留拉普兰期间，沿子午线测量了 1°的长度，这对航海和土地测量都具有重大意义。其间，林奈继续以多部著作对植物学、生物学、甚至物理学的研究留下持久而深刻的印迹，这种影响远远超越拉普兰的地理范围。1741 年，林奈被任命为乌普萨拉大学的教授，他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包括《植物哲学》（*Philosophia botanica*，1751）和《植物种志》（*Species plantarum*，1753）。在这些书中他开始建立一套系统的命名法，对那时所知的许多类型的动物群和植物群进行分类。对它们的分类是根据对其性器官的外表观察做出的，按拉丁文字母顺序排列。这种“令人震惊”的分类方法使 18 世纪英国博物学家威廉·古德诺夫（William Goodenough）公开表达了对这个“令人厌恶”的瑞典名字的憎恶，认为“他的命名法是一种不道德的、低俗的挑逗，是他思想粗俗好色的表现”。但林奈所创建的体系继续成为现代植物学和生物学分析的基础。林奈绝非是一位“象牙塔”中的学者，他认识到一些诸如咖啡、甘蔗和生姜等有价值的商品可以增加经济利益，就设法对它们进行改良以使它们适应非常寒冷的气候，由此而能够在瑞典种植，当然他失败了。林奈为开启一个新的科学时代做出了贡献，不仅是在瑞典，而且在更广泛的世界中。1753 年，公历（the Gregorian Calendar）被引入瑞典，致使那一年的 2 月 17 日过后就是 3 月 1 日。尽管这与林奈完全无关，但回顾起来它似乎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端，使瑞典成为以它的科学研究而闻名的国度，甚至直到今天。

120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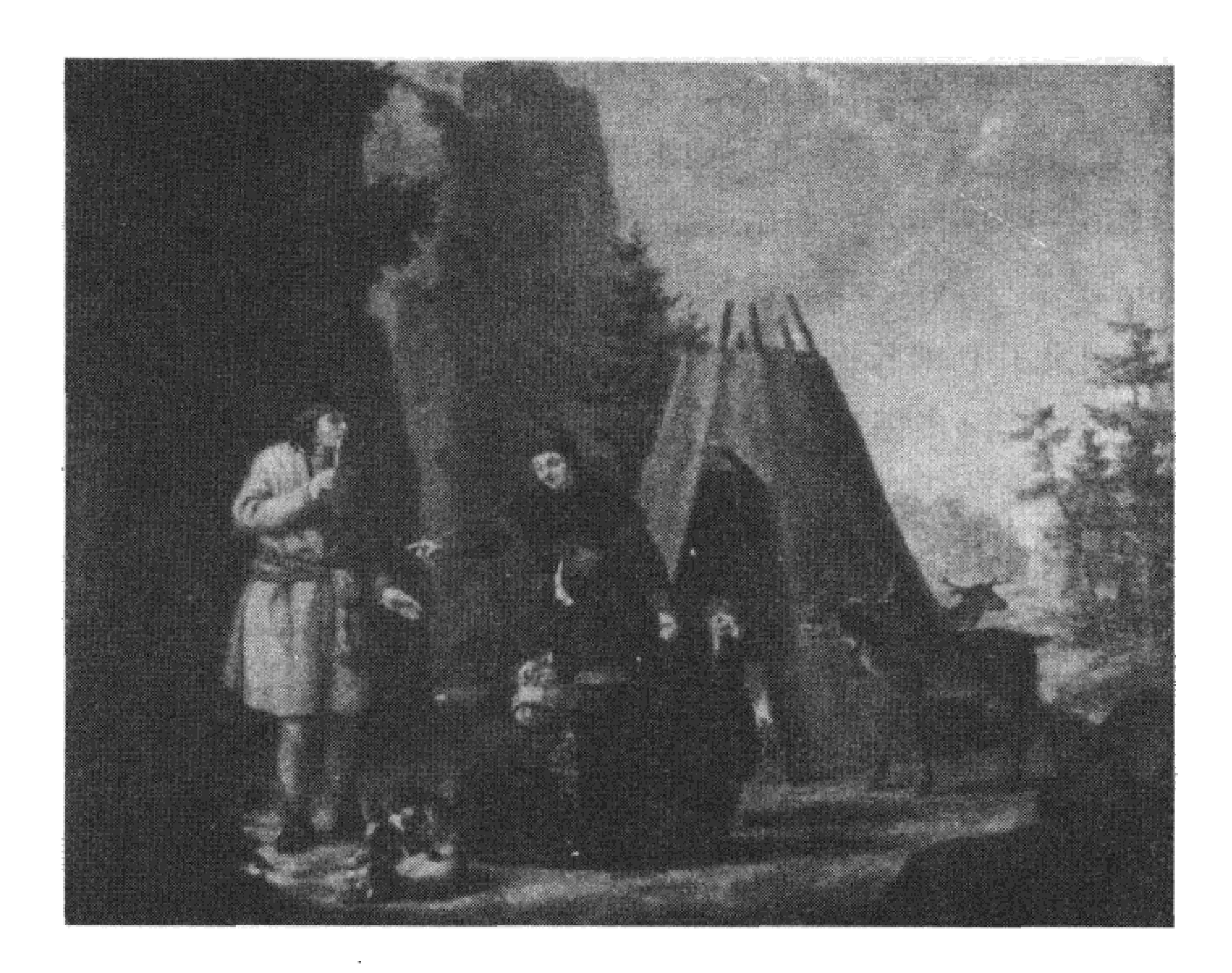


插图8　在夏季帐篷前的萨米人。大佩尔·西里斯特罗姆（Pehr Hilleström，在18世纪晚期）创作的油画。萨米人（或拉普兰人）是长期居住在瑞典极北部地区的土著民，他们是瑞典居民中最后被基督教化的群体。历史上主要以驯鹿放养为生、辅之以捕鱼。在整个国家的历史中，他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经常被置于边缘地位，他们的游牧生活方式通常会与定居生活的农民的要求相冲突。油画存放于斯德哥尔摩的豪威尔斯卡博物馆（Hallwylska Museet）。

林奈绝非他那个时代唯一赢得国际声誉的瑞典人。天文学家安德斯·摄尔休斯（Anders Celsius，1701—1744）是另一个著名的例子。他提供了一种对北极光的科学解释，同时还在科技方面留给世界一项持久性遗产，即发明了摄氏温度计。其他重要人物包括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萨缪尔·柯林金斯蒂娜（Samuel Klingenstierna，1698—1765）与天文学家和统计学家佩尔·沃金廷（Pehr Wargentin，1717—1783）。前者是乌普萨拉大学教授，她帮助发明了消色差望远镜。而仁者后来担任了1739年建立的瑞典科学院的院长，那是

一个讨论科学发展和交流思想的重要场所。那时另一个重要科学人物是化学家约翰·哥特沙克·沃勒里尤斯（Johan Gottschalk Wallerius，1709—1785），他专注于化学品影响农业的方式，这是他的主要著作《农业化学基础》（*Agriculturae fundamenta chemica*）研究的主题，该著作于1761年出版后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

十八、农业的发展

尽管有上述科学创新，但瑞典在整个这一时期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几乎一半的人口还在从事传统的农耕，只是使用的耕种方法处于变化之中。在斯堪尼亚，能够发现最肥沃的土地和贵族最大规模的庄园。正如大的土地所有者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土地租给佃农以换取产品或货币那样，重农学派有关发展农业的理想正得到认同。而最重要的是，政府开始对农业组织实施彻底的检查以提高生产率。这也像在工业中一样，英国提供了榜样。但在瑞典，它特别奠基于《瑞典农业发展的障碍及其对策》（*Svenska landtbrukets hinder och hjälp*）等著作所传播的启蒙哲学，该著做出版于1746年，是由瑞典土地经济学家雅各布·法戈特（Jakob Faggot，1699—1777）撰写的。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变革（Storskiftet）被启动，当时它不仅被视为一种瑞典现象，而且更被视为广泛的圈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发生在这一时期的整个北欧地区。

122

大变革分几个阶段进行，首次启动于1757年，一直持续了1个多世纪，它深刻地改变了整个国家的农村生活。因为，更多的农业人口被强制离开他们居住的村社，在新的土地上安家，而后者就坐落在那些正在开垦的土地中间。由此，这些土地的产出更高效。尽管这在小土地所有者中广泛受到抵制，但它还是通过各种非暴力手段得到了执行。而且，它的目标已经被实现：扩大可耕地和提高效率。由于变得更加富裕，越来越多的农民能够购买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尽管不是从那些贵族土地所有者那里购买；因为一直到1864年是禁止贵族将土地卖给平民的。据说，并不是所有农民都从这种

新制度中获益。虽然许多佃农被给予住宅和牧场而不收任何费用，但此后他们却被迫为此付出代价，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变得更穷。

十九、文学和教育

尽管在18世纪上半期瑞典遭遇了使之痛苦不已的经济困难，但在同法国和英国启蒙思想不断的接触中，它的文学得到了繁荣发展。123 一位早期的领军人物是奥洛夫·冯·达林（Olof von Dalin，1708—1763），他是在隆德大学接受的教育。他在这个时期对将启蒙价值观介绍到瑞典发挥了突出的作用。他编著的周刊《瑞典的阿耳戈斯》(*Den Svenska Argus*）是从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创新中获得的灵感，后者与理查德·斯蒂尔（Richard Steele）一道于1711年在伦敦创办了《旁观者》(*the Spectator*）。通过创作对斯德哥尔摩生活的讽刺作品，他能够将英国和法国崇尚怀疑和理性的文学风格加以传播，他就居住在那里。在他于1740年出版的作品《马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Horse*）中，讽喻的写作手法被添加到他的讽刺作品中，用于嘲弄那些一直假装严肃的人。他还创作了一些剧本，诸如《瑞典的纨绔子弟》(*Den Svenska sprätthöken*）发表于1740年，是一出嘲讽卡尔·吉伦伯格伯爵的喜剧。不过，达林在今天的声望主要是源于他的历史著作，尤其是他出版于1747年和1762年间的3卷本的《瑞典史》，这是受瑞典等级院委托撰写的。

随着18世纪逐渐过去，卢梭，而不是英国怀疑论者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开始在瑞典文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这在该时期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海德薇格·夏洛特·诺尔登弗莱彻（Hedvig Charlotta Nordenflycht，1718—1763）的作品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作为一位自学成才者，她将她的虔信派信仰融入作品，创作了《哀伤的情人》(*Den sörjande turturduvan*），发表于1743年，这是在她的情人、接着是丈夫相继去世的阴影下创作的。后来，在18世纪50年代，她协助创办了一个文学社团，即所谓的“思想创造者园地”（Tankarbyggarorden），是她与文人古斯塔夫·菲利普·克鲁兹（Gustaf Philip Creu-

tz，1731—1785）和古斯塔夫·弗雷德里克·吉伦伯格（Gustaf Fredrik Gyllenborg，1731—1808）共同创办的。前者克鲁兹最知名的是他创作于1756年的诗歌《夏之歌》（*Sommar-qväde*），他的其他两首诗作《达芙妮》（*Daphne*）和《阿提斯与卡米拉》（*Atis och Camilla*）也同样受到欢迎，后两首创作于1762年。克鲁兹后来放弃了诗歌创作，成为了一名杰出的外交家，供职于古斯塔夫三世王朝。仁者吉伦伯格走了相似的发展路线，创作了《愤世嫉俗者》（*Verdsföraktaren*）和《忧伤的人》（*Menniskans elände*）等诗作，对人类持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1762年他同样转入了仕途，担任国家公务员。不过，在此之前，三人曾合做出版了几部诗选，包括1753—1756年发表的诗作结集成的《我们的尝试》（*Våra Försök*）与1759—1762年的《文学作品》（*Witterhetsarbeten*）。

18世纪，随着瑞典受教育精英对科学兴趣的不断增加，从各方面看法语都成了与欧洲其他国家交流的通用语。在贵族中，法语已成为他们使用的第二语言，尽管从未达到像俄国贵族在18世纪中期和晚期使用的那种普遍性，但确实已使贵族能够流利地与有相同社会背景的其他贵族交流，不论是在瑞典还是在国外。王室家族和许多其他贵族家庭的家庭女教师大多是法国人，在家里言谈和书信都使用法语，尤其因为它能提高私密性，仆人不大可能听懂。较普遍地使用法语还能使人们更大范围地接触欧洲文学，这对像瑞典这样的国家非常重要，因为漫长的冬季使阅读作为一种娱乐手段具有更大的意义。一些贵族家庭积累了大量的藏书，像拉普兰劳夫斯塔·布鲁克（Leufsta Bruk）的德·吉尔斯（De Geers）、芬兰赫尔辛基东部阿米尼·加德（Åminne Gård）的阿姆菲尔茨（Armfelts）、卡累利阿维堡附近蒙特利珀斯（Montrepos）的L. H. 冯·尼古拉（L. H. von Nicolay）等的藏书。这些藏书中有许多法文书，当然也有各种其他语言的书。

124

一些著作被译成瑞典语。其中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是1765年对麦克弗森（McPherson）的《莪相》（*Ossian*）的翻译出版。它成

为一种重大的促进因素，激发人们对北欧古代神话的兴趣，而这是与古斯塔夫三世建立宏大帝国的幻想相适应的。然而，古北欧神话的影响最终是在19世纪，即尚武的国王卡尔·约翰统治时，达到了它的全盛期。

由于一些来自法国和其他地方的访问王室的有学问的访客经常应邀给渴望知识的瑞典听众作演讲——他们渴望了解外部世界的知识，因此，这种会场就成为传播来自不列颠群岛、欧洲大陆和更远地区信息的重要渠道。

不过，对大多数有读写能力、而又与王室生活不相关的人而言，《圣经》成为长时间阅读的主要书籍。据说，在整个18世纪随着教育范围的拓宽，人们的文学视野和品味在不断拓展和提高。到18世纪60年代，普遍的初等教育已经在瑞典确立，它教授读、写、算术等课程。这时教学工作主要由路德派教士承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虔信派教徒（Pietist），对他们而言，许多来自国外的文学作品被视为在神学和道德上是可疑的，不利于他们的教民，尽管他们本人也许非常渴望阅读。由于这种原因，法语的普及并未得到他们的支持，直到法国元帅贝纳多特（Bernadotte）于19世纪继承了瑞典王位为止——那为法语的普及提供了一种更有说服力的和爱国的理由。

125

二十、音乐的发展

伴随着教育的发展和识字率的提高，人们对古典音乐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目前这种源于中欧传统的音乐不仅受到宫廷、而且受到愈来愈广泛的公众认同。因此，与艺术、建筑和科学一道，音乐也在18世纪中期开始走向繁荣。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一个人，他就是有德国血统的作曲家约翰·黑尔米奇·罗曼（Johan Helmich Roman，1694—1758）。他的音乐为他赢得了“瑞典音乐之父”的称号，1727年被任命为宫廷管弦乐队的指挥。他是一位技艺娴熟的小提琴演奏家和双簧管吹奏者，但他最知名的还是为宫廷仪式应时创作的乐曲和他创作的宗教音乐，其中包括两首宗教交响曲、

许多首奏鸣曲、一首瑞典路德教礼拜仪式的乐曲和为多首圣歌配的乐。他的许多创作受到乔治·弗雷德里克·汉德尔（George Frederick Handel）的启发，在他于1716年到1721年旅居英国的5年期间，他已经非常熟悉汉德尔的作品。他于18世纪30年代在斯德哥尔摩的贵族院（the House of the Nobility）组织过多场公众音乐会，对丰富首都人民的音乐生活贡献颇多。他于1740年当选瑞典科学院院士，表明他在那个时期的瑞典文化生活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他音乐生涯的高峰是他创作的《德洛特宁宫曲》（Drottningholmsmusik），这是一首为庆祝黑森的阿道夫·费雷德里克与洛维萨·乌尔里卡于1744年大婚而创作的乐曲，尽管前者那时还只是王储。

另一位音乐名人是大费迪南德·瑞尔贝尔（Ferdinand Zellbell the Elder，1689—1765），他作为风琴演奏家和作曲家于1715—1751年供职于瑞典皇家教堂（the Royal Chapel），并于1718（或1719）年作为风琴演奏家供职于斯德哥尔摩的大教堂，直到1753年他的儿子小费迪南德（Ferdinand the younger）接替他的位置。他出版了许多合唱作品集，但最知名的还是《一首小调和五首管风琴前奏曲》（A Minor and Five Organ Preludes）中的《低音管协奏曲》（Bassoon Concerto）。如果说后一位作曲家是由于他的教会音乐而为大家所接受的话，那么前一位就不是这样。因为，对许多瑞典路德教教士而言，有音乐伴奏的奢侈挥霍的舞会和其他虚荣的娱乐活动只是提供了那个时代道德堕落的又一个表征，是受国外影响的产物，这些活动在那一时期整个欧洲都非常流行。许多这样的教士在瑞典国教中寻找精神的家园，他们发起了一个运动，即著名的虔信派。

126

二十一、虔信派

尽管虔信派起源于国外，但这绝没有阻止它于18世纪第二个25年在瑞典生根。尤其是它根源于德国，它的教义在德国的哈勒（Halle）大学和格拉夫瓦尔德（Greifswald）大学由诸如奥古斯都·赫尔曼·弗兰克（August Hermann Francke）等路德教学者予以传

播。作为一位社会激进分子，弗兰克带头给瑞典王储本人写信，要使他确信，对上帝敬畏的完全确立是一个国家最坚实的基础，由此可以期望对所有等级的忠实臣民和虔信上帝的仆从拥有权力。尽管政府的领导人也经常会认同它的教义，但虔信派的传播受到如下事件的进一步推动，即在北方大战期间，许多瑞典的军官被俄国俘虏，在他们作为战俘被关押在莫斯科和托波尔斯克（Tobolsk）期间，他们逐渐受到它的理念的影响。

在弗兰克于1727年去世后，朱利叶斯·赫克（Julius Hecker）继续传播他的教义。在皈依虔信派的约翰·康拉德·迪佩尔（Johann Konrad Dippel）的帮助下，该教派的影响迅速超越德国边界和东欧各国之外。尽管用特别的语言交流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因素有时在聚会中发挥突出作用，但瑞典的虔信派是一种高度理性主义的运动，它与人们对启蒙价值观愈益增加的兴趣相契合。

127 在18世纪的较晚期，瑞典的虔信派主要是受另一位德国人尼古拉斯·路德维希·冯·亲岑多夫伯爵（Count Nikolaus Ludwig von Zinzendorf，1700—1760）的影响，他在摩拉维亚（Moravia）的赫仁护特（Herrnhut）建立了一个社区。因此，虔信派的这一支就被称为摩拉维亚兄弟会（Moravianism），从1732年开始在路德教派中获得广泛支持。一方面，它的伦理规范主张社会公有和辛勤劳动，另一方面又主张服从国家和那些被任命执行其命令的人的支配。尽管虔信派的公众集会于1726年被禁止，但该教派在贵族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尤其是在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它给瑞典文化打上了持久的烙印，甚至在20世纪晚期都有明显表现，例如在由英格玛·伯格曼导演的《芬妮和亚历山大》(*Fanny och Alexander*）影片之中。在这部影片中，这些宗教价值观之间的两分与对生活的一种更感官和艺术的表现构成了主题，反映出这位著名剧作家和电影导演本人在童年和其后生活中所历经的内心斗争。

二十二、斯韦登伯格和新耶路撒冷教派

尽管虔信派在瑞典国教中的地位未变，但许多其他教派开始越

来越脱离主流的路德教派。由伊曼纽尔·斯韦德伯格（Emanuel Swedberg，1688—1772）建立的教派是这一时期诸教派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在1711年被晋封贵族后一般被称为斯韦登伯格（Swedenborg）。该教派为瑞典国教提供了一种神秘的替代性宗教。斯韦登伯格的父亲是乌普萨拉大学的神学教授，不过，斯韦登伯格本人对力学和冶金术更感兴趣。只是在18世纪40年代早期的信仰危机后，他才将注意力转向宗教问题。此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一种新的神学体系的文字阐述上。他8卷本著作《灵界记闻》(*Arcana coelestia*）出版于1749年到1756年间，稍后于1758年出版了《天堂与地狱》。在这些著作中，他用大量神秘的内容阐发了灵界与俗界相统一的信念，这些内容既有可以理解的，又有神秘不可知的。他的新世界观迅速获得了大量支持者，由此建立起新耶路撒冷教派（Church of New Jerusalem），该教派在知识分子、通常是贵族知识分子圈中具有巨大影响力，而且不仅在瑞典，在伦敦也是如此，他最终就病死在那里。他的一个学生卡尔·伯纳德·沃德斯特罗姆（Carl Bernard Wadström）成为瑞典努力在西非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建立殖民地的主要倡导者，但同时他表达了结束瑞典参与那里的奴隶贸易的道德必然性。前一个目标从未被实现，而后一个目标也只是在19世纪才完成。

第六章　王权专制主义的恢复

一、古斯塔夫三世的新秩序

129　1771年，在其父阿道夫·弗雷德里克国王统治的最后一年，古斯塔夫三世那时在巴黎就瑞典和法国的关系进行着重要谈判，此时瑞典的政治情势处于越来越混乱的状态。古斯塔夫在回国途中已经思忖好应对这种事态的方案，他利用在路易十五宫廷中逗留的时间与那里的法国和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进行广泛接触，他们支持他在情况允许时建立仁慈的专制统治。不过，与他们的交流也经常令他感到失望。正如他在写给国内母亲洛维萨·乌尔里卡皇后的信中所表述的："我已经熟知了这里的几乎所有哲学家：马蒙泰尔（Marmontel）、格里姆（Grimm）、托马斯（Thomas）、莫尔莱神父（the Abbé Morellet）和爱尔维修（Helvétius）。读他们的著作比同他们面谈有趣得多。"因此，当他父亲突然去世使他成为国王时，他渴望尽快返回瑞典将长久以来孕育的计划付诸实施，因为他决心要在他父母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即将瑞典重新变成绝对君主制国家。1772年8月19日，国王和他的支持者发动的政变没有流血，却在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成功地重新确立了王权专制统治：曾经在1720年，瑞典的4个等级——贵族、教会、市民和农民——联合起来接管了专制

君主的权力，而现在古斯塔夫三世要从他们手中收回权力。与此同时，他越来越多地同农民建立起联盟，这种安排特别不利于贵族的利益，因为他使那些拥有充足财富的农民有可能至少购买贵族的部分土地，而这些土地在以前是不允许转让的。他还要确保，从此以后，只有当他提议时，瑞典国会才能召开。为了颂扬他新建立的独裁秩序，他要求伟大的历史画作《古斯塔夫三世加冕礼》（The Coronation of Gustaf III）以这样的方式创作，即国王的形象与群众相分离，就像神一样；国王君临天下就好像被尊为神一样。这幅画是委任瑞典著名的肖像画家卡尔·古斯塔夫·皮洛（Carl Gustaf Pilo，1711—1793）创作的。但实际的统治却没有那么“宏伟壮观”，不是像阅读画作似乎能够想象的那样。 130

实际上这种专制受到诸多重要因素的限制：发动一场进攻性战争需要得到瑞典国会同意，法律必须由国王和瑞典国会共同颁布，最重要的是只有经过瑞典国会同意才能够征税。据说，国王的特权得到了增加，使古斯塔夫能够将他的注意力不仅转向政治而且转向艺术。他热爱艺术不仅出于美学的原因，更重要的是，艺术能够作为他新赢得的专制统治的象征，并有助于给那种统治以必要的支持。结果，政治、艺术和建筑等领域在瑞典交织在一起，其程度是此前从未达到过的。

二、约翰·托比斯·塞戈尔

古斯塔夫三世对艺术的兴趣受到一个艺术家小群体的激励，他们都有着很好的天赋，并深受新古典价值观的浸润，这种价值观已在巴黎和罗马居于统治地位。在这些人中，雕刻家约翰·托比斯·塞戈尔（Johan Tobias Sergel，1740—1814）取得了最大的声誉，在国内和国外都是如此。获得瑞典议会的津贴，塞戈尔能够于1767年游历罗马，在那里他深受由德国人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Johann Joachim Winckelmann）所传播的美学价值观的影响。温克尔曼精熟罗马教廷的古代文物，他于1764年出版了那部对后世产生巨大

影响的《古代艺术史》(*Die 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ums*)。
131 塞戈尔对希腊和罗马的考古学遗址，以及吉安巴蒂斯塔·皮拉尼西(Giambattista Piranesi)荒诞古怪的设计都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拒斥那种洛可可式的取悦感官的曲线，而赞同一种更厚实、几何体的线性风格，它是以一种古代原型为基础的。当古斯塔夫三世的兄弟弗雷德里克·阿道夫于1776年访问罗马时，他被人引领拜访了塞戈尔，并成为后者的赞助人。此后不久，古斯塔夫本人从塞戈尔那里购得他的雕塑作品《爱神和赛姬》(Eros and Psyche)，该作品最初是由杜·巴丽夫人(Madame du Barry)委托制作，她是已故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情妇。这是瑞典君主从塞戈尔那里订购的许多作品中的第一件，原打算放置在斯德哥尔摩郊外汉高花园中的一个巨大寺院里，而且这只是古斯塔夫所设想的巨大新宫殿建筑计划中的一个部分。他的自大狂倾向越来越强烈。像他的许多建筑方案和军事计划一样，该项工程由于耗费巨大而从未启动。1778年塞戈尔被任命为宫廷雕塑师，接替法国前任皮埃尔·于贝尔·阿奇伏柯(Pierre Hubert L' Archevêque，1721—1778)的职位。塞戈尔从意大利回到瑞典，又担任了瑞典皇家艺术学院的教授，后者是国王在他统治早期于1733年建立的。

三、多次游历意大利

1782年，古斯塔夫计划于来年进攻丹麦—挪威以实施他的领土扩张野心，尽管他已与丹麦公主索菲·美达玲(Sophie Magdalene)结了婚。但在与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协商后，他决定放弃该计划，因为女皇反对他采取这种行动。不过，国王还有其他计划：广泛游历意大利，这既是出于政治目的，也是出于文化目的。其实，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前他就打算用几年时间来游历意大利，只是到1782年他才感到是时候来实现他的这一计划了。由于拥有广博的艺术知识，塞戈尔受命作为国王的游伴回到意大利。与塞戈尔同行的还有卡尔·奥古斯特·艾伦斯瓦德(Karl Au-

gust Ehrensvärd，1745—1800），他是赫尔辛基郊外斯维堡的建筑设计师的儿子，那时刚刚被任命为瑞典皇家艺术院的院长，也加入随行行列。

因此，尽管对于古斯塔夫的意大利之行瑞典公众得到的解释是疗伤——那是在芬兰战役期间受的，但不可否认，意大利之旅具有艺术和美学方面的内容。然而，国王喜爱权力胜过艺术，因此政治成为这次游历最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古斯塔夫希望赢得法国、西班牙、那不勒斯和帕尔玛（Parma）等波旁王朝诸强国的支持，以结成联盟来对付丹麦和俄国。他在意大利宫廷的出现也许使他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而他们的支持在许多方面是绝对必需的。他计划在稍晚些时候发动对俄国和丹麦的战争，希望能够重新获得卡尔十二世丧失的大部分领土。古斯塔夫作为一个尚武国王的缺陷是无法克服的，他建立大帝国的自大狂幻想指导着他的长期战略。 132

由此，他和他的随从启程穿越欧洲。他隐身为汉高伯爵，尽管这种雕虫小技预计不会骗过任何人，但却使他能够避免麻烦的外交礼仪。他们首先到达意大利北部的威尼斯（Venice）、维罗纳（Verona）和维琴察（Vicenza），接着是曼图亚（Mantua）和帕多瓦（Padua），在向南到达梅索兹阿诺（Mezzogiorno）之前到了那不勒斯（Naples）和西西里（Sicily）。在那里，庞贝（Pompeii）的古代遗址和寺庙以及离前者不远的赫库兰尼姆（Herculaneum）的阿格里真托（Agrigento）都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所有这些城市中最重要的就是罗马：塞戈尔和一位长期居住在瑞典的法国艺术家路易—阿德里安·马斯莱利茨（Louis-Adrien Masreliez，1748—1810）的协助使他的行程非常顺利，他们将许多艺术家、建筑设计师和古董经销商介绍给他。古斯塔夫还与教皇庇护六世（Pope Pius VI）相熟识，参加了于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教皇亲自参加的大弥撒，一次是在1783年圣诞节，另一次是1784年复活节。

对古斯塔夫和他恢复瑞典在波罗的海霸权的宏大计划而言，不幸的是俄国王子保罗（Paul，即后来的沙皇保罗一世）和他的王妃

此时也游历到意大利，也是用一个假身份，即北方伯爵。虽然后者此行的部分原因是针对国内政治情势的一种反应，但他游历的另一目的是要破坏古斯塔夫同各方的协商，因为它们不利于俄国的利益。

四、路易—吉恩·德普雷

133 古斯塔夫将建筑和艺术视为强有力的工具，可以用它们作为象征形式来传播他建立帝国的构想，也能够使它们服务于他的政治和军事图谋。为了这一目标，他需要聘用一些人才带回国为他所用：他们应当是那些在艺术领域和艺术技艺上有着较深造诣，并已经具有显赫声望的人。因此，在罗马，古斯塔夫选择了法国人路易—吉恩·德普雷（Louis-Jean Desprez，大约 1743—1804）来推进他那广泛的计划，即在建筑和艺术方面装饰首都。德布雷是在法国艺术家查尔斯-尼古拉斯·科尚（Charles-Nicholas Cochin）门下学习的，但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剧场设计师查尔斯·德·怀勒（Charles de Wailly），正是后者为他提供了恣意想象的空间，而这正是对国王有吸引力的地方。在意大利，德普雷帮助广受赞誉的德·圣依主教（Abbé de Saint-Non）编撰了伟大的建筑学著作《风景如画的地方，或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图绘》（*Picturesque Voyage, or a Description des Royaumes de Naples et de Sicile*），书中收录大约 136 幅非常富有吸引力的插图。在古斯塔夫三世将他带回瑞典后，他就按照他以前的风格那样，试图按照一种浮华的新古典型式来重新装饰斯德哥尔摩。

对国王而言，建筑皇冠上的明珠将是新汉高宫。它的中心是一座圆形建筑，有突出的两翼，总共包括不少于 32 个八角窗，而在它的南面装饰有一个科林斯式石柱廊，由 60 根圆柱组成。另外，还计划在它的中心圆顶下方建一个富丽堂皇的内大厅，由 16 根西伯利亚孔雀石做成的圆柱支撑。当工程启动时，一座大的花岗岩山丘被夷为平地来为宫殿奠基。工程最初预计于 1797 年完工，但古斯塔夫未能考虑到其中一个无法克服的障碍，就如他的许多计划一样：王室国库中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支撑工程完工。结果，这个巨型宫殿复合

体以及国王计划建造的功德柱（Victory Column）和其他建筑工程都从未完工过。空虚的王室国库与耗资巨大的对俄战争（1789—1790）不仅终止了这一建筑的继续，而且也使所有此类的奢侈工程都落了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德洛特宁宫建一座宏伟的希腊寺庙。以一种与古斯塔夫所预期的完全相反的方式，他的建筑和艺术也象征着他的政治和军事计划，它们都未能实现。瑞俄战争也以瑞典失利而告终：古斯塔夫将波罗的海变为瑞典内湖的设想破产，就像他对古典艺术的审美偏爱未能实现一样，他曾是如此渴望用它们来重新装饰瑞典。 134

尽管德普雷的宏大设想从未付诸实现，但在规模上更为适度的其他建筑却完成了，它们是由他的一些瑞典学生设计的：他的一个学生卡尔·克里斯托弗·约尔维尔（Carl Christoffer Gjörwell，1766—1837）设计了土尔库（瑞典语是埃博）埃博学院（Åbo Academy）的主要建筑，它是那时芬兰唯一的大学。约尔维尔的设计灵感不仅来自维特鲁威（Vitruvius）和帕拉第奥（Palladio），而且也受罗马早期巴西里卡风格的影响。在它丰富的建筑装饰中，瑞典国王被描绘为阿波罗（Apollo），即主管艺术和音乐之神。

五、瑞典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

古斯塔夫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北部和东部，尽管徒劳无效。而向南部和西部的发展，也引起他的关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这些方向的发展而不是他的更宏大的设想，取得了最大的实际收益。1748 年，古斯塔夫三世与法国在巴黎就建立新的秘密联盟进行了谈判，谈判还涉及瑞典获得法属圣巴特勒米岛（St Barthélemy）和圣马丁岛（St Martin）两块殖民地，以及法国提供援助给瑞典；作为回报，法国有权使用哥德堡作为中转港。这些谈判成功地于 1785 年 3 月 7 日完成，瑞典获得了对这些加勒比海岛屿的完全主权。但这很难说是重大的收获，因为这里人口稀少，1787 年仅有 739 人。其中，458 人来自欧洲，115 人是瑞典人，剩下的是法国人、英国人和荷兰

人；另 281 人来自非洲。只有有限发展的农业，而且每年有半年的干旱期，从这种自然状况看，这些新的殖民地不大可能提供丰富的收益。确实，它的蔗糖和棉花总产量每年很少有超过 4 船货的，而鱼、酸橙和家畜的产量可满足当地居民的需要。但据说它的港口勒·卡里尼加（Le Carénage）非常漂亮，位于东加勒比海，离英国和法国在背风群岛（Leeward Islands）和向风群岛（Windward Islands）的殖民地以及西班牙在大陆美洲的殖民地都很近，因此它有潜力成为一个非常成功的中转港。很快这种潜力得到发挥。贸易繁荣起来，一年内殖民地的人口翻了一番。结果，瑞典设立了瑞典西印度公司来管理这块新殖民地。它的首都设在古斯塔维亚（Gustavia），这是圣巴特勒米岛唯一的城镇，这一命名是为了纪念国王；另外还有要塞，即古斯塔夫堡。

拿破仑战争的爆发对瑞典的殖民地而言是一种特殊的恩赐。因为欧洲的主要强国彼此在开战，包括新建国的美国也不时参与进来，所以大部分加勒比海贸易此时都经它中转。到 1800 年，它的人口已经增加到 5 千人，从人口数量看已经与乌普萨拉相当。因为拥有如此多种族的人口，所以瑞典语、法语和英语在殖民地都被接受为官方语言，而且宗教宽容也是彻底的。在这方面，它与那时瑞典国内的统治状况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在国内转信天主教仍然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那些皈依者会被没收财产，本人也会被强制驱逐。

当然，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并不是每个方面都对加勒比群岛的瑞典人有利。例如在 1801 年，殖民地被英国短期占领，但第二年在支付赔偿之后，它又被归还给瑞典统治，继续获取利益。到 1804 年，随着财富的剧增，在首都建了一个戏院，经常举行音乐会，乐师既有当地的也有从其他地方请来的。2 年后，由于自由贸易对所有瑞典人都开放，殖民地享有了它最繁荣的时期。仅 1811 年就有大约 1 800艘船停靠圣巴特勒米岛。并且在随后发生的英国和美国敌对的期间，从 1813 年 10 月到 1814 年 9 月，美国不少于 20% 的出口都经瑞典殖民地中转。尽管圣巴特勒米岛的内陆地区农业收成贫乏，人

们很少能从农业生产中获益，但许多商人也从这一状况中获利，即从加勒比群岛其他地方逃亡的奴隶到瑞典所属的岛屿寻求庇护，被公开拍卖给奴隶主。瑞典王室也从中获益。

六、在非洲的殖民冒险活动

在建立它的加勒比地区殖民地的同时，瑞典还在非洲西海岸进行殖民冒险活动。在代表法国政府利益的戴斯·马歇骑士（Chevalier des Marchais）所做航海的激励下，一个支持在西非殖民的瑞典协会在尼雪平成立。国务大臣约翰·莱金克兰茨男爵（Baron Johan Liljencrantz，1730—1815）支持由政府授予 40 个家族在非洲进行殖民的特许状，这些家族都有制造业和商业的背景。此后不久，他们就从瑞典启航，在弗尔·德·格拉斯（Havre de Grâce）中转，由法国塞内加尔公司（the French Senegal Company）提供食宿。最初，该协会希望在佛得角（Cape Verde）附近建立一块殖民地，但后来他们尝试在更南方即今天的塞拉利昂（Sierra Leone）境内创建，那里肥沃的耕地在召唤他们。他们的一位成员沃德斯特罗姆（C. B. Wadström）提出建造精致树房的独特创意，他设计用古典风格的低矮女儿墙来分隔住处，以此来适应那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这具有着乌托邦的色彩。不过，恶劣的气候、疾病和土著人的敌视共同发挥作用，很快破坏了瑞典这块非洲殖民地，进而完全被毁弃，于是进一步拓展的倡议也被搁置。

136

七、古斯塔夫三世的不稳定统治

如果说瑞典在非洲殖民冒险活动的根基在崩塌，那么，古斯塔夫三世在瑞典统治的稳定性也受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受与俄国重开战事的影响，那是于 1788 年在缺少财政资源支持和没有周密计划的情况下开打的。瑞典在芬兰湾（the Gulf of Finland）的霍格兰（Högland）岛附近对俄国海军突袭，却未给自己带来什么收益。由于未能在军事方面取得决定性进展，军官中的不满情绪增加，以致

一些军官于1788年在安亚拉（Anjala）乡村庄园举行密谋，有113名军官参与。这次密谋以失败告终，他们无力迫使国王终止这灾难性的战争。古斯塔夫对这一密谋进行了镇压，尽管它的许多成员都只受到轻微的惩罚，但它的领导人海斯泰斯克上校（J. H. Hästesko）被处死。

137 在1790年6月9日到10日爆发的斯文斯克松德海战（the Battle of Svensksund）中，瑞典获得大胜，但却掩盖了在更广泛的战场上瑞典处于不利地位的军事现实。古斯塔夫三世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开启了谈判，于1790年8月在瓦热拉（Värälä）与俄国签署和约。由此，最终的军事失败被避免。但是，反古斯塔夫的力量仍然强大，尤其是那些反对国王以牺牲贵族制为代价而实行专制统治的人，这最终导致国王遇刺。

八、古斯塔夫三世遇刺

1792年3月16日在皇家歌剧院（the Royal Opera House）举行的一次化装舞会上，古斯塔夫三世被一个不满的贵族雅各布·约翰·安卡斯特罗姆（Jacob Johan Anckarström）上尉射杀，而他是在其他不满人士的支持下做的。这个歌剧院是由国王自己设计，由建筑师卡尔·弗雷德里克·阿德尔克兰茨于1782年建造的。因此说，与他本人喜爱设计的剧场构架相符合，他成功地在建筑设计上“构想”了他的死亡。从那时起，这个事件的戏剧性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既在瑞典国内也在国外。后来朱塞佩·威尔第（Giuseppi Verdi）在1859年创作的歌剧《假面舞会》（Un ballo in maschera）中对此事件进行了纪念性描述，尽管大多是虚构的记叙。他是在参阅了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将之改写成戏剧的，这对意大利复兴运动具有重要意义。国王虽受了致命伤，但仍苟延了数日，到3月29日才去世。安卡斯特罗姆被逮捕并处死，他的同谋被监禁或流放。现状仍然被维持，他的儿子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Gustaff IV Adolph，1778—1837）在摄政体制下继位。尽管如此，但变革就在眼前，它

由瑞典边境之外的事件引发，即拿破仑战争。

九、宗教发展动向

在 18 世纪较晚期，瑞典社会明显地实现了内部稳定和认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瑞典国教促成的，不像君主制本身，它是该国最具统治力和最稳定的一种制度，它将宗教义务强加给了几乎所有的瑞典人。这些义务最主要的是定期做礼拜和领取圣餐，一年至少要领几次，具体看领圣餐者的住家离教堂的远近以及其他的情况。严格禁止信奉基督教的其他教派。 138

不过，在加勒比地区，由于更多的殖民者是外国人，他们信奉其他一些教派，所以实际实行的是一种宗教宽容政策。在圣巴特勒米岛和圣马丁岛，非瑞典人享有完全的宗教宽容，这种宽容程度 70 多年后才在瑞典国内实现。而那时在殖民地的瑞典人仍被迫信奉国教。

1787 年，在殖民地首都古斯塔维亚建立了一个瑞典人的路德教教堂，它以皇后索菲·美达玲的名字命名，但因为当时殖民地仅有 21 名路德教居民，所以它也为其他教派的居民提供礼拜场所。其中包括 234 名卫理公会教徒、149 名圣公会教徒和 60 名其他新教教派的教徒，后者包括由加尔文教激励的改革教会教徒。此外有 519 名天主教徒，他们中许多人来自附近的法国殖民地。天主教徒对殖民地的繁荣是如此重要，以致该岛总督罗森斯坦（Rosenstein）受到瑞典政府的敦促，向天主教牧师埃比法尼神父（Father Épiphane）支付报酬。他就住在圣马丁岛，每月为天主教社区做两次礼拜，礼拜仪式是在东方（L'Orient）村的一个石制小教堂中举行。

在瑞典国内，旧的僵化的路德教统治体制仍在继续实行，导致许多人、尤其是那些不大赞同正统观点的人，将教会讽刺为处于“木乃伊化的状态”。

十、经济发展

虽然对加入殖民国家的行列感到自豪，但瑞典的殖民冒险活动

对它的整个经济并未产生持久的影响。相反，像采矿、冶金、林业和农业等传统产业仍然是最重要的生产部门。在18世纪较晚期，林业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尽管南部和中部地区的大部分林地已被开 139 垦作耕地；而在芬兰，几个世纪中未发生什么变化，林木仍然很茂盛。据说，伴随着农业生产范围的扩展，向卡累利阿、萨沃和卡雅尼等东部和北部地区的拓殖增长迅速。由于很少有贵族来这些地区定居并获得土地，因此对自耕农和无地农场雇工尤其具有吸引力。这与芬兰西南部，即土尔库周边那些一直有移民流入的地区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在1805年有大约14%的人口出身贵族。用刀耕火种的办法将处女地变为耕地能够迅速获得收益，促使许多农民放弃在南方地区的旧宅地，在这些新近移居的地区寻找新的宅地。从1789年开始，农民被允许不受任何限制地购买王室的土地和属于贵族的免税土地，相比从前，这一改革有助于使更广泛的人口获得土地所有权。因此，瑞典明显在向一个现代国家迈进，其中的个体能够通过他自己的实际努力和资本积累在社会—经济阶梯上攀升。

芬兰西南部和东波斯尼亚地区生产几乎全欧洲所需要的煤焦油，对欧洲各国海军而言，这类所用是必需的，而这对许多需要就业的人而言具有巨大吸引力。这些产品的生产为该地区的许多人提供了另一种收入来源，普遍提高了人们的富裕程度。但另一方面，由于这些地区地处内陆，经济状况仍然很差，那些生活在这里的人缺乏适合的交通工具，所以是与外界隔绝的。对多数人而言，除了农业和林业提供的就业以外几乎没有其他就业渠道。由于这方面的原因，像西方世界的其他地方一样，瑞典政府开始开凿运河来缓解这一问题。首先开凿的是特罗尔赫泰运河（the Trollhätte Canal），它于1800年完工，使帆船能够从维纳恩湖（Lake Vänern）航行到约塔河（Göta River），再从那里入海。与约塔运河（Göta Canal）相衔接，在一个将北海和波罗的海打通的交通网中，瑞典的交通系统很快实现了在整个国家大部分地区的快速贸易流动。

140 另一方面，与亚洲的海上贸易的赢利水平逐渐减少，该贸易是

由瑞典的东印度公司经营。虽然如此，它的经济收益在许多年间都是巨大的，使它的一些股东聚敛了可观的财富。确实，它使格里尔家族（the Grill family）有可能积聚巨额资本，能够投资钢铁业，在乌普萨拉附近建立起著名的奥斯特彼钢厂（Österby Works）。不过，到1807年，瑞典的东印度公司已处于瓦解状态，停止了贸易活动。但它留下了值得记忆的纪录，在其运行的70多年间组织了大约132次航海，即从哥德堡到东方的航海，其中许多次是到广州的，它还在那里建了一家工厂，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留下了持久的遗产，这对瑞典和中国而言都是如此。

十一、采矿和冶金

采矿和冶金仍然是瑞典经济的支柱产业，尽管铁，稍后是钢所占比重在不断增加，但铜仍然是最主要的产品。在全欧洲的背景下，达勒卡利亚地区的大铜矿相比以前的重要性虽有所下降，但仍具有很高的生产能力，对瑞典出口总额的贡献不少于12%。当古斯塔夫三世视察大铜山矿区（the Great Copper Mountain Mine）时，它的重要性由一幅名画所揭示，国王专门指派瑞典著名的艺术家大佩尔·希莱斯特罗姆（Pehr Hilleström the Elder，1733—1816）来作画纪念这一事件。当时，在一个矿井中举行了盛大宴会，它被当做节日的庆典进行了精心的装饰。

该产业的经济收益是巨大的，但矿工的工作条件却非常简陋并不利于身体健康。卡尔·冯·林奈本人曾探访过铜矿区，当然不是在国王的那种节庆场合，他是这样描述的："他们被人称之为'该死的人'，上身赤裸，嘴上戴着毛织口罩，希望能防止吸入烟灰。几乎不大可能吸到任何的新鲜空气，汗水顺着他们的身体流淌，就像水从一个水袋中流出一样。"但那些占据管理位置的人更关心的是经济收益，对他们而言利益才是重要的。例如，在耶斯特里克兰（Gästrikland），私人铁厂厂主经常会修建新古典式的乡间别墅，坐落在他们工厂附近的广阔的林地之中，家中布置以最时新的新古典式

家具。

铁厂的工人住在附近，他们的家是成排分布的有两个房间的小屋，他们的报酬是根据他们生产的铁条量来支付的。他们能够通过生产生铁块和木炭来增加收入。不过，一俟兰开夏锻造法被引入瑞典，该产业就发生了重大变革，工人的生活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那些在铁厂工作的人由此变得越来越具有流动性——不带家属的流动，住在他们暂时工作的不同工厂的集体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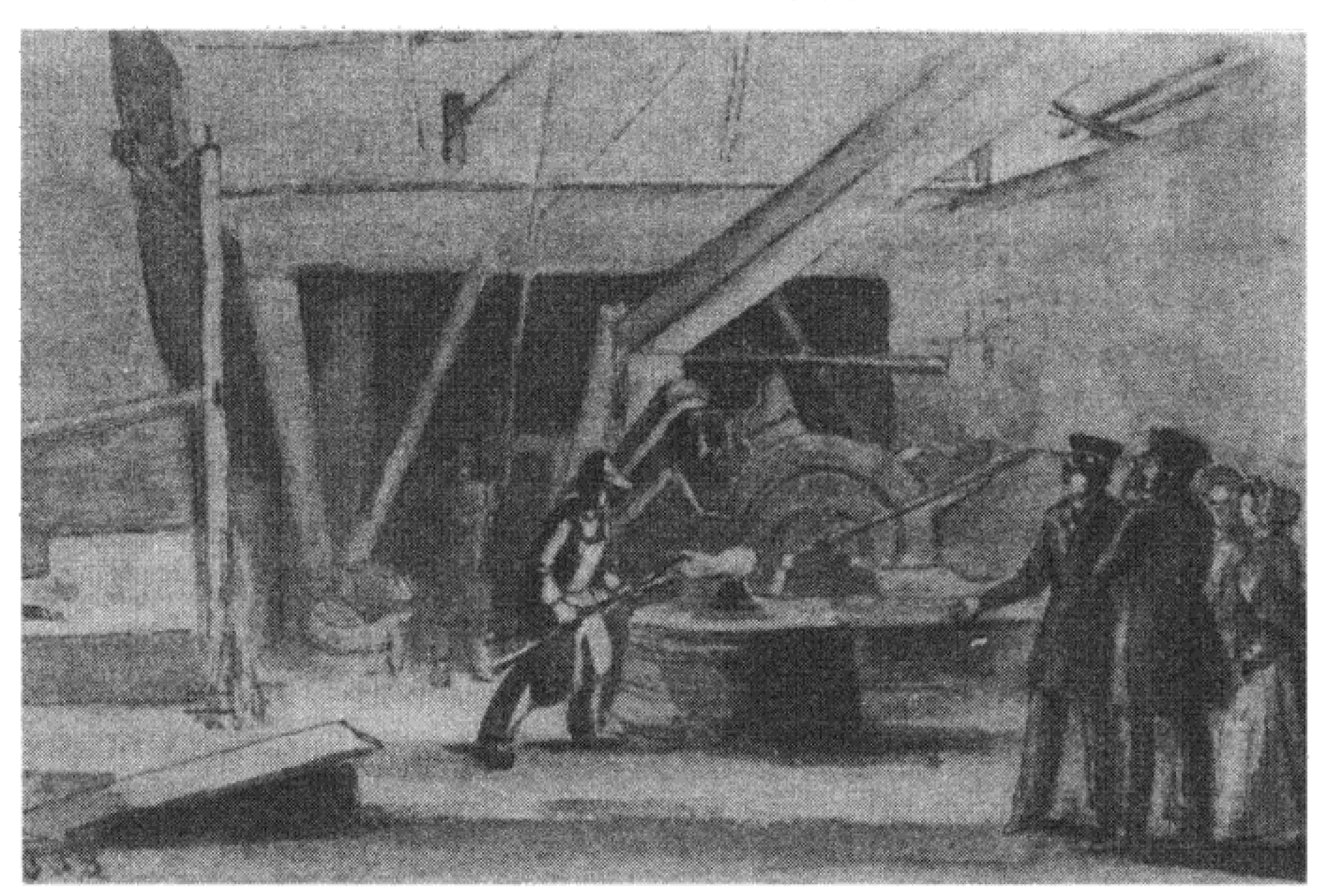


插图 9　1838 年吉米铁厂（the Gimo Works）的瓦隆锻铁炉（the Walloon Forge）。弗里茨·冯·达戴尔创作的油画。采矿业几个世纪以来在瑞典经济中具有高度重要性，它生产了该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最初是达勒卡利亚地区法伦的铜，后来是铁。铁能够成功生产，大部分应归功于新教避难者所带来的技术。他们来自比利时的瓦隆地区，于 16 和 17 世纪来到瑞典。他们在原来生活的地方受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政府的迫害。油画存放于斯德哥尔摩的北欧博物馆（Nordiska Museet）。

142　矿业学会经营着这一产业，它拥有最终的行政管理和司法控制权。但在管理上它又细分为 12 个独立的单位。它的辖区不仅包括达

勒卡利亚这个瑞典传统上最重要的采矿地区，而且也包括新近开发的在乌普兰、纳克（Närke）和西曼兰的矿区。国际贸易伙伴也不断发生变化。因为自身产业的发展，英国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瑞典的铁，但新兴的美国递补了英国的角色，尤其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它不可能再从母国进口。虽然如此，英国却也在瑞典的采矿产业中发挥了一种同样重要的作用：它提供了如何发展该产业的专业人才的知识。一个代表人物是约翰·詹宁斯（John Jennings，1735—1784），他在旅居巴黎一段时间后定居瑞典，成为瑞典科学院的权威人物。以他在乌普兰福斯马克的庄园为基地，他引入了最新的革新工艺，逐渐成为瑞典最大的铁出口商。

十二、科学发展

如果说18世纪较早期瑞典对植物学的发展是非常重要的，有关它的重要研究和体系化在这个时期实现；那么，在18世纪的较晚期就以化学研究而闻名。其中尤其重要的是化学家、矿物学家托尔培恩·伯格曼（Torbern Bergman，1735—1784），他对这两门学科的深刻洞察力使他能够系统阐述某一种矿物的系统分类，这种分类是基于它们的化学成分和外部表象做出的。他的专著《对地球的物理分析》（*Physisk Beskrifning öfver Jordklotet*）出版于1766年，为他赢得了广泛赞誉，不仅在瑞典，而且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其他国家，以及德国和俄国，都是如此。他闻名于世的另一项成就是通过硫酸的作用从白垩中制造出苏打水，虽然最初的人工制造是由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y）于1767年发明的。这种人造的苏打水作为一种健康饮料后来在全世界流行起来。同样值得书写的是，伯格曼为那个时代瑞典的另一位权威化学家威廉·舍勒（Wilhelm Scheele，1742—1786）提供了巨大资金支持，舍勒以1771年发现氧气而闻名，虽然当时他未就这一发现发表任何东西。由此，使约瑟夫·普里斯特利在1774年发现氧气后，能够首先公布这一信息。1774年，舍勒还首次注意到另一种物质氯的存在，尽管那时他没有

意识到氯是作为一种化学元素存在的。他在所作的其他试验中注意到了光对银化合物的效应，这个发现在 19 世纪被应用于照相技术的发明。

戈特利布·加恩（Gottlieb Gahn，1745—1818）是这一时期另一位重要的科学家，他将矿物学和结晶学的知识结合起来。他在这些领域的深刻造诣使他能于 1774 年发现锰元素。与舍勒一样，加恩也帮助发现了磷酸是尸体的一种成分。他几乎没有什么出版物，但在作试验方面非常积极，改进了提炼铜的工序，这对采矿业具有巨大效用。结果，他于 1784 年在斯德哥尔摩被任命为矿业技术顾问。

这一时期的瑞典还有一位重要的科学人物，他就是植物学家卡尔·佩特·屯贝里（Carl Peter Thunberg，1743—1828）。他是在乌普萨拉大学林奈门下学习的。后来他游历国外，在荷兰在南非的殖民地好望角（the Dutch Cape of Good Hope）进行了广泛研究。再后来他到了日本，他是那时唯一被允许进入其沿岸的荷兰人。在那里，他以长崎湾（the Bay of Nagasaki）的出岛（Dejima）为基地作研究，他是唯一被允许上岸的人。在他于 1776 年离开日本之前，他对日本的植物群进行了全面研究。回到欧洲后，他又因为在伦敦与约瑟夫·班克斯（Joseph Banks）爵士的相识而进一步获得教益，后者是英国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他还研究了德国人恩格尔伯特·肯普费（Engelbert Kaempfer）对 17 世纪日本植物的精美收藏，后者也曾在出岛居住过，不过是在他之前很多年；此外还有库克船长（Captain Cook）在第二次太平洋探险后带回的新植物标本。屯贝里 1779 年返回瑞典，最终完成了他伟大而广博的著作《日本植物志》（*Flora Japonica*），出版于 1784 年。他的其他著作也相继出版，包括描述他在日本各地游历的著作，其中一次他到了日本首都江户（Edo，今天的东京），拜访了幕府朝廷。

144 因此，在古斯塔夫三世于 1786 年组建瑞典科学院时，能够自夸拥有众多不同学科的科学精英。从此，该学院提供了一个聚集场所，供最高层次的精英交流科学思想。它的这种功能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十三、教育

伴随着科学研究和工业技术的发展，对广泛的人口的普及教育同步得到发展，其中读、写和算的技能变得越来越普及。这种趋势得到了宗教教育的促进，后者要为青年接受坚信礼（即成人礼）作准备，这即便不是圣礼，也是瑞典路德教的一种重要习俗。结果，人们普遍能够识字，阅读能力随着路德教宗教价值观的传播而发展。在瑞典的一些地区，一些专门传授教义的人生活在当地教区牧师家里，由教会支付给他们报酬，下到农村地区传播识字技能和基督教知识，例如在拉普兰就是这种情况。不过，深入到萨米族人游牧营地中的传教活动是由萨米人而不是由教会支付报酬的。

一旦将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义灌输给人们，那么提供书籍给他们以获得进一步的知识就成为必要。由于书的价格昂贵，因此建立租赁图书馆的思想在 18 世纪较晚期生了根。它是从刚成立的美国传入的，是在美国国际巡回大使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和第二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倡议下建立的。到 18 世纪 80 年代，这样的租赁图书馆已经在北雪平和卡尔斯克鲁纳建立，许多讨论小组也相继建立起来。这些图书馆能使公众阅读到更广泛的书籍，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尚无力购买图书。在芬兰的瓦萨，上诉法庭的成员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图书馆，以满足自身的兴趣和消遣，这为其他人提供了榜样，稍后就在芬兰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发展起来。

十四、音乐

145

古斯塔夫三世是一位音乐爱好者，也是艺术和戏剧爱好者，因此在他统治期间，瑞典的音乐繁荣起来。1771 年由国王建立的瑞典皇家音乐学院有助于使他的宫廷变成一个具有高度音乐修养的小圈子，其中像卡尔·米凯尔·贝尔曼（Carl Michael Bellman，1740—1795）等著名音乐家能够茁壮成长。贝尔曼是瑞典那个时代最具亲和力的音乐家，他为自己创作的诗歌谱曲，经常随身携带一把齐特拉琴。从那个

时代直到今天，他都受到高度赞誉，尽管他的音乐风格变幻莫测。他是一位受启蒙运动影响的怀疑论者，他的饮酒歌和滑稽模仿《圣经》的歌在瑞典各阶层听众中非常受欢迎（从国王到他最低级的仆人）。他的《弗雷德曼的诗体书信》（*Fredmans epistlar*）开始撰写于1765年，首次出版是在1790年。这是一部较早期创作诗歌的合集，它以一种个性方式对小步舞曲和对面舞曲等流行舞曲做出了重新诠释，明显是受了让—约瑟夫·瓦岱（Jean-Joseph Vadé）等当时流行的法国作家的影响。他的第二部诗歌集出版于1791年，定名为《弗雷德曼之歌》（*Fredmans sånger*），更集中于饮酒和欢宴主题，而不是《圣经》。他同时还是一位高产的戏剧作家，但这些剧本在他去世后才发表。

十五、古斯塔夫三世的改革

像在音乐领域中一样，怀疑论和启蒙运动的价值观在其他领域也表现出来，古斯塔夫三世倡议废除这个国家过去颁布的一些法律，即他视为在更迷信的时代颁布的法律。1779年，他废除了那些与巫术相关的法律，并以其他方式软化那个时代宗教偏执的倾向，但仅限于民意和瑞典教会教士允许的范围内。仍然禁止瑞典人信奉天主教，但天主教移民被允许继续信奉天主教，因为他们的劳动技能是这个国家需要的。1782年，犹太教徒也最终被允许到瑞典定居，他们被允许在居住地区私下进行宗教活动。他们被允许定居在斯德哥尔摩、北雪平和卡尔斯克鲁纳，不过仅限于那些拥有财富和技能的人，他们被认为能够进行富有成效的贸易和工业活动。而他们的权利是受到限制的：手工业行会的成员资格、土地财产的所有权和异族通婚仍然遭禁止。较贫穷、没有技能的犹太教劳工继续不受欢迎，直到19世纪中期。

146

古斯塔夫对监狱改革也很感兴趣。英国监狱改革者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出版于1777年的名著《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监狱状况》（*The State of the Prisons in England and Wales*）对他产生了尤其大的影响，促使他发出改革倡议。他还鼓励戴维·舒尔茨·冯·舒尔岑海姆就犯人的待遇和对他们的改造提出一揽子改进建议，后者是普鲁士

人，在18世纪50年代将天花疫苗接种引入了瑞典。当地瑞典人更接近国内实际情况的监狱改革建议也对古斯塔夫三世产生了影响，尤其是由著名瑞典建筑设计师古斯塔夫·阿夫·席兰（Gustaf af Sillén）设计的一个新模范监狱赢得广泛赞同，他的设计理念是一种改良主义的，他设计的监狱是一个3层的大建筑，其中重犯和罪行较轻的犯人被彼此分开关押，有一个小教堂位于两个主要侧楼之间，是这个大建筑的唯一聚会场所，所有人都被允许在这里聚会。

那时，最受欢迎至少是受到国外启蒙思想家欢迎的是古斯塔夫废除了酷刑，这是在他统治早期实施的。这使他赢得了许多启蒙哲学家，尤其是伏尔泰（Voltaire）的赞许。古斯塔夫三世被赞誉为一位真正的哲学家国王，被列入到俄国的叶卡捷琳娜大帝和普鲁士的弗雷德里克大帝等“仁慈的专制统治者”的行列。

十六、社会福利和性别

尽管古斯塔夫三世在各个层面进行开明的改革，但瑞典在古斯塔夫时期的社会福利仍然非常有限。家庭和婚姻仍然是主要的“社会组织”，绝大多数人在需要时会依赖它们。求助社区或政府的援助通常是不得已所为。丈夫在夫妻关系上拥有控制权，不仅是对妻子的人身、而且也对她们的物质财产。由于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绝大多数瑞典成年妇女都结了婚，所以，这意味着她们由于性别的原因会寻求丈夫或子女的照顾。而对于1800年前剩下的10%未结婚的成年妇女，那些拥有充足财富的人会照顾自己，那些不太幸运的人会继续在需要时依赖其他亲戚关系。只是在最极端的情况下，通常包括所谓自命清高的穷人才会求助当地社区给予帮助，但这种帮助即使被提供也是最低限度的。至于乞丐，在所有时代都会对给予她们的救济施加严格限制，那些“不值得同情”的穷人会被送到所谓的“织房”中，在那里她们被安排生产布料。“织房”是由建筑设计师卡尔·弗雷德里克·阿德尔克兰茨在北雪平建造的，它在1784年成为瑞典最重要的纺织厂。这对整个城市及其收容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许多纺织厂和

147

其他相关的工业企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相继建立，北雪平成为瑞典的纺织业之都。

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妇女一旦陷于贫困，一般也会比那些出身卑微的妇女过得要好些。很久以前就在斯德哥尔摩建立有女王院，在这一时期继续满足中途落魄的贵妇人的需要，为她们提供适度的舒适和保障。它是一个人们竞相寻求进入的庇护场所，要求获得它接待的请求增加到了这种程度，以致 1775 年在它的中心建筑上又加盖了第三层，也是由阿德尔克兰茨设计建造，以为数量越来越大的被收容者提供充足的空间。

十七、卫生与健康

这一时期最伟大的革新并不是在改善社会福利基础设施方面，而是在采取措施进行疾病预防方面，尤其是在 1801 年引入疫苗接种以预防天花。5 年前，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Edward Jenner）发现，至少在几年内牛痘疫苗有可能对这种疾病提供几乎完全的免疫能力。结果，在接下来的 10 年中，由于引入和推广使用这种疫苗，天花在瑞典的发病率急剧下降。

148

另一方面，性病感染在这一时期仍然是一种严重危害健康的问题。梅毒在 16 世纪早期已经传入瑞典，到 17 世纪晚期已经变为一种地方病。18 世纪晚期，瑞典医学院（the Swedish College of Medicine）宣布国家处于危险中，但却几乎未产生什么效果，因为并未采取坚决的措施来控制它，因此，这种疾病继续在瑞典的各个社会阶层吞噬人们的生命。特别是在部队从战场返回后，他们又从国外带回了热病和其他多种疾病。只是到 19 世纪较晚的几十年中，卫生和健康状况才开始有显著改善，这主要是卫生设施得到改善的结果，同时也应归功于比较好的饮食。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正如后来世界广泛注意到的，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岁月里，在瑞典，和平、疫苗和土豆带来了无法否认的好处。

第七章　宪政时期的瑞典

一、对王权专制统治的不满

149

在古斯塔夫三世遇刺后的几十年间，瑞典所走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具有宪政色彩。不过，它在这条道路上的发展绝非一帆风顺。当仍然是孩子的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Gustaf IV Adolph，1778—1837）继承王位时，瑞典的政治未来似乎非常琢磨不定。尽管原国王的兄弟卡尔公爵（Duke Karl，1748—1818）正式担任摄政王，但政治权力实际却掌握在古斯塔夫·阿道夫·鲁特霍尔姆男爵（Baron Gustaf Adolph Reuterholm）手中。他是一位政治家，曾在古斯塔夫三世统治期间由于政见的对立被短暂囚禁，但此时他受到了一个强有力的联盟支持。而这是在法国大革命的背景下发生的，它导致欧洲的普遍军事冲突的爆发，瑞典被迫要在这场冲突中选择一种立场。

最初，瑞典能够采取“武装中立”的立场，与它以前的敌人丹麦结盟。不过，它目前所享有的贸易繁荣使它与旧盟友英国处于对抗状态，后者试图通过海上封锁在经济上孤立和困死法国。1801 年，瑞典的海军港口卡尔斯克鲁纳受到英国海军的威胁，瑞典被迫妥协。然而，此时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与一些不满的贵族之间的内部对抗导致了一场政府内的冲突，并引发了国际政治的反响。这些矛盾不可能轻易解

150

决，前者是一位坚定的独裁者，在成年后于1796年继承王位，后者是一些同情法国革命思想的贵族。瑞典国会于1800年在北雪平召开，会议混乱无序，证明国王缺乏足够的支持。由此他拒绝再召开任何这样的会议，而对他统治的敌意在大范围的人口中不断加剧。在国王和国会处于僵持状态时，不利情势由于瑞典与俄国关系的再次恶化进一步严重，而这对芬兰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争夺芬兰的战争

几个世纪以来，芬兰一直是瑞典王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在国内和国外，它被许多人视为一块非常原始的土地，但它对路德教的忠实和在东部边境与俄国的敌对状态赋予了它一种中心的地位，即在瑞典进攻性军事战略中的中心地位。此外，其中操芬兰语的人口越来越多地吸引着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而这种兴趣是由该种语言的芬兰乌戈尔语族的起源和他们被视为具有异域风味的民族而引起的。在《北欧通史》(*Algemeine Nordische Geschichte* ）中，德国历史学家奥古斯特·路德维希·舒泽尔（August Ludwig Schözer）写到芬兰的土著居民，指出："如果芬兰人既不是塞西亚人或萨莫耶德人，也不是匈奴人或希伯来人，那么他们究竟是谁？对，他们就是芬兰人，这是我必须得出的结论。我对他们的族谱不会再作进一步的追溯，我不知道在芬兰人与诺亚人之间有任何祖先上的联系。"但与此同时，芬兰又被其他人描述为"欧洲的加拿大"，是一片尚待开发的土地，这对它急剧增长的人口而言充满了经济机会。正像在新建国的美国一样，欧洲殖民者与当地的土著"野蛮的印第安人"形成鲜明对比，因此埃博学院的教授亨利克·加布里埃尔·波尔坦（Henrik Gabriel Porthan，1739—1804）能够在1789年坚持认为，"俄国人确实是亚洲人，而斯堪的纳维亚人则是欧洲人"。因此，不会令人感到奇怪，俄国和瑞典之间的决定性对抗将在芬兰决出胜负。

当然，瑞典此时还有其他敌人。因为到1805年，在俄国和英国强大的压力下，瑞典在波美拉尼亚被迫卷入与拿破仑治下的法国对抗。

诚然，瑞典本土逃过了法国的占领——这种占领使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都遭到蹂躏，但当《提尔西特条约》（the Treaty of Tilsit）于1807年签署时，俄国突然改变立场，与法国结盟。这样，在南部和东部，瑞典突然受到孤立，无力阻止波美拉尼亚迅速被拿破仑的军队占领。而更糟的是，俄国在1808年2月利用了这种情势入侵瑞典。那时，俄军大约有24 000名士兵，在利沃尼亚将军弗雷德里希·威廉·冯·布克斯赫夫登（Friedrich Wilhelm von Buxhoevden）的领导下；瑞典军队仅有16 000人，在威廉·莫尔蒂茨·克林斯波（Wilhelm Maurtiz Klingspor，1744—1814）的领导下进行抵抗，但于事无补，因为援军被封冻的波罗的海所阻。虽然瑞典避免了被法国军队占领，但它的南翼和西翼遭到了俄、法两国的盟国丹麦的进攻，而这方面的威胁更大，因为已经无法从其他地方抽调援军增援。尽管英国海军提供了援助，使瑞典在芬兰的军队能够向西北撤到东波斯尼亚，等待春天到来重新向南部发起进攻，然而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发生了：有7 000人在卡尔·奥洛夫·克朗施泰特（Carl Olof Cronstedt，1756—1820）领导下驻扎在斯韦堡要塞保护赫尔辛基，但他们却突然投降了。这是一个重大打击，尽管瑞典在东波斯尼亚的拉珀（Lappo）和萨沃的沃塔布罗（Virta Bro）取得了胜利，但俄国人在芬兰占据了上锋。1809年初形势进一步恶化，此时芬兰南部的沿海地区也遭到攻击。看到胜利就在眼前，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于该年3月强迫芬兰各等级在波尔沃（Porvoo，瑞典语是伯尔加［Borgå］）召开会议。在那里，他们被迫接受他为大公，虽然附有限制条件，即他将尊重公国的内部自主性。和约于1809年9月17日在哈米纳（Hamina，瑞典语是弗雷德里克斯哈姆［Fredrikshamn］）签署，瑞典将芬兰割让给俄国已经变为不可逆转的既成事实。尽管大片土地由此而丧失，但沿东部边界存在的长期摩擦大为减轻，而正是这些摩擦在几个世纪以来使俄国成为瑞典的世仇。此后，瑞典与它以前的敌国俄国未再发生进一步战争。

不过，灾难带来了创伤，瑞典1/3领土的突然丧失使许多瑞典军官对国王心存不满，他们联合起来策划了一场政变。卡尔·约翰·阿

151 152

德勒克鲁茨（Carl Johan Adlercreutz，1759—1815）上校是他们的领袖，他是芬兰尼兰（Nyland）地区的当地人。他们逮捕了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宣布将他废黜。接着，国王的叔叔卡尔公爵恢复了瑞典的摄政制。1809 年 6 月 6 日，一种新的政治体制被确立，王权专制统治被搁置——这是自古斯塔夫三世政变以来一直实施的制度，旧的摄政王被选为卡尔十三世国王。尽管新国王被批准有宣战和媾和的权力，但国务会议的权力被再次确立并加强。而且，瑞典国会正式剥夺了被废黜的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后代的继承权，并将他流放，他最终死在了瑞士的圣加仑（St Gallen）。至于芬兰，它的丧失已无可补救。

由于卡尔十三世此时已上了年纪，而且没有合法的子女，所以他收养了丹麦王子、基督教徒奥古斯特·冯·奥古斯滕堡（August von Augustenborg），选择他做继承人。不过，这位继承人突然于 1810 年早夭，尽管是出于自然原因，但却被许多瑞典人尤其是首都的人质疑。当他的送葬队伍行进到斯德哥尔摩时，那里爆发了群众骚乱。国家警察局局长小阿克塞尔·冯·费尔森（Axel von Fersen the Younger，1755—1810）是皇后玛丽·安托万内特（Marie Antoinette）年轻时的密友，与不受欢迎的、被罢黜的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关系密切。他在送葬队伍中被从乘坐的马车上抓下来杀害了。骚乱最终平息下来，而国王迫在眉睫的责任是选择新的继承人。这次他选择的是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元帅——以尚武闻名的让·巴普蒂斯·贝纳多特（Jean Baptise Bernadotte，1763—1844）。人们徒劳地希望，他有能力帮助瑞典重新夺回芬兰并提高它的军事地位。尽管在那一年瑞典成功地与丹麦和法国缔结了和约，但重新收回芬兰的目标却从未能实现。对新国王而言，他将俄国视为一个必需的盟友而不是敌人，将芬兰公国让给沙皇，而将注意力集中于未来对挪威的征服，所谓“1812 年政治”的一个中心特征就是这样的设想。那一年贝纳多特在土尔库与亚历山大一世会晤，结果是瑞典与它以前的敌国俄国结盟，后者承认了贝纳多特作为瑞典王位继承人的地位。他以卡尔·约翰这个新名字进行统治。

153 1812 年，法国进攻俄国，贝纳多特与法国决裂，帮助俄国在莱比

锡战役中打败了拿破仑。他同时向丹麦统治的公国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进军，以武力威胁丹麦将挪威割给瑞典，这一结果由 1814 年的《基尔条约》（the Treaty of Kiel）予以了肯定。经过一系列在挪威举行的军事战役和随后进行的谈判后，尽管挪威人民明显倾向由丹麦国王统治他们，但挪威的王冠被授予了卡尔·约翰。虽然该国被承认有它自己的宪法和国内政治、经济自主权，而且与瑞典结成一种新的松散联邦，但这仍然不受挪威人民的欢迎。如果说决定战后整个欧洲解决方案的维也纳会议（the Congress of Vienna）认可了瑞典新获得的这块领土，表面上看似乎对瑞典有利，但它却同样认可瑞典失去德国北部的领土，所以在这项新的解决方案中普鲁士是赢家。

这些领土主要转归普鲁士控制，瑞典国内和国外的许多人都扼腕叹息，其中最感惋惜的是德国艺术家卡斯帕尔·戴维·弗雷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1774—1840）。他是在瑞典统治下出生的，作为瑞典治下波美拉尼亚的格拉夫瓦尔德的当地人，他深受虔信派的影响，如我们所看到的，该教派起源于德国和瑞典，而它所产生的影响要比瑞典统治的政治遗产更持久。他在拿破仑战争激战正酣时创作的颇具影响的台岑祭坛画（Tetschen altarpiece）《跨越巅峰》（Cross in the Mountains，1807 年创作）是要祈求保佑瑞典人，而且是献给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国王的。这幅画充满了象征意义，多次被瑞典人提到。在另一幅画作中，他将自己年轻的儿子古斯塔夫描绘为一个充满激情的路德教徒，挥舞着瑞典国旗，而且正是为纪念他如此钦佩的瑞典国王才为儿子取了这个名字。最值得注意的是，正是瑞典的神秘主义者斯韦登伯格对他产生了最大影响，但是通过哲学著作，而不是任何政治教条对他产生的影响。这种神秘主义是瑞典人对他影响的核心所在，它最明显地表现在弗雷德里希的风景画中，其中包含许多神秘的关联。他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正如他本人所写的："画家不仅应画出他所看到的东西，而且要画出他在内心世界中看到的东西。如果他心中无物，那他就不应该作画……"像此类的心灵暗示尽管影响很大，但却并未产生什么政治反响。的确，它是目前在这块土地上仍然保留的最后痕迹，那是瑞典在长达几乎 2 个世纪 154

之久的统治中遗留下来的。

三、卡尔·约翰

伴随着卡尔十三世于1818年的去世，荷尔施泰因—戈托普王朝在瑞典结束。接替它的位子，让·巴普蒂斯·贝纳多特作为卡尔十四世约翰（Karl XIV Johan）登上王位。像之前的古斯塔夫三世一样，新国王也对艺术和建筑感兴趣，但不如前者那么奢华，而是更实际一些。他主要的意图是给他的新王朝以必要的支撑，在有益于这个目标的背景下做出相应的装饰，赋予其历史象征意义。像古斯塔夫三世一样，他也非常喜爱雕塑家塞戈尔。确实，在他作为皇太子时，他就曾于1810年拜访过这位高龄的新古典主义者的工作室。8年后，在他执掌王位时，他改变了在艺术风格上的偏好。在成为国王后不久，原来的艺术家和雕塑家学院改名为自由艺术学院（the Free Academy of Arts），他向它捐款1万瑞典圆。此时他的兴趣已转向法国，而不是意大利的艺术风格。他和他的配偶德西德利娅（Desideria）王后都是法国人，他们都沉浸于法国文化。据说，欧洲人都狂热地模仿马尔梅松宫（the Palace of Malmaison）的装饰艺术，它是法国皇后约瑟芬（Josephine）在巴黎郊外的住所，是由夏尔·拜西埃（Charles Percier）和皮埃尔·弗朗索瓦·莱昂·封丹（Pierre-François-Léonard Fontaine）设计的，这种偏好扩及到了瑞典。它所蕴涵的政治象征意义和哲学表现性，使它似乎成为传达新国王希望强调的价值观的理想手段。因此，卡尔·约翰的新罗森达尔宫（Palace of Rosendal）就从马尔梅松宫那里汲取了灵感。它位于斯德哥尔摩郊外的皇家鹿园（the Royal Deer Park）内，由瑞典建筑设计师弗雷德里克·布洛姆（Fredrik Blom，1781—1853）于1824年到1831年设计建造。国王对该建筑的建设抱有浓厚的兴趣，他亲自监督了部分工程的进行。最终它将新古典、哥特和古斯堪的纳维亚元素融合在一起。对各种风格的兼收并蓄，使得卡尔·约翰能够不仅将自己与希腊和罗马的古典寓意联系起来，而且也与北欧当地的风格相联系。例如，在图书馆中，一个罗马人西塞罗

(Cicero) 的雕像被放置在古斯堪的纳维亚神海姆道尔旁边，他是作为人类之父的神。与此类似，在红色沙龙（the Red Salon）中装饰的雕像不仅包括马略（Marius）和苏拉（Sulla）这两位罗马国家的缔造者，而且包括古北欧神奥丁，后者不仅是军事力量的象征，也是拿破仑的前元帅喜欢将自己比作的人物。约翰·尼克拉斯·毕斯壮（Johan Niklas Byström）或本特·厄兰·佛格柏（Bengt Erland Fogelberg）等雕塑家此时都涌现出来，前者的伟大作品《作为战神的卡尔·约翰》（Karl Johan as Mars，1816年）被用于装饰斯库克洛斯特城堡，后者是奥丁神雕像的创作者。两人都深受瑞典诗人埃里克·古斯塔夫·盖谢尔（Erik Gustaf Geijer，1783—1847）的影响，而后者还是乌普萨拉大学的历史学教授，是将哥特式风格与古北欧神话联系在一起的关键人物。在这方面，他受到珀尔·亨利克·林格（Per Henrik Ling，1776—1839）的帮助，后者是所谓的“瑞典体育运动之父”。林格的《埃达诗的象征》（Symbols of the Eddas）是又一部有助于培植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认同的重要作品，这种认同有别于地中海世界由古典文化所激励的认同。

155

156

出于相同的原因，卡尔·约翰也要使挪威获得适当的修饰，其时他已凭借拿破仑战争的解决方案成了那里的国王。他下令在首都克里斯钦尼亚（Christiania，现在的奥斯陆）的一个至高点建造皇宫，它下面的一条街道被恰当地命名为卡尔·约翰街，这项工程在19世纪20年代启动。与此同时，在瑞典，他参与了瑞典最大图书馆卡洛琳纳·雷迪韦瓦（Carolina Rediviva）在乌普萨拉大学内的建造工作，这个馆址是他在1812年选定的，尽管那时他还只是皇太子。这些建筑不仅是卡尔·约翰建筑和审美偏好的重要见证，也是他自身政治和社会观念的体现。他能够将这些与新的瑞典意识相结合，它们的灵感源自浪漫主义的文学和艺术风格，而这在那时是时兴的。此时，国王的许多臣民首次开始将他们自身视为公民而不是臣属，要在社会和政治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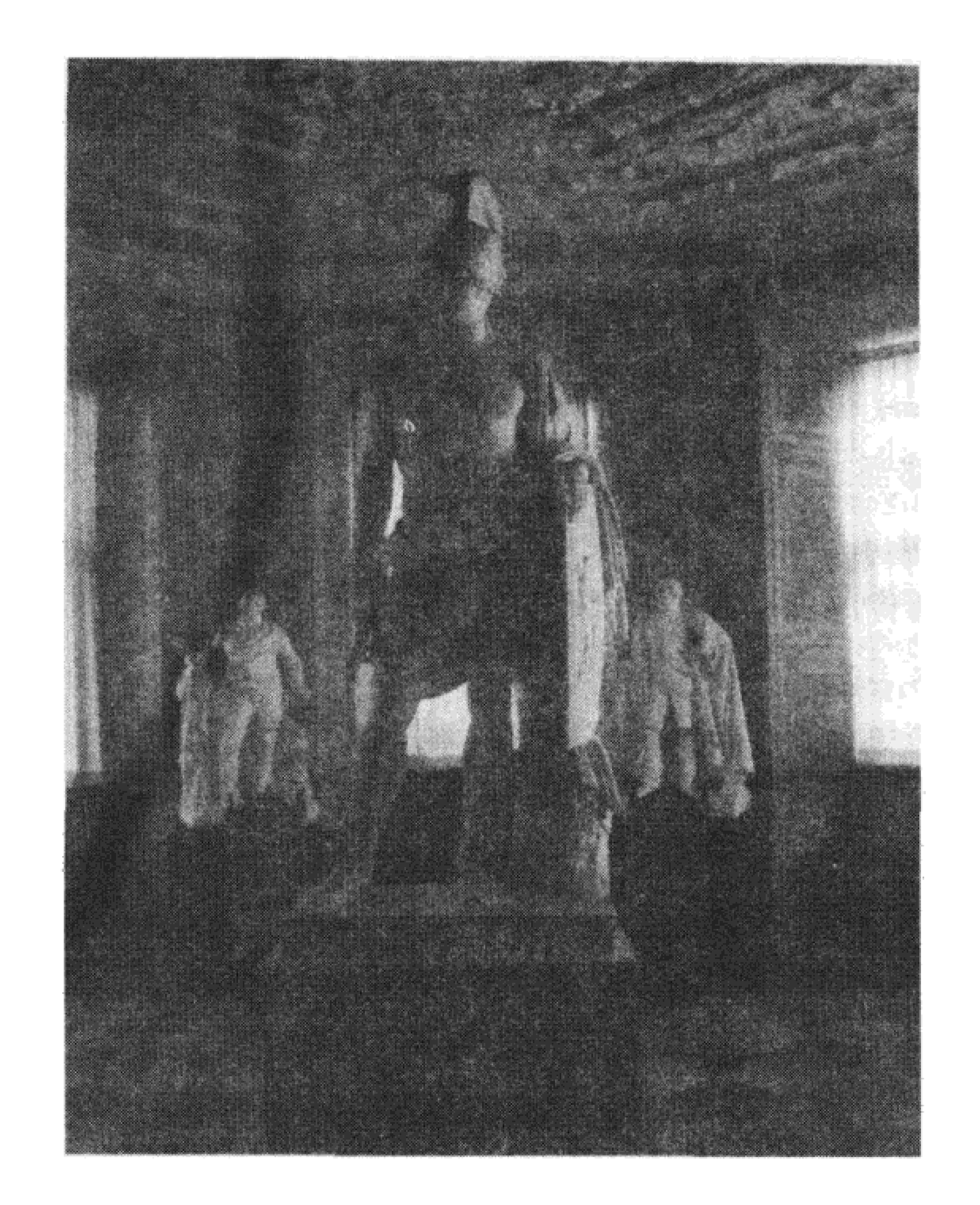


插图10　作为战神的卡尔·约翰国王的雕塑（1816年）。约翰·尼克拉斯·毕斯壮创作，放置在斯库克洛斯特城堡。卡尔·约翰是一个新王朝的缔造者，该王朝直到今天仍然统治着瑞典。法国拿破仑时期的元帅让·巴普蒂斯·贝纳多特（1763—1844）以卡尔·约翰之名出任瑞典国王，他热衷于将自身与古典和古北欧的神和英雄联系在一起，他们那时激励着北欧大部分地区文化的发展。由他授命完成的雕塑、绘画和建筑所暗示的寓意提供着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

不过，卡尔·约翰留给瑞典最重要的遗产还不是在这些方面，而是在另外一个方面，即他采纳了政治中立的政策。这种立场在当时的国际法中并没有基础，就像瑞士的中立是由维也纳会议承认，在1815

年后实现的；比利时是在1830年以后实现的。它应当归功于国王本人的首创精神和对这种立场的长久坚持。他在1843年发布了一份备忘录，确认这种“严格和独立的中立政策”，这是他在执掌王位后为他所入籍的国家制定的政策。但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奥斯卡一世（Oscar I）及后者的儿子卡尔十五世（Karl XV），对这种立场的倾心程度则要低得多。但是，他政府的许多成员以及民意支持他，促使这种政策延续下去。而且它那时已经有迹象与不断增强的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Pan-Scandinavianism）呼声相结合，后者是在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流行的一种寻求与北欧国家在政治上联合的倾向。尽管19世纪40年代末的革命及其后果导致瑞典中立政策的暂时中止，但它的持久性经受住了考验，这一中立政策一直延续到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 157

四、经济发展

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间，瑞典仍然是一个农业主导的社会。瑞典的农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中期，给社会带来重大的动荡，但这些问题大体已经解决。不管怎样，1827年颁布的新法律，即所谓的圈地（laga skifte），部分原因是由于农村地区持续的人口过剩引发的，它的结果是小块农业用地合并成较大单位。这就要求那些甚至在边远地区居住的农民也需离开他们的家乡，在新开垦的土地上重新安家，由此来提高效率。而此前的法律并未包括这些地区。由于这些在农村发生的变化，旧的组织农业生产的村社团体已经过时，它被新的资本主义公司所替代。

效率和生产率成为座右铭，激励那些在政府圈中的人进行调查研究，而后引进最新的技术成果，这在农业和工业生产中都是如此。他们认为，这是瑞典城乡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因此，政府于1801年派遣公务员亚伯拉罕·尼古拉斯·艾德尔克兰茨（Abraham Niclas Edelcrantz，1854—1821）出国考察，获得有关新涌现的技术方面的知识，并研究如何将它们应用于瑞典。作为这种主动学习的结果，他带回了一种新改良的光信号技术及4台蒸汽机，前者是由法国人克劳德·乔

皮（Claude Choppe）首先开发的，后者是由斯科特·詹姆斯·瓦特（Scot James Watt）发明的。蒸汽机立即被投入实际应用：其中一台很快就被用于为利迪格（Lidingö）的一家纺织厂提供动力，利迪格是斯158 德哥尔摩的一个郊区。其他两台被用于为首都的酿酒厂提供动力，第4台为丹内马拉（Dannemora）的一个矿井提供能量。

与瓦特一道工作的萨缪尔·欧文（Samuel Owen，1774—1854）来到瑞典，为瑞典的技术发展提供了帮助。他也是在英国出生的，是一位虔诚的卫理公会教徒。定居在斯德哥尔摩后，欧文订购了第5台蒸汽机来为首都国王岛（Kungsholmen）上的一家工厂获得动力。到19世纪30和40年代，大量棉纺厂以这种方式来提供动力，它们在瑞典的许多城市发展起来，包括北雪平、哥德堡和布罗斯（Borås）。这些工厂所需要的棉花是从美国南部的各蓄奴州进口，一直到1861年美国内战爆发。

作为将瑞典所需的财富和商业技巧带进来的一种途径，更多的犹太移民被鼓励来瑞典。他们在北雪平、哥德堡和斯德哥尔摩定居。一些新到的移民是在德国居住的富裕犹太家庭的子女，他们通常来自以前瑞典在西波美拉尼亚的领土以及相邻的梅克伦堡。到1815年，大约有800名犹太人居住在瑞典。他们在商业和贸易方面、尤其是在纺织业方面的才智被证明对这个国家的经济非常有益，致使他们逐渐被授予更大权利。到1838年，曾经加诸于他们身上的绝大部分限制都被取消。

造纸业也在这一时期获得显著发展。新的工业机械在19世纪初被引进，这些机械是根据尼古拉斯—路易·罗勃氏（Nicholas-Louis Robert）于1799年在法国的发明制造的。它大大提高了质量，降低了成本，并增加了产量。结果，人口稀少但树木繁茂的诺尔兰地区成为企业开拓的新边疆，吸引了许多人从事这种产业。

交通的改善也在这一时期实现，这对整个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是这一时期运河的建设，它大大便利了商品从瑞典内陆地区向沿海地区的运输，从国界这一边向另一边的运送。塞德特里耶运河

（The Södertälje Canal）于1806年开始建设，完工于1819年；亚尔马运河（the Hjälmare Canal）完工于1830年；最重要的是约塔运河，完工于1832年。约塔运河的修建计划是由苏格兰土木工程师托马斯·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根据英国原型设计的 。约塔运河将瑞典的北海沿岸与波罗的海沿岸相连接，从西部到东部的路程大约347英里；它的建设由6500多名士兵完成，由陆军元帅巴尔察·冯·普拉敦（Baltzar von Platen，1766—1829）指挥。这位元帅是前瑞典属波美拉尼亚的总督和后来的挪威总督。这项工程花了40多年才完成，而且是在冯·普拉敦死后才完工的。但那时它已被证明是一项昂贵而低效的工程，不仅因为河水在1年的至少1/3的时间封冻，大大降低了它的利用功效，而且因为瑞典的铁路时代在此后不久就将到来，它提供更廉价和有效的替代形式，并且可以全年利用。 160

正是铁路真正使瑞典的内陆地区向外部开放，新的城区沿着铁路线迅速发展起来。据说，斯德哥尔摩被证明是主要的受益者，它吸引了大量来自农村的工人。甚至早在1815年，即在铁路时代到来前的一些年中，它就自夸有大约10万人，在人口数量上可与哥本哈根相比肩，由此成为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两个人口最稠密的大都市之一，当然更是瑞典最大的城市。这种新赢得的重要地位依赖良好的运输系统来确保它的发展和繁荣，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又依赖于基础设施的显著改善。如果没有劳动力持续不断地进入首都，它不良的卫生状况、不利于健康的环境条件和低出生率，不可能使它的人口实现自我增长。但当劳动人口能够维持生存并且不断增加以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新的解决办法。新的限制因素的出现是由于旧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能适应工业时代新的需要和要求。不仅是在首都而且在许多其他城市和地区，像手工业行会和封建社团等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因为已不能吸纳这些新到来的人而变成发展的障碍，结果最终被废除，这导致一种更开放的市场经济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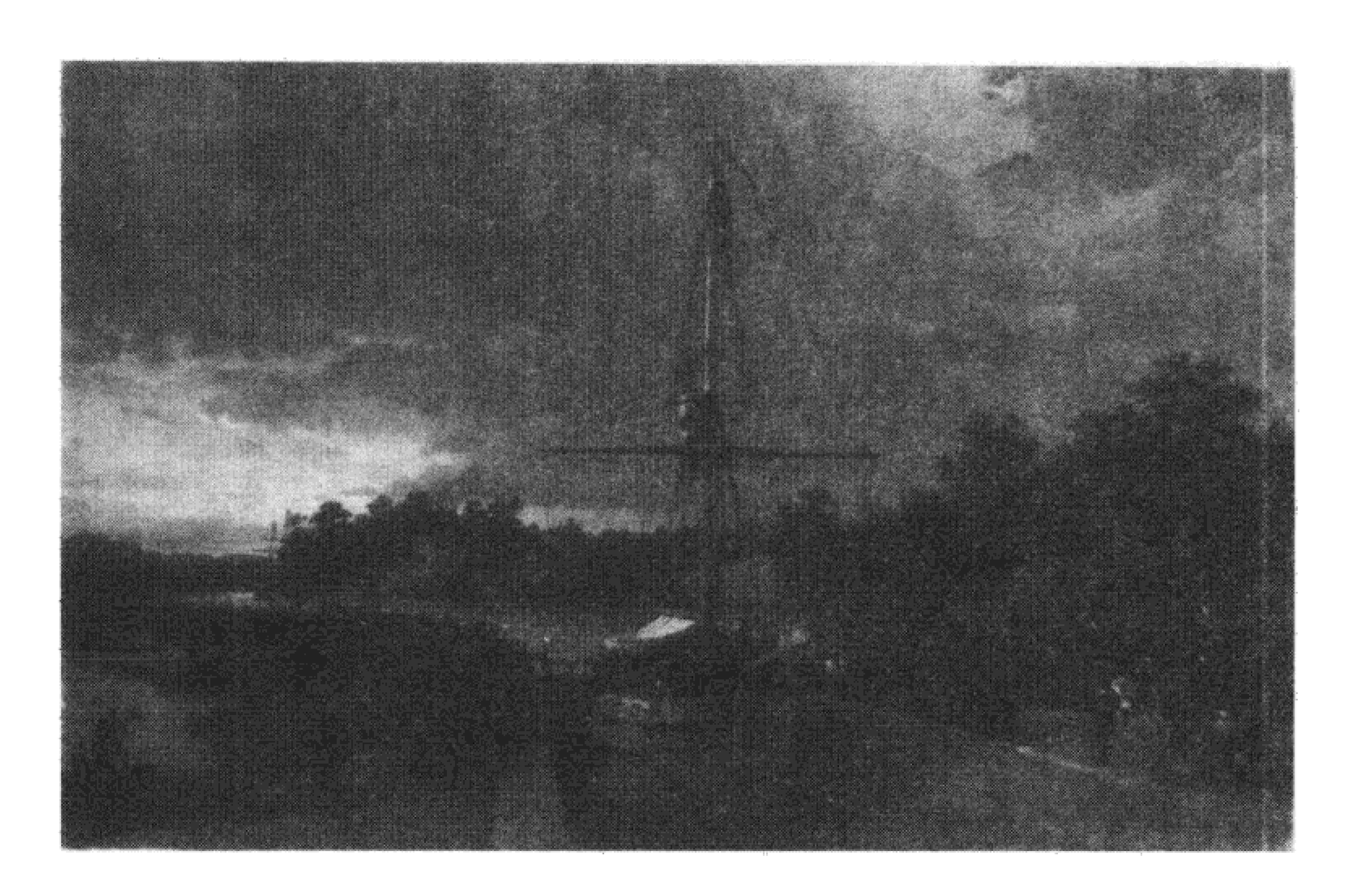


插图 11 约塔运河于 1832 年 9 月 26 日开通。约翰·克里斯汀·伯杰（Johan Christian Berger）创作的油画。19 世纪早期是欧洲运河建设的伟大时代，约塔运河是一项促进工业发展的重大事业，它成功地将瑞典东西海岸连接，由此使瑞典的内陆地区开放，大大减少了海路运输的时间和成本。不过，它的用途由于瑞典漫长冬季导致的运河封冻和铁路时代的到来而大大降低。油画存放于斯德哥尔摩的国家博物馆。

五、卫生与健康

161 与改善交通和技术发展所采取的方法类似，瑞典同时启动了有条不紊的步骤来提高公众的健康。其结果是，已开始在减少疾病发病率上取得重大进展。英国的有关“什么样的创意对改善卫生与健康最有效”的论著在瑞典引起巨大兴趣，这在行政管理圈和学术界都是如此。结果是采取的新举措都奠基于最新的医学理论。正如我们上面看到的，瑞典在这方面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在 1801 年引入疫苗接种以防御天花。而直到此时，许多受害者的命运仍不仅由于疾病本身致命的后果所决定，而且还受它引起的恐慌所影响。例如，一位在拉普兰的托

尔尼奥（Torneå）行医的内科医生写道："在传染病开始流行时，几个萨米家族迁移到挪威。对他们而言，将老人遗弃在家中或将那些被传染的亲戚遗弃在路上，听天由命，这并不罕见。"确实，不仅那些远房的亲戚被抛弃，而且丈夫、妻子和孩子也可以是如此。

到19世纪20年代，疫苗接种在法律上已经成为强制性的，所以接种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致天花感染率显著下降。在18世纪90年代，瑞典在10年中死于这种疫病的人数曾达到41 000人；但到19世纪20年代，根据那时的教会记录，死亡人数下降了90%还多。事实上，到那时，已有不少于3/4的瑞典儿童接受疫苗接种，相比欧洲其他国家的接种情况，这是一个非凡的成就。据说，这个国家的各个地区在受益程度上并非均等。在遥远的拉普兰，疫苗接种首次被引入是在19世纪20年代，大大晚于其他地区；而且它在这里的功效也并不明显，因为在未进行疫苗接种的情况下，这种疫病的死亡率在前一个10年就已经显著在下降，其中的原因至今仍不清楚。

162

在1809年专制制度垮台后，市民社会的产生更多地是基于公民的权利，因此国家采取了广泛的创意来改善各个方面的健康和医疗服务，其中许多是继续以英国为榜样。结果，在整个19世纪，许多新的医院被建成。这种趋势与瑞典国家官僚体制的中央集权化进程是一致的。因此，新医院的建设主旨是鼓励在大城市附近建立大的医疗机构，以替代过去散布于各地的较小的医院。例如，乌普萨拉附近的乌勒阿克尔医院（Ulleråker），从19世纪30年代就开始收治远至韦斯特罗斯、甚至更远地方的病人，而且能够对他们做出更有效、更低价的治疗。

在治疗和护理方面的改革也在这一时期被引入，这是在诸如法国人菲利普·皮内尔（Philippe Pinel）等国际改革家的影响下实现的。皮内尔是法国毕希特（Bicêtre）精神病院的住院医师，他的《精神错乱或癫狂的医学和哲学理论》（*Traité médico-philosophique de l'aliénation mentale; ou la manie*）出版于1801年，产生了巨大影响，他鼓励对精神病做出治疗，而不是单纯的禁闭。作为他发起的运动，观光客不再被允许参观精神病院来以观看病人作为一种娱乐形式。在

斯德哥尔摩附近的丹维克精神病院等都在 19 世纪 20 年代进行了重大修缮，以为每个病人提供更大的空间。

这时还建成了许多新的医院。在斯德哥尔摩汉特沃卡戈坦（Hantverkargatan）的部队医院，是由非常富有创造性的建筑设计师小卡尔·克里斯托弗·约尔维尔（Carl Christoffer Gjörwell the Younger，1766—1837）设计建造的，他是根据“理性主义”原则设计的，将宿舍和病房分置于一个中心通道的两边，那些房间都在一个正门后面，正门被装饰成一个宽的有多根多利安式门柱的中心门廊。它于 1834 年开门营业，成为那个时代的一所模范医院，一直使用到 1969 年。

尽管天花的发病率在急剧下降，但其他长期肆虐的疫病仍在瑞典继续为害。在瑞典沿海岸的沼泽地区，尤其是东南部满布沼泽的地区，疟疾从远古以来就是长期流行的地方病，每年都会传染数万人。当其明显症状暂时减轻时，也是使人们处于非常虚弱的状态。虽然如此，163 但它在瑞典造成的灾害要比在瑞典位于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圣巴特勒米岛造成的危害轻微得多，这是依据患者相对于人口规模的比例而言的。在殖民地，源于疟疾和其他热带疾病的死亡率特别高。在 1805 年到 1815 年间来到殖民地定居的 33 位瑞典人，有 29 名在那个时期结束时已经死亡，而且主要是由疟疾致死的。黄热病甚至更严重，病菌是定期由到达它的首都古斯塔维亚港口的船只带进来的，对当地居民尤其是那些出身欧洲的居民带来毁灭性影响，却没有产生任何基因上的抵抗能力。

这种疾病也在瑞典国内引起恐慌。黄热病在美国的北方港口（如波士顿等地）爆发的消息传到哥德堡后，当地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船只在那里登岸。政府于 1834 年在哥德堡列岛中的坎索岛（Känsö）设立检疫站，对来自西班牙在美洲大陆殖民地的船只进行疫病检查，它们满载着腌制瑞典鲱鱼所需要的盐。每当那里的传染病产生威胁时，船只就被迫转向到坎索岛接受检查。幸运的是，黄热病并没有在瑞典爆发，但另一种同样严重的新传染病霍乱却爆发了。

霍乱病菌是于 1834 年由船只首次带进瑞典的。哥德堡成为最早的

受害地区，在大约几个月内有1/10的人口死于这种疾病。此后不久就是斯德哥尔摩遭难，但较为幸运的是，它的死亡率仅有哥德堡的一半。遥远的农村地区大体幸免于这种疫病带来的灾难。尽管设立了12个暂时医院来医治这些患者，但在这种传染病肆虐瑞典期间，仍有12 000多人丧命。到秋天时，霍乱的发病率开始下降，但1850年再次爆发，肆虐了许多港口城市，而农村地区再次相对地未受影响。霍乱的流行清楚表明需要改善城市地区的卫生设施，普遍建设污水排放管道、引入来自清洁水源的管道供水与普遍使用抽水马桶等。作为这些改善的结果，稍后一些传染病尽管跨越波罗的海肆虐了俄国和德国，但却没有进一步袭扰瑞典。

性病传染也是瑞典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由于感染此类疾病的士兵和海员回国而加重。尤其是梅毒成为一种严重的问题。为了抑制它产生长期影响，政府在全国设立许多诊所，由1815年为此目的而征收的一种特别税提供资金。 164

据说，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瑞典人饮食的改善有助于培养较高的抵抗力，可以抵御广泛的疾病。尤其是马铃薯在这个时期的种植被证明对农民是一种恩赐，它为农村地区的大部分穷人提供了更好的营养，特别是在冬季的几个月里。在拿破仑战争期间，马铃薯被视为谷物最好的替代物，谷物的进口是由于英国在1807年到1814年间的封锁而变得困难。自1816年以来能够合法地从马铃薯中蒸馏酒精只是一种额外的收益。

六、对妇女限制的逐渐放宽

尽管不断拓展的交通联系带来了传染性疾病而威胁到瑞典，但扩大联系也带来新的收益，尤其是就业机会的增加。的确，妇女支配她们自己的生活，寻求她们所希望做的有报酬的工作，这种自由也有赖于交通状况的改善。汽船引入瑞典，既方便了旅行，也便利了迁移，尤其是在19世纪20年代航线实行固定时刻表以后。这些交通路线既有国内的也包括国际的：1836年引入了将斯德哥尔摩与其他波罗的海

诸港口相联系的固定交通服务。同样重要的是，济贫法（Poor Laws）在19世纪40年代被放宽，取消了对改变居住地点的限制，由此鼓励了工人向城市地区大量流入，在那里他们能够获得更广泛多样的工作机会。更具体地看，取消这些限制使许多妇女能够离开家，脱离家务劳动去寻找工作：到工厂做工，甚至是去当妓女。

社会道德观念也变得更为宽容，尤其是在城市地区和殖民地。在圣巴特勒米岛，欧洲妇女是人口的极少数，纳妾几乎成为一种社会时尚，而纳妾对象几乎都是黑人或混血妇女。来自圣母升天教堂（the Church Lady of the Assumption）的当地天主教牧师对这种状况提出异议，但没有用；该教堂建于1829年，是为当时占人口多数的天主教社区服务的。罗伯特·蒙哥马利（Robert Montgomery）是古斯塔夫三世的一位宠臣，他由于参与安亚拉叛乱（the Anjala Mutiny）而被流放到殖民地。正如他在日记中所描述的那样，所有人都劝他纳一个黑人妇女为妾，因为这对在炎热得使人无精打采的气候下维持健康是非常必要的。对那些渴望在殖民地结婚的人而言，婚礼配套服务都成问题，因为经常找不到牧师来主持婚礼仪式。因此，在19世纪20年代，由于缺乏牧师导致许多未婚夫妇开始家庭生活。连总督都认为，引入某种形式的公证结婚是合适的。

165

七、圣巴特勒米岛经济的崩溃

伴随拿破仑战争的结束，那些使瑞典在加勒比地区的殖民地保持繁荣的有利条件突然消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事实造成的，即英国、法国和荷兰的诸港口的正常贸易在过去由于战争而受到了影响，而这时都恢复了它们的商业活动，从而抢走了圣巴特勒米岛的生意。其他问题也困扰着殖民地：由于新的更廉价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开拓，蔗糖和棉花的价格急剧下降，不仅在圣巴特勒米岛，而且包括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都成为这次加勒比地区经济大崩盘的受害者。许多奴隶在1817年的饥荒中被饿死。尽管那里在1818年后仍有与西班牙在加勒比地区沿海殖民地的贸易，但相邻的丹麦的殖民地圣克鲁

瓦（St Croix）和圣托马斯（St Thomas）也成功攫取了圣巴特勒米岛以前的大部分生意。

据说，在殖民地也有一些积极的发展。例如，在随后的一些年中进口了一台印刷机，一份定期出版的报纸开始发行。尽管如此，持续的经济下滑导致瑞典政府考虑将圣巴特勒米岛和圣马丁岛出售，但并未采取重要步骤来实现这一目标。贸易的不断减少仍在继续，尤其是在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1825年的棉花出口是150包，而1826年就仅有80包。由于传染病和飓风的肆虐，殖民地的问题进一步恶化。166 1834年的大飓风仅在圣巴特勒米岛就摧毁了200多间房子，使40多名居民丧命。新的经济冒险活动也不成功：从马德拉群岛（Madeira）引入葡萄种建立葡萄园的尝试也被证明是不成功的。结果，殖民地在随后的几十年间走向衰落，从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它所面临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圣巴特勒米岛的生活组织具有加勒比地区其他地方的典型特征，而非常不同于瑞典国内的生活，后者拥有单一的欧洲种族构成。在殖民地，种族区分通常就决定了每个个体的法律地位。其原则是简单的：任何具有非洲或混血血统的人都被视为奴隶，除非拥有特殊的文件宣布他或她自由。因此，以下通告那时候在该地区是非常典型的：这是一个非洲男童理查德·克鲁普（Richard Crump），他将于1815年以公开拍卖的形式出售，“为了国王的利益，如果从这个日期算起3个月内不被认领，那么将证明他在法律上是自由的”。

八、教会

在加勒比地区，奴隶制这种“独特的制度”如果是以一种在道德上负责的方式运行，即以启蒙价值观为指导的话，是被瑞典的路德教（以及天主教和英国国教）视为可以容忍的。尽管今天看来，这种态度似乎是与启蒙运动的意义相矛盾，但在那时，这绝非事实。在19世纪20年代的瑞典国内，大部分教士日益将他们在社会中的作用视为是一种启蒙，但绝非是现代自由主义意义上的启蒙。它乃是对教会干净

无污的强调。没有哪位教士比厄斯特拉博·泰格奈尔（Esaias Tegnér，1782—1846）更以这种使命为己任。作为隆德大学的古典学教授，他从 18 世纪德国新古典理论家和美学家约翰·约阿希姆·温克尔曼那里获得了灵感，蔑视神秘主义。被任命为韦克舍（Växjö）的主教后，他 167 排斥带有阴郁和迷信痕迹的哥特式建筑风格，而努力确保瑞典的教堂变为明亮和通风的建筑，有宽大的窗户让光线进入。他热诚呼吁毁坏老式教堂，为建立一些人称之为"谷仓"（barns）的新式教堂腾地方。他的丰富著述中的大部分都反映了这种信念。最著名的著作《弗里蒂奥夫传奇》（*Frithiofs saga*）出版于 1825 年，这是一部浪漫主义的史诗，从冰岛传奇中汲取灵感，但注入了基督教的玄学。

这一时期，许多教会人物都采取更为积极的方式同社会弊病作斗争。减少酗酒人数在他们的日程中处于重要地位，因为它在瑞典一直是一种祸害，尤其在诺尔兰地区问题更为严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那时发起了各种戒酒运动，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拉尔斯·列维·莱斯塔迪乌斯（Lars Levi Læstadius，1806—1861）领导的。他是一位深入萨米族人中的传教士（他本人具有该族的一些血统）和卡尔施塔德（Karesuando）郊区的牧师，卡尔施塔德在芬兰和瑞典边界的穆奥尼奥（the Muonio River）河边。莱斯塔迪乌斯具有瑞典教会福音教派的价值观，正是这个教派在北方地区最受欢迎，尤其在倡导戒酒运动（temperance movement）方面。

与其相比，在南方地区，更强调圣礼的"高教会派"（high church）地位突出，它以隆德主教区和大学城为中心，以牧师亨利克·萨尔图（Henrik Schartau，1757—1825）为代表，该教派鼓励在做礼拜时有更丰富的礼仪，同时也更积极地重新评价路德教会的天主教来源。而其他人则寻求一种中间立场，试图将两种教派的教义相融合。在这方面，约翰·奥洛夫·瓦林（Johan Olof Wallin）大主教发挥了主要作用，他出版于 1819 年、备受好评的《圣咏集》（*Psalm Book*）吸纳了两种教派的长处，尽管路德教会两个教派间的斗争仍在继续。乌普萨拉是福音教派的中心，隆德是高教会派的中心，但前者

越来越占据优势地位。在这个过程中，它受到组织得越来越好的传教运动的帮助，该运动努力传播以福音书为基础的启示，不仅在瑞典的草根人口当中而且是在世界各个角落传布。

当许多瑞典的传教士将他们的信仰向非洲和中国传播时，新的宗教运动也从国外传播到瑞典。从英国传入的卫理公会教派传播到瑞典的大部分地区，它是由苏格兰传教士乔治·斯科特（George Scott）传入的。尽管教会和世俗的地方机构将它视为一种分裂社会的力量予以怀疑，但它对节欲的强调在许多瑞典人中受到欢迎。 168

浸礼会同其他各种自由教会一样长期被排斥在瑞典之外，它强调成人的洗礼，通过美国传教士的布道活动传入瑞典。浸礼会被视为一种比卫理公会运动更革命的教派，遭到当地机构更大的敌视，许多地方机构以有害瑞典国家为名禁止它的传教活动。共产主义福音派构成了传教运动的极端一支，他们在脾气暴躁的福音派教徒埃里克·延森（Erik Jansson）的率领下于1846年离开海尔辛兰去了美国的伊利诺伊州，其他人也尾随而去。不过，政府和教会最大的怀疑和敌意并非针对这些新教中的更极端的教派，而仍然是针对传统的罗马天主教会。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禁止土生瑞典人从事该教的宗教活动，否则将予以严惩，包括流放和没收财产。

九、教育

在1686年的瑞典教会法颁布后，识字开始在全国广泛普及。此时，特别是英国，为在普通人口中扩展教育提供了榜样。这种趋势在1809年以后得到加强，建立了许多社团和协会来推进教育的普及。据说，大多数瑞典人的教育，不论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仍然掌握在瑞典路德教教士手中，并且通常是由私人提供资金。尽管在农村地区受教育的范围非常有限，但在斯德哥尔摩发展得很好。事实上，在首都有100多所这样的学校，其中大部分还为富裕家庭的子女提供食物。但是政府办的学校却非常少，在同一时期的斯德哥尔摩仅有12所，而且相比私立学校，它们更多关注具有实用性的科目。只是到1842年，

169 由国家主办的教育才得到显著扩展。此后，读写能力在普通人口中得到了迅速扩展。

甚至在海外殖民地圣巴特勒米岛，教育的发展也得到鼓励。在19世纪的第一个10年，一个石头砌成的学校就在首都古斯塔维亚建成了。不过，人口中的语言差异以及热带气候的严酷，最终使它关闭，该建筑也变成了一所监狱。但私立教育继续由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天主教会派往该岛的男女教士提供，因为居民的大多数都是天主教教徒。据说，新成立的瑞典宣道团（the Swedish Missionary Society）为殖民地富裕的新教家庭子女建立了两所学校，一所招收男童，一所招收女童。至于普通的自由民、黑人和混血奴隶，则由以伦敦为基地的卫理公会教士协会在这里建立的学校，为100多名此类儿童提供教育，该教派有着普遍解放的纲领。这些学校提供的教育是卓有成效的，因为该岛总督于1824年对学生进行测试后赞扬了他们的工作。不过，对绝大多数人口而言，具有读写能力的人还是非常少，在整个瑞典统治时期许多奴隶被排除在受教育范围以外。因为，许多奴隶主担心，奴隶获得读写能力将使他们造反的危险增加。

十、文学

伴随着读写能力在大多数瑞典人口中的普及，文学——既包括历史著作，也包括纯文学作品——在这一时期也获得显著发展。由埃里克·古斯塔夫·盖谢尔撰写的3卷本的《瑞典人民史》（*Svenska Folkets Historia*，出版于1832到1836年间）由于对瑞典人民持一种民族浪漫主义观点而备受关注，它在政治和文学方面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年轻时，盖谢尔帮助创建了哥特协会（Götiska Förbundet），并为它发行的杂志《青春女神》（*Iduna*）贡献了许多文稿。这就为重新评价瑞典的历史渊源埋下了种子。

诗人帕·丹尼尔·阿玛迪斯·阿特博姆（Per Daniel Amadeus Atterbom，1790—1855）也在这种新运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首先是于

170 1807年帮助创建了在艺术领域引领潮流的社团“北极光”（Aurora）。

同时，他也是其他相关创新活动的关键人物，包括出版报纸《博里芬》（Polyfem，1809—1812 年发行）和《启明星》（Phosphorus，1810—1813 年发行），它们都倡导新浪漫主义的哲学和美学价值观。他尤其专注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奉献了一部最著名的抒情作品《欢乐岛》（*Lycksalighetens Ö*），它作为一部寓言出版于 1823 年。他于 1828 年被任命为乌普萨拉大学哲学教授，7 年后被任命为美学和文学教授，他推进了将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作品介绍给瑞典年轻一代的工作。

尽管存有争议，但该时期最伟大的一位诗人是埃里克·约翰·斯塔格奈利乌斯（Erik Johan Stagnelius，1793—1823）。他出版于 1821 年的诗作《雪伦的百合》（*Liljor I Saron*）最受欢迎，这是一部寓言作品，描述了在一个充满死亡和堕落的世界中人类灵魂如何冲破束缚的尝试。处于同等地位的还有约翰·路德维格·鲁内贝格（Johan Ludvig Runeberg，1804—1877），他是说瑞典语的芬兰人，在瑞典以及芬兰都具有重要地位。他以对操瑞典语的农村人的理想化描述而闻名，他自 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的诗作就是要唤醒他们。稍后，他的诗作《恩塞恩·斯塔尔传奇》（*Fänrik Ståls Sägner*，创作于 1848—1860 年之间）集中描述了 1808—1809 年的瑞俄战争，它在波的尼亚湾两岸非常受欢迎，成为增进瑞典人和芬兰人民族认同的文学作品。

就散文而言，卡尔·乔纳斯·罗夫·阿尔姆克维斯特（Carl Jonas Love Almqvist，1793—1866）作为《阿穆丽娜》（*Amorina*，它首次出版于 1822 年，但在 1839 年出版了修订本）的作者无疑是取得了最大声望，但同时又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这是一部抒情小说，最初集中阐发他有关自由意志是一种虚幻的信念，但在接下来的一些年中他对这部作品进行了修改，使它的调子更温和，以便再版时较少引发争议。他于 1837 年被任命为路德教牧师，但 1841 年教会以道德败坏的罪名强迫他放弃了教职。稍后对他提出了性质更为严重的指控：1815 年，他被指控谋杀了一位债权人。他逃到国外，移民美国。他于 1865 年回到欧洲，去了德国的不来梅而不是瑞典，并于第二年死在那里。他为

瑞典文学留下的遗产就是对现实主义的新的关注，这是他的许多作品所试图唤起的，而这种新的发展趋向在芬兰也受到鲁纳贝格的推动。

在这一时期，3位女小说家也取得了巨大声誉。其中最著名的是弗雷德丽卡·布雷默尔（Fredrika Bremer，1801—1865），她是一位能讲瑞典语和芬兰语的作家，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斯德哥尔摩，但1849年她到美国作了长期旅行。在那里，她作了广泛的游历，甚至于1851年访问了那时在西班牙统治下的古巴，而后返回瑞典。她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是《赫塔或一个灵魂的故事》(*Hertha eller en själs historia*)，出版于1856年，是一部悲观厌世的小说，哀叹对个人自由的诸多限制，这些限制是她那个时代的许多妇女被迫忍受的。瑞典最重要的妇女组织后来将她的书名作为该组织的名称来纪念她。她的另一位同胞索菲·冯·克诺琳男爵夫人（Baroness Sophie von Knorring，1797—1848)，在自身作为瑞典贵族的生活经历中寻找小说的主题。她的小说《表兄妹》(*Cousinerna*）出版于1832年，是这类小说中非常有洞察力的一部，尽管她稍后的一些作品更多关注的是那些出身卑微的人物，像《雇工和他周围的人》(*The Cottager and his Milieu*)。艾米莉·弗莱盖娅—卡伦（Emilie Flygare-Carlén，1807—1892）从布胡斯半岛选取她的小说主题，她在1839年和家人迁到斯德哥尔摩之前一直居住在那里。她的这些作品充满了当地色彩，刻画了瑞典西南海岸渔村的生活。她的小说《提斯代尔岛的玫瑰》(*Rosen på Tistelön*）出版于1842年，是她此类题材作品中最著名的一部，她是她那个时代最受欢迎和最多产的一位作家。这些作品是追求妇女权利不断增加的运动中的第一批文学成果，该运动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妇女最终获得完全解放，而瑞典争取民主宪政的斗争也最终取得胜利。

第八章　瑞典的工业化和资本化

一、军事备战

19 世纪中期是瑞典的工业化和资本化加速发展的时期，这是在全欧洲军事对抗的背景下发生的。1853 年克里米亚战争（the Crimean War）的爆发是对瑞典中立地位的第一次重大考验，交战双方一方是英国、法国和奥斯曼帝国（Ottaman Empire），另一方是俄国。最初，瑞典宣布中立。但很快，国王奥斯卡一世和他的顾问们看到如果加入的同盟获胜，就有重新得到芬兰的可能性。这本质上是对“1812 年政治”的唐突改变，该政治是由他的父亲卡尔·约翰和亚历山大一世沙皇开创的。1855 年，瑞典批准了与英国及其盟国签署的《十一月协议》（the November Accord），表明瑞典抵抗俄国以换取盟国军事支持的意愿。一些政府成员对协议仍然存有疑义。但在瑞典参战之前，于第二年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改变了政治进程。1856 年，只有英国要求的芬兰属奥兰群岛（Åland，芬兰语是阿维南马群岛［Ahvenanmaa］）的非军事化被提出，并由《巴黎条约》（the Treaty of Paris）批准。不过，主权仍属芬兰，因此也就间接属于俄国，尽管该岛居民支持由瑞典统治他们。这一举动被称为“对奥兰的奴役”，是未来许多年中瑞典和奥兰群岛人民不满的根源所在。

172

173

伴随19世纪的缓慢度过，尽管瑞典还在继续其中立地位，但政府决定加强军队力量。这是因为有鉴于欧洲主要强国、尤其是俄国和德国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强，瑞典看到了采取预防措施的必要性。在这项计划中，瑞典通往芬兰陆桥的建设和东部防御占据主要地位。早在1877年，瑞典总参谋长就已经提出建议，认为有必要将诺尔兰省的博登地区（Boden）建成防御俄国在波罗的海地区不断增加的军事力量的堡垒，该地区在北极圈以南不到70英里处，而这项提议只是到1900年才由瑞典国会最终通过。因此，防御工事于1901年开始修建，防御要塞于1908年投入使用。它将几个要塞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大规模的防御工事，计划是用它抵挡来自北方芬兰的陆上进攻，它成为瑞典唯一的“环形要塞”。军队也得到了更有效的组织。各项军事改革于1885年开始实行。1901年普遍义务兵役制被实施，旧的摊派制度被取消，那是在17世纪实行的：将全国细分为一个个小区，每个小区供养一名士兵，这些由各小区供养的士兵共同构成部队的基层单位、直到团级，每个团都与一个特定的地理区域相联系。

二、政治改革

像在军事防御领域一样，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也是一个实施重大政治改革的时期。种族和宗教上的少数群体获益尤多。例如，在19世纪70年代，瑞典犹太人的政治权利得到增加，到20世纪到来时他们获得完全解放，最终享有了与其他瑞典国民同等的权利，包括享受贫民救济的权益，而此前这是不给予那些在瑞典国教之外的人的。174 与丹麦更紧密的关系也在1873年得以建立，那一年成立了北欧货币联盟（the Scandinavian Monetary Union），确定了两种北欧货币的兑换比率。然而，从政治结构看，瑞典仍然是一个非常传统的国家。在丹麦，专制制度于1848年被废除，实行着一种完全议会制政府，而这个进程在瑞典推进得更慢和更渐进一些。但最重要的是瑞典于1876年任命了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首相，他就是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1818—1896）男爵，一位温和的自由主义者。他曾从1858年开

始担任司法大臣直到1870年。他在影响民意支持政府改革上发挥了重大作用，导致1867年瑞典国会被改革为现代两院制议会。19世纪70年代，新的农民党迅速在其中发挥领导作用，该党的主要领导人包括阿尔维德·波塞（Arvid Posse，1820—1901）伯爵、埃米尔·凯伊（Emil Key）和卡尔·伊弗瓦森（Carl Ifvarsson）。1880年，波塞当选首相；1883年由卡尔·约翰·西塞留（Carl Johan Thyselius）继任；接着是O. 罗伯特·塞姆坦德（O. Robert Themptander，1844—1897）于1884年担任首相。不过，长期以来，农民党和它的反对党的权威都是有争议的。

一个新的政党即将进入政坛，它将在整个20世纪发挥中心作用，其重要性无与伦比，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它就是社会民主党。

社会民主党的发起非常普通。1885年，一位裁缝奥古斯特·帕尔姆（August Palm）在斯德哥尔摩创办了《社会民主党人报》（the Social Democrat），把他的政治和社会思想传播给广泛的公众。4年后，即1889年，在瑞典工人的支持下，社会民主党建立，他们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他们的集体的政治权利。雅尔玛·布兰廷（Hjalmar Branting，1860—1925）在1886年成为该报纸的总编；在社会民主党成立后担任了该党的领导职务，并且一直担任这个职务几十年，直到去世。他是拉尔斯·布兰廷（Lars Branting）教授的儿子，后者是鼓励普通人进行体育锻炼运动的著名人物。雅尔玛·布兰廷自学了数学和天文学，之后在斯德哥尔摩天文观测台工作。不过，他很快就对社会科学更感兴趣，专注于新闻工作，这成功地使他获得显赫的政治地位。

相比英国或德国，经济上的迅速资本化所引发的不满在瑞典发生得要晚些，这有助于社会民主运动力量的增强。这种趋势非常明显地表现在锯木厂的罢工上，罢工是1879年在松兹瓦尔（Sundsvall）被宣布的，成为了促进该党最初发展的催化剂。据说，为成功掌握那种政治权利又花了一代人的时间，即使布兰廷于1896年享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当那终于实现时，这个统一的群众政治组织开始对瑞典社会自我认同的形成发挥深远影响，该过程直接导致了福利国家在两次世

175

界大战之间的最初发展。

与此同时，农民党内部的分裂也在加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不断增强的对进口征收保护性关税的要求所引发的。分歧最终导致农民党分裂，那些支持征收关税的人组成新农民党（the New Farmers' Party），由埃克里·古斯塔夫·博斯特罗姆（Erik Gustaf Boström，1842—1907）担任领袖；而那些支持自由贸易的人组成老农民党（the Old Farmer' s Party），由卡尔·伊弗瓦森领导，并受到国王本人的支持。在议会中经过激烈争辩，最终那些支持征收关税的人获得胜利。结果，对木材和一些工业品的进口加征了关税，前者大多是从俄国和美国廉价进口的。但当1895年这些问题最终得到解决以后，两党又重新合并为单一的农民党。

鼓励泛北欧合作的尝试并不成功。瑞典经济学家庞特斯·法尔贝克（Pontus Fahlbeck）于1888年极力主张北欧应该结成一个保护性关税同盟，以维护它们的集体经济自主性，但并未受到重视。甚至北欧货币同盟本身也逐渐失去存在的理由，因为货币交换的固定汇率已成为昨日黄花。此时，北欧各国都有自己的规划，它们各自不同的经济利益驱使它们不仅彼此分离，而且纷纷投入到它们在地区外的主要经济伙伴的怀抱。

博斯特罗姆两次担任首相职务，即在1891—1900年，接着又在1902—1905年担任。而此时，其他各种政党也开始走向联合，包括卡尔·斯塔夫（Karl Staaff，1860—1915）领导的自由党和舰队司令阿尔维德·林德曼（Arvid Lindman，1862—1936）领导的保守党。1906年，林德曼当选首相，任职到1911年，主要执行一种保守政纲。据说，1909年，在议会和地方选举中有资格投票的人数都大大增加了。

176

在斯塔夫担任第二任首相期间，瑞典人的不满在持续增加，主要是针对经济资本化产生的负效应。政府被迫采取新的举措，包括于1913年首次在瑞典设立国家抚恤金。不过，此时战争的乌云正笼罩着瑞典及欧洲其他国家，新的问题开始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对1914年的所谓“农民游行”做出敌视的反应，斯塔夫于第二年辞职。这次游行

的许多参与者支持增加军费开支，其中包括斯文·赫定（Sved Hedin，1865—1952）。他是著名的中亚探险家，也在向皇宫挺进的游行队伍中。他们支持国王古斯塔夫五世，后者此时叫嚷应该加强瑞典军队的力量，因为其他主要欧洲强国似乎都在为一种战时状态在作准备。据说，瑞典向军国主义的迈进受到了羁绊。此时，社会民主党成为下院的最大政党。

欧洲各国中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德国一直热衷于拉拢瑞典做盟友。德国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于1895年写道："我的全部政治理想集中关注于将全世界、尤其是欧洲的日耳曼人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以保障我们自身免受斯拉夫—捷克人的入侵，他们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民族……在这个日耳曼民族的大联盟中，瑞典—挪威是我们的主要伙伴之一。"不过，这种召唤并未得到瑞典的响应。但在另一方面，与德国的经济和交通联系将瑞典同它的这个东部邻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09年，定期直航在两国间确立，而这仅是诸多联系中的一种。可以说，在非政治领域两国越来越彼此依赖，由此来最大限度地避免政治上的紧张关系。

三、联盟危机

在一个君主统治下的两个王国瑞典和挪威之间的政治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并在这一时期急剧恶化。第一次严重危机发生于1884年，挪威争取议会制的斗争正在加速进行。这场斗争取得了成功，此后，议会统治支配了内阁政府的各行政部门。但对那些追求挪威获得更大政治自主权的人来说，这是远远不够的。1891年，他们努力争取废除总督制的统治方式；第二年，又要求有权独立向国外派驻领事，这项要求被瑞典政府拒绝。尽管从1895年起，对抗的气氛就在不断升级，但只是到了1901年事态才变得真正紧张起来，而且是在军事意义上的。这一年，挪威开始在它与瑞典的边境地区修筑工事。一场两个北欧国家之间的武装冲突似乎正在逼近。

177

这一时期瑞典与德国的关系仍然保持温和状态。1903年，瑞典最

终放弃了对维斯马（Wismar）在法律上的主权，而实际上它在数十年前就已经被并入了普鲁士。正因为很久以前主权就已经是名存实亡，所以这并未引发动荡。另一方面，当挪威于1905年单边宣布独立时，恰巧也是新议会大厦在斯德哥尔摩开始投入使用的时候，一场重大冲突似乎有使斯堪的纳维亚半岛陷入分裂的危险。6月7日，挪威议会（Stortinget）宣布取消奥斯卡二世（Oskar II）的挪威王位，他无权再组建挪威政府。接着这项决定在挪威的全民公决中被批准，绝大多数参与者投票反对瑞典国王，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但于9月召开的卡尔施塔德会议（the Karlstad Convention）将两国从战争边缘拉了回来。11月1日，挪威实现完全独立，瑞典国王和政府保持了克制，未采取鲁莽行动。

瑞典成功地避免了与挪威的军事对抗。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它沿袭了持续近一个世纪之久的立场，继续保持了严格的中立立场。正如在1905年的一次演讲中博斯特罗姆就瑞典外交部的规划提到的那样，“瑞典的政策并未在任何实质意义上偏离它保持中立的立场”。瑞典的资本化进程在不间断地进行着：像往常一样，在商业、经济和政治领域之中进行着。

178

挪威的独立也许在国际关系领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使北欧各国的关系变得动荡不安，尤其是英国、德国和俄国之间的关系更是如此。不过，1908年4月23日，各方签署协议表示接受现状。据说，1885年协定被搁置，该协定规定，瑞典—挪威的领土完整将得到保证。但在战时，松德海峡的领土完整性会在何种程度上被保持仍然是悬而未决的。因为很明显，俄国继续鼓噪修改奥兰群岛的地位，使它成为俄罗斯帝国境内一块不设防的领土。这引起德国的警觉，它担心，如果它们设防的话，那么在冲突爆发时，它经海路运输铁矿石的船只将在通过这些岛屿时受到羁绊。英国也不支持俄国的意图。在同一年，爱德华七世（Edward VII）继承了他已故母亲维多利亚女王的王位，他对瑞典进行了国事访问，意在加强英瑞关系。而这种关系由于英国在上次联盟危机中支持挪威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那次危机导致了挪

威王国的独立。

四、经济发展

如果说瑞典的政治生活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发生了急剧变化的话，那么，它的经济生活由于受到资本化不断增强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846年，行会制度被废除，广泛的职业对普通人开放，而此前他们被排斥在外。尽管产品质量变得难以控制，但大量的人口（其中许多是新近移民到瑞典城市中心地区的）此时能够被吸纳去做各种各样的工作，甚至是技术工作，而这只是政府采取的鼓励资本化市场经济的举措中的一种。这种市场经济成为瑞典19世纪下半期的标志性特点。

179

约翰·奥古斯特·格里潘斯塔德（Johan August Gripensted，1813—1874）男爵是瑞典在19世纪中期的经济发展中起关键作用的人物，他对这些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作为废除过时的庄园制度的支持者（因为该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瑞典的政治或经济要求）他于1856年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在这个位置上，他鼓励实施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包括自由贸易和通过外国贷款修建铁路，尤其是利用法国资本。保守派政治领导人，诸如伦纳德·弗雷德里克·拉夫（Leonard Fredrik Rääf，1786—1872）和奥古斯特·冯·哈特曼斯多夫（August von Hartmansdorff，1792—1856）等，联合起来采取一种强硬的反对立场，但自由主义改革派最终占据了优势。

到19世纪60年代，外贸获得显著增长，其中出口占GNP的13.6%，进口占13.2%。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逐渐变得倾向于进口，到1900年，比率颠倒过来，分别为17.4%和23.4%。出口和进口的最大宗都是同英国完成的，在1874年，分别占出口总量与进口总量的56.4%和30.6%；据说，丹麦也在对瑞典的出口中占据一个重要份额，那一年是14.2%；接着是法国占8.9%和德国占6.2%。不过，就从瑞典进口而言，德国排在英国之后居第二位，占21.2%。对德出口中，铁和钢是尤为重要的商品，因为它们是德国在鲁尔地区

(Ruhr)迅速发展的重工业所必需的。丹麦也占据了这个市场的一个重要份额，占18.2%；但法国的份额普通，仅有3.6%。

尽管铁和钢一直是重要的出口品，但到19世纪60年代，木材已成为瑞典最重要的出口产品。这是由于引入了蒸汽机，它为锯木提供了动力。阿斯克斯塔地区的锯木场（Askesta Sawmills）首次将蒸汽机用作锯木的动力，它在突亚多尔（Tunadal），离诺尔兰地区的松兹瓦尔不远。在1881年到1885年间，木材出口占瑞典外贸总额的比率不低于40.4%。这一时期，纸张和纸浆的出口贡献了另外的4.6%。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纸张和纸浆的出口急剧增加，在1911年到1913年间，它们所占的比率上升到17.6%；而木材出口仍大体保持不变。

180 像工业一样，在19世纪较晚的几十年和20世纪初，农业也经历了一个资本化不断增强和结构调整的时期。迟至1910年，农业仍然雇佣了瑞典几乎一半的劳动力，它对经济生产率也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仅谷物出口就占到11.7%。不过，来自国外的竞争也是强有力的，在后20年间，出口份额急剧下滑，到这个时期结束时降至仅有0.4%。

采矿业仍然是一种重要的产业，尽管这时铜的产量已经显著下降。从1895年到1914年，铜矿的维持和发展以及一般铜产品的制造所需的资本，主要来自丹麦和挪威。铁仍然是一种重要的出口产品，在19世纪40年代，它每年被运往国外的数量不低于75 000吨。钢铁产业的大部分仍然掌握在瓦隆人手中，他们是于17世纪移民到瑞典的，尽管此时德国人也开始进军该产业。技术革新由古斯塔夫·埃克曼（Gustaf Ekman）在19世纪50年代引入，使瑞典的钢铁产业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在制造铸铁加农炮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不过，这在19世纪80年代被更加有效的替代产品取代，即为此目的而引入的钢的生产。因此，到80年代的头5年，铁和钢的出口量占瑞典外贸的份额大约是16.2%。耶利瓦勒（Gällivare）和基律纳（Kiruna）的优质高磷生铁矿场具有了越来越大的重要性，这些矿产品的运输由于连接纳尔维克（Narvik）和律勒欧（Luleå）的新铁路的修通而成为可能，前者在挪威的海岸地区，后者在波的尼亚湾。筑路权最初授给了一家英国公司，

但在它清盘后，修筑工作因来自瑞典和挪威政府的资金支持而得以继续。它完工于 1903 年。由于在诺尔兰地区这种资本密集型重工业的发展，通常至少有部分依赖来自国外的投资，所以瑞典的极北部地区开始享有经济繁荣，吸引了来自瑞典其他地区、甚至国外的移民。

瑞典最北部省份的工业发展提供了经济和社会的流动性。据说，与人们的工作技能一道，年龄也常常决定一个工人在该产业中的发展前景。到 36 岁，他一般就有资格担任工长；到 56 岁，他将退休。就年龄限制而言，金属制造业是不同寻常的，因为在工业的其他大多数部门并没有规定退休年龄。

181

海上贸易也很少再受传统的管制和税费的影响。例如 1856 年，松德海峡的通行费被取消，它首次对过往船只征收通行费是在 15 世纪 20 年代。瑞典的船只目前能够不受阻碍地来往于海上。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由丹·布鲁斯特罗姆（Dan Brostrøm）创办的瑞美航运公司（the Swedish-American Shipping Line）已成为国际海上运输和贸易中一个需要认真对付的竞争对手。

一个新的工业王朝、瓦伦堡财团（Wallenbergs）也开始浮出水面，它将在瑞典经济发展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直到今天仍然如此。1856 年，林雪平主教的儿子安德烈·奥斯卡·瓦伦堡（André Oscar Wallenberg，1816—1886 年）创立了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the Enskilda Bank），尽管金融业变幻莫测，但它迅速成为瑞典最重要的银行之一。而且在他的儿子克努特·阿加东·瓦伦堡（Knut Agathon Wallenberg，1853—1938）和马库斯·瓦伦堡（Marcus Wallenberg，1864—1943）的管理下，这种地位一直得到延续。它在今天仍然很兴旺。瓦伦堡财团的金融触角拓展得非常广泛，它不仅在瑞典国内提供主要的融资，而且在挪威水电业发展所必需的融资中也占据了最大份额，尤其在泰勒马克（Telemark）尤坎（Rjukan）的挪威水电厂（the Norsk Hydro plant），那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电公司之一，生产人工制造的硝酸盐。

另一位主要的实业家也在这一时期的瑞典获得声望，他的名字最终将享誉全球：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1833—1896）。他于

1863年发明了甘油炸药，而这只是他86项发明中获得的一项专利。他成为瑞典最殷实的工业家之一，同时也是该国善款捐赠最多的一位慈善家。他设立了诺贝尔奖，以奖励那些在物理学、化学、医学、文学与和平领域对人类做出最大贡献的人。它在1901年开始颁授，目前授奖范围已经扩大，诺贝尔奖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具声望和奖金最高的奖项。

银行业继续保持兴旺发展，1871年斯德哥尔摩商业银行（Stockholms Handelsbank）建立，后来于1919年更名为瑞典商业银行（Svenska Handelsbank），它的业务非常多样化，客户遍及瑞典。从那时起，它就逐渐将业务向世界各地拓展，目前已成为取得全球声望的许多瑞典银行中的一家。

182



插图12　大酿酒厂（1890）。安德斯·佐恩（Anders Zorn，1860—1920）创作的油画。佐恩是瑞典最伟大的社会名流肖像画家之一，但他也关注出身较低微的人的主题。他自己的母亲就是一个仆人，父亲则是一位德国酿酒师傅，他对描绘妇女的工作、生活非常感兴趣。在这个迅速工业化的时期，有成千上万的妇女在瑞典新建立的工厂中找到了工作。油画存在于哥德堡的哥德堡文化展览中心（Göteborgs Kulturförvaltning）。

由于新技术的开发显著改变了生产方法，纺织业在效率和质量上

都有很大提高。胡斯华纳—维京（Husqvarna Viking）公司于1872年将缝纫机引入瑞典，这对纺织业的工人产生了重大社会影响，因为许多妇女可以作为女裁缝在工厂中工作。传统上，女裁缝是在家工作的，但随着昂贵机器的引入，她们越来越多地在新的大型工业企业中工作，其中许多企业都是在北雪平。这鼓励了越来越多的妇女从乡村移民到城市。

瑞典在利用新技术和新设备方面进展迅速。1853年，煤气灯照明被引入斯德哥尔摩，大约在同一时间，斯德哥尔摩和乌普萨拉之间的第一条电报线路也对公众开放。1856年，瑞典的第一条铁路线对乘客开放，即从奥雷布洛（Örebro）经埃尔瓦拉（Ervalla）到诺拉（Nora）。议会此时已将铁路网的发展置于一个政府委员会的管理之下，这个政府委员会就是为此目的而设立。6年后，连接斯德哥尔摩和哥德堡的铁路线开通。

183

拉斯·麦努斯·爱立信（Lars Magnus Ericsson，1856—1926）创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工厂。同年，亚历山大·贝尔（Alexander Bell）由于发明电话而被授予专利。最初，爱立信主要集中于修理电报机的业务，但很快它开始生产电话，并研发相关技术。由此，爱立信迅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人工交换电话机的供应商，既供应国内，也供应国际。最重要的订购来自俄国。1916年，爱立信安装了一台交换机，可以操控超过6万部电话。不过，伴随着自动交换机越来越多地支配世界市场，爱立信的市场份额在显著下降。

工程技术界的另一个支柱是古斯塔夫·德·拉瓦尔（Gustaf de Laval），他于1878年发明了用于从牛奶中分离奶油的分离器，他于同年建立了一个公司来生产这种分离器。不过，就工业生产而言，他发明的蒸汽涡轮电机被证明更为重要，因为它可以为多样的工业生产和运输提供动力。1892年，第一个公共的发电厂开始为斯德哥尔摩提供能量。斯德哥尔摩成为一座拥有最高技术水平的欧洲城市。作为新时代的象征，瑞典接受公制作为标准的度量衡系统，它此时已在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中被使用。

伴随着大工业组织的增加，工会被建立以推进工人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利益。1886年，印刷工人工会建立，它是第一个这样的全国性组织；很快，多个产业的工会组织也随之产生。在这一阶段，它们保持一种低姿态，避免采取更具斗争性的积极立场；而在世纪之交后，它们继续采取这种立场，尽管在公众眼中这损害了它们的地位。

184

到20世纪初，新的工业创新进一步扩大了在大规模、高度资本化的工业复合体中的就业队伍。一个这样的工业企业AGA公司，在古斯塔夫·达伦（Gustaf Dalén，1869—1937）的帮助下于1904年建立。达伦作为这一时期瑞典科学界具有出众才华的人，于1912年被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在他的主要发明中，用途特别大的是日光开关，它使灯塔在傍晚时能够自动亮起来，在黎明时又自动熄灭。这样，灯塔就可以无须人员驻守操作而正常运行。他的有关乙炔气体和它的工业应用的研究也十分重要，但在一次试验中发生了事故，即气体储存器爆炸，导致他失明。尽管如此，他仍于1909年接管AGA公司的管理工作，并在20世纪初的几十年间领导公司的运营，直到他于1937年去世。那时，该公司已因生产低能耗的燃煤炉而闻名于世，它们的首次生产是在1929年，可以在无人照看的情况下烧一整天。今天，它们的生产已转向国外，在英国和美国比在瑞典更受欢迎。

瑞典的进一步创新是尝试拓展国外经济伙伴的范围。例如，1906年，瓦伦堡家族派一个代表团到日本考察进行新的贸易的可能性。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各种努力也在尝试，后者实施了门户开放政策，即通过授予所有国家以相同的工业和商业投资权利而吸引外国投资。

在新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时，工会已高度政治化，他们对新发展的实力过分自信，以致要尝试伸展一下肌肉。这导致1909年大罢工的发生，由工会组织的普遍停工试图强制雇主联盟屈服。不过，它被证明是一只纸老虎。这不仅是因为这次行动未能为工会成员带来进一步的物质利益，而且它流失了大量会员。由于罢工的失败，有超过一半以上的会员退出。其后果是，至少在短期内工会遭受了惨重损失。

五、农业发展

1864 年，许多贵族庄园的限定继承权被最终废除，而这些庄园土地在以前是被禁止出售给普通人的。它对农业产生了巨大影响，不仅反映在深层的政治变迁上，而且反映在农村地区不断加剧的贫困化上。由于来自北美、南美、以及亚洲的农产品充斥世界市场，使得农村的农产品市场走向萧条，这不仅仅出现在瑞典，许多其他欧洲国家也是如此。结果，许多地主离开农村迁移到斯德哥尔摩和其他城市，那里伴随着贸易和工业的拓展，出现了许多其他的商业机会，吸引他们前往。

佃农仍然是农业人口中最贫穷的部分，他们的数量在 19 世纪后半期和 20 世纪初大体保持不变。据说，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到城市去寻找工作，出现了从乡村到城市移民的重大增长。《城郊》（The Outskirts of the City）是由社会意识很强的瑞典艺术家尤金·延森（Eugène Jansson，1862—1915）于 1899 年创作的画作，它只是众多表现瑞典新的不堪入目的棚户区生活的艺术作品中的一幅。这些棚户区像雨后春笋般在城市中心的边缘区蔓生，许多新近从农村移民到此的大家庭挤在狭小的房间中，这些房间很少能有新鲜空气和阳光透入。

六、移民

伴随着农业的重大变迁和铁路运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既有单个人也有全家，利用这一机会在国内迁移，甚至移民到国外。斯德哥尔摩一直是受益最多的城市，但省辖市和市镇在规模上也增长显著。例如，作为大主教席位所在地和学术中心的乌普萨拉，人口从 19 世纪早期的大约 5 千人增加至 1900 年的 15 000 多人。

瑞典国内的大多数移民都是季节性的。在农业劳作最少的月份，许多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和乡镇，在那里通常能够找到工作；或到沿岸地区做渔民，这尤其适宜于萨米族人，他们经常迁移到挪威北极海岸做季节性渔民。锯木厂也吸引了许多季节性工人，不仅有瑞典人，而

186 且有大量来自国外的移民，他们在就业期间住在大的集体宿舍，酗酒和暴力斗殴成为主要问题。不过，在瑞典最声名狼藉的移民群体是吉普赛人。贫穷而且有着暴力和偷窃的不良名声，使他们成为新法律关注的焦点，这些新法律的通过就是用来约束他们的迁移和行为的。然而，他们的劳动却经常有益于社会：在当地劳动力不足的地方，他们帮助收割庄稼，尤其是蛇麻草。许多人还提供诸如补锅等有益的服务，其他人则在全国的春冬季市场上摆摊售货。因此，对付他们的政策在运用时经常非常矛盾。

瑞典严酷的气候也造成了人口的流失。在饥荒期间，尤其是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间，许多人移民国外，特别是到美国。在那里，美国政府向移民提供充足的土地，这被证明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许多有事业心的人无法抵制这种诱惑，而他们在国内则受到有限机会的束缚。在20世纪，美国的瑞典人在数量上甚至超过了瑞典国内的瑞典人。

七、教会城

为了更好地服务于瑞典急剧增加的人口以及造成这种增长的经济发展，这一时期的瑞典教会也经历了一个扩张时期，从组织和建筑方面看都是如此。许多新的教区被创建，许多教堂被修建，尤其是在北方地区。在19世纪较早期，教会城（church town）就已经在波的尼亚湾沿岸的主要城市中开始存在，礼拜者能够在做礼拜的前一天晚上就来到那里，在专为此目的修建的小木屋中休息。这是瑞典教会对其成员所作要求的反应。瑞典教会规定：那些居住在离教堂10千米以内的人，每周到教堂做一次礼拜；那些居住在在10千米到30千米之间的人，每两周做一次礼拜；那些更远的人则每三周和在宗教节日做礼拜。这些教会城中最重要的是诺尔兰的律勒欧，其起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伴随它们的规模在整个19世纪的急剧扩张，其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宗教方面，而且也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尤其是那里的贸易兴旺起来。星期六，年轻的教区居民经常会将这个场合作为婚姻市场，寻找中意的对象。19世纪中期，在宗教节庆的前夜，300名年轻男女一起

参加一个舞会并不罕见，那通常是在教会城的公共会堂甚至户外举行。因此，伴随律勒欧人口的迅速增加，其物质设施的进一步增加就显得非常急迫。19世纪早期，在新设立的奥夫里律勒欧（Övreluleå）教区新建了21座新教堂，它成为律勒欧旧城名副其实的郊区；其教堂数量到19世纪末已增至50个，又过了约50年后约为76个。

八、不断增强的宗教宽容和谅解运动

其他所谓的自由教会也在影响范围上不断拓展，它们有别于瑞典国教。由于非正统地强调对成年人的洗礼，浸礼会和其他自由教会一道曾长期被排斥在瑞典国门之外，但它最终于1848年在这里成功生根。卫理公会也于1876年取得政府承认，尽管许多地方政府的领导人和路德教会本身对它仍然态度冷淡。乔治·斯科特是将这个教派传入瑞典的人。尽管他此时回到了瑞典，但像卡尔·奥洛夫·罗森尼尔斯（Carl Olof Rosenius，1816—1868）等瑞典人已接过他的衣钵，而且教义中越来越多地包含民族主义的内容。罗森尼尔斯式的卫理公会教义在诺尔兰尤其受欢迎，他于19世纪中期在那里创建了福音派祖国基金会（Evangeliska Fosterlandsstiftelse），虽然这里是路德教的管辖范围。

1878年成立的瑞典宣道团（Svenska Missionsf örbund）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就它在拉普兰的传教活动而言的，而且对于它在海外、尤其是非洲的传教活动也是重要的。它于1881年在比属刚果（the Belgian 188 Congo）的木基姆邦果（Mukimbungo）设立了第一个传教区，接着许多其他传教区也随之建立。并且，它还倡议在相邻的殖民地也建立这种传教区，结果1909年在法属刚果的马兹亚（Madzia）、1911年在布拉柴维尔（Brazzaville）分别建立了传教区。它因人员损失而代价高昂，1910年派往这些地区的133名传教士和他们随行的孩子有53名死于疾病。该宣道团也在亚洲尤其是在土耳其斯坦、印度和日本设立了传教区。

救世军（the Salvation Army）最早是由威廉·布斯（William Booth）于1865年在伦敦创立的，它自1882年开始在瑞典的传教活

动，尤其关注城市贫民的需要。到此时，自由教会运动已经在瑞典兴旺发展，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在斯莫兰的延雪平地区，从此以后它被民间俗称为“瑞典的小耶路撒冷”。不过，在瑞典其他地方，尤其是大城市，路德教的势力仍然很强大，而且由于它赋予普通教徒在宗教和社会决策上愈来愈大的发言权，它的影响力进一步得到提高。人们目前开始重视对各宗教教派所特有的风格的研究，不仅局限于宗教方面，而且也包括建筑方面。正如一位乌普萨拉大学拉丁语和美学教授提出的那样，“在所有欧洲建筑中，人们很少能再发现这种东方主义的滥觞，一种像宝塔似的神秘外观，它就像我们的信仰一样”。

如果说这种东方宗教激发的联想具有一种特殊的诱惑力，那么人们仍然是以一种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天主教的影响的。诚然，长期以来天主教一直在瑞典持续增强的宗教宽容范围之外，尽管奥斯卡一世国王的配偶、约瑟芬皇后（Queen Josephine）本人就是一位天主教徒。例如，两位土生的瑞典人在19世纪50年代皈依天主教后被没收了财产，并被驱逐出瑞典。尽管有巨大异议，但最终在19世纪60年代，瑞典政府实施了一次重大的法律改革，解除了对天主教会的禁令。犹太教也从这一改革中获益，因为从此以后，他们能够购买土地和与其他瑞典人享有同等的公民地位。结果，许多来自东欧的犹太人到瑞典寻求避难，他们由于受到集体迫害和不断加剧的经济困难而向西迁移。1870年，所有担任公职的障碍最终被消除。

189 在瑞典遥远的海外殖民地圣巴特勒米岛，宗教方面的变化也同时在发生，甚至进一步削弱了瑞典国教的统治地位。尽管有一个新的路德教堂于19世纪50年代在那里建成，但1855年建成的英国国教教堂在服务殖民地的精神需求方面更为重要。因为到此时，那里美国和英国的居民在数量上要远远超过其他国家的居民，英语成为那里的主要语言。这个新教堂是由当地的一位英国人理查德·丁塞爵士（Sir Richard Dinzey）出资修建的，他后来被奥斯卡一世国王封为瓦萨勋位骑士，以表彰他的慷慨捐赠。

在随后几十年，自由教会的教派数量一直不断增加。1892年，那

里的浸礼会教派发生分裂，导致一个小教派瑞典国浸礼会（Örebro Mission Society）的诞生。五旬节运动（the Pentecostal movement）也在瑞典生根，它通过美国传教士的活动在斯莫兰形成强大势力，他们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来到这里的。后来以斯德哥尔摩为基地的浸礼会的费拉德尔费亚教众（the Filadelfia congregation）加入该运动，它的教众数量得到增加。

与此同时，许多变革也在瑞典国教内发生，这是对宗教的多样性变化以及世俗化进程不断增强的反应。例如，教徒在一年内参加几次圣餐仪式的义务于1910年被取消。而事实上，被批准取消的只是一个已经形同虚设的规定，因为到19世纪末，定期参加者据估算仅占斯德哥尔摩人口的15%。婚姻制度也遭到破坏，尤其是在斯德哥尔摩，那里未婚先育的比率相比瑞典的其他地方尤其高。

虽然如此，但一波修建新教堂的高潮在世纪之交启动，尤其是在诺尔兰和瑞典主要城市的郊区，它成了瑞典国教复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趋势反映在瑞典国教大主教纳特汉·瑟德尔布罗姆（Archbishop Nathan Söderblom，1866—1931）的学术和宗教活动上。他于1914年晋升为大主教，对瑞典的文学、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竞逐诺贝尔奖的热心支持者，尽管这位剧作家由于在有关性别和社会的问题上持有非正统的立场而从未能获得该奖项。作为一位最早提出宗教合一的论者，虽然他对罗马天主教仍持谨慎态度，但瑟德尔布罗姆已将注意力转向俄国和拜占廷的东正教，从那里汲取宗教和建筑方面的灵感。 190

萨尔特舍巴登（Saltsjöbaden）的新教堂是由瑞典著名建筑设计师费迪南德·波贝格（Ferdinand Boberg，1860—1946）设计建造的，它明显受到东正教拜占廷建筑风格的影响。虽被宣布是奉献给基督主显节的，但它的墓堂最终被用于存放工业家克努特·瓦伦堡（Knut Wallenberg）和他妻子的遗体。尽管其内部的建筑风格主要是拜占廷式的，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领导的工艺美术运动（the Arts and Crafts movement）中的许多元素也很明显。就其折衷主义的表现而言，

它是瑞典路德教新的包容观的一个主要范例，它寻求与广阔世界中的宗教、社会和文化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在这种发展路径中，卡尔·霍尔（Karl Holl）和卡尔·施瓦茨洛斯（Karl Schwarzlose）等德国神学家的著述提供着主要灵感。同时，瑞典国教也在努力增加吸引力，这是通过对其信条更易接受的方向，即对《圣经》做出更准确和更易理解的翻译来进行的，翻译工作到1917年才完成。

瑟德尔布罗姆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甚至为雕塑家古斯塔夫·威克曼（Gustaf Wickman，1858—1916）创作的一个装饰用男人雕像摆姿态、做模特。装饰用雕像生产是诺尔兰工业的象征，该雕像被运往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的松兹瓦尔分行作装饰。瑟德尔布罗姆一直对瑞典北部地区有着一种特殊的偏爱，这并不令人奇怪：他本人就出生和生长在瑞典北部海尔辛兰地区的特鲁诺（Trönö），他的父亲是那里的一位路德教牧师。尽管有这样一种狭隘的宗教背景，但瑟德尔布罗姆还是成为了一位瑞典最著名的和多才多艺的教会人物。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尤其是对《瑞典圣歌集》(*the Swedish Hymn Book* ）做出补遗，那是由约翰·奥洛夫·瓦林于1819年首次收集汇编的。这本圣歌集真正是以泛基督教主义的方式编辑，包括了源自自由教会诸教派以及瑞典相邻国家的圣歌。

九、瑞典海外殖民地的衰落与转让

191 伴随着19世纪的演进，瑞典开始着手处理它变得越来越贫困并已成为负担的殖民地，后者已无法为它带来任何重要的资本收益。早在19世纪40年代初期，圣巴特勒米岛就已经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变得衰弱，而西班牙在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殖民地此时已赢得独立，并能够自由选择他们所期望的贸易伙伴，这加重了问题的严重性。贸易额降到了最低点，农业生产也无法获利。此时提出了缓解这种情势以及进行行政管理改革的建议，为了提高效率和削减成本，旧的殖民局（the old Colonial Office）被关闭，殖民地被转交给了财政部管理。

最重要的是在经过诸多考量后，瑞典政府决定要解决奴隶制问题。

出于道德和经济的原因，它决定逐渐解放奴隶。从而最终于 1846 年，1 800 名殖民地奴隶的绝大多数被解放——这是在英国在西半球的殖民地的奴隶获得自由 12 年后发生的。相邻的丹麦的殖民地也在几年后废除了奴隶制。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仍然保持着这种制度，直到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

瑞典政府对奴隶主做出了补偿，给了他们 24 699 元西班牙银圆，这种银圆是加勒比地区通用的货币。到 1847 年 10 月 9 日，全部奴隶的解放工作最终完成，包括那些在名义上属于国王奥斯卡一世的奴隶。那些被解放的奴隶中因疾病或年龄大而无法养活自己的人，由公共基金而不是他们以前的主人供养，正如丹麦在加勒比地区殖民地所做的那样。尽管对奴隶主的损失做出了补偿，但殖民地许多已经变穷的种植园主还是不免破产。这导致许多人移民到其他地方，圣巴特勒米岛仍然残留的种植园经济已大体衰落。进一步的打击接踵而至，几年后古斯塔维亚的一场毁灭性大火大约烧毁了 135 间房屋。虚弱的瑞典管理当局无力做出反应，还是来自伦敦和纽约的慈善救济援助了许多受害者。不过，此时很大数量的居民都是英国人和美国人。 192

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早期，美国的内战激战正酣。此时，棉花在圣巴特勒米岛得以短暂种植，这有助于补偿美国南部邦联那时因被围困造成的供给下降。但在北方联邦赢得战争后，棉花就不再被种植，而代之以种菠萝。菠萝迅速成为殖民地最重要的农产品，仅 1858 年就出口了 100 万吨。从海水中提炼出的盐也成为出口量不断增加的产品，于 1868 年首次在那里发现的铅也很快加入到出口产品行列。虽然如此，但仍无法解决一直困扰圣巴特勒米岛的失业问题，大规模的向外移民一直在持续。由此，瑞典政府希望真正摆脱殖民地的负担，而于 1868 年就转让事宜开始与美国谈判，但并未成功。第二年与意大利进行的类似谈判也无果而终。最后，瑞典转向法国，后者曾是这块殖民地的前殖民国家。1876 年，出售意向最终达成。接着，在圣巴特勒米岛举行的全民公决批准了转让决定。1878 年 3 月 16 日法国接管了它的主权，这块殖民地被转交给法国在瓜德罗普岛的政府管辖，法国为

这次转让支付了32万法郎。这些费用被用来为殖民地那些被替代的公职人员提供抚恤金，另外又提供了8万法郎在古斯塔维亚修建一所新的医院。瑞典居民被允许继续住在那里，并保留他们的瑞典国籍。这构不成什么重大问题：因为早在1860年，那里就仅剩6名操瑞典语的人生活在那里。瑞典从殖民地的撤离最终完成。

十、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

如果说瑞典正在脱离它持续了数十年的殖民冒险活动的话，那么在北欧世界，它却正尝试复兴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运动（Pan-Scandinavianism）。早在1810年，丹麦教士、诗人和教育家格朗德维希（N. F. S. Grundtvig）就写作了引起巨大争议的文章《北欧地区的统一是可取的吗？向瑞典人民敬一言》（*Is Unification of the Nordic Region* 193 *Desirable？A Word to the Swedish People*）。瑞典人花了大约30年才注意到他的话，此时至少是学者做出了反应。毕竟，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享有共同的宗教路德教，并在文学和文化上对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有着共同的偏好，这些都是格朗德维希热衷鼓励的东西。另一位丹麦人、剧作家亚当·欧兰施拉尔（Adam Oehlenschäger）在他的《北欧诗集》（*Nordic Poems*）和史诗作品《北方诸神》（*The Gods of the North*）中也同样关注这一论题，后一作品是古斯堪的纳维亚伟大史诗《埃达》（*Edda*）的一种现代版诠释。因此，他的这些作品在卡尔·约翰国王那里得到回应，国王授予欧兰施拉尔一枚纪念性奖章以表彰他的创作，而在这之前瑞典的斯堪尼亚地区的隆德大学授予这位诗人以荣誉博士学位。很快，许多学者和其他社团开始积极倡导斯堪的纳维亚诸国的内部合作，一些学者在乌普萨拉大学集会，表达他们对此类泛斯堪的纳维亚运动的支持。2年后，类似的事件在哥本哈根发生，一些挪威和丹麦学者来到这里集会，丹麦艺术家约恩·松内（Jørgen Sonne）还在稍后用一幅名画描绘了这一事件。到那时，这场运动已经在文化性之外具有了政治性。它堪与泛斯拉夫运动相媲美，后者发源于同一时期的俄国，鼓吹斯拉夫民族的兄弟情谊，也具有政治和文化

内涵。此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知识分子倡导一种共同防御政策和经济合作。尽管很少有人公开呼吁建立政治联盟，从而涉及应由哪一位君主进行统治的问题，但由于丹麦王储没有子嗣而且离了婚，所以一些人判断瑞典国王将会担任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之王，并认为这几乎是没有悬念的。

据说，尽管有卡尔马联盟的浪漫回忆，但泛斯堪的纳维亚运动的根基却是软弱无力的。主要讲德语的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两个公国，长期由丹麦人统治，泛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对他们是一种不相关的东西；而且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对这种运动也缺乏兴趣。当丹麦与正在进行领土扩张的普鲁士之间先于 1848 年、接着于 1864 年连续爆发战争时，对该运动的可行性的真正考验来临了。在第一次冲突中，确实有大约 4 500 名瑞典人和挪威人自愿参战，支持他们的斯堪的纳维亚同伴；但在第二次冲突中，他们的援助就非常有限。由于瑞典—挪威国王和他的政府不希望开罪普鲁士，所以他们在第二次丹普战争中保持明确的沉默，这就最终为泛斯堪的纳维亚运动敲响丧钟。大臣们拒绝对丹麦的战争努力给予任何官方援助。这还并非最后一次，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证明的那样，德国的大炮再次使泛斯堪的纳维亚运动保持缄默，每个北欧国家都选择了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缺乏战斗力又孤立无援，丹麦被迫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施泰因割给它颇具侵略性的南方邻国，而这些领土的北方部分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通过全民公决归还给了丹麦。但泛斯堪的纳维亚运动也有一个成功的地方：它给广大的普通百姓带来了一种意识，即他们都拥有共同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价值观。由此，它在 19 世纪成为更广泛的教育、文化和公民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该运动遍及瑞典的各部分人口，有助于塑造一种更为统一的种族和民族认同。

194

十一、教育

1842 年颁布的公共教育法（the Law of Public Education）对瑞典第一批由国家资助的学校的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它努力确保 7 岁到

13 岁之间的儿童几乎都能接受基础教育，即读、写和算术，以及路德教基本信条的教育。但圣巴特勒米岛没有受到这种法律惠及的影响：迟至 1866 年，在这个加勒比岛上的居民每 20 人中只有不到 1 人具有读或写的能力。而据说，甚至在瑞典国内，这种制度也仅是从 19 世纪 50 年代末才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但大学教育并不在该法律涉及的范围内，它仅为少数精英提供服务，虽然那些特别有天赋的男性可以通过奖学金完成学业。对女性而言，获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极为有限：只有极少数人被允许听课，仅是到 1873 年她们才有资格参加学业考试。但即使在那时，许多人也明确意识到这种情势将会改变，因为男女儿童和他们的家长愈来愈要求获得更好和更进一步的受教育的权利。

195 伴随更多的中产阶级在瑞典的崛起——这是与欧洲其他国家及美国的发展相一致的，对儿童和他们的福利的关注越来越普遍，随之而来的是要求不仅从个人修养方面而且从公民责任方面对他们进行教育。由此衍生的是倡导对他们进行道德教育，这在像作家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等瑞典颇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的著述中有着明确表述。在她出版于 1900 年、产生重大影响的著作《儿童的世纪》（*Barnets århundrade*）中，她集中关注了教育的发展以及在道德教育方面的不足，同时展望了道德教育在未来应发挥的作用，即在推进儿童和整个社会福利方面将发挥的作用。特别是，她对国际上对侵略性军国主义的叫嚣表示悲哀，她有先见地担心，这种势头发展下去将使下一代陷于可怕的战火之中；如果是那样的话，文明生活的基本信条将有被抛弃的危险。与此同时，她还认为，性别问题应该加以解决，以使个人就他或她作为一个男人或女人的性特征得到启蒙，由此就作为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未来的责任有较深刻的认知。与爱人共枕的行为，即年轻男女被允许穿着衣服睡在一起，甚至他的年轻兄弟姐妹有时与他睡在同一张床上的风俗——尽管他们被禁止性交，但预计会进行爱抚和亲吻，这些行为长期以来在农业社会被允许，但她感到，现代世界生活在城市的男女需要就他们的婚姻责任有正确的认识。

到此时，核心家庭已成为瑞典人生活的中心单位，包括孩子，通

常也仅有3或4名成员。许多人将这种家庭视为孩子能够被塑造的基本园地，因此，父母的教育变得几乎和孩子的教育同等重要。贫穷、犯罪，甚至非法性行为，愈来愈被视为家庭生活和教育存在缺陷的结果。诸如鲁夫博士（Dr Ruff）出版于1888年的《健康词典图解：适用于所有人的通俗手册》(*Illustrated Health Lexicon: A Popular Handbook for All*）等书非常流行，不仅是由于它们介绍了现代卫生和健康知识，而且因为它们就如何控制儿童的不良和有害习惯，尤其是手淫，提出了建议。正如鲁夫对有处于青春期儿子的父母所作的忠告那样，“他决不能单独睡在一个屋里；父母应在夜间多次到他床前，掀开他的被子而不用考虑他是否睡着。在这种查房的威胁下，有不良习惯的男孩就不敢手淫了”。他还告诫父母不要在孩子面前用过分热烈的身体动作展示他们的感情，因为他担心这也许会造成他们在长大后耽于声色。 196

19世纪，报业也获得兴旺发展。大量报纸涌现，它们越来越多地发表有倾向性的文章，即那些寻求通过争辩找出如何实现个人和社会发展的文章。《瑞典晚报》（Aftonbladet）于1830年开始发行，日报《每日新闻报》（Dagens Nyheter）在1864年创办。后者至今仍然是瑞典最受欢迎的日报。一代人之后，1884年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瑞典日报》（Svenska Dagbladet）发行，它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仍然发行得很好。在这些报纸中，阿道夫·埃里克·诺登舍尔德（Adolph Erik Nordenskiöld，1832—1901）驾驶他的“维加号”航船于1880年成功穿越“东北通道”（North-east Passage）等事件占据了巨幅版面，尤其当他于那一年4月回到斯德哥尔摩时举行的公众庆祝仪式更是如此，这有助于建构瑞典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荣誉感。

这种趋势在1912年得到进一步的加强，那一年奥林匹克运动会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美国的印第安人运动员吉姆·索普（Jim Thorpe）表现突出，赢得了五项全能和十项全能两项冠军。在颁奖仪式上，打网球的国王古斯塔夫八世据说称赞他道：“先生，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运动员。”索普的回答很出名，他简洁而不失尊严地答道：“谢谢

您，国王陛下。"

来自芬兰的汉内斯·科勒赫迈宁（Hannes Kolehmainen）也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人物。那时的芬兰尽管仍然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大公国，但它作为一个国家参加了这次奥运会。科勒赫迈宁赢得了3枚金牌，即5千米、1万米和8千米越野赛，并创造了5千米跑的世界纪录。总共有大约2 500名运动员参加这届奥运会，代表着28个国家。在瑞典首都召开这样一次国际盛会，确实对培养瑞典的国际意识、对给许多瑞典人带来巨大自豪感以及对不断增强自身的民族认同感，都贡献颇多。

十二、妇女权利

197 在19世纪较晚期，伴随着妇女在家庭和工厂中的作用不断增加，妇女在瑞典的权利问题开始变得突出。家庭内对成年人的体罚于1858年被取消。同年，年龄在25岁以上的单身妇女被授予财产所有权。弗雷德丽卡·布雷默尔（Fredrika Bremer，1801—1865）是迅速发展的蓝袜运动的一位女领袖，该运动寻求为妇女争取新的权利，尤其是为那些已婚妇女。1874年，议会最终通过法律，使工作的已婚妇女能够管理她们自己的收入；但直到1884年，年龄达到21岁的单身妇女才被赋予与男人相同的一般权利。下一代妇女从布雷默尔那里汲取了灵感，1884年成立了弗雷德丽卡·布雷默尔协会，它成为倡导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创新以进一步推进妇女权利的中心所在，其中包括了最终获得投票权。

十三、卫生与健康

伴随着瑞典社会对道德与教育发展的关注度的提高，卫生和健康状况的改善也成为优先考虑解决的问题。由于采取了一揽子预防性措施，尤其是改善了保健和卫生设施，使死亡率有所下降。斯德哥尔摩的人口最终能够实现自我补充，而无须再求助于移民来增加人口的数量。但由于难以预测的恶劣天气和坏收成以及人为的干预，这种改善

是一个缓慢的、不平衡的过程。的确，在 19 世纪中期，饥荒再次在瑞典爆发。马铃薯的收成成为祸因，虽然它以前从营养方面对穷人而言是一种赐福——袭扰爱尔兰的马铃薯疫病给瑞典带来严重破坏，它造成马铃薯在 19 世纪 50 年代严重歉收，而此时几乎没有什么替代性食物。农村的苦难尤其严重，出现大规模移民国外的潮流，通常是移民到美国的中西部地区。这在著名小说《大移民》（*Utvandrarna*）中得到表现，它是由瑞典作家威尔姆·莫伯格（Vilhelm Moberg，1898—1973）在 1949 年到 1959 年之间创作的，后来由获奖的挪威女演员丽芙·乌曼（Liv Ullmann）拍成电影。不过，到了 19 世纪的最后几十年，瑞典已经不再发生饥荒，改善的交通运输条件和更合理的种植使农业产量的稳定性大大提高。 198

此时，一些传染病几乎完全消失。1895 年，瑞典成为世界首批根除天花病的国家之一。至于麻疯病，虽然在瑞典大部分地区已消灭，但却在几个偏远地区残存到 20 世纪；而在北欧的其他国家，在几个世纪前就已经绝迹。在世纪之交的瑞典，仍然有 100 多人忍受这种病痛的折磨，他们几乎全都是在家里染上病症的。麻疯病在诺尔兰南部的锡利扬（Siljan）、尤其是海尔辛兰危害最大，那里于 1867 年在雅夫索（Järvsö）修建了麻疯病院，收容了大约 20 名永久性居留者；它于 1889 年又被加以扩建，容留另 26 位患者。到那时，对麻疯病患者的隔离限制有所放宽，患者已被允许去教区教堂做礼拜。这种开放性归因于对该疾病的更多认知，这些知识是由丹麦内科医生爱德华·意勒思（Edvard Ehlers）和挪威医生阿莫尔·汉森（Armauer Hansen）介绍到北欧国家来的。在科学词汇中，这种疾病就以后者的名字来重新命名，以纪念他在治疗方面所取得的进展。而那时他是在挪威西部的卑尔根（Bergen）、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最大的麻疯病院工作。1875 年，有超过 2 100 名麻疯病患者被收容在那里和周围乡村医院的附属宿舍，通过汉森用新疗法的积极治疗，到 1912 年他去世时，已将这个数量减少到仅 300 人。由于他的努力，这种疾病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逐渐绝迹。

十四、新医院建设

伴随瑞典人口的不断增加，各种身体和精神疾病的就医机率明显降低，这要求做出重大的创新举动：增加医院数量，改善医院的护理。建筑设计师艾伯特·托奎斯特（Albert Törnqvist，1819—1898）设计的乌普萨拉的学院医院（the Academic Hospital），完工于1867年，是这些新建医院中最具创新性的建筑之一。它有一套复杂的通风管道和内部窗户系统来提供新鲜空气，而且它们都很好地整合在建筑物中。于19世纪70年代建立的萨巴茨伯格（Sabbatsberg）医院尝试设立隔离区，在其中保持无菌状态是头等目标，这是在艾米·瑞普（Emmy Rappe）的影响下建成的，她是以现代方式培养的第一位护士，对卫生状况有着严格要求。作为一个非常乐善好施的贵族家庭的女儿，她在英国老师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的指导下接受培训，后来她与老师在1867年到1870年间一直保持着长篇而生动的书信往来。这种新的对卫生条件的强调收获了报偿：在19世纪60年代，瑞典产科病房中每1千人有56.1名妇女死于产褥热，而到1896年这个数字急剧下降到0.7人。20世纪早期的新一代普通医院继续关注卫生条件，此外它们还严格关注规模经济效应。医院越来越变成为巨型建筑，治疗来自广大地理区域的病人，斯德哥尔摩的卡罗来纳医院（the Carolinian hospital）和索德医院（Söder hospital）都能提供1千个床位。

此时，就精神健康问题也提出了新的创新建议。到19世纪中期，瑞典有超过1千人被收容在精神病院，而且还有许多人在等待入住。新的精神病院被加以建造，诸如斯德哥尔摩的康拉兹堡（Konradsberg）病院，它满足了该城市及其迅速发展的郊区不断增加的需求。这个巨型建筑是由艾伯特·托奎斯特根据最新的原则设计的，对空间感、卫生条件和通风都给予了特别关注，它在今天仍作为拉莱姆肖夫医院（Rålambshovs Hospital）在运营。在那里，精神病学教授布罗尔·加德留斯（Bror Gadelius，1862—1938）于19世纪90年代引

入了新的治疗精神病症的方法，治疗手段包括长时间的温水浴。美国医院改革家多罗西娅·林德·迪克斯（Dorothea Lynde Dix）也对瑞典的医院产生很大影响，尤其是对1872年建于哥德堡的黑辛恩（Hisingen）的医院更是如此，那里房间的内部布置比以前更具家庭的外观。医院的环境和它们的建筑物也成为关注的对象。特别是将医院建在大公园中成为通用的做法，周围遍布绿树、植物和草坪，这被认为有益于病人康复。一些医院的环境非常开阔，设在斯堪尼亚的隆德的精神病院，包括不下3.7万株植物。但据说，它与田园风光的农村生活无法比拟，因为在那里的生活规则与监狱有着更多相似性：每个人都在锁与钥匙之下生活，工作人员每次离开住地时也要获得批准。 200

梅毒在这一时期仍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而且既是社会也是医学问题，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特别是因为它能够影响到任何人，富人和穷人、城里人和乡下人，都是一样受到影响。正如一位瑞典医疗管理人员于19世纪40年代提出的那样："人们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即这种病只有通过特殊的和单独的住院治疗才能治愈。人们相信，利己主义（对传染的恐惧），而不是对患者的关爱是对他们治疗的主要原因。"避孕套此时已能够得到，它通常由山羊和绵羊的肠衣制造，既不可靠，也不受欢迎，因此它们很少被使用。这种疾病因此在全国广泛传播，患者通常携带病毒继续生活许多年。这就要求提供长期的治疗，尤其是对受这种病折磨的母亲和孩子更是如此，结果许多孩子生下来就是瞎子。斯德哥尔摩国王岛上的小小家园（the Little Home）就是用于收容这些年轻受害者的地方。对许多罹患此病症的母亲而言，她们宁可选择更极端的办法：堕胎。这是违法行为，所以她们用土法堕胎，甘菊、芦荟、藏红花和松针的提炼物加以混合被认为能够导致堕胎；如果这种或其他土法不能奏效，就只有用外科手术方法来堕胎，但这通常伴有巨大的风险，既有法律上的，也有卫生方面的。

十五、卖淫与性病

为了遏制性传染疾病的传播，瑞典于19世纪40年代成为欧洲首

201 批对卖淫进行管理的国家，它引入了对妓女进行强制健康检查的制度。在那时的瑞典，她们的数量是巨大的，1870 年全部妇女中也许有 0.85% 的人是妓女，因此检查的任务量也是巨大的。许多妓女是来自农村地区的穷姑娘，她们迁移到斯德哥尔摩和其他城镇。而这并不包括那些从事卖淫的男性的数字，他们通常是在军队和海员高度集中的地区，长期低报酬和需要钱用迫使他们从事这一行当。在 19 世纪 60 年代的斯德哥尔摩，相关的管理规章已被纳入城市健康法规，而且专设有特殊的机构来处理这一问题，它要运用各种方法来控制性病的传播。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绝大多数妓女都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到 19 世纪 90 年代健康检查达到 1 周 2 次的密度。结果，性病发生率急剧下降。尽管取得显著成果，但出于道德原因一场禁止卖淫的运动被发起，并在世纪之交后影响不断扩大。以英国为榜样，瑞典联合运动（the Swedish Federation Movement）呼吁禁止非法卖淫，而不是仅仅控制性病的传播。瑞典医生医学协会与之进行斗争没有成功，瑞典对妓女的管理却最终于 1918 年被取消。但到此时，性病治疗大体已被纳入普通医院的治疗范围。

十六、结核病与其他传染病

这一时期，另一种对瑞典社会造成重大健康危害的传染病是结核病。它的患者数量远超过梅毒患者的数量，而且医治起来也更昂贵，因为患者也许会继续生存几十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受到这种病害的侵扰，在北方地区，它已经达到成为严重传染病的程度。例如，在尼德律勒欧（Nederluleå）的安特纳斯（Antnäs）村，7 名居民中就有 1 名患此病症。确实，19 世纪 70 年代，在瑞典全国，每千人中有 3.24 人死于这种疾病。为了应对这种疾病，政府修建了许多疗养院，像哈拉胡尔特（Hålahult）的疗养院于 1899 年投入使用，疗养院有严格的治疗制度，其中最关键的是良好的营养和清新的空气，房间宽大和开

202 放的阳台为吸收新鲜空气提供了可能。这类疗养院都建有这种开放的阳台，它成为这种机构的标志。

其他的传染病也是需要应对的问题。伤寒和斑疹伤寒的影响范围仍然遍及瑞典。而圣巴特勒米岛由于其热带的气候，在整个这个时期仍然是一个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地方。仅在1849年，一种未确诊的热病夺取了殖民地全部人口1/3人的性命，大约350人。疟疾在殖民地也是一种常发病，尽管在瑞典国内这种疾病的发病率正在下降。据说，在1875年到1908年间，仍有不少于6万瑞典人遭受这种疾病的折磨，大多都是在瑞典南部的多沼泽海岸地区与它的大内陆湖的沿岸地区，后者包括梅拉伦湖和维纳恩湖。

十七、孤儿院和对穷人的关怀

非婚生子女也是瑞典在整个19世纪面临的一个问题，尤其是在斯德哥尔摩和其他迅速发展的工业城市的贫民区。在农村地区，20个孩子中有一个是非婚生的，而在这一时期的城市，4个中就有1个是非婚生的。在斯德哥尔摩，已婚妇女比率在全国是最低的，到19世纪末，几乎一半的新生儿都是私生子。据说，许多未婚母亲在孩子诞生后才匆匆结婚。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也许多达1/3的瑞典妇女是大着肚子举行婚礼的。据说，这种比率在全国各地并非一致。在拉普兰和瑞典农村的其他一些地方，私生率非常高，而在哈兰、克鲁努贝里（Kronoberg）和延雪平等南部各省，由于受清教诸自由教派的影响，私生率非常低。

在19世纪80年代晚期，斯德哥尔摩北城的孤儿院最终被拆除。许多新的此类设施被按照更现代的原则加以修建，一些专门用来收容犯罪的青少年，他们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拉比感化院（the Råby Salvation Institute）就是一个这样的机构，它是由建筑设计师卡尔·乔治·布鲁纽斯（Carl Georg Brunius，1792—1869）设计，用卡尔·约翰国王本人提供的建筑材料修建的。它的院长是著名的动物学家阿克塞尔·古斯塔夫·吉伦克鲁克男爵（Baron Axel Gustaf Gyllenkrok，1783—1865），他自己的儿子就逃往国外以逃避偷窃罪的惩罚。它收容的第一批人员是年龄在8岁到13岁之间的12名男孩，他们以前被安

置在马尔默监狱。继它之后，类似的机构在全瑞典迅速增加。

在整个这一时期，瑞典的各个教区继续为穷人和无家可归者提供庇护场所。不过，从 19 世纪 60 年代开始，所谓的穷人农场被设立，像在卡尔斯克鲁纳附近的布莱金厄的农场，在那里，被收容者是作为农场的劳动力从事有报酬的工作。一些农场，诸如在奥雷布洛附近的于斯纳斯贝里（Ljusnarsberg）的农场，不仅提供住处，而且为孩子提供学校，还有一个医院和一个治疗精神缺陷的精神病院。有时，整个家庭都住在这样的农场。它们开办得如此有效，以致被视为是对传统贫民院的一种替代，它们收容人员的数量大量增加。这些新的设施收容那些当时被视为“值得帮助的穷人”，即那些由于年龄、健康不良或由于无法控制的原因而致贫的人。不过，对那些被认为对他们自己的贫困有愧的人，即由于不愿工作或其他道德瑕疵而致贫的人，令人恐惧的教养院则在等待着他们。那里，拒不服从的穷人被提供的是拥挤狭窄的宿舍，要干诸如劈柴或洗衣服等卑贱的工作。斯德哥尔摩的迪尔斯特罗姆教养院（the Dillström Workhouse）就是这样一个声名狼藉的机构。1863 年，它在放置了三层床的巨大房间里收容了大约 414 人，在这种通风不良的恶劣环境中，传染病经常肆虐并产生可怕的后果。

十八、对老年人的照顾

在整个 19 世纪，对老年人的照顾也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这一时期的瑞典，绝大多数家庭并不包括年老的家庭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自己的家里，只是当身体不好或遭受灾难时才同愿意接受他们的家庭成员住在一起。

尽管以前就有收容穷人和老年人的机构，但直是到 19 世纪结束时，现代意义上的养老院才真正确立，而且只针对有个人收入的人提供服务。这些机构中最著名的就是哥德堡的老年之家（the Old People's Home），它是由建筑设计师卡尔·法尔斯特伦（Carl Fahlström）设计的，每个房间可容纳两位住客。不过，这样的设施只

是例外、而不是普遍情况。绝大多数老年人继续独立生活，少数人与家庭成员住在一起。

十九、家庭价值观

如果说作为家庭单位，大家庭在这一时期的瑞典已经相对稀少，但“家庭价值观”此时却获得新生。诸如《瑞典家庭杂志》（Svenska Familj-Journalen）和《家庭之友》（Familjens Vänen）等新杂志发行，它们都宣扬这种价值观、并树立一些榜样，甚至将国家本身设想为一个大家庭。一幅瑞典皇后路易丝（Louise）的平版画于 1864 年首次出版，在它较晚的一个版本中附有一首诗，对她履行作为母亲、妻子和女人的职责表达了敬意。像虔诚、孝顺、敬慕道德等优良品质都被加以强调。有时，这些生活中的优良品质还与政治道德相融合，就像在《过去与现在》（*För och Nu*）中所宣扬的，从历史与神话两种角度格瑞典民族过去的浪漫主义观念不顾时代差异地结合在一起，并被视为代表了 19 世纪的一种理想。模仿古希腊及后来法国的神话传统，动物也被赋予人的特征。因此，马和它们的小马驹、狗和它们的幼崽，都成为现代瑞典家庭的象征。

二十、婚姻市场

尽管对家庭生活关注的程度在提高，但 19 世纪中期步入婚姻生活的妇女所占比例却在大幅下降。在 1844 年的斯德哥尔摩，成年女性大约 3/4 的人都是单身，甚至在农村地区这个比率也高达 2/3。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所谓的“斯德哥尔摩婚姻状况”，即男女生活在一起而又无婚姻约束。不过，它也反映出拥有经济能力的男性的缺乏——这种男性才被视为适合结婚，他们所占比率的增加是与相关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成反比关系的。最令人震惊的是，正是那些社会地位较高的妇女阶层在这方面受害最大，有大约 40% 的这类妇女终生未婚。因为以前适合同她们结婚的人此时都同来自不断增加的中产阶级妇女结婚，她们更为富裕，虽然其社会地位比较低下。不过，在 19 世纪最后几十年，相反的趋

205

势开始出现，未婚妇女的数量急剧下降，至少在斯德哥尔摩，单身妇女占全部成年妇女的比率到 1900 年降至 1/4。

与妇女形成鲜明的对比，绝大多数男性都结了婚。在农民中，婚姻非常普遍，因为农村生活中必需有妇女来做家务，不管是为奶牛挤奶还是纺纱，这些都是生存所必需的。只是在贵族和较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中才可能发现长期单身的人，但在 19 世纪上半期数量很小。不过，在 19 世纪后半期，其数量急剧增加，尤其是在职员阶层和公务员阶层中的男性，因为女管家和女仆为他们提供了必需的家庭服务。在土地贵族中，结婚率在这一时期下降得尤为显著，也许是经济状况恶化的原因所致。由于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数量众多的大地产所有者发现自身处境艰难，结果许多庄园被出售，迫使许多以前的所有者移民到斯德哥尔摩和其他大城市。

二十一、罪与罚

伴随着城市化和移民的不断增长，犯罪成为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问题，监狱关押的囚犯迅速增加，它使建立新的收容场所成为必然。为了应对此类问题，一种改良主义运动形成，它在 19 世纪中期和晚期持续对有关犯罪行为的起诉和处罚做出多样而深刻的干预。卡尔斯堡要塞（Karlsborg Fortress）是由土木工程师和建筑设计师卡尔·弗雷德里克·梅耶尔（Carl Frederik Meijer，1791—1872）于 1845 年设计的，它成为这一时期的标志性建筑。这是一个极为雄伟的高大建筑，侧面是圆顶的城堡，它根据罪行的轻重实现了对罪犯严格的分别关押，这成为许多其他类似设施的样板。

206

在 19 世纪中期，大量新的监狱在全国各地建立，它们都是基于改良主义新原则修建的。其中包括由建筑设计师阿克塞尔·尼斯托姆（Axel Nyström，1793—1868）于 1852 年设计建造的雷曼德监狱（the Remand Prison）和由威廉·西奥多·安卡斯瓦德（Vilhelm Theodor Ankarsvärd，1816—1878）设计的、在朗霍尔门（Långholmen）的中央监狱（the Central Prison）。后者于 1874 年到 1880 年建于斯德哥尔摩，专

门关押服长期徒刑的囚犯。中央监狱建造得尤其具有创新性，它以美国费城的东方惩治监狱（the Eastern Penitentiary）为蓝本修建，其创新之处在于监室的安排，各监室从一个中心区呈扇形散开，门向着阳台开。纽约的奥本监狱（Auburn Prison）也被作为一种蓝本，因为那里监室的门绝没有彼此直接相对的，由此阻止它们所关押的囚犯之间的个人接触。由于社会受到更严格的管理，犯罪行为似乎已明显减少，到1899年，监狱关押的囚犯数降到最低，在全国仅关押了2 293名犯人。各种法律改革措施也予以了实施，一方面有助于减少重罪案发数量，但另一方面却也构造了新的刑事犯罪行为。1864年颁布的一项新法律具体将同性恋定为一种犯罪，以替代过去惩治要更严厉些的鸡奸罪，那时的公共浴池、公园和伐木工棚由于是这类人经常出没的地方而臭名昭著。尽管新的法律被颁布，但由此被起诉的人却很少。

二十二、文学和正在变革的农村世界

由于瑞典的工业发展和资本化显著地改变着社会，因此许多正在消逝的农村文化成为那个时代许多作家和诗人的关注焦点，他们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对它做出关注的。他们好像是要以最后拥抱的形式来把握住它，他们开始在想象中描绘，想象一种他们认为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甚至在他们自己生活的时代就已经不复存在。例如，诗人埃里克·阿克塞尔·卡勒菲尔德（Erik Axel Karlefeldt，1864—1931）在《原野与爱之歌》（*Vildmarks-och kärleksvisor*）和《弗里多林之歌》（*Fridolins visor*）中集中关注达勒卡利亚自然风光的优美，它们独立于那里的农民而存在，它的中心特征是诗人的另一个自我，他一只脚在现代的工业世界，经历了它所有的动荡；另一只脚则在小农组成的旧的农村世界，贯注于他们的收成和天气的反复无常。他拒绝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因为他是评委会的成员，认为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但在去世后仍因为他的贡献而获得了该奖。就他创作的主题而言，他从另一位瑞典诗人、性情古怪和生活杂乱无章的古斯塔夫·弗洛丁（Gustaf Fröding，1860—1911）那里汲取了灵感，但不像后者，他将

207

基督教因素注入到了他的作品之中。尽管对家乡韦姆兰的乡村生活的怀旧描摹是抒情、奔放的，但弗洛丁在诗歌创作形式上是激进的。他来自有精神病病史的家庭，他本人也无法幸免于这种病症，他有时受病症折磨产生的幻觉被用于文学创作，诸如《新诗集》（*Nya dikter*）等作品就是这样的。它出版于1894年，其中富于神秘的想象，从斯堪的纳维亚传奇中汲取了许多灵感。

有关民间文化的趣闻传说此时在公众读者中获得了广泛的反响，在诸如《阿勒的家庭杂志》（*Allers Familjen-Journal*）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使它们广为流传。许多模范村此时被建在城市的周边地区，诸如斯堪森村（Skansen）就在斯德哥尔摩的郊区，它们成为越来越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的朝圣之地，人们对正在消逝的民间文化充满着迷恋。正如瑞典诗人古斯塔夫·阿夫·耶伊尔斯塔姆（Gustaf af Geijerstam，1858—1909）在那时所指出的："正是原始性乃是城市居民在夏日乡村生活中所寻找的东西，人们着迷于它的原始性和平静安宁。"其他人像作家、评论家和博物馆馆长托尔·海德伯格（Tor Hedberg，1862—1931），则在瑞典的大自然中看到了其与音乐的密切关系，正如他在小说《托尔帕农庄》（*På Torpa gård*，创作于1888年）中所描述的那样，瀑布的轰鸣声不仅像风琴的低音，而且也表现了农庄本身的本质特征。他的小说还强调一种两分，这是由城市对乡村的浪漫主义想象与实际从大自然中获取食物勉强度日的艰辛之间的冲突造成的，前者是以一种怀旧的态度看待乡村生活：这种冲突拆散了小说中两位主人公的婚姻，妻子出于精神原因通过与大自然融为一体而寻求个人的救赎，而丈夫却出于对物质利益的追求而寻求统治和剥削大自然。

208 对有财力作外出旅行的瑞典人而言，火车、有轨电车、公共马车，接着是轿车，都是出行手段，借助于它们，斯德哥尔摩的新城郊和乡镇都发展起来，诸如萨尔特舍巴登（Saltsjöbaden）和林町洋（Lindingö）。令人艳羡的木制别墅，面积很大，包括角楼、塔楼和阳台，在多岩石的斜坡和崎岖的海角拔地而起，它们遍布于大都市附

近的乡村地区；甚至在较偏远的地区，这种新开发的建筑也并不罕见，那些新贵从林业给这些地区带来的不断增加的收入中获益。在耶姆特兰偏远的斯吉特蒙村（Skyttmon），有不下10幢宏伟壮观的乡间别墅在1874年到1914年间被修建，其中一幢是由建筑设计师伊洛夫·弗瑞德（Elov Frid）设计的，其外部有7座露台作为装饰，相比瑞典传统的别墅式样，它们更具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地农舍的特色。

这一时期新作品中最具民族主义特色的是贵族作家和诗人魏尔纳·冯·海登斯塔姆（Verner von Heidenstam，1859—1940）的作品，他于1916年荣膺诺贝尔文学奖。他的乡间别墅奥乌拉里德（Övralid）建于1925年，它成为文化领域有相似思想的人物聚会的场所，既有艺术家，也有作家。在那里，瑞典的历史得到颂扬，而且确实直到今天仍然在被称颂：它成为一年一度颂扬瑞典民族和文学特性的场所。海登斯塔姆的历史小说《查理十二世的人马》（*Karolinerna*）出版于1897—1898年，集中记叙了瑞典作为世界强国的伟大历程的最后岁月，那时瑞典在它的尚武国王查理十二世领导下。这是海登斯塔姆诸多歌颂英雄主题的作品中的一部。

其他作家，像奥拉·汉松（Ola Hansson，1860—1925）则回避有关古老历史的理想，转而关注色情和人类心灵中的病态和消极因素。汉松撰写的故事集《敏感的爱梦莎》(*Sensitiva Amorosa*）出版于1887年，对那时的许多瑞典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影响。小说家雅尔玛·索德伯格（Hjalmar Söderberg，1869—1941）集中关注他小说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正如他在最著名的一部作品《格拉斯医生》(*Doktor Glas*）中所表现的那样，该书出版于1906年。它的主人公是一位赢得信任的医生，情节包括由出轨的妻子和堕落的教士通奸引发的冲突。诸如堕胎和妇女权利等问题在他的作品中也占据了重要地位，尽管这在那时的文学中是不常见的。 209

在所有这些才华横溢的作家中，这一时期瑞典最重要的文学家无疑是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1849—1912），他对资

产阶级生活的不平等给予明确的关注甚至憎恶，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几十年前的阿尔姆克维斯特和其他人。然而，尽管在瑞典文学界中具有至上的地位，但斯特林堡却从未获得过诺贝尔奖。他对传统宗教和人际关系所持的异常和扭曲的观点导致他被视为危险的局外人，19 世纪较晚期和 20 世纪初的许多当权人物都是这样认识的，因此他的作品被他们长期加以排斥。在大部分这些作品中，斯韦登博格的神秘主义对他的影响能够明显被察觉，印度教以及叔本华（Schopenhauer）的哲学沉思对他也产生了影响，这些可从叔本华的著作《意志与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1819 年）所表述的思想中看出来。斯特林堡对物理学和哲学有关实在的表象和潜能的认识也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对两种观点的争议感兴趣，一种观点认为时空观念是虚幻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它是一种深层精神的实在反映。这导致他在炼金术与绘画方面做出实验。在所有这些关注中，他所探求的是精神、情感和物质间的关系。当然，在文学领域，他取得了最大声誉。他不仅用植物学家的视角来考察自然界，而且也从人们的自然生存环境中考察他们的心理和情感世界。他的小说《海姆苏人》(*Hemsöboarna* ）出版于 1887 年，集中关注了居住在斯德哥尔摩半岛上的瑞典人的生活，那就像从崎岖的海岸上挺拔而起的常青树一样构成了自然的一部分。其他作品，像剧本《朱莉小姐》(*Fröken Julie*)，首次公演于 1889 年，探索了朱莉童年时期的冲动。社会分裂对她所在的家庭产生重大影响，她的母亲是一位女仆，她的父亲是一位受经济困难困扰的贵族。

二十三、视觉艺术

瑞典的视觉艺术同样关注于类似的问题。正如在文学领域那样，它也在 19 世纪的最后 20 年和 20 世纪的头 10 年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时期，许多人称之为瑞典艺术的黄金时期。它的两位主要领军人物——也是竞争对手——是卡尔·拉尔森（Carl Larsson，1853—1919）和安德斯·佐恩（Anders Zorn，1860—1920)。像诗人卡勒菲

210

尔德一样，他们也居住在达勒卡利亚，着迷于那里的乡村生活和有着悠久历史的民间文化，包括音乐、舞蹈和手工艺。

拉尔森对家庭生活的理想化观念成为他那个时代的标志，其中包含着对那种生活的偏爱，他颂扬的家庭生活的典范甚至在今天都是被模仿的榜样。他创作于1893年的画作《老人与新栽种的植物》（Old Man and New Planting）是以自然主义风格绘制的，集中表现了生物的生命周期，人和自然界都需服从一样的必然演进趋势，光和影、平面和立体、年轻和老年构成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他稍后的作品，诸如《冬至的献祭》（Midwinter Sacrifice），从古北欧神话中选取了创作主题，它的最终版本完成于1914—1915年。这些画作当时并未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只是经过数代人之后，其中一些画作的内在艺术价值才真正被欣赏。直到1997年，《冬至的献祭》才最终被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国家美术馆（the National Gallery of Sweden）收藏在它应该摆放的位置上，而后者在很多年前已被授权收藏此画。

佐恩的母亲是一位到斯德哥尔摩找工作的贫穷农村的劳动妇女，父亲是一位富裕的德国酿酒师。他接受了来自父亲的良好教育，成为备受欢迎的关注现实社会的画家。他是具有国际声望的画家，最终接受了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的特别委托为后者创作肖像画，而且也曾为许多英国贵族创作肖像画。据说，他的户外风景画在今天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力。他的《1897年仲夏夜之舞》（Midsummer Dance of 1897）抓住了北欧最重要节日的夜晚的欢乐气氛，在具有标志性的画面中，映衬着亮如白昼的天空，旋转的舞者烘托出该场合的情绪和氛围。这个场景为该时期许多的瑞典艺术作品提供了主题，但没有哪幅作品能像它那样表现出如此多层面的内容。他的作品《首演》（Première）迥异于公众的印象，描绘了一位裸体妇女与她的孩子在水中嬉戏，背景是波光粼粼的水面和令人目眩的阳光。213 它使欣赏者能够领略到一幅有关母爱的作品背后的东西，肯定是瑞典艺术史上此种类型最具大师水准的画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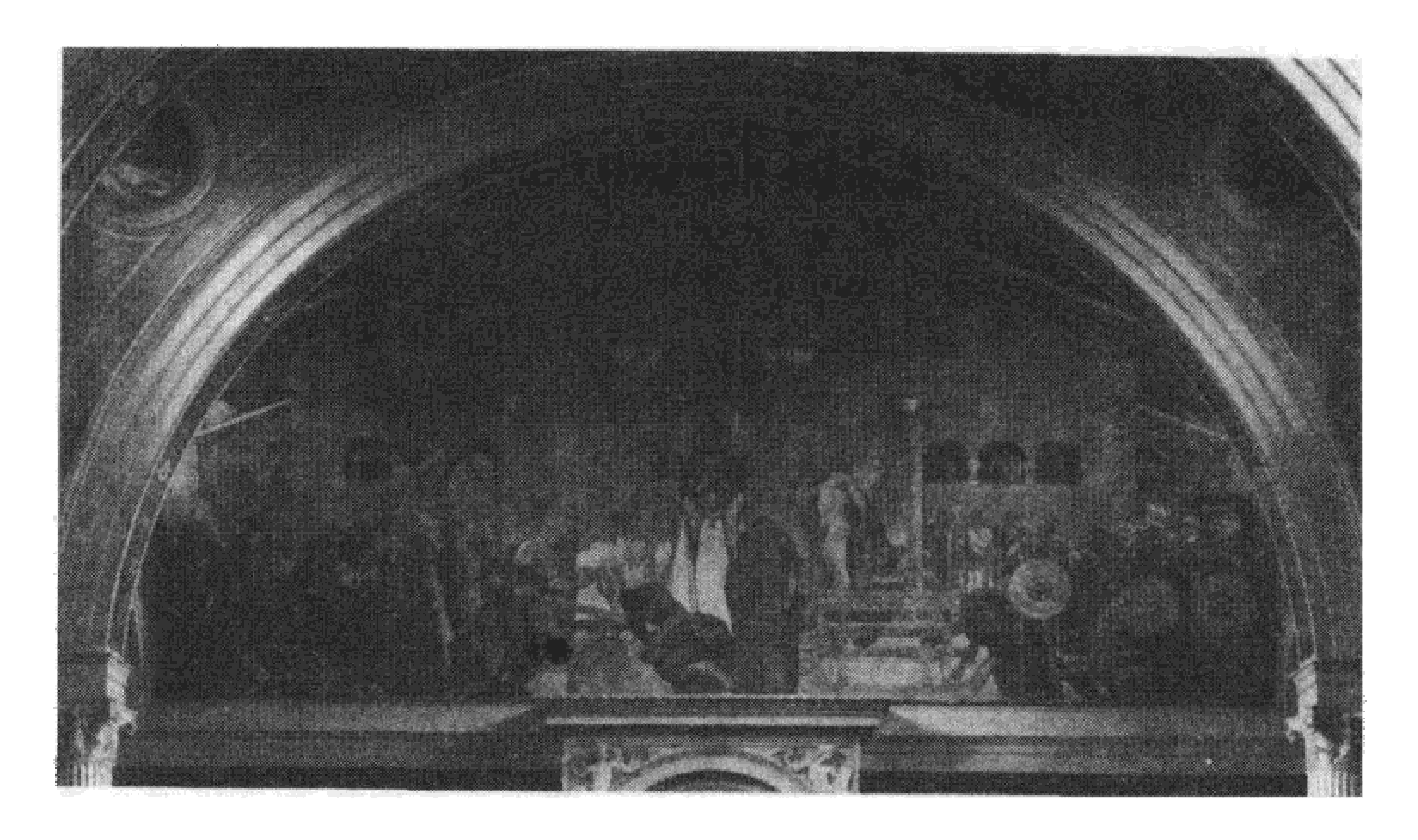


插图13　冬至的献祭（1914—1915）。卡尔·拉尔森（Carl Larsson，1853—1919）创作的油画。拉尔森是他那一代人中最重要的一位艺术家。献祭是古瑞典的一种宗教仪式，通常是在1年中黑暗和饥荒对人类威胁最大的时候举行。不过，到20世纪早期，它变为一种颇有影响力的文化象征，体现了一种民族认同的自我意识。此时波罗的海战事正酣，不仅威胁到瑞典的中立，而且威胁到它的政治和经济存在。油画保存于斯德哥尔摩的国家博物馆。

艺术家恩斯特·约瑟夫森（Ernst Josephson，1851—1906）是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的子女，于19世纪移民到瑞典，他的创作关注了自然与心境。诸如《水中精灵》（Water Sprite，1884）等作品，实际是在他游历挪威期间创作的，他为画作注入了一种泛神论精神。这在后来的北欧世界，甚至在德国和围绕柏林杂志《全景》（Pan）所形成的艺术圈中，都产生了影响。皇室艺术家尤金王子（Prince Eugen，1865—1947）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Gustaf V）的兄弟，在他的象征主义作品中集中关注了另一种风格，其中明显的是回避了神话人物，取而代之的是自然本身：森林、云朵甚至沼泽。它们似乎在暗示更高的精神与哲学实在。他的画作《森林》（Forest，1892年）做出了一种泛神论暗示，其中森林本身似乎拥有它自身的自我认同意识，就好像反映了某种新柏拉图式的另一个实在世界。

二十四、音乐生活

像艺术一样，伴随19世纪后半期的演进，音乐也在瑞典的文化生活中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自然界的状态和氛围能够在其中有着多面的和充满生气的表现。在19世纪中期，浪漫主义音乐已经在瑞典得到强烈反响，尤其是在这一时期瑞典最伟大的作曲家弗兰茨·贝瓦尔德（Franz Berwald，1796—1868）的创造性音乐影响之下。贝瓦尔德来自一个连续4代都产生音乐家的家庭。他在法国人杜·普伊（J. B. E. Du Puy）的指导下学习作曲，接着先是于1829年在柏林、后来于1841年在维也纳继续深造。此后，在瑞典短暂逗留后，于1846年到1849年间，先是回到巴黎，然后再次去了维也纳。到这时，他已创作了6首交响曲，但第4首被遗失。非常不幸的是，在19世纪5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还不能靠音乐养活自己。因此，在那段时期，他在安格曼兰（Ångermanland）一个眼镜制造厂做管理工作。不过最终，他于1867年被任命为斯德哥尔摩音乐学院（the Stockholm Conservatory）的音乐作曲教师。

214

如果说贝瓦尔德的大多数作品受到路易·施波尔（Louis Spohr）和卡尔·玛利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作品的影响，那么音乐和声则是他自己的特色，正如他的歌剧《索里亚的埃斯特里拉》（Estrella di Soria）所表现的那样。在他生活的时代，这些并未受到欣赏。他对瑞典音乐界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才被充分认识，当代斯德哥尔摩最著名的音乐厅——贝瓦尔德音乐厅（Berwaldshallen）——就是为纪念他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这一时期，音乐界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卡尔·史坦翰墨（Carl Stenhammar，1871—1927）。他是作曲家、钢琴家和指挥。特别受瓦格纳（Wagner）和布鲁克纳（Bruckner）的影响，他在其后尝试发展一种更具北欧音乐风格的音乐，并按这种风格创作了两首交响曲以及许多协奏曲和奏鸣曲，其中创作于1905年的大合唱《一个民族》（A People）是一首代表作。当然，他的许多作品也有一种国际向度，它明显地表现在

这样一个事实中，即对许多听众而言，他的6首弦乐四重奏构成了在勃拉姆斯（Brahms）和巴托克（Bartok）之间的一种联系。



插图14 仲夏夜之舞（1897年）。安德斯·佐恩（Anders Zorn，1860—1920）创作的油画。北欧夏天的“白昼”一直是瑞典艺术家创作的著名主题。在这期间，太阳很少落到地平线以下。但佐恩却创作了一幅有关年轻人爱的标志性画作，将光、自然和人的关系提升到一种具有强烈形而上意味的层面。不过在世俗层面，却是在诸如此类的大型活动中，许多年轻男女找到了各自的婚姻伴侣。

雨果·阿尔芬（Hugo Alfén，1872—1960）是这一时期的瑞典音

乐三巨头中离我们最近的、也是最后的一位。作为一位作曲家、小提琴家和指挥，他受到门德尔松（Mendelssohn）非常大的影响，他稍后的作品也表现出理查德·斯特劳斯（Richard Strauss）的音乐对他作曲的重要影响。尤其是他最受喜爱和最著名的作品《瑞典狂想曲》（Swedish Rapsody）更是如此，该作品完成于1903年。他还创作了5首交响曲。而他从达勒卡利亚地区收集的民歌集也对他的音乐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第3首交响曲《E大调第23首作品》（Opus 23 in E Major）更多地是受他在意大利旅居的影响。

至于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的歌剧演员，没有人能够取得比所谓“瑞典夜莺”珍妮·林德（Jenny Lind，1820—1887）更大的声誉。她在卡尔·玛利亚·冯·韦伯创作的歌剧《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中扮演阿加特（Agathe）的角色，这使她红遍了整个欧洲大陆和大西洋两岸。1850年，在马戏团经理巴纳姆（P. T. Barnum）的赞助下，她在美国作了广泛的音乐巡演，在华盛顿特区新建的国家剧院（the United Theatre）中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而为了容纳更多观众看她表演，该剧场进行了修整和扩建。在她生活的稍后时期，在英国做多次演出后，她定居在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的马尔文（Malvern），在那里她仍然是瑞典最伟大和最受敬重的传播高雅文化的大使，直到她去世。不过，这一时期并不是在古典音乐文化的高潮中而是在枪炮声的轰隆声中结束的。战争的突然爆发对波罗的海的另一边产生翻天覆地的影响，并预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

215

第九章　世界大战与瑞典的中立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

216　于1914年夏季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对瑞典军事中立立场的一次严峻考验。正如他们的先辈那样，许多瑞典人一直担心俄国也许会跨越波罗的海进行全面的进攻。然而，像丹麦和挪威一样，它对各交战国都保持了中立立场。因为，大多数瑞典人都认为参战并不能带来什么好处。俄国也曾担心，瑞典会联合德国于1915年对它发起进攻；但瑞典并没有进行这种军事冒险活动的冲动。独立保守党（the Independent Conservative）的首相雅尔玛·哈马舍尔德（Hjalmar Hammarskjöld，1862—1953）尽管同情德国，但一直努力使瑞典置身冲突之外。甚至社会民主党人雅尔玛·布兰廷也支持中立立场，尽管他将战争的责任归罪于德国与奥匈帝国组成的轴心国。由于民意压倒性地反对加入两大政治军事阵营中的任一方从而介入战争，瑞典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了它形式上的中立。

但这并不是一项容易实现的目标。协约国和德国对瑞典的中立立场施加的压力是巨大的，但这种压力采取的是经济的而不是军事的方式。通过满足双方的许多物质要求，瑞典阻止了对其立场的任何军事干预；而在这个过程中，还给它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收益。例如在1915 217

年春天，英国特别需要瑞典的木材，而德国需要瑞典的马匹，因此双方都从该国的中立立场中获益，买卖毫无障碍地进行。不过，有时在某一参战国的巨大压力下，瑞典采取的行动确实引起其他参战国的明显不满，甚至是报复。例如1916年夏，在德国的压力下，瑞典在松德海峡瑞典一方的康格兰德海峡（the Kogrund Channel）布雷，这就与英国处于严重对抗状态，因为它关闭了后者进出波罗的海的海上通道。另一方面，亲英国的工业家马库斯·瓦伦堡在那一年同英国的谈判则有助于缓解紧张局势，推进两国间的外交和贸易关系。据说，英国对德国进出口实施愈加严格的封锁使瑞典遭受的损失日趋加大，导致国家严重的经济困难，日常用品稀缺。瑞典政府被迫于1916年9月实施食物配给制度。

到此时，哈马舍尔德首相和他的保守政纲被笼罩上阴影，甚至同样具有保守思想的、时任瑞典驻英国大使的贵族弗兰格尔伯爵（Count Wrangel）也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叹息道："哈马舍尔德执行政策的方式也许适合于一个像布尔人那样的农民共和国，与历史上的外交精英阿克塞尔·奥克森斯特纳和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等人所实践的那种外交相差甚远。"

接着在1917年4月，瑞典爆发了因食物引发的骚乱。雅尔玛·哈马舍尔德领导的政府垮台，首相被民间讥讽为"饥饿的舍尔德"。民族党领袖卡尔·施瓦茨（Carl Swartz，1858—1926）继任首相，继续他前任的政策。之后臭名昭著的卢克斯堡事件（the Luxburg affair）败露，在该事件中保守党政府卷入了从阿根廷向柏林传递外交信息的秘密活动，后者下令将阿根廷船只沉没以阻碍英国舰船航行，而该情报却被英国情报机关拦截。这一事件造成瑞典政治体制的重大改组，左派获得了胜利。自由联盟的尼尔斯·埃登（Nils Edén，1871—1945）被选为瑞典第一任完全由议会产生并对议会负责的首相，他是乌普萨拉大学的历史学教授。

与此同时，1917年，在国际政治事件的压力下，尤其是俄国在这年10月的分裂和革命的爆发，使瑞典左派经历了严重的内部派系斗 218

争。雅尔玛·布兰廷对共产党人或其他极端左派的社会主义者缺乏同情和耐心，将他们从社会民主党中驱逐出去。那些由此而离开社会民主党的少数人于 1917 年组建了左翼党（Vänsterpartiet）。这就使得左翼多数党能够巩固它的政治地位，他们成为布兰廷的坚定支持者。

在外交领域，经过多次妥协的艰难谈判后，最终于 1918 年 2 月与协约国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瑞典被允许从它们那里进口大量谷物和饲料；而作为回报，瑞典将大量减少对德国的铁矿石出口。最初，人们担心这会激怒轴心国，引起报复。但瑞典与德国于 1918 年 4 月达成协议，确保了后者对这项新的安排保持缄默。

然而，还有另外一个重大问题必须解决：讲瑞典语的奥兰群岛的主权问题，它在波的尼亚湾的中部。该问题的解决确实更为棘手，因为俄国于 1915 年重新在该岛修筑了工事，虽然在 1856 年克里米亚战争的和解协议中禁止这样做。因此，1918 年 2 月 13 日，作为对所谓俄国人的暴行的煽动性报道的反应，瑞典派军队占领了奥兰群岛，这是瑞典自 1808 年以来第一次将军队派往国外。很明显，瑞典海军部长埃里克·帕尔姆斯蒂纳男爵（Baron Erik Palmstierna，1877—1959）选择了兼并该群岛。不过，一个星期后德国军队也开到了这里，这使瑞典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而局势又由于新独立的芬兰所持的敌意而更加严重，后者目前拥有对这些岛屿的法律所有权。

最初采取的是多国共管的方案，由瑞典和德国共同管理这些岛屿。但 4 月 25 日瑞典开始撤军，它认为对这些岛屿的利益能够以非对抗的方法得到保障。毕竟，德国同意瑞典有权就这些岛屿的非军事化和主权进行谈判。军事对峙的可能性明显下降。

219

然而当战争临近结束时，瑞典并没有从这些麻烦的水域中脱身，其他各种威胁也在逼近。西班牙流感于 1918 年 6 月传到瑞典，它以那种连战争都无法实现的方式给该国以沉重打击。而它的传播又由于邻国军队的复员和大量移民潮加剧，后者使它对中立国和交战国产生几乎同样的影响。几十万瑞典人成为这种疾病的牺牲品，他们中大约 85% 都在 17 到 40 岁之间。大量公共建筑被作为医院收容病人。尽管

政府提供了广泛的公共援助，但仍有远远超过 2 万的人死去，其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成年人。虽然并未爆发真正的饥荒，但食物短缺仍然构成问题。尽管阻力很大，但 1918 年 7 月瑞典实行了主要粮食作物土豆的配给制度。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瑞典的影响

尽管流感夺去了许多人的性命——这次流感被视为影响遍及全世界的最严重的流感，但瑞典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烬中反而得到加强，特别是相对于邻国俄国和德国而言。伴随战争的结束，甚至德国也乐于看到奥兰群岛的非军事化，因为如果未来存在敌对状态的话，那么将铁矿石运往德国就很可能会受到阻碍。最终是在奥兰群岛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根据结果，超过 95% 的人赞成重新与瑞典合并。但这一结果被新组建的国联否决，这个新国际组织是在 1919 年的巴黎和会上成立的，其目的是要确保世界各国未来的和平。英国对该组织的成立施加了巨大影响力，它主要是担心德国的复兴。奥兰群岛的主权仍归芬兰，但在内部事务上实行自治，而且将瑞典语作为唯一官方用语。

在战后早期，曾于 1906 年到 1911 年间担任瑞典首相的阿尔维德·林德曼，作为一位右派领导人再次走向前台，但左派此时依然具有政治支配地位。1920 年，雅尔玛·布兰廷作为瑞典的第一位社会民主党首相开始了第一届任期。同年，瑞典加入国联，并于 1923 年占据了该组织委员会的一个非常任席位。不过，1926 年它放弃了这个席位，以使德国能够成为一个永久性成员。此时，德国的地位已部分地得到恢复。尽管具有国联成员国的资格，但瑞典继续保持了它的中立立场，并于 1925 年削减了它的军队规模。 220

虽然瑞典的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对与北欧共同合作的政纲感兴趣，但影响范围是非常有限的；不过，也确实进行了一些有创意的活动。1918 年，北欧联盟（Föreningen Norden）成立以培植这个地区的合作，它很快包揽了经济及政治两个方面的促进活动。不过，政治方面的活

动尤其难进行，因为北欧地区诸国，特别是挪威，担心瑞典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据说，这个地区所有国家都签署了盟约，甚至芬兰也成为了它的成员，尽管它长期以来一直在进行几乎完全排外的民族觉醒运动（Fennonmania）。

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不管是右翼还是左翼，没有一个政党能够在议会中占据统治地位，政府平均每2年就换1届。例如，布兰廷执政不到1年就被迫下野。1920年到1921年，小路易斯·德·吉尔（Louis De Geer the Younger，1854—1935）担任首相，他是独立自由党的成员，是瑞典第一任首相的儿子。在他的任期内，社会大体是平静的，无重大事件发生。

就左翼而言，一位石匠的儿子，皮尔·阿宾·汉森（Per Albin Hansson，1885—1946）成为这段时期瑞典最著名的年轻政治家。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他赞成禁酒，成为布兰廷的门徒。后者帮助他在斯德哥尔摩找到一份记者工作，即《社会民主报》（Social-Demokraten）的记者。他最终于1918年被选入国会，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国防部长。

1921年，像独立党（the Independent Party）的德·吉尔一样，奥斯卡·冯·赛多（Oscar von Sydow，1873—1936）担任首相。在他短暂的任职期间引入了一项重要的法律改革：废除死刑。不过，总体看，他在政府中获得的支持很少。那一年的晚些时候，由雅尔玛·布兰廷接任首相——他的第二届任期持续到1923年，见证了社会民主党权力的进一步巩固。

221

三、经济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尽管瑞典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但由于同陷入麻烦的欧洲其他国家在经济上的纠葛，致使它的经济处于一种衰败状态。就直接后果而言，它遭遇了严重的失业浪潮，有高达1/4的工人缺乏谋生手段。伴随着工业的再次开始发展，事态才有所改善，到1925年失业率降到了10%。在1919年到1939年间，瑞典经济年增长

率保持在 3.3% 的水平。从贸易角度看，经济仍然处于衰弱状态：出口从 1913 年占 GNP 的 20.8% 的高水平，降至 1925 年的 16%；进口也保持在较低水平上，从 1913 年的 21.6% 降至 1925 年的 17%。

至于德国，尽管它的政治和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但它仍然是瑞典的一个主要贸易伙伴。在接下来的一些年中，伴随德国工业的复苏，德国对铁矿石的进口急剧增加，特别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瑞典的铁矿石产量于 1927 年被固定下来，为每年 1 050 万吨，绝大部分来自它位于北方的铁矿石场。

俄国的动荡，尤其是革命引发的、一直持续到 1922 年的惨烈内战，也给瑞典带来巨大的经济收益。尽管英国和美国在 1920 年到 1921 年间对俄国进行了封锁，但瑞典仍然是革命的俄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充当着俄国出售黄金的销售渠道，并且瑞典的铸币厂对大量的黄金进行了加工。

不过，伴随着大萧条的降临，即 1929 年 10 月 29 日华尔街股市的崩盘，瑞典的经济也几乎陷入崩溃。其货币的金本位被迅速放弃。经济损失巨大，富人和穷人同时遭殃。正如在纽约发生的那样，金融界的巨头面对破产选择自杀身亡，其中包括著名的企业家和工业家伊瓦·库鲁格（Ivar Kreuger，1880—1932）。作为民间熟知的“火柴大王”，他的瑞典火柴公司（Svenska Tändsticks AB）从属于美国的国际公司（the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生产了全世界大约 2/3 的火柴。他的商业帝国还包括在瑞典北部的大部分林业生产，同时还过多地参与了纤维素的生产。他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与最终急剧落败成为俄裔美国剧作家艾恩·兰德（Ayn Rand）的百老汇戏剧创作轰动一时的主题。在《1 月 16 日之夜》（Night of January 16th）中，作家就从中汲取灵感创造了主人公比约恩·福克纳（Bjorn Faulkner）。

222

由于失业在瑞典的急剧增加，工厂工人和矿工的不满也在加剧。在西曼兰的斯特雷帕矿（the Stripa Mine）和阿达伦（Ådalen）矿都爆发了严重的罢工事件，有 5 名罢工者被枪杀。结果，对这些事件和这一时期苦难的记忆，导致许多社会民主党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强化其

主要纲领：建立所谓的人民之家（folkhem，照字面意思翻译）或瑞典的福利国家。在这些支持者中最具热忱的是古斯塔夫·穆勒（Gustav Möller，1884—1970）。他所具有的雄辩才能和他担任的社会事务部长职务，极有助于塑造一种积极的民意来支持这一政纲的实施。社会民主党引入凯恩斯经济解决方案来应对经济萧条，该党从1932年起与农民党组建联合政府，它将统治瑞典长达几乎两代人之久。

瑞典政府的成功导致美国经济学家马奎斯·奇尔德（Marquise Child）于1936年出版了他的名著《中间道路》（*The Middle Way*）。在书中，斯堪的纳维亚经济被视为提供了可行的替代经济模式，即替代苏联共产主义和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模式。因此，它有助于为正在发育中的瑞典福利国家制度培植根基。不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的几十年间，这一制度的运行才完全成熟。

与当时的预期相反，那个时期严重的经济衰退在瑞典并没有引发犯罪潮。正相反，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犯罪率一直保持在相当低的水平上。结果，几乎没有新建的监狱，19世纪建成的监狱就能很好地满足需要。同样是在19世纪运行的、在人口各阶层中培植瑞典公民社会的努力，仍然在产生着红利。

223

尽管有社会民主党人的良好意图和他们为振兴经济而采取的各种政策创新，但在世界性大萧条之后，失业率还是在瑞典迅速上升，到1932年底，失业人口几乎达到30%。受到严重削弱的瑞典经济变得难以为继，到1938年，尽管在有限的部门还能获得微利，但出口对进口的比率一直保持在非常低的水平，仅有15.7%的GNP被出口，却有17.7%的进口。只有作为出口产品之一的木材，在1924—1925年相比战前仅微弱下降到总出口的22%。不过在1934—1938间，它也急剧地降到13.2%。据说，有些重要产业表现出某种复苏的迹象，尤其是钢铁产业，它们从1924—1925年占外贸5.3%的低水平，增加至1934—1935年的7.2%。铁矿石的生产此时也有了新的起色，在1924—1935年从占海外贸易的7.9%增加至9.5%。

瑞典的机器制造业被证明给其他困难产业带来了实惠，它的产品

由于质量好迅速获得国际声望，使它们在世界市场上具有很高的竞争力。结果，这类产品在外贸出口中所占份额明显增加，在 1934—1938 年多达 21.3%。

到 1938 年，英国成为瑞典最重要的出口伙伴，占总出口量的 24.5%。木材只是众多重要出口产品中的一种，它对英国迅速增加的建筑行业而言是必需的。德国位居第二，对德出口占瑞典总出口的 18.2%。不过，从进口看，恰好颠倒过来：从德国的进口占 24.0%，而从英国的进口仅占 18.3%。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末，瑞典新兴的飞机制造业具有了巨大的经济价值。瑞典飞机公司（SAAB）创建于 1937 年，总部位于哥德堡附近的特洛尔海坦（Trollhättan）。由于瑞典在高技术领域的声望不断提高，它迅速成为国际热议的对象，而且伴随战争的阴云越来越逼近欧洲，它的重要性也在不断增加。

224

到此时，从瑞典北部进口铁矿石对德国而言已具有攸关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并非被高估。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德国的铁矿石进口中有不少于 60% 是来自瑞典。它购买了瑞典铁矿石总出口量的大约 3/4，远远多于英国，后者在这一阶段仅进口了 12%。这种进口水平是不能满足英国需求的，因此，1937 年它也试图购买更多数量的铁矿石。而这是可以通过鼓励瑞典政府增加其总产出量来实现的，不用以牺牲德国的利益为代价。瑞典确实这样做了，但英国并非是获益最多的，因为它的钢铁工业不景气，这意味着其对铁矿石的需求并不像最初预计的那么多。由此而造成的剩余则全部被德国贪婪地鲸吞。

新技术革新的作用到此时凸显出来，它对交通运输给予巨大推动，对瑞典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公共广播开播于 1922 年，很快就普及到几乎所有瑞典家庭。它不仅具有重要的娱乐价值，而且对民意的形成、对社会问题的公众关注，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938 年，当作家和记者鲁比·诺德斯特罗姆（Lubbe Nordström，1882—1942）主持的一个系列脱口秀节目“蹩脚的瑞典人”（Lort-Sverige）播出后，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使广大公众意识到，大城市正在遭受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这也进一步激励政府做出创新，发展瑞典新生的福利国家

制度。

汽车在瑞典也变得极其重要，它的使用越来越多地普及到普通人。第一辆沃尔沃轿车于1927年在哥德堡下线，它是在两位有远见的人的管理下制造出来的，即工业家阿瑟·格布尔森（Assar Gabrielsson，1891—1962）和工程师古斯塔夫·拉尔森（Gustav Larsson，1887—1968）。像瑞典飞机公司一样，沃尔沃也最终进军飞机制造市场，尽管它从未取得像其竞争对手那样的成功。虽然如此，但两个公司被证明在生产足够数量的飞机上是不可或缺的，而这些飞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保障瑞典空中安全所必需的。

四、卫生、健康与社会福利

225 尽管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西班牙流感就袭扰了瑞典，但全国的预期寿命还是在不断提高，饮食和卫生条件的改善有利于控制各种传染疾病的传播。这导致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来照顾这些老年人，因为他们在身体上已经不能照顾自己或正在衰老。斯德哥尔摩的皇后院等老年照顾机构一直在为那些变穷的贵妇人提供服务，但它们发现要求提供服务的人数变得越来越多。1924年，皇后院将它的房间沿着一个中心走廊再分成更小的房间，以容纳更多的人过隐居生活。与此同时，新建了许多这样的机构，为来自各阶层的老年人口提供服务。

在导致精神病的各种身体的和社会的原因中，社会动荡的不断加剧以及冷漠疏远的城市生存环境使数量不断增加的人需要医治这种病症。与精神病院的传统治疗方法并行，一种新的、但现在已臭名昭著的脑白质切除术到20世纪30年代末流行起来。首先是葡萄牙内科医生和神经专家安东尼奥·埃加斯·莫尼兹（Antonio Egas Moniz）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治疗，他也因此赢得了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这种治疗方法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在瑞典非常流行，它被用作治疗精神障碍症。多达5万人以这种方式做了外科手术，该技术一直在瑞典运用到20世纪70年代，这期间接受治疗的人数保持很大的稳定性。以后有其他形

式的精神病治疗方法取代了这种带有侵害性的外科治疗方法，其中包括使用药物氯丙嗪，它对各种反常状态具有疗效。

像其他北欧国家一样，酗酒仍然是瑞典的一个大问题，它的影响经常包含各种暴力犯罪行为，许多私人诊所开业治疗那些患此症状的人。尽管政府对酒精饮料的销售予以管制，但酗酒一直是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重大健康问题。此外，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疟疾在瑞典被根除。 226

儿童保育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改善。城市儿童保育委员会（the Municipal Child Care Boards）最早于 1902 年设立，但在 1917 年进行了彻底重组。到第二年，对那些没有维持生计手段的儿童，由新设立的这些机构提供服务已经成为常规。这些机构不再作为成年人机构的附属部分，而是专门为儿童所建立。它是作为对公众所担心问题的一种反应，即儿童们和与他们没有关系的成年人交往会为他们"变坏"提供机会。

一揽子法律改革也在这一时期实施。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死刑于 1921 年被废除，同一年妇女被授予选举权和在婚姻中的平等司法权。而就妇女权利而言，最重要的是科尔斯汀·海塞尔格伦（Kerstin Hesselgren，1872—1962）成为第一位被选进瑞典国会的女性，她是于 1922 年取得议员席位的。

在两次大战期间，伴随着宗教宽容主义运动的迅速扩展，瑞典教会也发生了改革。这种运动在 1925 年达到高潮。那一年，在大主教纳特汉·瑟德尔布罗姆的领导下，诸教派的宗教人士在斯德哥尔摩举行大聚会，他们强调各主流基督教派所具有的共同基础。只有罗马天主教会没有出席，他们的代表由于神学原因拒绝参加，其实它也是来自基督教的一个主要教派。

在自由教派中，五旬节教派一直保持发展态势，它从对路德教派和浸礼会教派不满的教徒中吸纳成员，教徒数量迅速增加。尽管后者流失了一些教徒，但浸礼会的影响仍然很大，1938 年它大约有 68 000 名信徒。不过，获得最大发展的是瑞典宣道团。它不仅继续在瑞典保

持不断壮大的势头，而且在海外的重要性也在持续增加。它集中关注着传教活动，尤其是在非洲和亚洲的传教活动。

五、艺术

如果说瑞典国教和该国的其他主要基督教派在视野上都变得更具国际性的话，那么，艺术也是如此。尤其是许多画家都积极参与了更广泛的艺术运动，它们在影响范围上都是国际性的。例如，阿德里安·戈斯塔·尼尔森（Adrian Gösta Nilsson，1884—1965）在多次旅居柏林期间深受未来派和立体派的影响，他最著名的一幅画作《海边城市》（City at the Seaside，1919 年创作）就结合了这两种流派的要素，它描绘的是瑞典西南海岸的城市哈尔姆斯塔德（Halmstad）。在画作中，与城市本身的远景一道，许多小场景被包括在它分层的画面，其中包括一起未遂的盗窃和他朋友埃贡·奥斯特兰德（Egon Östlund）舒适的客厅；蒸汽列车驶过画的中央，按照未来派风格强调了运动感，似乎当它接近观察者时是在加速行驶着。

另一位享有巨大声望的艺术家是西格莉德·希雅藤·格伦尼瓦尔德（Sigrid Hjertén Grünewald，1885—1948），她也受着立体派的很大影响。她的部分灵感来自于她的丈夫伊萨克（Isaac）的作品，那是一位有德国犹太人血统的艺术家，在巴黎居住了许多年。她创作于 1919 年的作品《眺望水库》（View over the Sluice）就表现了这种风格，它证明在描绘斯德哥尔摩的生活时运用片断化的一点透视法是能够创造出千变万化的效果的。其中的一个场景是从一个站在阳台上的人物的视角来观察路人，这似乎是借鉴了毕加索（Picasso）的风格。出身贵族的瑞典画家尼尔斯·冯·达德尔（Nils von Dardel，1888—1943）也应该被提及，尤其因为法国、俄国和瑞典的芭蕾舞领域对他作品产生的重要影响。他作为 19 世纪创作历史题材的画家弗里茨·冯·达德尔（Fritz von Dardel）的孙子，创作于 1921 年的画作《拜访一个古怪贵妇人的家》（Visit at the Home of an Eccentric Lady）描绘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件。他运用一种透视法，将三维世界交织在一起创造了一种现

代的、类似博世（Bosch）精密仪器所表现的视界。法国艺术家亨利·卢梭（Henri Rousseau）对他的影响也很明显，这种影响表现在一位贵妇人在与一个呆在她头上的猴子共舞的画面。而来自东方动物绘画的特色似乎也产生了影响，这倒并不会使人感到奇怪，因为冯·达德尔曾在瑞典芭蕾舞团经理罗尔夫·德·马雷（Rolf de Maré）的陪伴下游历墨西哥和日本。马雷是瑞典芭蕾舞团的创建者，富有而才华横溢。

最后，雕塑家卡尔·埃尔德（Carl Eldh，1873—1954）也值得关注，尤其因为他创作的有关斯特林堡的系统作品。其中，他有关肌肉作为人类力量表现的构想被用于表现瑞典最伟大剧作家斯特林堡的理智力量；特别是他创作于1923年的那幅不朽作品更是如此。为了汲取创作灵感，他曾在巴黎作广泛游历，并在不同学校、尤其是科罗拉西学院（Académie Colarossi）学习。他在1900年举办的世界博览会上获得荣誉奖。也许正是他较晚期的作品《奔跑者》（Runners）最能表现罗丹（Rodin）的影响，该铜像至今仍竖立在斯德哥尔摩体育场（the Stockholm Stadium）。

228

在音乐方面，瑞典作曲家希尔丁·罗森贝格（Hilding Rosenberg，1892—1985）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享有盛名。他于1930年创作的《第一钢琴协奏曲》（Piano Concerto No. 1）虽是现代性风格，但却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中获得巨大成功。他拒斥前一代音乐人的浪漫主义风格的做法激励了许多后来者，尤其是"星期一小组"（the Monday Group）。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卡尔—毕尔格·布洛姆达尔（Karl-Birger Blomdahl，1916—1968）。

在文学领域，主要是自学成才的埃温特·约翰逊（Eyvind Johnson，1900—1976）此时凭借着像《这就是你的人生！》（*Här har du ditt liv！*）等作品获得显赫声望，该书出版于1935年。受诸如乔伊斯（Joyce）、纪德（Gide）和普鲁斯特（Proust）等作家的启示，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能够看出他从早期在瑞典极北端、北极圈附近做伐木工的经历中汲取了营养。哈里·马丁逊（Harry Martinson，1904—1978）是这一时期另一位有巨大声望的作家，因小说《费尔韦尔角》

(*Cape Farewell*，1933 年创作）而得名。这是一部以他的游历为基础的自传体小说。书中，他对风的印象和描述具有隐喻性，使人联想到人的情感。很多年之后，他们的作品才得到完全的认可，1974 年，约翰逊和马丁逊共同分享了诺贝尔文学奖。

瑞典的戏剧也开始得到越来越广泛的观众的欣赏，但尤为重要的是电影业的诞生和发展。无声电影 1896 年传入瑞典，而其本国的电影生产开始于 1907 年。有声电影是在 1929 年开始制作的，到下一个 10 年末，女演员莎拉·利安德尔（Zara Leander，1907—1981，真名是莎拉·斯蒂娜·海德伯格［Zara Stina Hedberg］）成为瑞典最著名的国际影星，她由于声音沙哑又浑厚有力而闻名。经历了在斯德哥尔摩的戏剧生涯后，她移民到柏林，她的第一任丈夫是瑞典皇家剧院院长的儿子。在柏林她迅速成为纳粹政府的宠儿。她在战争期间拍摄的影片《大爱》（The Great Love，拍摄于 1942 年），包括流行一时的歌曲《我知道奇迹有一天会发生》（I Know One Day a Miracle Will Happen），都使她在整个第三帝国获得狂热的追捧。不过，看到德国即将战败，她回到瑞典。战后，她在本国的演艺生涯陷入低谷，声誉受到严重毁坏，因为她主演的电影为纳粹的战争努力提供了宣传支持。据说，她在德国和奥地利仍然非常受欢迎，在余生的时间里她继续到那里作巡回演出。

在国际影坛取得更大成功的是女演员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1905—1990，真名是葛丽泰·洛维萨·古斯塔夫森［Greta Lovisa Gustafsson］）。她在瑞典无声电影《哥斯塔·柏林的故事》（Gösta Berlings Saga，创作于 1924 年）中扮演的角色使她赢得了高度评价，该电影改编自哈里·马丁逊的小说。但正是由于她转到好莱坞发展，为她提供了成为一名世界最著名女影星的机会，在那里她为米高梅电影公司工作。她在《克丽丝汀女王》（Queen Christina，拍摄于 1933 年）中扮演的女王角色已经成为经典，这是一部有关瑞典 17 世纪女王的高度虚构的电影。她个人一直过着隐居生活，包括其面部表情的高深莫测，都有助于造成一种神秘感，至今仍然如此。而且，由于她在纽约

的几十年隐居生活更增强了这种神秘性。她于1951年加入美国籍，并在1954年由于“令人难忘的表演”而被授予奥斯卡荣誉奖。



插图15　女演员和电影明星莎拉·利安德尔（Zara Leander，1907—1981）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和二战期间的柏林成为瑞典最著名的一位国际女影星。她由于沙哑和浑厚有力的声音而闻名遐迩，但她与纳粹宣传机器的合作毁坏了她在战后时期的声誉。照片存放于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

瑞典电影界三巨头的最后一位是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

1915—1982)，她也是在好莱坞获得声誉的。她出演的最著名的影片无疑是《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拍摄于1942年)。在影片中与她演对手戏的是汉弗莱·鲍嘉（Humphrey Bogart)。这部影片成为那10年最著名和最受欢迎的影片。不过，与利安德尔和嘉宝不同，她在几十年间一直在饱受国际好评的多部影片中出演角色。后来她主要是与导演罗伯托·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成为她第二任丈夫）合作创作了多样角色。英格丽·褒曼共赢得3次奥斯卡金像奖。

六、瑞典的政治右转

如果说瑞典艺术灵感的源泉变得愈来愈国际化，那么，在政治层面，该国却进入了一个保守时期，变得更为孤立。像欧洲大多数国家一样，右翼政党在20世纪30年代的支持率增加。1936年，尽管内部处于分裂状态，但民族社会主义运动（the National Socialist Movement）在瑞典成为最受欢迎的一种政治运动，在议会选举中获得大约2万选民的支持。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the Nationalsocialistiska arbetareparti）与德国的同名党（即纳粹党）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它在斯文·奥洛夫·林德霍尔姆（Sven Olof Lindholm，1903—1998）的领导下获得17 383张选票，瑞典民族社会主义党（the Swedish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获得了2万支持者余下的选票。林德霍尔姆领导的组织“北欧青年”（Nordic Youth）此时成为在年轻一代的潜在支持者中宣传其纲领的中心组织。不过，仅赢得总选票的0.7%，瑞典纳粹党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能在议会中获得席位。

231

极左翼也处于一种衰落和无组织状态。瑞典共产党处于严重分裂状态，被边缘化，无力对多数党社会民主党施加任何重要的影响。因此，瑞典继续坚持它的中间道路，谨慎制定它军事力量的发展规划，因为国联已经表明无力阻止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国际形势急剧恶化。1936年，社会民主党和农民联盟党（Bondeförbundet）合作组建联合政府，瑞典政治的稳定性得到保障直到1939年。接着，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一个包括所有民主政党在内的联合政府被组建

起来。

伴随着战争威胁的愈来愈近，签署一个北欧防御协定（Nordic defence pact）的创意于1937年春被提出。瑞典总参谋部（the Swedish General Staff）也制定计划，当芬兰卷入对苏联的战争时将提供军事援助。尽管丹麦首相托马斯·斯陶宁（Thomas Stauning）拒绝了签署一项协定的提议，但瑞典建立起与芬兰更为密切的关系。1939年，瑞典外长理查德·桑德勒（Rickard Sandler，1884—1964）宣布，瑞典将全力支持芬兰重新武装奥兰群岛。不过，苏联的敌意阻止了这项计划的实施。此后，瑞典对芬兰的支持变得越加谨慎，并且主要集中于经济方面。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9月1日爆发时，瑞典宣布中立。北欧国家首脑会议于10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瑞典、芬兰、挪威和丹麦的首脑参加，但并未达成实际的一致，即在政治或其他方面采取任何可能一致行动的协议未能达成。据说，瑞典将它的防御置于一种准军事状态，奥洛夫·索恩奈尔（Olof Thörnell，1877—1977）将军被置于总指挥的位置，代替国王担任全部瑞典军队的总司令，一直到1944年。不过，瑞典继续保持中立立场。尽管俄国于11月30日对芬兰的进攻激起大部分民众的同情，许多瑞典人以私人身份作为志愿者为芬兰而战，但瑞典并未改变中立立场。

232

就对德关系而言，瑞典努力保持一种严格的政治和军事中立，但对德贸易给瑞典带来巨大经济收益。1939年4月，瑞典正式向德国政府保证，后者急需的铁矿石将得到继续供应。尽管一些更具体的措施并未执行，像在瑞典南部建立铁矿石大量储备的计划，因为从那里的港口出口货物到德国的风险较小。

七、第二次世界大战

当苏联于1939年11月30日入侵芬兰时，大多数瑞典人都对这个过去属于自己、但已脱离出去很久的国家表示同情，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外长桑德勒是坚决主张对芬兰援助的政府领导人。不过，伴随着他

的去职，瑞典保持严格中立立场的主要障碍就被消除。职业外交家克里斯蒂安·京特尔（Christian Günter，1886—1966）继之被任命为外长。此时汉森作为社会民主党首相已是第三个任期，他赢得大约53.8%的选票。与左右翼各派别政党组成广泛的联合政府，他成功地在整个战争期间保持了瑞典正式中立的立场。不过据说，他和他的政府秘密地向芬兰提供了武器和急需的贷款。大约有12 000名瑞典人自愿帮助芬兰人作战，还有许多人在芬兰的拉普兰地区提供非战斗的服务。

工业家马库斯·瓦伦堡（Marcus Wallenberg，1899—1982）和他的哥哥雅各布·瓦伦堡（Jacob Wallenberg，1892—1980）都是老马库斯·瓦伦堡的儿子，他们的父亲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进行谈判维系瑞典的利益，而这时他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瑞典赚得了巨额经济收益。再次地，像父亲一样，他们也进行了对瑞典和英国双方都受益的复杂谈判，这些谈判并未使瑞典对轴心国的正式中立立场受到破坏。不过，在一些领域的摩擦是存在的，因为瑞典的铁矿石被继续出口到德国支持了后者的战争努力。因此，英国制定计划要阻止这种供应。1940年初，英国军事情报局6处的特工阿尔弗雷德·里克曼（Alfred Rickman）领导一个突击小组，计划破坏铁矿石从乌克瑟勒松德港的出口，这个港口在瑞典的波罗的海沿岸。不过，这种破坏企图未能成功，铁矿石继续出口到德国。

233

此时，一位在瑞典的俄国人的才华被认知，尤其是在外交领域。这位迷人而才华横溢的亚力山德拉·科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从1930年起就成为苏联驻斯德哥尔摩的公使，从1943年开始担任大使。她是对俄国新统治者存在的伟大证明，她不仅巧妙地使两个国家之间保持相对平稳的关系，而且也熟练地协调了芬兰和苏联之间的谈判，后来导致了1944年两国之间所谓“继续战争”（the Continuation War）的敌对状态的结束。

就与挪威的关系而言，瑞典的反应被视为是远非友好的，这导致它们之间的怨恨持续到了今天。因为，在德国于1940年3月占领挪威

后，德国军队被允许使用瑞典铁路穿越整个瑞典。其运输的规模在1941年6月变得非常明显，那时德国一个超过18 000人的整装师被从挪威运到芬兰，这为纳粹的战争努力提供了方便。只是在1943年铁路才停止使用，那时德国的军事力量已处于衰落中。许多瑞典人，尤其是那些政治左派，从这种安排一开始就非常不满，这些意见通过资深总编托尼·塞格斯蒂特（Torgny Segerstedt）的《哥德堡商业和航运日报》（Göteborgs Handels-och Sjöfartstidning）和图里·尼曼（Ture Nerman）的《不顾一切》（Trots Allt）两份报纸予以传播，这些报纸充斥着对瑞典政府在该问题上的尖锐批判。

而来自政治右翼的人则更担心来自苏联的威胁，害怕一旦苏芬战争失败，共产主义会向瑞典传播。不过，政府实施的严格审查制度会减少他们的出版物的影响，那些被认为可能冒犯各交战国的出版物经常被没收，甚至那些透露纳粹对挪威抵抗运动战士实施酷刑的信息也被禁止传播。结果，瑞典继续沿着它正式中立的道路前行，冷眼旁观东部和南部那些处于交战状态的大国。但同时，在整个战争期间，它允许总计超过两百万人的德国军队往来于它的领土。 234

不过，尽管其政策存在各种缺陷，但有一个事实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瑞典成功地避免了丹麦和挪威的命运，而它们于1940年4月被德国军队占领。据说，同盟国由于担心瑞典会被轴心国借助这种或那种手段纳入它的轨迹，英国和法国几乎于同一年入侵瑞典。1940年2月5日，作为斯特拉特福德行动（Operation Stratford）的组成部分，盟军最高战时委员会（the Allied Supreme War Council）批准动用10万军队，在11 000艘船只的支持下占领瑞典。不过，在缺乏足够人力和资源的条件下，这种宏大的占领和对德防御计划并未实现。并且，瑞典保持中立也使这种行动变得不再必要。瑞典的领土完整，对于同盟国和轴心国而言都不存在争议。

八、战时经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海变为战场大大限制了瑞典对西部的

贸易，虽然英国愿意为瑞典开放某些海上通道。因此，相比从前的情况，它被迫更多地依赖与德国的跨波罗的海贸易。铁矿石是德国不顾一切也要得到的主要资源，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在1940年到1944年间共有不少于3 800万吨的铁矿石被出口到德国。另一方面，煤和碳又是瑞典维持能源供应所急需的重要产品，它们供工业和家庭使用。很自然，在不利的环境下，进口下降。政府在1942年对经济施加越来越严格的管制，包括对工资和物价设置上限以及实行配给制。据说，由于从国外进口粮食的急剧下降，使得瑞典的农业获得大的发展，价格也显著提高。军队有大幅增加，超过了政府承认的数字。1936年的军费支出为1.48亿克朗，而在1941—1942年剧增至18.46亿克朗。

235

工业在战时所经历的困难有时会导致工人和工业管理层之间的关系受到严重损害。当某些部门的行业纠纷导致工人宣布于1945年2月5日举行罢工时，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不久就演变为自1909年大罢工以来最严重的产业动荡。

九、犹太人的避风港

与邻国相比，瑞典的中立至少使它避免遭受战争毁灭性的影响，并且带来另一个积极的结果，即对那些从国外逃到瑞典的难民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恩赐：它为成千上万的人提供了避难处，这些人面临着被迫害和死亡的威胁。逃到瑞典最著名的文化人物是德国社会主义剧作家贝尔托特·布莱希特（Berthold Brecht），他自1933年以来就长期居住在丹麦，但1939年4月与他的家人迁到斯德哥尔摩。第二年他离开瑞典，借道芬兰和苏联，从那里越过太平洋到达美国。不过，具有最重要意义的是瑞典为那些逃过纳粹大屠杀的欧洲犹太人提供了避难所。尽管德国对瑞典施加了压力，但在整个战争期间，瑞典继续为成千上万从被占领的欧洲逃出来的犹太人提供了庇护，特别是于1943年10月穿越松德海峡逃到瑞典的大部分丹麦犹太人。

瑞典从欧洲其他国家将许多犹太人从毒气室拯救出来的事例也非常多：1944年，拉奥尔·瓦伦堡（Raoul Wallenberg，1912—1947?）

在卡尔·伊万·丹尼尔松（Carl Ivan Danielsson）、皮尔·安格尔（Per Anger）和瓦尔德马尔·朗格莱特（Valdemar Langlet）的协助下，通过发给他们瑞典护照，帮助许多人从纳粹占领的匈牙利逃了出来。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国王古斯塔夫五世的支持，后者甚至给匈牙利独裁者霍尔蒂将军（Admiral Horthy）写私人信件，告诫他停止迫害。瓦伦堡最终落到苏联人手里，据称被送到一个劳动营中，但他失踪和死亡的背景情况至今仍不太清楚。

福克·贝纳多特（Folke Bernadottte，1895—1948）是瑞典皇储的堂弟，后者是未来的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Gustaf VI Adolph）国王，福克当时任瑞典红十字会副会长。据长期以来的传说，他曾在中欧解救犹太人的各种人道主义行为中提供过帮助。不过，最近的研究结论并非如此。人们曾长期认为，不仅挪威、丹麦和法国抵抗运动的1万名成员，而且还有1.1万名落入纳粹之手的犹太人，通过他的努力被解救，即在成功地与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谈判后，利用所谓红十字会的“白色救护车”把这些人运送到瑞典。但如果最近公布的休·特雷弗—罗帕（Hugh Trevor-Roper）爵士的信件能够被相信的话，事实上情况似乎非常不同。特雷弗—罗帕在1952年给他的朋友、艺术品鉴赏家伯纳德·伯伦森（Bernard Berenson）的信中写道：

236

> 确保19 500名囚犯获救的谈判几乎完全是菲利克斯·克斯滕（Felix Kersten）的功劳，他是希姆莱的医生。他与瑞典外长京特尔协商制定了营救计划，而这在贝纳多特出现之前很久……当要执行这些计划时，贝纳多特明确拒绝营救任何犹太人。他告诉希姆莱，他和后者一样拥有种族主义观点。[①]

① 休·特雷弗—罗帕致伯纳德·伯伦森《牛津来信》（Letters form Oxford，附有一封1952年8月30日写于牛津基督教堂学院的信），收录在《贝纳多特神话》（*The Bernadotte Myth*）中，由理查德·达文波特—海因斯（Richard Davenport-Hines）编辑，伦敦：威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2006年，第96—98页。

结果，贝纳多特被批判，营救计划被执行。不过，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将这份功劳记在自己名下，以支撑瑞典和他本人的声誉。瑞典是由于允许纳粹将军队运往挪威而声誉败坏。

1945 年春，伴随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瑞典已能够将自己视为最幸运的国家。它逃过了诸如荷兰和比利时等其他中立国所遭受的成千上万人的损失，虽然它们也在努力保持中立，但没有成功。诚然，在整个战争期间，许多瑞典海员在各个国家的船只上丧命，但瑞典的船只却避免了被攻击，尽管有两次例外。一次是 1943 年 4 月瑞典潜艇阿尔文号（Ulven）碰上水雷，大约 33 名水兵阵亡。另一次是渡船汉萨号（Hansa）于 1944 年 11 月 24 日被德军击沉，它是在哥德堡和瑞典大陆之间航行，据信这是一次误炸，84 名乘客和船员罹难。

瑞典也逃过了地毯式轰炸，而欧洲其他大部分国家都遭受过这种痛苦。虽然曾有一位苏联飞行员错误地将一架飞机装填的炸弹投向斯德哥尔摩，但所幸无人伤亡，造成的破坏也是最小的。由于保持政治和军事中立的立场，瑞典实际上逃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全部恐怖，这与它的北欧诸邻国形成鲜明对照。而且，它还从交战双方那里获得巨大经济收益。而由此获得的资源对瑞典福利国家的发展和资金支持具有重大意义，该制度目前仍在演进中。最重要的是，它一直对许多来自芬兰与其他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避难儿童持欢迎态度。他们在战争结束后来到瑞典，它为他们提供慷慨的援助，在一个当时缺乏这种帮助的世界里，这显得尤为珍贵。

第十章　瑞典福利国家的胜利

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瑞典大体是毫发无损地熬了过来，而且相比战前享有更大的社会凝聚力。由于此时它的社会福利基础设施已牢固确立，所以福利制度带来的收益能够广泛扩展到整个社会。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公民都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价值观，正如他们几个世纪以来所保持的那样。来到瑞典的移民主要是避难者，他们逃过宗教的或政治的迫害，不管是来自纳粹德国和苏联还是来自战后被苏联占领的东欧国家，尤其是来自波兰、爱沙尼亚和匈牙利。后来，他们为实际推进福利国家制度建设做出了自己的努力。瑞典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塑造成一个福利国家的。但在战争刚结束的岁月，对他们的安置或迁移却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决定他们能或不能长久地留在瑞典成为一个尤其棘手的问题，而这经常会对这些难民产生生死攸关的影响。 238

有超过 3 万名难民来自波罗的海国家，那里当时被苏联占领，他们被允许留在了瑞典。另一方面，2 700 名德军士兵，再加上 145 名与德军一起战斗但后来逃到瑞典的拉脱维亚（Latvian）、立陶宛（Lithuanian）和爱沙尼亚（Estonian）人被向东驱逐出境，一些人被关进苏联

战俘营，一些人死亡。在对这些人的处理上，瑞典害怕激怒苏联。因
240 为，如果允许以前敌对国家的战斗人员长久避难的话，将被证明是一种难以克服的灾难。因此，这些难民中的许多人最终被送到苏联劳动营，并在那里结束生命。

在国际领域，战后最初的岁月是一个高度动荡的时期，因为以前的盟国——一方是美国、英国和法国，另一方是苏联——处于愈益严重的对峙状态。古斯塔夫·阿道夫是西博滕（Västerbotten）的公爵，他是现任国王的孙子和未来国王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的父亲，当他于1947年在丹麦的一次空难中遇难时，很难在政治上对谁做出谴责。1948年福克·贝纳多特伯爵担任联合国驻耶路撒冷的代表，目的是调节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之间的冲突。这颇具讽刺意味，让人想起他宣称的反犹太主义情感。他被犹太恐怖分子刺杀，他们认为他进行了有害的干预，不利于他们建立新以色列国家的努力。

二、政治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皮尔·阿宾·汉森首相领导的联合政府在战争结束后终止，此后不久他突然死亡。前任教育部长塔格·埃兰德（Tage Erlander，1901—1985）于1946年被选为首相。他连续三届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69年。这样，他不仅成为瑞典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而且成为那个时期所有西欧国家中任职最长的首相。因此，他成为瑞典政治和社会稳定的一个象征。他倡导建立一种“强社会”，即一个具有能提供社会服务的巨大基础设施的社会。他以一种持久而有力的方式为瑞典社会打上了他个人和社会民主党的烙印，使得瑞典变成为福利国家模式的原型。审查制度于1949年被取消，没收财产和财富仍然被禁止。与此同时，他和他的政府拒斥了任何极权主义或强加给他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就像在瑞典的许多邻国发生的那样，后者当时被苏联的军队占领。



地图3　今天的瑞典。瑞典的边界自1809年以来一直没有改变。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芬兰被转让给俄国沙皇。瑞典边界的稳定性是这一事实的副产品，即该国自那时以来一直到今天都成功地保持了政治和军事上的中立。

241 有鉴于西方盟国与苏联阵营之间愈益严重的对峙，正如丘吉尔所指出的，苏联对几乎整个西欧强加了它的“铁幕”，瑞典于1948年2月再次强调它在战后的新欧洲继续保持正式的政治和军事中立。这项政策得到瑞典外长奥斯滕·安顿（Östen Undén，1886—1974）的支持，他于1945年第二次被任命为外长，前一次担任外长职务是在一代人之前，即1924—1926年。作为一位左翼的社会民主党人，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62年，但由于他对苏联所持的某种程度的同情立场，他也遭到了许多来自政治右翼人士的尖锐批评。据说，正是在他的支持下，瑞典与美国和北约（NATO）达成许多非官方的和解，以确保在苏联发动突然袭击时瑞典的防御安全。

这种新的立场绝没有阻止政府去倡议组建一个新的北欧防御联盟，它不隶属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阵营，像过去经常存在的那种泛斯堪的纳维亚观念一样。不过，这种联盟始终没有变为现实：丹麦和挪威都加入了北约，而芬兰在与苏联友好合作的前提下保持一种政治不结盟立场，该立场即为人所熟知的“芬兰化”（Finlandisation）。芬兰还同以前的敌国苏联签署了互助和友好协定。因此，一个目标更为节制和非军事化的北欧委员会（Nordic Council）于1952年建立，其目标也更为有限，主要是鼓励北欧各国间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合作。芬兰在9年后加入到其中。

1951年，两个主要的左翼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农民联盟再次联合组建新一届政府，正像它们在战前时代所做的那样。它们继续贯彻社会民主党的基本纲领。作为反对派，右翼党（Högerpartiet）的领袖雅尔·加尔马森（Jarl Hjalmarson，1904—1993）和人民党（Folkpartiet）的领袖贝蒂·俄林（Bertil Ohlin，1899—1979）试图阻止国家更多地干预私人部门，但越来越不成功。许多政治右派和那些支持一种更开放的市场经济的人都哀叹这样一个事实，即瑞典愈来愈变为一个标准的“保姆国家”（nanny state）。其中社会较弱的成员都能获得充足的物质支持，但同时，那种培植创新性、个性、企业家精神和健康劳动 242 的国家统治方式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遏制。

伴随着苏联军事力量在战后岁月的愈益强大，尤其是在它研制成功原子弹后，瑞典对这个东方统治权力的恐惧迅速升高，尤其是在弗里蒂奥夫·恩鲍姆（Fritiof Enbom，1918—1974）和他的6位同事在1943年到1951年间涉嫌为苏联从事间谍活动被揭露后就更是如此。1952年，俄军击落两架瑞典在国际水域执行侦察任务的非武装飞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但瑞典的中立立场仍然未受到争议。

确实，在广泛的国际层面上，瑞典由于坚持它的中立立场而赢得了特别受尊重的地位，这不仅表现在欧洲事务上，而且也表现在其他方面。这种成就不是通过强权政治而是通过许多瑞典人的人道主义行为获得的，尤其是达格·哈马舍尔德（Dag Hammarskjöld，1905—1961）的人道主义行为。哈马舍尔德于1953年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他是在严重危机时期临危受命的。这种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以后令各方不满意的停火造成的，他一直担任这一职务直至去世。

瑞典在1946年已经加入联合国，它采取了一种非常明确的立场，即在两大政治阵营间充当调节者。当哈马舍尔德担任他的职务后，他能够利用瑞典不偏不倚的声望在他参与的谈判中发挥一种关键的作用。其中最棘手的是他试图调停由比属刚果统治的瓦解引发的政治和军事冲突。在这一时期，其他的欧洲殖民强国也在放弃它们的许多殖民地，不管这是自愿的还是通过武力被迫的。哈马舍尔德在非洲一次空难中突然罹难有助于促进事件的解决。而这次空难可能是南非特工根据他们的政治纲领制造的。哈马舍尔德的著作《路标》（*Vägmärken* ）在他去世后的1963年出版，在书中他灌输了一些神秘的基督教价值观，这些价值观源自于德国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梅斯特·埃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和较早时代的其他一些宗教人物。这有助于增强他在公众意识中的神圣化程度。在他去世前不久的1961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在20世纪60年代，社会民主党和一些更激进的政治左翼政党在力量和受欢迎程度上都有巨大增长，这是由福利制度在全社会扩展带

来的收益所致，大部分社会成员仍对大萧条时代的苦难日子记忆犹新。接着，苏联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突然发生，减弱了更激进左翼力量的高涨热情。虽然如此，左翼政党仍然继续执政。左翼政治家奥洛夫·帕尔梅（Olof Palme，1927—1986）背叛了他出身的上层阶级，追求一种激进的、受社会主义影响的政治纲领，于1969年出任社会民主党领袖，并由此成为首相。瑞典民众进一步增强了他们的左翼倾向。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瑞典成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所持立场越来越激烈的反对者，由此招致了华盛顿的非难；但同时它却对苏联共产党在其东部和南部卫星国进行的恐怖镇压行径熟视无睹。据说瑞典与苏联和北越有着合作，但证据并非确凿无误。那时一位瑞典记者的报道揭示，瑞典正在进行大范围的反苏联间谍活动。虽然如此，民众的左倾却在1970年得到进一步推进。那一年，瑞典国会变为一院制，共350名议员；出于投票的技术原因，2年后，该数字降为349名。伴随着右翼势力的边缘化，中央党（the Centre Party，由旧的农民党转化而来）到1973年成为了主要的反对党。

尽管一直保持政治中立，但瑞典绝没有幸免于恐怖主义兴起的侵扰，后者到此时已开始使许多欧洲国家痛苦不堪，因为它们经常受到这种激进力量的袭击。恐怖主义对瑞典的破坏也变得非常明显，1975年4月24日，以德国为基地的巴德尔—迈因霍夫团伙（the Baader-Meinhof Group）占领了联邦德国驻瑞典的大使馆，3人被枪杀。苏联所造成的现实威胁也被瑞典人民所认清，1981年一艘苏联潜艇U137号偶然在卡尔斯克鲁纳群岛搁浅，而那是瑞典一个封闭的海军基地。

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瑞典一党独大的缺陷与优势开始引起瑞典选民的关注，他们越来越希望结束这种有可能变为一党永久执政的局面。结果，1976年，中央党的图尔比约恩·费尔丁（Thorbjörn Fälldin，生于1926年）被选为首相，结束了社会民主党长达40多年的统治。除其间一个短暂的间歇，即1978—1979年由人民党的奥拉·乌尔斯滕（Ola Ullsten，生于1931年）执政外，费尔丁和他的党一直掌权到1982年。不过，这些右翼政党当时能够保持它们的

244

任期不是凭借单个政党的力量，而是通过彼此联合实现的。1982 年，这种联合破裂，结果社会民主党在帕尔梅领导下再次获得首相职位。由此，帕尔梅能够以比以前更大的决心来推进他的激进纲领，提出了更强有力的国际创新建议，用以培植他作为“世界警察”的形象，这正如国内和国外许多人称呼他的那样。废除南非种族隔离制度成为帕尔梅在国际层面关注的焦点，但仅仅在隔波罗的海相望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铁血统治下的持不同政见者所面临的恐怖，却似乎并未进入他的法眼。

尽管瑞典政治右翼的反对力量是强大的，但 1986 年 2 月 28 日帕尔梅和他的妻子去一家电影院途中的遇刺，他们却并未牵涉其中。帕尔梅是被一个心存不满而又精神不正常的年轻人所谋杀的，后者在此之前就曾因为犯罪企图而受到过指控。这次谋杀是个人行为还是有着更广泛的政治背景，至今仍不清楚。首相由英瓦尔·卡尔松（Ingvar Carlsson，生于 1934 年）继任，尽管卡尔松也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但相比帕尔梅，他却较少激进性和争议性。

伴随国际和国内政治风向的右转，卡尔松于 1991 年在选举中失败，从 1991 年到 1994 年，保守派再次赢得对国会的控制权，来自温和党（Moderata samlingsparti）的卡尔·比尔特（Carl Bildt，生于 1949 年）被选为首相。到这一时期，已不同于以前竞选运动时的情况，世界已发生巨大变化：苏联和东方阵营的解体明显有助于推动瑞典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持续右转。正如在其他西欧国家那样，以前国有化的工业和服务业的私有化成为这一时期经济的标志。像邮政、铁路和电话等机构此时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迅速私有化。这种越来越市场化的导向对瑞典经济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因为一个最初于 19 世纪组建的公司爱立信公司，此时已成为该国最重要的电信企业，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它垄断了全世界整个蜂窝状电话系统产量的 1/3 还多。

欧盟的建立和发展是另一个尤为重要的事件，对瑞典的政治和经济认同具有重大意义。几十年来，瑞典一直游离于欧洲共同市场之外。但就加入欧盟而言，在苏联解体、外在压力消失后，这是一个不同的

问题。尽管有左翼和主张环保的诸政党的强烈反对，但在 1994 年 11 月 13 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52.3% 的选民支持瑞典加入新的泛欧洲组织。这种提议被采纳，1995 年 1 月 1 日瑞典加入欧盟。

瑞典政治倾向的右转在 1998 年的选举中得到进一步的印证。那一年，社会民主党人仅获得 36.4% 的选票，这是自 1912 年以来的最低得票率。尽管如此，同其他左翼政党的联合使他们继续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地位。因此，1994 年，卡尔松再次被选为瑞典首相，他将该职务保持到 1996 年。此后，他被同样是社会民主党的约兰·佩尔松（Göran Persson，生于 1949 年）接任。后者一直任职到 2006 年。不过，最后这些年，社会民主党执政的经济和政治价值观已经完全不同于奥洛夫·帕尔梅那个激进时代的价值观。而且，新组建的、保守的瑞典联盟（Allians för Sverige）开始主导瑞典政府。它组建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由 4 个政党组成，分别是温和党、中央党、自由人民党（Folkpartiet liberalerna）和基督教民主党（Kristdemokraterna）。在温和党政治家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生于 1965 年）的领导下，右翼政党执政，作为一位年轻的首相，他没有早先一代人所具有的社会包袱，这有助于巩固瑞典右倾政治的变化。

三、瑞典的萨米人和他们不断增加的政治权利

246 像 20 世纪最后几十年北欧其他国家一样，瑞典的少数民族被赋予了新的权利，既包括政治方面也包括社会方面。这对北方的土生民族萨米人（该民族更愿意被称为萨米人，他们以前被称为拉普人）更是如此。1993 年，萨米人被批准建立他们自己的议会，而即使到现在，他们也很难说是一个单一同源的民族。萨米人是遍布整个北欧世界的，而且他们单在科拉半岛（Kola Peninsula）就存在大约 9 种不同的方言，一些族群甚至在其内部也说多种语言，当然其中也有经济方面的原因。在瑞典，1.8 万到 2 万萨米人中只有 10%—15% 的人认为自己是萨米人，他们在积极从事驯鹿的放养工作。但这种活动不再是按照过去几个世纪那样传统的方式进行，而是利用高技术（包括飞机和雪地机动

车）来使放养工作更为便利。由于绝大多数萨米人目前从事各种其他形式的职业，所以他们在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通常会有其他优先考虑的事情。因此，对许多人而言，重新评估它对萨米人的实际影响是必要的。据说，萨米人的生活不再具有像他们过去所具有的那样的特定习俗，尤其是在语言使用方面。结果，萨米语成为今天瑞典 5 种官方少数民族语言中的一种，其他包括吉普赛语（Romani）、芬兰语、米恩基利语（Meänkieli，一种在托尼达尔［Tornedal］极北部地区使用的芬兰方言）和意第绪语（Yiddish）。

四、战后经济发展

战后是瑞典经济大规模发展的时期，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果实被用于为迅速发展的福利国家制度买单。1946 年，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the Scandinavian Airlines System）由一个跨整个北欧的国际财团所组建，开通了飞往美国的定期航班。同年，与苏联签署了一项重要的信贷和贸易协定，这对两国而言都是互惠的，因为两国间的贸易有显著的增加。瑞典也从 1947 年加入的马歇尔计划中受益颇多，该计划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的发展提供资金。它也成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EEC）的一个成员，该组织存在推动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西欧各国的经济合作。据说，在财政部长恩斯特·威戈弗斯（Ernst Wigforss，1881—1977）的领导下，社会民主党政府于 1947 年向瑞典人强加了非常大的税收负担，这减缓了它的经济增长，削弱了它的竞争力。一个同样重要的难题更贴近百姓的生活实际，并且也同样难以解决：对不断增加的城市人口而言，住房短缺成为战后最初几十年中的严重问题。但政府和人民决心解决它。

当固定电视节目于 1950 年开播时，正值诺贝尔奖设立的周年纪念，它是在 1901 年开始颁授的。瑞典明显处于一个新时代的巅峰。然而，在 20 世纪 50 年代，通货膨胀成为瑞典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进口—出口部门实现了增长，但这种增长所达到的水平只是瑞典 1900 年的水平。1955 年的出口占 GNP 的 17.5%，进口占 20.3%，英

247

国成为瑞典最重要的出口伙伴，占其出口总量的19.7%，联邦德国居第二位，占13.3%；而后者提供了瑞典最大的进口份额，占其进口总量的约21.9%，而英国的份额仅有13.7%。至于美国，它提供了另13.7%。虽然进口最初居优势地位，但接下来的10年天平开始向出口倾斜，到1969年出口和进口占GNP总量的比率分别为19.2%和19.9%。

木材工业和它的附属产品的重要性明显降到次要地位。在战后岁月，相比其他出口产品，木材在瑞典外贸中的重要性急剧下降，从1947—1950年的10%降到1967—1970年的7.7%。纸和纸浆在外贸中也占据不大重要的地位，从33.3%降到了15.8%。另一方面，铁和钢继续着它们的增长势头，从1947—1950年的5.4%增至1967—1970年的8.9%。据说，机械产品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它们的份额在同一时间段从27%上升到42.7%。

248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瑞典的造船业持续保持繁荣状态，有超过3万人在该部门就业。在马尔默的考克姆船坞（Kockum Wharf）仅是许多取得成功的造船厂之一。不过，来自国外，尤其是东亚愈加激烈的竞争，破坏了这种发展势头，在随后的几十年，该产业逐渐走向萎缩。到1990年，仅有6 000人仍然在造船厂就业。至于历史悠久的瑞典—美国航线，也成为造船业萎缩的受害者，在1975年，最终完全停止了它的客运任务，后来仅集中满足游客乘船游览的需求。

另一方面，银行业继续成为经济中的高赢利部门。马库斯·瓦伦堡和雅各布·瓦伦堡仍然是这一时期瑞典工业界的两位主要人物，他们的权力基础由于他们对斯德哥尔摩私人银行的控制而得到巩固。该银行于1971年与北欧斯安银行（Skandinaviska Banken）合并。

为公共部门、工业和家庭提供的能源生产到此时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产业部门。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核能利用问题已成为一个引起巨大争议的问题，因为许多人担心它的安全性和对健康的影响。数量越来越多的政治激进分子开始强烈反对对它的进一步应用，一些人甚至要求完全停止使用它。

与此同时，汽车已成为瑞典大多数人不可或缺的交通工具。不过，不像北欧地区其他国家，瑞典实行的是一种靠左行驶的交通规则。因此，伴随着与邻国交通联系的增加，这造成了严重问题。因此，1973年11月，瑞典停止使用这种交通规则，改为右行方式。不过，由汽车造成的其他问题就不那么容易克服：空气污染和对耕地的破坏，在城市和农村均是如此，因为必须修建新的道路来为数量越来越多的汽车提供行驶空间以及开通更便捷有效的出入口。

五、福利国家制度的成本不断增加

对许多人而言，此时高税收也变为令人忧心的负担，不仅是那些政治右翼人士，而且包括中间甚至左翼的选民；正如许多富人看到他们的大部分收入被税收人员拿走用于为愈来愈庞大的社会基础设施买单那样。阿斯特丽·林德格伦（Astrid Lundgren，1907—2002）是瑞典最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长袜子皮皮》(*Pippi Longstocking*）是她最著名的一部儿童小说。当她于1976年宣布被迫将收入的100%还多要用于交税时，这种状况被讽刺性地称为“波美尔博萨效应”（Pomperipossa effect)，这是她出版于那一年的小说中的一个人名。甚至许多老牌的社会民主党党员也都得出结论：税收向上的急剧增加已经超出了它的极限。 249

尽管福利国家的缺陷在瑞典变得越来越明显，但在国际舞台上，瑞典社会民主党作为提供福利国家各种保障的榜样，其声望却与日俱增。在这种发展趋势中，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1898—1987）起了主要作用，他是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在得奖之前，他是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院（Santa Barbara）民主制度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的客座研究员，从1974年到1975年他还是纽约市立大学（New York City University）的杰出访问教授。他的许多著作集中关注世界贫困问题以及根除它的途径，他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价值观和方法正是该种途径之所在。

不过，回到瑞典看，它的经济正面临着自身的困难，而其中许多困难正是这种社会民主制度造成的——此外还有因富人、工业家和地主逐渐逃避税收造成的，他们通常是带着大部分财富和技能转移到英国。1977 年瑞典遭遇经济困难，它的货币克朗贬值 10%。这鼓励了瑞典工业的出口，而此前瑞典的出口正在失去其竞争力。这种状况还是由于高税收和维持大规模的政府基础设施造成的，而后者是管理福利国家制度所必需的。

虽然如此，一些工业部门仍然运行相当良好。在 20 世纪 80 年代，瑞典的汽车产业已经能够与美国和日本的汽车业相竞争。结果，到这一时期，沃尔沃轿车已成为世界最受欢迎的汽车品牌之一，它的主管是佩尔·吉伦汉姆（Pehr G. Gyllenhammar，生于 1935 年）。1991 年，250 该公司下线了第一台前轮驱动的高级轿车，它装有一个横向的、5 个缸的发动机。此后不久，它与雷诺汽车（Renault）的合并存在很大争议，这种合并从未能实现。该公司仍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拥有独立品牌的公司，不仅在瑞典，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

与此同时，瑞典飞机公司（the Svenska Aeroplan Aktiebolaget，简称萨博［SAABs］）开始生产汽车，萨博也成为国际最知名的一种汽车品牌，深受中年成功人士的欢迎。它原是一家飞机制造公司，从 1949 年 12 月就开始生产飞机，满足国内需求。1989 年它的最大股权出售给了通用公司（General Motors），采取了一种真正国际性的运作方式。这家总部在美国的公司后来又成为以日本为总部的富士重工（Fuji Heavy Industries）的股东。由此，日本人在萨博汽车，尤其是在萨博 9-2X型汽车生产中也发挥了作用。

尽管有这些毋庸置疑的成功，但瑞典经济仍然陷于麻烦之中。1982 年，瑞典克朗再次贬值，这次是贬值 16%。这次贬值幅度很大，但对瑞典的大部分人来说，更麻烦的是瑞典社会民主党努力宣传的所谓“雇员基金”，即一种集体的金融机构。它们试图买下大批产业的全部股份，以推进工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并作为实现更大平均性的手段。这甚至在党内都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它的一位领导人、财政部长

雅尔·奥洛夫·费尔德（Kjell-Olof Feldt，生于 1931 年）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做法。由于对这种似乎是公开地将私营部门国有化的尝试感到恐惧，许多人提出强烈抗议，甚至大部分左翼力量也反对这种做法。1983 年在斯德哥尔摩市政厅（Stockolm's City Hall）前举行了一次 7.5 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各种抗议活动一直延续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在“人民力量”的胜利和在政治权力的右转以后，“雇员基金”被最终取消。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瑞典政府全面介入公营和私营经济生活，公共部门成为瑞典最主要的雇主，它过多地介入到管理和控制的几乎全部方面。在政府所面临的诸多优先选择中，首先是可持续能源的供给问题。核能到此时已被更多人接受，大家认为，尽管它不受欢迎，但却是瑞典不断增加的能源问题的必要解决方案。1980 年政府批准修建 12 座新的反应堆。但建在巴斯伯格（Barsebäck）的反应堆仍然引发巨大争议，它位于斯堪尼亚西南海岸，隔海与哥本哈根相望，许多居住在松德海峡两岸的居民对此提出了异议。这是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核能既是瑞典未来工业和家用能源的来源，廉价而又易得，但从意识形态或生态方面看却又是不合适的。

251

瑞典的福利国家制度已是长期存在并得到巩固的现实存在，但它在许多方面成为了社会的一种重负。瑞典政治方面的中央集权在急剧加强，大约 2 500 个公社已被合并为仅有 284 个。地方和社区越来越感到自身被孤立和忽视，来自高层的权力决定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方面的政策，下面只是在执行这些政策。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瑞典经济遭受巨大挫折，但并非所有问题都归罪于社会民主党。面对愈益加剧的世界市场的竞争，它只是这个世界市场发展趋势的组成部分。股票交易量急剧下降，价值损失大约在 40%；而同时，住宅市场几乎崩溃。不过，仍然有一些公司处于繁荣发展之中，它们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

利乐包装公司（Tetra Pak）肯定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取得巨大成功的公司之一。它是由鲁本·罗兴（Ruben Rausing，1895—1983）和

埃里克·瓦伦堡（Erik Wallenberg，1915—1999）于1951年创办的。它用带塑料皮的纸板制成四方形的纸盒，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包装公司。这使得罗兴的两个儿子盖德·罗兴（Gad Rausing，1922—2000）和汉斯·罗兴（Hans Rausing，生于1926年）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富的两个人。该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在中国为芦荟饮品生产包装纸盒，仅这一项的产值就是巨大的。

20世纪90年代中期，瑞典每年的出口增长超过10%，而通货膨胀则降到40年间的最低水平。接着，瑞典的又一个产业在全球取得成功，它的传奇声名鹊起。这就是宜家（IKEA，是所有者的名字加上他家族名称埃尔姆塔德［Elmtaryd］首写字母的缩写）的非凡发展，它是家具制造商。该企业始建于1943年，它成为近些年来瑞典最成功的工业和零售企业，使它的所有者英瓦尔·坎普拉德（Ingvar Kamprad，生于1926年）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及瑞典最富的人。罗兴家族和坎普拉德能使福利国家制度为他们所用，但对大多数瑞典人而言，高税收仍然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抑制了资本积累。到1997年，瑞典加诸于公民身上的税收负担是欧盟国家中最高的，即占那一年GNP的大约55%。这导致瑞典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竞争力持续陷入麻烦中。

252

六、社会改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瑞典，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是住房短缺。因此，1950年，瑞典公益建房互助协会（Sweden's Beneficial Building Society或SABO）作为全国性的组织被创建，以帮助提供新的、急需的居所。这个问题不仅由于许多瑞典人从乡下移居到了城市，而且由于来自芬兰的和被共产党占领的波兰的、以及来自以前独立现在被并入苏联的波罗的海国家的移民而加重。住房短缺问题不仅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典中心地区，而且在偏远地区也是如此。那里虽然人口不断增加但仍相对稀疏。例如在律勒欧，从1800年到1950年人口增加了7倍，而人口的绝对数量是从6.6万人增至50万人。

这一新的创意带来的积极成果是，瑞典到1970年建设了10万多

套租屋，而仅仅5年后这一数字就超过100万套。其中大多数租屋是连排的公寓楼，缺乏吸引力，虽然也有少部分是私人住宅。这与欧洲大多数国家，包括北欧国家的住房状况形成鲜明对比，那里在这一时期很少有单个家庭住宅被建成。由此为普通瑞典民众提供了居所。但到20世纪60年代晚期，这种新的、缺乏感情交流的卫星城的缺陷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伴随20世纪的演进，其中许多租屋后来成为一些批评家谴责的真正的棚户贫民区，供瑞典边缘化的底层阶级居住。在20世纪最后25年，他们中的许多人更多地是来自第三世界的难民。其中先是库尔德人、伊朗人和土耳其人，后来包括阿尔巴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索马里人。少数瑞典人对他们的到来感到震惊。一种新的现象出现，即瑞典新纳粹小集团对他们采取暴力行为。在不同地区，一些人甚至由于这些暴力行径而丧命。而这类犯罪在以前几乎是闻所未闻的。

不过，如果说一些新问题是起源于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那么一些固有问题则是通过改善基础设施来加以解决的，后者有助于民众获得广泛的公共服务。这尤其适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情况，通过这种服务，人口中越来越大的比率能够接受了高等教育。为了满足这些需求，哥德堡大学（Gothenburg University）于1954年创建，斯德哥尔摩大学（Stockholm's University）于6年后开始招生，而以前的高等教育学院则被赋予更高的大学地位。接着是1965年在诺尔兰地区建立了于默奥大学（Umeå University）。从那时起，许多新的学院和大学在全国各地建立起来。

公共交通，尤其是空中旅行也处于迅速发展之中。位于斯德哥尔摩北部的阿兰达机场于1959年对公众开放，从那时起就成为北欧地区最重要的一个机场，为成百上千万海外游客提供了方便。瑞典许多其他城市也都建有自己的机场，使旅客能够在几个小时内迅速到达全国的几乎各个地方。

瑞典民众获得了更多和更好的医疗服务。1955年，公共医疗保险被实施，所有人都能够获得高质量的医疗保健。稍后，在1957年到

1960年间，讨论集中关注退休金问题，这是继迅速增加的通货膨胀和应对战后较高的生活标准的需要而产生的。由于在统治联盟中意见发生分歧，就该问题举行了一次全民公决，结果选择了社会民主党的意见，使一种必须与工资挂钩的退休金制度得以确立。它由雇主提供资金，但由此筹措的资金由政府代表予以管理，其中既包括雇主的代表也包括雇员的代表。在对此意见产生分歧之后，社会民主党与人民党分道扬镳，后者的地位受到严重削弱。但当该问题被提交给国会讨论时，却正是人民党的支持才使这些退休金制度得以确立，当然是按照社会民主党所设计的思路。1959年相关的法律颁布实施。最初，领取国家退休金的年龄被限定在67岁，但1974年降为65岁。

254

在现代性中其他更多冲突的内容也于这一时期在瑞典出现，正像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那样。1968年，个别学生占领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学生会，这只是整个西方世界此类行为中的一个，它是模仿巴黎学生运动的产物。女权运动也开始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教育界和社会其他领域。占领诺尔兰地区于默奥市的妇女之家（Kvinnohuset）也许是这种运动中最著名的事件，她们主要是关注20世纪80年代晚期瑞典的性别问题，但这只是许多此类静坐事件中的一种。

性态度的明显自由化在战后时期的瑞典出现，尤其是在同性恋问题上。它是在1944年被承认合法的，相比邻国丹麦晚了大约11年。从1996年开始，同性别成员之间的伙伴关系能够被登记结婚，享有一揽子的经济利益。瑞典政府还引入一揽子新的举措以在其他方面给予妇女更多的保护。1999年通过的一项法律规定，以赢利为目的拉皮条在瑞典要判罪，尽管不包括自己卖淫的行为。同时还引入新的法律，规定在工作场所禁止种族和性别的歧视。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瑞典国教第一位女主教克里斯蒂安·奥登贝里（Christina Odenberg）的就职仪式于1997年在隆德举行，这巩固了教会领域的性别自由化进程。这一进程开始于1954年的首次任命女性为牧师。2000年，瑞典政府最终实施了与瑞典国教的分离，由此正式实现政教分离。这一举措得到卡尔·古斯塔夫·哈默（Karl Gustav Hammar，生于1943年）的批准，

虽然瑞典人口87%仍然是瑞典国教的正式成员。2006年，安德斯·维尔德（Anders Wejryd，生于1948年）接替哈默担任瑞典第69任大主教，教会继续沿着自由化的道路发展。

尽管世俗化与瑞典政教分离的运动在继续，但基督教在几十年来的发展呈繁荣之势。在沉寂几百年之后，路德教派的女成员再次于瓦德蒂娜建立了布丽吉塔修道院（Brigitta Convent），以庆祝圣布丽吉塔诞辰600周年。其他教派也发展良好。在20世纪80年代头半期，天主教会是增长最快的教会，不仅在瑞典如此，而且在其他北欧国家也是这样。教皇第一次访问瑞典是在1989年，在这次访问中，教皇约翰·保罗二世（Pope John Paul II）访问了乌普萨拉大教堂，在乌普萨拉和土尔库两位大主教与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 XVI Gustaf，生于1946年）和王后西尔维娅（Queen Silvia，生于1943年）的陪同下，一同祈祷。至于瑞典宣道团，它继续保持了兴旺状态，但有鉴于它自主性不断提高，在2003年将其名字改为瑞典宣道会（the Swedish Missionary Church）。

七、卫生、健康与切尔诺贝利事件

到20世纪50年代，同从前比，瑞典肯定已经成为一个更适于生活的健康居所。该国最后一位罹患麻疯病的本地患者已于1951年去世。不过，就采取措施抑制疾病传播方面看，瑞典没有理由自满。确实，由于未能采取适当的防御措施，致使天花在1963年袭扰该国，不过已是最后的一次。斯德哥尔摩受灾最重，它明显是由一位从东南亚回家的瑞典海员带进来的。有25人感染了此种疾病，有4人病故。接着在全国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牛痘接种，这种疾病很快就消失了，并且没有再发生过。

政治倾向的由左向右转也带来了其他一些医疗方面的变化。到20世纪末，私有化风潮再一次影响到瑞典的医疗系统，正如在北欧其他国家那样。1999年，斯德哥尔摩的圣戈兰医院（Sankt Göran's Hospital）成为瑞典第一家急诊治疗私有化的医院，其他医院此后也都步其

后尘。

256 对精神病患者的照顾在这一时期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许多这样的病人被从精神病院中放出来分散到社区进行照顾和治疗。脑白质切除作为治疗那些精神病患者的外科治疗方法不再为精神病医生所青睐，他们越来越倾向于用药物和分析治疗相结合的方法来治疗病人。对那些被认为不适合生育孩子的人采取绝育措施的比例也在这一时期急剧下降，到 1976 年完全停止。虽然如此，但自 1936 年到那时，已有不少于 6.3 万名妇女被采取了绝育措施。

酗酒仍然是危害健康的重要问题。自杀率在这一时期达到创纪录的高水平。财富的增加，社会服务提供的不断增长，以及更容易获得心理治疗，都未能阻止自杀率的升高。

在瑞典，许多死亡事故一直是由于未能执行恰当的安全措施所引致，尤其是一些自助的活动。不过，这些已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事故发生率在下降。据说，大众旅游的增长已经使其中潜含的危险威胁到生命安全。德国造的渡船爱沙尼亚号（Estonia）于 1994 年 9 月 28 日在芬兰岸边的沉没夺去了 852 人的生命，其中 501 人是瑞典人，它设计不合理的船首门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之一。海盗于 2004 年 12 月末袭击了印度洋东海岸，夺取了几百名瑞典游客的生命。这些造成成百上千人死亡的案例使人们意识到，自然灾害绝非仅仅是过去 1 000 年间很少发生的偶然事件。这有助于使瑞典人集中关注相关的生态问题，尤其是全球变暖问题。

瑞典人民还必须面对来自其边境以外、严重程度更甚的一些问题。他们认为，通过解决好自己国家内的问题，新的健康威胁就能够加以抑制。1986 年 4 月 26 日，乌克兰北部的切尔诺贝利（Chernobyl）核电站的爆炸带来了严重后果，当时乌克兰还是苏联的一部分。当地的环境受到灾难性破坏，成百上千名附近居民死亡，土地被污染，而瑞典也受到影响，它在放射物直接影响的范围以内。尤其是萨米人，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在从事驯鹿的放养。他们不仅发现自己的长期健康

257 受到损害，而且他们的生计也受到破坏，因为瑞典政府对销售和出口

驯鹿肉（即他们的主要出口品）强加了禁令。这种不利情势又由于如下事实而加重，即挪威政府允许销售和出口这类肉制品，虽然它们受放射性毒害的程度要远远大于瑞典。随着时间的过去，当瑞典政府允许那些受到辐射的肉类出口时，它已损害了公众的信心，阻碍该产业的发展。只是在为驯鹿引入人造饲料，使它们能够完全避免来自当地草场的食物污染以后，才有助于缓解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如此，还是有大量驯鹿被杀死，它们的肉被销毁，这使驯鹿食品生产的延续性遭到了破坏，尽管有一些资金上的补偿，但萨米人这种最传统的谋生方式已被破坏。从事这种畜牧业的萨米人越来越少，他们开始多样性地从事其他的、更定居的活动，像其他瑞典人那样。

八、文学

在20世纪后半期，瑞典文学处于繁荣发展状态，不时地通过翻译获得广泛的国际读者。哈里·马丁逊（Harry Martinson）和埃温特·约翰逊（Eyvind Johnson）两位作家的创作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表现出过人之处，到此时，他们已经处于完全的成熟阶段，于1974年联合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马丁逊的《路》（*Vägen till Klockrike*）出版于1948年，以一种同情态度思考了流浪者和被社会遗弃的人所遭遇的困境。约翰逊的《他的光荣岁月》（*Hans nådes tid*）首次出版于1960年，后来被译成多国文字。这是一部记述发生于查理曼大帝宫廷中的各种历史事件的历史小说，它集中关注沉重的政治和社会内容，但与其说它反映的是中世纪的生活，不如说反映的是20世纪极权主义的统治。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一位文学人物是斯文·德尔布兰克（Sven Delblanc，1931—1992），他生于加拿大的一个瑞典移民家庭，后来重新在瑞典定居。他的第一部小说《寄居蟹》（*Eremitkräftan*）出版于1962年，运用寓言这种文体来考察广泛的政治和教会问题。稍后的著作包括《回城》（*Stadsporten*），它出版于1976年，集中关注20世纪30年代瑞典乡村的生活。

258

不过，文学方面最伟大的褒奖也许应给予托尔尼·林德格林（Torgny Lindgren，生于1938年），他是20世纪较晚期思想最深刻的一位小说家。他于1980年皈依罗马天主教，此后他的大部分作品有着丰富的宗教内涵，尤其是《毒如蛇蝎》（*Ormens våg på hälleberget*），它出版于1982年，几乎是一种圣经文体，集中关注了一个在瑞典北部的偏远社区，那是从在西波的尼亚的生活中汲取了灵感，他就生在那里。这部小说于1986年被拍成电影，其中瑞典—芬兰双重国籍的斯蒂娜·埃克布拉德（Stina Ekblad，生于1954年）扮演蒂艾（Tea），她是瑞典当代最重要的女演员之一。由于认识到林德格林杰出的文学才能，1991年他被推举为瑞典文学院（the Swedish Academy）的一员，同时也成为诺贝尔奖遴选委员会的成员。

另一位重要的文学人物是萨拉·利德曼（Sara Lidman，1923—2004），她的《黄草莓地》（*Hjortronlandet*）出版于1955年，思考了她童年在瑞典北部农村生活的经历。她的其他作品集中关注了越南战争和美国在其中的作用，以及那里积极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她强烈反对美国的介入，同时也对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表示了强烈反对。稍后的小说，包括《铁冠》（*Järnkronan*），有着强烈的宗教色彩，而不是世俗内容，该书出版于1985年。

在夫妇作家玛姬·史花菊（Maj Sjöwall，生于1935年）和皮·华卢（Per Wahlöö）写作的侦探小说中，文学人物马丁·贝克（Martin Beck）在瑞典广为公众熟悉。这些侦探小说包括大约10个故事，它们开始于1964年的《罗莎娜》（*Roseanna*），结束于《恐怖分子》（*Terroristerna*），后者出版于1975年。从那时起，这种体裁就在瑞典国内和国外获得广泛的效仿。在目前积极从事这种文学体裁创作的作家中，他们经常会与所谓的斯堪的纳维亚二人组相混淆，二人组包括卡琳·亚弗提根（Karin Alvtegen，生于1966年）和丽莎·马克隆德（Liza Marklund，生于1962年）；前者是阿斯特丽德·林德格伦（Astrid Lindgren）的侄孙女，以小说《深海寻人》（*Missing*）闻名，并于2000年赢得了瑞典最佳犯罪小说奖；后者是《黄金时段》（*Prime*

Tiem ，出版于 2002 年）的作者。后者的作品在文体上受她为小型报刊写作的影响，她经常集中关注诺尔兰地区的问题，尤其是有关人口减少的问题。

九、艺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岁月里，瑞典的艺术深受国际艺术发展趋势的影响，尤其是那些源自美国的风格的影响。例如，画家奥利文·法尔斯特罗姆（Öyvind Fahlström，1928—1976），父亲是挪威人，母亲是瑞典人，而他本人则是定居在瑞典的巴西人。他通过自己创作的流行艺术而深受欢迎，其中主要就是借鉴了来自美国的灵感，尽管法国的情景主义（French Situationism）也对他的作品产生影响。他的大部分作品都有着社会和政治寓意，尤其是他的“即兴艺术”（happenings）作品，其中包括《阿伊达》（Aida，创作于 1962 年）和《中度啤酒》（Mellanöl，创作于 1964 年），这两幅作品都存放在斯德哥尔摩现代博物馆（the Moderna Museet of Stockholm）。

另一位重要的艺术家是菲利普·尚茨（Phillip Schantz，1928—1998）。他的作品以丰富的细节而闻名，具有一种极简抽象派（minimalist）艺术的特质，表现出对有限色调的精细应用。他尤其以静物作品的温和抒情性而著称，其中许多作品都能够在斯德哥尔摩国家博物馆（Nationalmuseum）和现代博物馆中欣赏到。

一位较年轻的艺术家彼得·迪尔博格（Peter Tillberg，生于 1946 年）在多样的艺术领域进行创作。他创作的系列插图《七龙珠》（*Sagas* ）就是要为一个瑞典版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Isaac Bashevis Singer）的短篇小说集作插图，后者出版于 1995 年。他的作品《我的小朋友，你有你的价值吗?》（*Blir du lönsam , lille vän* ？创作于 1971—1972 年）也非常著名，它描绘了一个教室的内部情况，塞得满满的小孩子们坐在他们的课桌前。它集中关注教室内的真实情况和小学生们通常未能被满足的要求，他们的个性经常得不到老师的尊重。

十、电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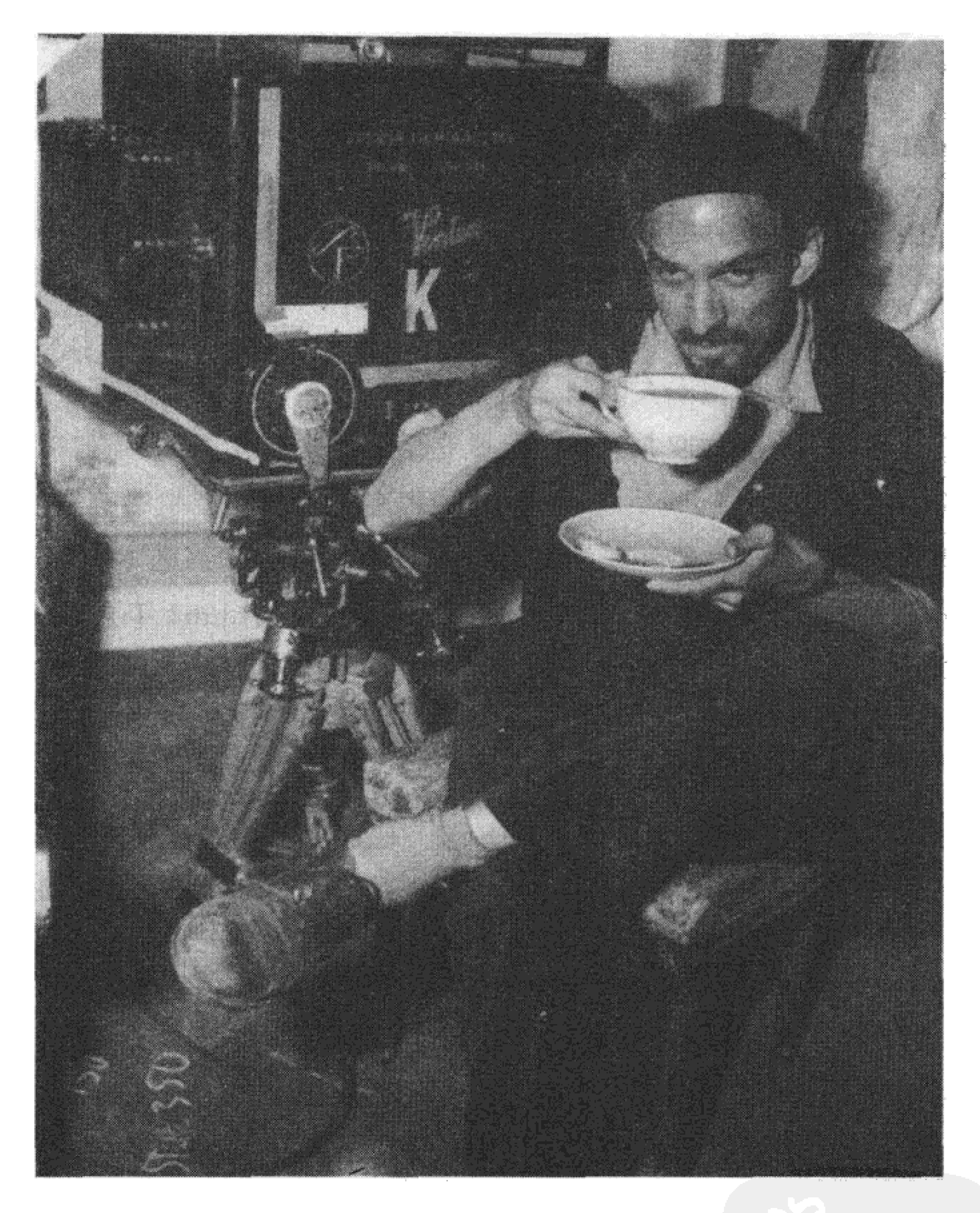


插图 16　世界最伟大的电影和戏剧导演之一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1918—2007）。他的电影在一种抒情的背景下探索了最私密的心理状态，并且有着丰富的哲学内涵。他拍摄的诸如《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1959 年）、《假面》（Persona，1966 年）和《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1982 年）等影片为他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摄影：Scanpix/epa Corbis。

在瑞典产生了许多有很高视觉艺术天赋的艺术家。正是在电影领域，瑞典真正取得了国际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格玛·伯格曼（Ingmar Bergman）拍摄的电影在全球所产生的吸引力，他不仅是瑞典最伟大的电影导演，而且也是世界电影史上最伟大的一位导演。他与具有创新观念的电影摄影师斯文·尼夫基斯特（Sven Nykvist，1922—2006）的合作被证明是天作之合，后者在同一届奥斯卡奖中两次获奖。诸如《野草莓》（Wild Strawberries，拍摄于 1959 年）、《假 260 面》（Persona，拍摄于 1966 年）和《芬妮与亚历山大》（Fanny and Alexander，拍摄于 1982 年）等影片确保了伯格曼作为最具洞察力的导演的地位。在他的影片中，人物最私密的心理状态与一种抒情性并置，以努力探索形而上的问题，与此同时也探讨个人生存中的相关问题。他挑选一些北欧世界最好的男女演员出演他的电影，对他（她）们的 261 发展也非常重要，其中包括马克斯·冯·赛多（Max von Sydow，生于 1929 年）、毕比·安德森（Bibi Andersson，生于 1935 年）、厄兰·约瑟夫森（Erland Josephson，生于 1923 年，是 19 世纪画家恩斯特·约瑟夫森的亲戚），最近被选中的还有挪威人丽芙·乌曼。其他已经成名的演员包括贾·库勒（Jarl Kulle，1927—1997）也在他的影片中出演角色。

由于认为瑞典社会民主党的文化政策产生了抑制效应，所以伯格曼对它非常敌视，这遭致极端社会主义者的怨恨。他们尽管欣赏他的电影创作天赋，但同时也希望他从受尊敬的地位上掉下来，因为他以轻蔑但又是哀伤的态度看待瑞典大部分现代艺术的堕落。这种冲突在 1976 年达到顶点，那一年伯格曼在斯德哥尔摩戏剧院（the Dramatic Theatre）被逮捕，罪名是逃税。不久，他被驱逐出瑞典，尽管一些年后他又回到瑞典。

伯格曼之后，一些新的导演脱颖而出，像莱塞·霍尔斯道姆（Lasse Hallström，生于 1946 年）凭借诸如《狗脸的岁月》（Mit Liv som Hund）等影片而走红，该影片拍摄于 1985 年，是根据瑞典作家瑞达·强森（Reidar Jönsson）的一部小说改编而成的。从此以后，霍尔

斯道姆主要是在好莱坞发展，而且更多表现出平民主义风格。这并不令人奇怪，因为他在早期曾为流行乐队阿巴（Abba）制作了一些音乐录影带。稍后的作品像拍摄于1992年的《恋恋情深》（What's Eating Gilbert Grape?）和拍摄于2005年的《卡萨诺瓦》（Casanova）等。他于2001年拍摄的电影《真情快递》（The Shipping News）是根据美国作家安妮·普鲁克斯（Anne Proulx）的小说改编的。他试图尝试跨越艺术片与票房号召力之间的鸿沟，但遭到惨败，虽然这部影片的主题是非常有价值的。

十一、音乐

战后，瑞典的流行音乐深受大西洋对岸发展潮流的影响，但就古典音乐而言，俄罗斯人的影响却非常明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世界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尼古拉·盖达（Nikolai Gedda，生于1925年，真名是尼古拉·乌斯季诺夫［Nikolai Ustinov］）的作用，他生于斯德哥尔摩，母亲是瑞典人，父亲是俄国人，与男演员彼得·乌斯季诺夫（Peter Ustinov）有亲戚关系。作为历史上录有最多唱片的歌剧演员之一，他尤其因为在柴可夫斯基的歌剧《叶普根尼·奥涅金》（Eugene Onegin）中扮演连斯基（Lensky）的角色而闻名。享有同等声望的是芬兰裔瑞典男高音歌唱家尤西·毕约林（Jussi Björling，1911—1960），他也取得了巨大声誉，在国际化的意大利歌剧舞台上居于统治地位。他在罗西尼（Rossini）的两部歌剧《威廉·退尔》（William Tell）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The Barber of Seville）中分别扮演了阿诺尔多（Arnoldo）和阿玛维瓦。最为著名的是他在贝多芬的歌剧《庄严弥撒》（*Missa Solemnis*）中，在托斯卡尼尼（Toscanini）指挥下演唱的男高音部分。这是1939年在纽约演出的，它的录音引起了歌剧发烧友的巨大兴趣。

262

女高音歌唱家比尔吉特·尼尔森（Birgit Nilsson，1918—2005）同样在国际舞台上取得了巨大声誉，尤其是她在德国和意大利歌剧中的表演。最著名的是她在瓦格纳（Wagner）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

德》（Tristan und Isolde）中对伊索尔德的演绎，稍后是在普契尼（Puccini）的齐名歌剧中扮演图兰多（Turandot）。

20世纪50年代，在音乐方面取得最大成功的是一部新的瑞典歌剧《阿尼亚拉》（Aniara），该剧由卡尔—毕尔格·布洛姆达尔（Karl-Birger Blomdahl，1961—1968）谱曲，由埃里克·林德格伦（Erik Lindegren）撰写，他是根据哈里·马丁逊的齐名诗歌改编的。在它于1959年5月31日的首次公演中，埃里克·塞登（Erik Sædén）和卢卢·波特法克斯（Loulou Portefaix）扮演了主要角色，前者饰演米玛罗本（Mimaroben），后者饰演伊萨格尔（Isagel）。

在流行音乐层面，阿巴演唱组合以他们的歌曲风靡世界，尤其是在1972—1982年间销售出350多万张唱片。成员包括班尼·安德森（Benny Andersson）、昂内塔·费尔特斯科格（Agnetha Fältskog）、安妮—福瑞德·林斯塔德（Anni-Frid Lyngstad）和比约恩·奥瓦尔斯（Björn Ulvaeus）。他们无疑是北欧世界最受欢迎的音乐组合，诸如《舞后》（Dancing Queen，1976年）和《给我一次机会》（Take a Chance on Me，1978年）等歌曲深受乐迷欢迎。这两首歌曲直到今天仍然非常流行，并成为不断再流行的经典歌曲。

十二、体育

像在艺术方面一样，在体育方面，瑞典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也是重要的。在20世纪第3个25年间，瑞典由于参与多样的体育运动而赢得国际声望，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网球运动。在这项运动中，比约·博格（Björn Borg，生于1965年）发挥了主要作用，他曾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网球选手，他被许多人，尤其是其他网球选手认为是该项目开展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在他保持高竞技水平的9年中，他在所参加的大满贯单打赛事中赢得了不下41%的冠军；此外，在他参加的大满贯单打赛事中赢得了89.8%的比赛。在瑞典许多赢得戴维斯杯（Davis Cup）的选手中，马茨·维兰德（Mats Wilander，生于1964年）非常著名，他也曾在世界排名中名列第一。他曾经赢得过7个大

满贯单打冠军头衔，以及一个大满贯双打冠军头衔。1988 年是他个人职业生涯最成功的一年，他帮助瑞典在那个十年间连续赢得 7 次戴维斯杯。因此，瑞典在国际舞台上赢得了“阿波罗神”的美誉。这不仅是由于它的政治公平、社会福利制度的榜样和技术专长，而且也因为它在文化和体育方面取得的成就。这些，对地处北欧边缘地带的一个小国而言，绝非平凡的成就。



结　论

新千禧年的开端见证了瑞典在政治上持续而渐进地右转，并且偏离超然世外的立场，这是几十年来它与欧洲其他国家所处关系的特征总结。2006 年 9 月，由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Fredrik Reinfeldt，生于 1965 年）领导的温和党（the Moderate Party）仅以 1% 的优势赢得多数选票，将社会民主党赶下台，也为瑞典带来它的第三位年轻首相。由于担心工作会受到威胁或担心瑞典福利制度会受到政府更替的破坏，所以新执政党在争取边缘选民上并未取得任何进展。政府减少社会部门规模的政策将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仍需拭目以待，而这些部门雇佣了瑞典总劳动力的大约 30%。作为欧洲税收最高的国家之一，减少税收和精简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与失业救济有关的改革，将在何种程度上实施也需拭目以待。高税收和高福利已经威胁到瑞典的经济发展。失业率目前为 6% 或 10%，如果将那些休病假和参加职业培训计划的人算上，它所涉及的总量会更大。 264

新世界秩序几乎是在冷战结束后一代人的时间形成的，它也带来新的敌人。瑞典保持了几乎两个世纪之久的政治和军事中立政策已退居幕后。奥萨姆·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对有关瑞典的声明并没有表达什么不满，却并未阻止后者支持在阿富汗进行的反对塔利班（Taliban）和基地组织（Al Qaeda）的战争，这就使它也像其他一些国

265 家一样易于遭受伊斯兰极端主义力量的攻击。丹麦的例子具有警示作用，由于丹麦报纸《丹麦日报》（Jyllandsposten）于2005年发表了一幅讽刺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的漫画，它就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推上火线，从而也使瑞典人意识到他们所需面对的新现实和危险。

在国内，变化也正在发生，尽管它涉及的范围要微小得多：瑞典贵族最后残留的一点特权也于2002年最终被废除，尽管这些特权已是象征性的。据说，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瑞典仍然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其中政府规章决定了政治和经济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不管是哪个政党掌权都是如此。确实，政府是在更大程度上干预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性别认同及权利到为支持少数民族权利提出的社会创新。不管这些是多么值得赞誉，但有一些干预受到了热烈的争议，认为它抑制了个人的创新活动。结果，私人的慈善活动仍保持在一个低水平上。社会大部分人的期望仍然是由政府提供医治社会病态所需的东西，不管这种社会病是什么。

生态问题与经济问题一道成为目前主导瑞典的政治辩论。全球变暖是一个尤其引起热议的问题，虽然传媒对正确解决方案的论调一致掩盖了气象学家、学者和工业家之间的认识分歧。可以肯定，18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炎暑并不比今天的情况更好，但对许多人来说绝非清楚的是：与太阳活动相比，人类在引致这些变化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大。据说，许多瑞典人倾向于不去冒险更进一步破坏大气层。因此，斯德哥尔摩的公共汽车是依靠来自污水厌氧处理的气体来推动的。

尽管有对生态问题的广泛关注，但瑞典人一般偏好乘飞机去热带旅行。因此，很多人都能够利用这种廉价的交通方式，通常是包机旅行，而不管由此造成的环境损害有多大。这些问题加上更快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系统，使瑞典在环境污染上已接近其他国家，尤其是它的欧

266 洲邻国。跨越松德海峡的大桥和隧道于2000年开通，将瑞典和丹麦连在一起，这是新的合作时代即将到来的一个潜在象征，不仅对北欧诸

国和德国而言是如此，并且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欧洲来说也是这样。

瑞典经济已经越来越多地与世界其他地方整合在一起，许多瑞典公司从国外获得的收入远远超过从国内获得的收入。像过去一样，瑞典以外发生的经济事件，尤其是美国的事件也能够对其国内产生巨大影响。2000 年爆发的席卷全世界的“科网股”（dot com bubble）也严重影响到了瑞典，它是从美国开始的，导致瑞典股市大跌，许多该领域的公司破产。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一直在发挥主要作用：沃尔沃卡车生产部与斯堪尼亚公司卡车部合并以建立一个单一公司的计划被政府阻止，以避免造成垄断，而垄断被认为不利于瑞典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

仍然处于迅速发展中的电信产业，过去和现在一直都容易受到全球经济的影响。因此，在千禧年之交，当世界电信业处于危机状态时，爱立信也不例外：它的市值仅在 2001 年就缩水 303 亿克朗。不过，它在 2004 年与索尼合并，再次成为赢利企业，并且在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上也更加国际化。它的总部在斯德哥尔摩，而且仅是诸多以那里为总部的电信产业中的一个，这导致有人将该城市称为“无线谷”（the Wireless Valley）。

如果一些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的话，那么其他尤其是社会性质的问题却不太容易解决。酗酒仍然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像许多其他北欧国家的情况一样。确实，在新千禧年到来之际的瑞典，酒精饮料的消费急剧增加，尤其是啤酒和葡萄酒，比 1996 年的消费量多了大约 40%。

另一方面，失业率保持在相对低的水平。据说，工作的保障性在不断下降，因为很少有人能像过去那样依赖于终生的职位直到退休。这种新的就业模式也许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它也增加了个人的压力感。瑞典经济相比 20 世纪 80 年代的下滑使这个问题变得严重，因为它没有石油资源的收益来减轻这种不良效应，像邻国挪威和俄罗斯那样。还有就是瑞典加快了对现代技术开发的投资，事实上，GNP 中超过 3% 的资金被投入这种研究和开发，这个比例甚至远高于美国在该

267

领域的投资比率。

学术研究也保持着快速发展，虽然从投资方面看，科学相比人文学科明显受到青睐，但对后者也进行了新的投资。因此，被译为瑞典语的新版《圣经》于2000年出版，这是一项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事业，涉及大约250名学者，而对此项目的投次超过6.7千万克朗。

北欧世界长期存在的种族分歧已经得到弥合，而其他种族和民族的紧张关系仍然存在。这包括土生的瑞典人和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移民，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欠发达国家的移民之间新的更加尖锐的冲突，经常会引发政治和军事骚乱。斯德哥尔摩第一家清真寺于2000年6月在南岛区（Södermalm）的公民广场附近投入使用，这是一种宗教宽容的标志。但由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分子的威胁不断增加，以及公众对此的焦虑反应，至今仍不太清楚这一新的场所将如何改变传统上信奉自由的瑞典人。

就卫生与健康而言，瑞典的情况仍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之一。尽管医疗服务机构越来越多地私有化，而且瑞典老年人口不断增加对公共医疗服务也在提出越来越高的要求，它无疑会增加该体系所面临的压力，但公共医疗水平仍然很高。心脏病发病率相对于以前几十年的观察已经下降。该国是世界上人民营养最好的国家之一。而且，历史上的几乎所有的严重传染病都已消失：麻疯病、天花、疟疾和霍乱都仅仅是在遥远的过去才存在。就爱滋病而言则另当别论；尽管通过良好的性教育和对患者的适当医治，这种疾病的传播已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抑制。据说，瑞典已经为可能出现的新威胁作好了准备：旧的传染病可能由生物恐怖主义者重新引入，新型流行感冒病症也可能出现，诸如“禽流感”（bird flu）等。还有越来越严重的吸毒问题，尤其是在年轻人中间，这似乎成为一种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它已经导致犯罪的增加，尤其是在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社区，他们中的少数人参与了毒品交易，并且过多地卷入到其他形式的犯罪之中。不过，在20世纪末的斯德哥尔摩，谋杀犯罪所占比率一直很低：每10万人中仅有3例，或仅稍稍高于同一时期的英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纽约是

268

16.8例，赫尔辛基是12.5例；但还有另一个极端，即罗马仅有1.7例，雅典是1.4例。因此，瑞典在这方面还很难自夸有着例外的良好记录。就卖淫而言，嫖娼于1999年被宣布为非法，但卖淫却是合法的。

性别问题依然非常重要。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的伙伴关系目前在瑞典被承认，即使是在偏远地区也是如此。但传统的价值观和成见仍然占据优势地位。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趋势一致，婚姻作为一种制度一直呈衰落趋势，许多瑞典人，包括一定数量的男女同性恋父母，都更倾向于在婚姻制度之外生养孩子。

传统生活方式的其他方面也持续受到威胁。尽管萨米族的驯鹿放牧者挺过了1986年切尔诺贝利灾难的破坏性影响，但其他威胁也在限制他们传统游牧生活方式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他们放牧所能利用的草场在急剧减少，因为由现代生态学家鼓励的所谓“受管理的荒野”目前根本就不是荒野。另一方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宣布了瑞典的拉普兰地区是世界遗产保护区，这对游客而言是一种恩惠，但对萨米人而言却不是这样，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的草场来放养经常是过分拥挤的畜群。此外，经济需要也迫使放牧者在有限数量的草场上将肉产量最大化，而这通常是与荒野的自然生长“要求”相矛盾的。这种情况又由于瑞典政府对狼提供的保护而进一步恶化。与牧人的期望相反，狼对畜群而言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威胁，对那些饲养的驯鹿被这些食肉动物吃掉的牧人所作的补偿仅仅是市场价值的1/4。水力发电对草场的占用也起到了不良作用。 269

然而，对许多萨米人而言还存在着别样的问题，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目前关注的是不同的问题。驯鹿放牧本身已成为私人的事务，只有那些从中谋取生计的人才关心。没有足够的土地使许多人从事这项活动，因而不少人已经从事其他职业，尤其是到工厂工作和从事旅游业。伴随当代萨米人职业的这种多样化，当地许多不同的政党纷纷成立，它们分别代表萨米人不同的政治和其他利益。

目前，瑞典在欧盟中的作用和对欧盟的认同已被很好地确立，但

这仍然是有争议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引发暴力冲突。2001 年，瑞典接任欧盟主席国职位，但就在这一年，当欧盟各国领导人齐聚哥德堡开会时，那里爆发了激烈的抗议活动，80 人受伤，造成损失大约为 1 亿克朗，1 千多人被捕。尽管存在着草根层的这种不满，但瑞典的忠诚可以由它对欧盟的贡献予以证明，它上交给欧盟的费用是大约 110 亿克朗或它 GNP 的 0.5%。这是其他国家无法比的。

就对联合国而言，瑞典从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成立伊始就保持一种不同寻常的高姿态。自 1964 年以来，瑞典就保留两个营的兵力为联合国服务所用；在各种维和任务中，有 60 多名瑞典士兵牺牲在它的旗帜下。在巴尔干地区（Balkans），瑞典军队在科索沃（Kosovo）的普里什蒂纳（Priština）发挥了尤其重要的作用，2002 年那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瑞典外交代表汉斯·布利克斯（Hans Blix，生于 1928 年）在 1981 年到 1997 年间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the 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主席职务，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问题以及黎巴嫩冲突中都发挥了重要虽然偶尔也存有争议的作用。许多人也许不同意他的观点，但很少有人怀疑他所代表的瑞典所具有的诚信，以及这个国家作为现代世界的和平使者所发挥的作用。人们还相信，它所拥有的社会和谐模式将是世界大多数国家会很好予以效仿的榜样。



附录 1　瑞典的君主和摄政王

乌普萨拉王朝

约 994 年	埃里克·塞格萨尔
约 994—1022 年	奥洛夫·埃里克森·舍特科农
约 1022—1050 年	阿努德·雅各布
约 1050—1060 年	大埃蒙德

斯滕克尔王朝

约 1060—1066 年	斯滕克尔
约 1070 年	哈肯·罗德
约 1080—1110 年	哈尔斯滕和小英格
约 1110—1120 年	菲利普和小英格
1120—1130 年	空位期

斯渥克尔王朝

约 1135—1156 年?	大斯渥克尔
约 1156—1160 年	圣埃里克九世耶德瓦尔德森
约 1161—1167 年	卡尔七世斯渥克森

约 1167—1196 年	克努特·埃里克松
1196—1208 年	小斯渥克尔·卡尔松
1208—1216 年	埃里克十世克努特松
1216—1222 年	约翰一世斯渥克森
1222—1229 年	埃里克十一世埃里克松
1129—1234 年	克努特·（高个子）霍尔姆格尔松
1234—1249 年	埃里克十一世埃里克松（复位）

福尔孔/比格尔王朝

1250—1275 年	瓦尔德马尔·比格尔松 （1250—1266，比格尔·雅尔摄政）
1275—1290 年	马格努斯·比格尔松·拉杜劳斯
1290—1318 年	比格尔·马格努松 （1290—1298，托尔吉尔斯·克努特松摄政）
1319—1363 年	马格努斯·埃里克松 （1319—1332，马格努斯·埃里克松被摄政期）
1357—1359 年	埃里克十二世
1362—1364 年，1371 年	哈肯

梅克伦堡王朝

1364—1389 年	梅克伦堡的阿尔布莱克特

联盟与当地摄政时期

1389—1412 年	玛格丽特·瓦尔德马尔多特（Margarete Valdemarsdotter）
1396—1439 年	波美拉尼亚的埃里克
1441—1448 年	巴伐利亚的克里斯托弗

1448—1457 年	卡尔八世克努特松·邦德
1457—1464 年	克里斯蒂安一世
1464—1465 年	卡尔八世克努特松·邦德
1467—1470 年	
1471—1497 年	大斯滕·斯图尔（国家政务会的领导人）
1497—1501 年	汉斯·约翰二世
1501—1503 年	大斯滕·斯图尔（国家政务会的领导人）
1504—1512 年	斯万特·尼尔松·斯图尔（国家政务会的领导人）
1512—1520 年	小斯滕·斯图尔（国家政务会的领导人）
1520—1521 年	克里斯蒂安二世

瓦萨王朝

1523—1560 年	古斯塔夫·瓦萨
1560—1568 年	埃里克十四世
1569—1592 年	约翰三世
1592—1599 年	西吉斯蒙德
1604—1611 年	卡尔九世
1611—1632 年	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
1644—1654 年	克里斯蒂娜（1632—1644 年阿克塞尔·奥克森斯特纳摄政）

普法尔茨王朝

1654—1660 年	卡尔十世古斯塔夫
1672—1697 年	卡尔十一世 (1660—1672，由王太后海德薇格·

	埃莱奥诺拉和五位枢密顾问摄政时期）
1697—1718 年	卡尔十二世 （1697 年枢密顾问摄政时期）
1719—1720 年	乌尔丽卡·埃莱奥诺拉

黑森王朝

1720—1751 年	弗雷德里克一世

荷尔施泰因—戈托普王朝

1751—1771 年	阿道夫·弗雷德里克
1771—1792 年	古斯塔夫三世
1796—1809 年	古斯塔夫四世阿道夫 （1792—1796，卡尔公爵摄政时期）
1809—1818 年	卡尔十三世

贝纳多特王朝

1818—1844 年	卡尔十四世约翰
1844—1859 年	奥斯卡一世
1859—1872 年	卡尔十五世
1872—1907 年	奥斯卡二世
1907—1950 年	古斯塔夫五世
1950—1973 年	古斯塔夫六世阿道夫
1973—	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附录 2　瑞典的历任首相

1876—1880 年	路易斯·德·吉尔，独立自由派人士
1880—1883 年	阿尔维德·波塞，农民党
1883—1884 年	卡尔·约翰·西塞留，独立保守派人士
1884—1888 年	罗伯特·塞姆坦德，独立自由派人士
1888—1889 年	D. A. 吉利斯·比尔特，独立保守派人士
1889—1891 年	古斯塔夫·艾克汉姆，贸易保护主义多数党
1891—1900 年	埃克里·古斯塔夫·博斯特罗姆，第一任期，农民党
1900—1902 年	弗雷德里克·冯·奥特，独立人士
1902—1905 年	埃克里·古斯塔夫·博斯特罗姆，第二任期，农民党
1905 年	约翰·兰姆斯特德，独立人士
1905 年	克里斯蒂安·伦德伯格，贸易保守主义多数党
1905—1906 年	卡尔·斯塔夫，第一任期，自由联盟党
1906—1911 年	阿尔维德·林德曼，第一任期，大选联盟
1911—1914 年	卡尔·斯塔夫，第二任期，自由联盟党
1914—1917 年	雅尔玛·哈马舍尔德，独立保守派人士

1917 年	卡尔·施瓦茨，民族党
1917—1920 年	尼尔斯·埃登，自由联盟党
1920 年	雅尔玛·布兰廷，第一任期，社会民主党
1920—1921 年	小路易斯·德·吉尔，独立自由派人士
1921 年	奥斯卡·冯·赛多，独立人士
1921—1923 年	雅尔玛·布兰廷，第二任期，社会民主党
1923—1924 年	恩斯特·特里戈尔，民族党
1924—1925 年	雅尔玛·布兰廷，第三任期，社会民主党
1925—1926 年	理查德·桑德勒，社会民主党
1926—1928 年	卡尔·古斯塔夫·埃克曼，第一任期，有自由意识的人民党人
1928—1930 年	阿尔维德·林德曼，第二任期，大选联盟
1930—1932 年	卡尔·古斯塔夫·埃克曼，第二任期，有自由意识的人民党人
1932 年	费利克斯·哈姆林，有自由意识的人民党人
1932—1936 年	皮尔·阿宾·汉森，第一任期，社会民主党
1936 年	阿克塞尔·佩尔森—布莱姆斯托普（Axel Pehrsson-Bramstorp），农民联盟
1936—1939 年	皮尔·阿宾·汉森，第二任期，社会民主党
1939—1945 年	皮尔·阿宾·汉森，第三任期，社会民主党
1945—1946 年	皮尔·阿宾·汉森，第四任期，社会民主党
1946—1951 年	塔格·埃兰德，第一任期，社会民主党
1951—1957 年	塔格·埃兰德，第二任期，社会民主党
1957—1969 年	塔格·埃兰德，第三任期，社会民主党
1969—1976 年	奥洛夫·帕尔梅，第一任期，社会民主党
1976—1978 年	图尔比约恩·费尔丁，第一任期，中央党
1978—1979 年	奥拉·乌尔斯滕，人民党
1979—1981 年	图尔比约恩·费尔丁，第二任期，中央党
1981—1982 年	图尔比约恩·费尔丁，第三任期，中央党

1982—1986 年	奥洛夫·帕尔梅，第二任期，社会民主党
1986—1991 年	英瓦尔·卡尔松，第一任期，社会民主党
1991—1994 年	卡尔·比尔特，温和党
1994—1996 年	英瓦尔·卡尔松，第二任期，社会民主党
1996—2006 年	约兰·佩尔松，社会民主党
2006—	弗雷德里克·赖因费尔特，温和党

推荐书目

Baldwin, Peter. *Contagion and the State in Europe, 1830—193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Carlsson, Harry G. *Out of Inferno. Strindberg's Reawakening as an Artist*, Seattle, Washing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Grell, Ole Peter, ed. *The Scandinavian Reformation. From Evangelical Movement to Institutionalisation of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Grell, Ole Peter and Andrew Cunningham, eds. *Health Care and Poor Relief in Protestant Europ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77.

Griffiths, Tony. *Scandinavia*, Kent Town, South Australia, Wakefield Press, 1991 and 1993.

Helle, Knut,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candinavia, volume I: Prehistory to 152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Hope, Nicholas. *German and Scandinavian Protestantism, 1700—1918*,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Johnson, Amandus. *The Swedish Settlements on the Delaware, 1638—1664*, volumes I and II, New York, D. Appleton, 1911 (reprinted 2005).

Kent, Neil. 'Gustaf III and Italian Culture', in Shearer West, ed., *Italian Culture in Northern Europ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87—206.

Light and Nature in Late 19th Century Nordic Art and Literature, Acta Universitatis Upsaliensis, Ars Suetica 13, Uppsala, 1990.

The Soul of the North: a Social, Architectural and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Nordic Countries, 1700—1940, London, Reaktion Books, 2000 and (in paperback) 2001.

The Triumph of Light and Nature: Nordic Art 1740—1940,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87; published in Swedish by Bonniers in 1987

(English version reprinted in paperback in 1992).

Klinge, Matti. *The Baltic World*, Helsinki, Otava, 1994. Koerner, Joseph Leo. *Caspar David Friedrich and the Subject of Landscap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90.

Levack, Brian P.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2nd edn,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 1995.

Lundh, Christer. 'Households and Families in Pre-industrial Sweden', *Community and Change. A Journal of Social Structure, Law and Demography in Past Societies*, 10/1 1995, pp. 33—68.

Michalski, Sergiusz. *The Reformation and the Visual Arts. The Protestant Image Question in Western and Eastern Europe*, London, Routledge, 1993.

Ranger, Terence and Paul Slack, eds. *Epidemics and Ideas. Essays on the Historical Perception of Pestil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Roberts, Michael. *The Early Vasas: a History of Sweden, 1523—161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From Oxenstierna to Charles XII: Four Studi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Ruong, Israel. *The Lapps in Sweden*, Stockholm, Swedish Institute for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Foreign Countries, 1967.

Rydén, Göran. 'Iron Production and the Household as a Production Unit in a Nineteenth-century Sweden', *Continuity and Change. A Journal of Social Structure, Law and Demography in Past Societies*, 10/1 1995, pp. 69—104.

Salmon, Patrick. *Scandinavia and the Great Powers, 1890—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Wadström, C. B. *An Essay on Colonization particularly applied to the Western Coast of Africa with some free thoughts on Cultivation and Commerce, also Brief Descriptions of the Colonies Already Formed, or Attempted in Africa, Including those of Sierra Leona and Bulama*, London, 1794.

Whitaker, Ian. *Settler and Nomad in Northern Torne Lappmark*, *Polar Record*, 21/133, London, 1983.



索　引

（文中所标页码为原书页码）

A

B

C

D

F

G

H

K

L

M

N

O

P

R

S

T

U

V

W

Z

译后记

《瑞典史》系“剑桥国别简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作者尼尔·肯特（Neil Kent）是英国历史学家，主攻文化艺术史；早年曾就读于剑桥大学，现任圣彼得堡国立艺术、建筑与文化学院教授，同时担任剑桥大学斯科特极地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尼氏有多部著作出版，这部《瑞典史》只是其最近的一部著作。

瑞典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国度。她的地理版图不大，人口数量也不多，但却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佼佼者，特别是它的福利国家制度堪称典范。作为一部国别的简史，受篇幅的局限，不可能将历史事件的细节展开叙述。但作者却以精练的文字语言，描述了从石器时代直到今天长近3千年的瑞典发展的历史进程脉络，从而使我们能够比较鲜明地认识那里发生的一切演变及其过程。

瑞典曾经维持了千余年等级森严的君主专制政体，只是伴随自然经济的解体、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才有了社会民主制度的兴起。瑞典的经济竞争力全球闻名，爱立信、沃尔沃、利乐、宜家等都是它享誉全球的品牌。她是一个多移民、多民族的国家，而广大民众，不论贫富、宗教信仰、政治态度，却共同树立有牢固的集体责任观念，从而奠定了社会和谐的理念基础。她是一个高税收国家，但取自富人的税金又返还给社会，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全民享有的

社会福利制度。她的左邻右舍曾是沙俄帝国和希特勒独裁统治的纳粹德国。因此，她较早地实行了军事中立政策，直到今天……相信，瑞典国家这些独具特色的历史演化定能吸引读者的探究兴趣，并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诚然，任何一部历史著述都不可能是纯客观的记叙。像对于原始材料的取舍、历史事件的评价、历史人物的褒贬，无一不体现着著者的立场、观点、偏好与意图。本书也不例外。比如，作者是一位主攻文化、艺术的学者，自然会对瑞典文化艺术领域的变迁给予特别的关注，以致本书在瑞典各个历史时段的记叙中，都以相当多的笔墨在追述其文化、艺术的成就，这就造成在政治和经济发展线索交代的完整性和逻辑性上受到一定影响。再比如，作者并未能摆脱西方学者对福利国家制度的认知的影响，认为福利国家制度造成的社会惰性，压抑着个人的创新精神。因此，在阅读本书时，对其中某些观点的认知，应有批判的取舍。

非常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于沛先生，是他推荐我翻译此书的。还应该感谢世界历史所的刘军先生，正巧这段时间他在瑞典做访问学者，帮助我解决了一些生偏译名的翻译问题。最后向本书的编辑王亦妮女士致以感谢，她做了细致的编辑工作。由于我个人水平有限，再加翻译时间要求比较紧，所以呈现给读者的这个译本会存在不少缺陷，企望读者给予指正。

吴英

2009 年 6 月 19 日